







解放军将领传

第四集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军将领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4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北京

目　录



伍　中　豪



伍　中　豪

一

伍中豪（1905—1930），原名伍昭萧，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城关镇伍家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城市贫民家庭。父亲伍茂定是清末秀才，早年病逝。母亲资氏是个读过四书五经颇有才学的家庭妇女。

伍中豪七岁开始读私塾，四年后考入耒阳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到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伍中豪八岁时可背诵一千多字的文章，十二三岁时可作诗，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每逢暑假、寒假大多在家乡度过。他十分同情受苦受难的群众。有一年秋收后，到他家送租谷的农民跑了一二十里路，汗流浃背，伍中豪主动给农民递水送茶，有一个农民少送了八九斤谷，急得直冒汗，他在一旁赶忙说："算了！算了！"给解了围。伍中豪在耒阳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自带中午饭，常常多带些饭、菜，分给那些家庭贫苦的同学吃，受到师生的夸奖。离他家不远有个刘家祠堂，一个姓刘的穷苦人在祠堂

旁边租间房做卖酒生意。由于生意不太好，交不起租金，房主要封他的酒铺，伍中豪上前据实说理，说得房主只好作罢。

伍中豪从小热爱劳动，寒、暑假期间经常到菜地里锄地拔草，还帮母亲带弟弟妹妹。他的年令稍大点就利用假期进行一些社会调查。他还和本地进步青年陈芬、刘太等人在一起叙谈青年理想和革命前途。

二

一九二二年秋，伍中豪考入北京大学，更多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不久，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带领青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年寒假，伍中豪回到家乡，与贺恕等人组织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耒阳支部。

一九二四年六月，伍中豪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参加学校进步学生运动受到军方的通缉。一天晚上，一支反动武装突然包围了学校，伍中豪闻讯越墙逃走。随后，他回到家乡，与贺恕、刘太等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耒阳第一个支部。同年年底，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一个支部发展为三个支部，伍中豪担任了其中一个支部的书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共耒阳县地方执委会建立，伍中豪任执委会宣传委员，其妻段凤翔任执委会妇女委员。

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伍中豪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少校副官。不久，返郴州、耒阳一带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自卫军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秋，伍中豪参加北伐战争，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三营十二连连长。

警卫团是共产党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警卫团赶赴江西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伍中豪和警卫团全体官兵从武汉乘坐一艘轮船顺流南下，他仰望满天星斗和滔滔的长江，心情激动，思潮翻滚，为将要参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而兴奋。轮船行至途中，得悉九江因敌所阻不能上岸，只好到黄石港登陆，然后步行向南昌前进。行至阳新县，伍中豪所在的三营每人领到一支“汉阳造”和百余发子弹。部队到达奉新后，得知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向赣南转移。当时，赣江沿岸都有敌人重兵把守，警卫团不能与起义部队会合，便返回江西修水休整。

此时，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由四个团组成，以武汉警卫团的大部编成第一团，卢德铭任团长；以安源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王兴亚为团长；以武汉警卫团的四连、八连、十二连和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团，苏先骏为团长，伍中豪为该团第三营副营长；另外，将收编的一部分旧军队编为第四团。秋收起义的进军路线是一、四团攻打平江，二、三团攻打浏阳，然后会攻长沙。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第三团按计划经白沙、东门，攻打浏阳。部队到达白沙市，打了一个小仗，打退了阻截的敌人，然后向东门前进。东门市内没有敌人，部队驻下正准备开饭时，外面枪声响了，伍中豪带领第三营迅速抢占制高点，但敌人已经占领有利地形，且用优势的火力向革命军猛烈射击，因敌众我寡，不少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伍中豪率领部队经过奋力拼杀，才突出重围。与此同时，第二团在进攻浏阳时也遭到敌人伏击，大部分英勇牺牲；第一团在进攻平江时，由于第四团叛变，被敌人前后夹击，也遭失败。

不久，秋收起义剩下来的一、三团在文家市会合。毛泽东对全体官兵讲了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进攻城市，应该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城市，并决定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的革命军沿着湘赣边境向井冈山前进，经过萍乡芦溪镇时，又遭敌伏击。由于当时情况不明，缺乏思想准备，加之长途行军，部队十分疲劳，患病者甚多，敌人又抢占了芦溪镇四面的小山头，我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损失严重。卢德铭团长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芦溪失利后，余下的部队到了江西省永兴县的三湾，毛泽东同志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由一个师改为一个团，实际上只有第一、三两个营，伍中豪为三营营长。

经过艰难和曲折，起义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上了井冈山，安了“家”。

一九二八年初，伍中豪率领第三营和革命军其他部队一起下井冈山，攻打遂川县。

部队在前进途中，到达一个小镇子，遇到敌人的民团。敌民团在一条河的南岸猛烈射击，伍中豪果断地指挥部队绕道过河包抄敌人。战士们不顾刺骨的严寒，连裤脚也未卷，从齐腹深的河水中蹚了过去，很快占领了一个山头，打垮了敌人。伍中豪率部队继续前进，在遂川城下进行了一次较小的战斗，敌人溃逃，革命军很快占领了遂川县城。随后，在遂川周围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每个指战员发了五块光洋，两套新的军装，把原来杂七杂八的衣服全换掉了，军容焕然一新。当敌人调大部队来围攻时，革命军已撤出遂川，顺利地返回了井冈山。

不久，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一、二团下山，攻打井冈山下的宁冈县城，按预定计划第一团进攻东门、南门和北门，第二团埋伏在西门外的一片树林子里。拂晓，四面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同时发起攻击。伍中豪率领第三营在南门进攻。因城墙高，他指挥八连架起竹梯往上爬，结果被敌人猛烈的火力打下来。又换上九连，敌人居高临下，占领了有利地形，火力凶猛，红军伤亡很大，伍中豪左臂也负了伤，简单包扎以后他又忍着伤痛继续指挥战斗，经过顽强拼杀，九连三排胜利爬上城头，打开了城门。这时东门、北门也相继被打开，革命军“冲呀！杀呀！”喊声震天，敌人吓得迅速向西门逃窜，革命军随即猛追，敌人进到一片稻田时，革命军第二团向敌猛烈开火，在一、二团合攻下把敌人围歼在稻田里。此战，全歼敌杨汤池部七十九团一个营及“挨户团”共七八百人，这是秋收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一九二八年三月，毛泽东率领井冈山部分革命军到湘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在大汾圩遭到大批敌人围攻，部队被冲散。毛泽东带领一团团部和一营向茶陵方向转移，以后攻克茶陵。此时，伍中豪率领的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络，在湘南上堡镇与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当时，朱德领导的部队暂时以国民党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为掩护。朱德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伍中豪的第三营通过朱德的关系，打着四十七师一

四二团的番号，也取得了大批武器装备，并进驻桂东县城休整。不久，毛泽东派朱云卿寻找三营，随后第三营到茶陵与一团团部会合。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向井冈山革命据据地转移，四月中旬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编六个团。之后，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率部转战湘赣边界。

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准备反击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严密封锁。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军主力出击赣南，到外线机动作战，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以内外配合，粉碎敌人"会剿"，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一月中旬，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挺进，途中多次打破敌人的追击和阻截，于二月九日到达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此时，敌两个团紧紧尾追，前委决定：抓住敌人孤军冒进的弱点，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战斗整整打了两天，最后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八百余人，伍中豪指挥三十一团战绩卓著，受到前委赞扬。

不久，三十一团改编为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司令员（又称纵队长）。他率部转战赣闽边界，先后攻占闽西的龙

岩、永平、武平、上杭等县，三月中旬进抵闽西长汀以南，准备攻打长汀。

长汀是闽西重镇，也是敌人进攻闽赣根据地的重要基地，伍中豪率部参加了攻打长汀战斗，经过两天的苦战，冲破了敌人的坚固工事，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合旅两个团，击毙敌旅长郭凤鸣，俘敌上千人，缴获各种枪千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占领了长汀城。攻克长汀，为红军闽西地区的斗争，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三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据闽西武装斗争形势，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

四

一九三〇年五月，伍中豪身患急性肺炎，被送进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毛泽东对伍中豪的病情十分关怀，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去病房看望，问寒问暖，摸摸额头，探探体温，有时还向傅连暲院长询问治疗情况。他一来就坐在伍中豪病床边上，久久不愿离去。肺炎是易传染的疾病，但阶级友爱使毛泽东不顾这些。当时，缺医少药，傅连暲院长作了最大努力，才使伍中豪的病情日渐好转。

一九三〇年九月，工农红军一、三军团久攻长沙不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撤围长沙，转战赣南，不久攻克吉安。伍中豪得悉后十分兴奋，病还未痊愈，他便要求出院

寻找部队。十月间，伍中豪带着治愈的十几个伤员前往吉安寻找红军，途经安福县城附近时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当时，他们没有武器，只有伍中豪带着一支短枪。伍中豪奋不顾身，掩护伤员突围，而他自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五岁。

（曾纪荣、李绍梅）



关　向　应



关 向 应

一

关向应(1904—1946)，原名关致祥，一九〇四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家屯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

关向应读小学时，东北人民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年幼的关向应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但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却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有钱人就享福，穷人就受苦？""世界太不公平！"他立志："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平一平"，做到"要吃都有吃，要穿都有穿"。因而，他对受苦受难的穷苦人非常同情。一次他遇见一个沿街行乞的老太太，就把自己兜里仅有的一点钱全都给了老人，老人对他十分感激。

一九二〇年四月，关向应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读书。他在大连目睹了外国殖民主义者横行霸道、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之后，愤愤表示："一定要把外国鬼子赶出中国。""我们不能容忍这种野蛮行为继续下去！"他在学校积极参加反对日本教师在歧视和无端打骂中国学生的

罢课活动。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做杂役工。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回家了。乡里日伪商会会长知道他毛笔字写得好，要他去事务所当书记，关向应严词拒绝。他说：“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我不当鬼子差！”以后，他到泰东日报社做学徒工，在工人中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一次，报社内的日本人在就餐时污辱中国工人，关向应就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迫使日本人赔礼道歉才了事。事后他说：“叫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

一九二三年冬，共产党人李震瀛等到大连进行革命活动。经人介绍，关向应认识了李震瀛。在李震瀛的启发教育下，关向应积极参加李震瀛在大连组织的革命活动。翌年四月，关向应由李震瀛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五月中旬，随李到达上海，在闸北市民协会工作。同年底，中共中央派他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出国前夕，关向应满怀激情给叔父写信，表示他为祖国为民族求解放的决心。他在信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侄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关向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回到上海，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不久调任青岛团地委书记。青岛团组织曾遭到军阀张宗昌的严重破坏，其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关向应去后，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组织。但在恢复过程中又一次遭到敌人破坏，一些团干部被捕，关向应也被通缉。面对白色恐怖，他毫不畏惧，继续忙于青岛市区及四方、沧口等地的团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由于他的积极努力，青岛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团支部由原来的一个发展到九个，团员由二十一人发展到八十三人，七家纱厂，已有六家有了团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关向应调往汉口工作。他积极组织武昌、武胜门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得了武汉童工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胜利后，他写文章对工人阶级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热情的赞扬："这一个小小的胜利，自然不能是满意的，但这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总算是破天荒的创举！这一个小小的胜利，是童工血汗的积累，是童工在革命过程中勇敢牺牲争得来的结果。因此，值得我们十分庆祝的。"他同时指出，这只是初步的胜利，"还需要继续的努力斗争……达到真正实现每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的目的，并为扩大八小时工作范围而斗争。这是武汉童工当前的重大任务。"在武汉期间，共青团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八年初，关向应回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长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他勤恳地为党工作。由于人手少，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文件。为使党的活动工作经费有来源，他忍饥受寒沿街卖报纸。关向应十分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经常劝导青年们到工人中间去走走，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在实际斗争中加强锻炼。他说："这是很有意义的革命工作。"同年六月，关向应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少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报告，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〇年他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工作。一九三一年又到上海工联工作。为指导工人斗争，关向应多次发表文章论述武装工人的重要性。他在《工人武装问题》一文中，从斗争方式、组织路线、主要任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特别指出，工人纠察队组织要发挥作用，必须与工会和中心任务联系起来，在党支部领导下才能取得。不久，由于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化名李仕真同敌人进行斗争。敌人采用种种酷刑对他进行摧残，他誓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派关向应到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同贺龙一起指挥红三军向襄河以北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作战五十余天，共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也得到扩大。但是，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夏曦领导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策，红三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于九月被迫退出洪湖革命根据地，年底转战到湘鄂边地区。第二年二月恢复了湘鄂边根据地，并向湘西发展，进入建始官店和巴东金果坪一带。湘鄂边地区各县在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困苦，加之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和破坏，红三军进到这里，给养遇到很大困难，一度掘食草根，在寒风凛冽的冬天，从领导干部到战士没有棉衣御寒，部队一方面要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浴血奋战，一方面还要四处筹措给养，处境非常困难。关向应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无论刮风下雨，宿营时摊上草秸，盖上多年使用的唯一的一条破毯子便睡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想到的总是人民。他说，我们困难，人民更困难，教育部队，不要去扰民，不要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当部队要离开驻地时，关向应总要到部队驻地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在湘鄂边地区为解决军民食粮问题，他亲自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并号召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和军事训练之余为群众打草、背炭、挑粪，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同

时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中，关向应很注意斗争策略，他坚持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有些地区因为是新开辟区，贫苦农民怕变天，不敢分领粮食，关向应就带领干部战士把粮食给贫苦农民送去，使农民深受感动。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湘鄂边苏维埃政权。

一九三三年春，红三军在夏曦左倾错误之下，解散了军内的党团组织，撤销了军内的各级政治机关。这一错误决定及肃反继续扩大化，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下，红三军被迫转战湘鄂川黔边界之黔江、酉阳、秀川、利川。一九三四年六月渡过乌江进入贵州沿河县境。部队进入毛坝后，在贺龙支持下，关向应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对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关向应提出，部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部队到达枫香溪后，由关向应主持再次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停止错误的肃反，恢复红三军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会后，关向应不分昼夜地深入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亲自主持登记和发展党、团员，恢复部队的党、团支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从而大大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使红三军迅速发展，部队人数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在根据地建立过程中，关向应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强

调做好群众工作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提出："我们要想在川黔边地区站住脚，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在关向应和贺龙领导下，红三军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游击队，深入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县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创建了有二十万人口、纵横二百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还成立了黔东革命委员会。

关向应在黔东时期，对红二方面军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自湘赣根据地出发，经过艰苦转战，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黔东与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了会师胜利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并以红二军团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二、六军团的会师，力量加强了，声威大震于湘鄂川黔边地区。为钳制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从黔东地区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十一月七日袭占永顺。湘西军阀陈渠珍立即调集一万余人向永顺逼进，红军决定放弃永顺，诱歼该敌于运动中。十六日，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城北龙家寨地区，三面设伏，一战而胜，歼敌两个旅大部，击溃敌人一个旅又一个团，俘敌旅参谋长以下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三百余支，再次占领永顺，为继续发展攻

势取得了有利条件。十一月二十四日，又攻占桑植、大庸两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宣告成立，关向应任省委委员和中央军委分委委员，参予两委员会领导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和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十二月初，红军由大庸南下，袭击沅陵，由于守敌有准备，遂改变计划，顺沅水东下，十二月十六日在桃源与常德之间的浯溪河、河洑地区，歼灭了敌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又两个营，击溃其一个团，并乘胜包围常德，占领桃源。十二月二十四日，红军主动撤离常德、桃源地区，回师占领慈利，一九三五年初回到大庸。在近两个月的湘西攻势中，二、六军团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大部，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不仅有效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还造成了轰轰烈烈地革命形势，初步形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猛烈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在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的同时，集中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万余人，分六路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进行大规模“围剿”。三月十四日，红二、六军团在永顺高粱坪将敌两个保安团击溃，接着又歼灭增援之敌第十六师的两个团一部。二十一日在大庸后坪毙伤敌近五百人。四月上旬，省委和军委分会传达了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四月十三日，二、六军团在桑植

陈家河地区，抓住敌人态势孤立、配置分散的有利战机，对立足未稳之敌陈耀汉纵队实施进攻，一举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团。四月十五日，又在桃子溪地区将敌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一个团全部歼灭。陈家河、桃子溪战斗后，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两仗胜利，红军由被动转入主动。六月中旬，红军在咸丰县忠宝地区歼敌张振汉纵队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生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八月上旬，在宣恩县板栗园战斗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击毙敌师长谢彬。板栗园战斗后，红军返回湘西根据地。八月八日，红军又在芭蕉坨一举击溃敌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军乘胜由反"围剿"转为进攻，集中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县地区突击。除留少数部队在根据地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和钳制敌人外，主力于八月二十日开始攻势作战，先后占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城，在根据地东部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和指挥下，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和艰苦斗争，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部队本身在斗争中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三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采用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移到外线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十一月十九日，关向应参与指挥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开始长征。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到达滇黔边之盘县地区，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的来电，提出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当时不了解张国焘的反党行为，以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是中共中央的意图，于是军委分会在盘县举行会议，决定率部向川康边前进。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于六月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七月二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指战员及藏民骑兵部队在甘孜喇嘛寺前列队迎接。两军互致慰问，充满亲密团结的气氛。刘伯承高兴地对红二、六军团干部战士说，朱总司令盼望你们，连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现在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们带来了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在甘

孜，张国焘利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对红二方面军软硬兼施，妄图将红二方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当即受到红二方面军领导的抵制。当张国焘派人到红二方面军进行“工作”时，关向应对张国焘派来的人说，你们讲话可以，只能讲草地生活怎么样，不准进行有损于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他亲自通知各部队，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不准下发，全部封存，亦不得在红二方面军部队中传达。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人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实现党的总任务和完成艰苦的长征，关向应在红二军团非常重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长征开始前，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亲自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抓行军中政治工作的落实，建立各种政治保障组织，调整和补充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根据新的任务和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的对干部、战士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长征途中每当地区的变换、作战的胜负和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他总是以非常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向干部战士讲述全国的政治形势，讲党和红军的光荣使命，讲革命征途上有利条件和困难，用部队中英雄模范和革命先烈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士

气，增强战胜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为及时让党、团员和干部了解中央和方面军的意图和任务情况，充分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部队每到一地，关向应都要亲自召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政治鼓动。为广泛发动群众都来做思想工作，关向应特别重视调动各级军事指挥员作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求政治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军事技术、研究战略战术，又会办给养。红二方面军在甘孜时，原计划进行短期休息和整顿，但中共中央指示，要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关向应在部队行动之前又一次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和支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号召部队充分做好过草地的各种准备。在关向应领导下，各师、团都分别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思想发动工作。红二方面军由东谷到包座经过了二十三天的连续长途行军，为避开敌人的尾追堵截，部队大部分时间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原野和泥潭深草中，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和饥饿使部队受到很大伤亡，关向应及时召集部队各级干部进行动员。他说，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在我们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一定要和红一方面军会师。越往前走困难越多，要懂得干部能吃苦，就会使战士少吃一些苦，多为部队服务，困难当头，干部首先要身先士卒，这是我们的光荣。关向应身体力行，在艰苦困难中总是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部队宿营休息了，而他却忙于深入到连队了解情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顶帐篷，长征途中每到宿营地，

他让身边的战士、警卫员、大师傅和饲养员都挤在他的帐篷内休息。总指挥部给他的乘马，他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人。行军中他要求部队各级领导，加强收容工作，务必保证全体干部、战士都能顺利的走出草地。为保持部队高昂的战斗情绪，增强战胜艰难险阻的信心和毅力，在关向应领导下，连队党支部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及时，从而保障了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渺无人烟的草地，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三六年七月，关向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八月底，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立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 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们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为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配合红一、四方面军作战，歼灭尾追和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的指挥下，进行了成县、徽县、两当和康县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尾追和堵截。战役后，红二方面军在人员和物质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补充。十月，红二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于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关向应的心情非常激动，他

对贺龙说，过去我们好象是在黑暗中摸索，往往碰了壁，吃了亏才缩回手来，另找一个方向再摸，我们多么希望中央的正确领导啊！贺龙兴奋地说，这回好了，从此我们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了。十一月，红二方面军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了山城堡战斗，取得了歼灭尾追红军的国民党胡宗南三个旅的重大胜利。十二月，关向应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八月，关向应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九月，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方针，关向应同贺龙一起率领一二〇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点燃了晋西北的抗日烽火。部队到达晋西北之后，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晋西北各阶层人民，争取了阎锡山的合作抗日，组建了地方武装，发展了进步力量，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向平西、恒山和大青山三个地区进行了战略展开。他们在忻口以北同蒲路沿线及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打毁汽车上百辆，取得了首次辉煌战果，给日本侵略军以

沉重打击，并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大同至宁武、代县之铁路、公路交通，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向太原的进攻。一九三八年春，关向应同贺龙一起指挥一二〇师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疯狂进攻，先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收复了被敌侵占的七座县城。这一胜利，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五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一二〇师派主力一部“沿大青山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更广泛地发动内蒙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八路军在整个敌后地区的战略展开。为此，师部决定抽调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二、三营和独立第四支队、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该支队在李井泉率领下于九月初进入大青山，同当地蒙汉两民族人民游击队会合，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关向应对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部队指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可以沟通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而且还能控制平绥铁路沿线的广大富饶地区。你们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地方党的组织，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强调指出，部队要尊重蒙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要侵犯蒙族利益，在蒙汉杂居的地方，应吸收蒙族群众参加地方各级政权。部队到达大青山地区后，根据关向应的指示，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使广大蒙族群众，包括部分王公贵族都参加了抗日

斗争。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大青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后来与晋西北根据地合称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东北的屏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政治部大部分干部和教导团七百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兴县、岚县、静乐、五寨、保德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晋西北临时区党委。十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师在大同雁门关、忻县、太原以西，北自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内，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工作团到各县后，在关向应亲自领导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钢领，由于党的各项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因而时间不长，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组织就陆续建立起来。工作团一面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一面创建各级党组织，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在以关向应为首的工作团的领导下，兴县、岚县等县的群众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五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对冀中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使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危急。为加强冀中的对敌斗争力量，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关向应同贺龙一起率领一二〇师主

力一部，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岚县出发，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达冀中河间县西北的惠伯口地区，同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此时，日军正在集中七千余人分五路从东、西、北三面向高阳、任丘、肃宁、河间地区实行“围攻”，企图将根据地分割包围，然后各个消灭。为粉碎敌人的攻势，一二〇师主力部队未得休息即投入反“扫荡”斗争，在河间、安平、文安等地区歼灭日伪军一千一百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冀中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士气，增加了根据地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冀中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二月中旬成立了冀中区总指挥部，关向应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四月二十三日，关向应与贺龙亲自指挥了河间齐会战斗，经三昼夜连续作战，歼日军二十七师团吉田一个大队七百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胜利。嗣后，在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配合下，接连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共歼敌四千九百余人，进一步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关向应还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第三纵队，利用战斗空隙帮助整训部队，训练干部，举办了政治指导员、锄奸干部和敌工干部的训练班，使第三纵队从组织、思想、制度、作风和战斗力等方面都得到加强。八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特别是在山西的反共活动日趋严重，一二〇师奉命开赴晋察冀边区整训待命。十月下旬，日军集中二十六、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各一部共二万余人，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这时，关向应同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途经北岳区，为配合晋察冀八路军部队进行反“扫荡”，于灵寿陈庄地区，指挥部队歼灭日军水原旅团长以下一千二百余人。十一月七日，又配合晋察冀部队于涞源黄土岭歼日军千余人，击毙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创造了在反“扫荡”作战中首次毙敌中将级指挥官的记录。

关向应在冀中八个月中，一面协助贺龙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学习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先进经验。他结合冀中对敌斗争的实际，写了《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冀中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关系等，作了详细的论述。文章强调指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战胜敌人的最可靠的支柱”，在广阔的平原上，在敌人的据点包围中，如果没有群众力量的支持，坚持冀中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真正“坚持平原抗战的堡垒是广大的民众，是人民政权与军队的密切结合，这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关向应这篇论著，对巩固冀中根据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军民斗争的信心，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一手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向山西新军决死队进攻，侵占晋西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一九四〇年二月，关向应、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日夜兼程，回师晋西北。到十一月初，侵入晋

西地区的阎锡山顽军被全部肃清。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日军的几次“扫荡”和阎锡山的破坏，使晋西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国民党政府停止对八路军抗日经费和作战物资的供应，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迅速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便成为根据地非常迫切的任务。关向应对建设晋西北根据地极为重视，他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晋西北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关于建设晋西北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号召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晋西北的经济建设。他指出：“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枢纽，这个战略意义是我们所素知的，自从晋西北新形势转变以来，敌人已经组织了两次战役‘扫荡’，企图摧毁它。一二〇师和新军在反‘扫荡’中英勇地尽了保卫晋西北的责任，可是这不能等于巩固了晋西北，如果没有长期的建设打算，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消耗，不顾建设……非但眼前困难不能克服，困难日深，必陷自杀的境地。”四月，关向应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各部队要积极参加晋西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强调在整训中要对部队进行长期建设晋西北的思想教育。他指出：“部队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作依托，以及对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政治、经济建设，则无法存在，根据地之巩固与建设，亦依赖部队之支持，部队与根据地之有机联系已是不可争的事实，故部队对根据地所负之建设责任，绝不能漠视而不关心。”他批评那种忽视对根据地建设、不关心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

不顾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为保障部队的给养供应和战备需要，师部从全师抽调三百余名干部组成十九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关向应要求部队团以上干部在领导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要教育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党的政策，教育部队严格遵守抗日政府颁发的各种法令，虚心听取地方的意见。在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方面，他要求团以上干部应成为研究和学习政治理论、遵守各种法令制度的模范。此时，关向应已患肺病，由于工作的劳累，身体愈加削瘦，但他依然拼力工作。他曾亲自带领干部参加山西新军的整训工作，清洗了新军内部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建立、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军内的各级组织，使新军得到基本巩固，也为党领导新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向应既是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者。每逢同贺龙一起部署作战时，他都一丝不苟，慎密考虑。他要求参谋人员要及时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做好首长的助手。他对参谋人员说，司令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了解了情况，才能完成组织战斗、管理部队、训练部队的使命，也可以说，司令部机关就是调查研究机关。

关向应还十分重视部队的文艺工作。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时间参加有关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听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解决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在文艺创作上，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现实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注

重反映现实斗争，反映部队，反映人民群众。一九四〇年五月，晋绥文联成立，关向应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敌后建设问题》的报告。它对开展晋绥文艺工作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由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的成立对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武装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一年三月，晋西北行署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关向应在会议上要求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共同参加经济建设。他特别强调了要重视群众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大胆地吸收各种技术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十月，根据中央九月一日发出的《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代表中央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

关向应在晋绥期间，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为创建与巩固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于长期戎马征战，辛劳成疾，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要他回延安疗养。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期间，时刻挂念着前方的战争和党的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到前线去了。不久，由于工作劳累，旧病复发，还出现了吐血的情况，他不得不又回到延安治疗。

六

关向应从少年起，就养成了勤奋读书的好习惯，参加革命后在长期艰苦斗争的条件下，也从不放过点滴学习的机会，即是在重病期间也不放过读书的时机。他学识渊博，善写、喜画，热爱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对《水浒》、《聊斋》等很熟悉。他有很强的记忆力，能大段背诵古典诗词和典故。在戎马征战的空隙里他写了“征途”短诗，诗的原文是：“月色在征尘中暗淡，马蹄下迸裂着火星。越过溪水，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电火送着马蹄，消失在希微的灯光中。”短短的诗深刻地描述了人民军队征途中的战斗场面。在晋绥时他对续范亭（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思想品德和才能很尊重。他说：“读了他的文章和诗，恰如看到他这个人。一个人对于人民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什么事情也做不出的，续老所以对反动势力这样痛恨，正是因为他对人民有极深厚感情。”他在疾病折磨中已知自己再到前线工作是困难了，希望病好后能搞文学工作。他对做文学工作的人说，搞文学的人必须“多读、多看、多研究鲁迅的东西不可”。

关向应在学习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对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给以恰如其分的估价，从不作夸大的形容。他曾说：“凭一时的热情看事情有时候

会看偏了的，有些作品粗粗看一遍还可以，仔细一想，就要替作者脸红了，鲁迅就不同，他总是稳打稳拿，经得起推敲。”在学术问题上，他主张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学说不同，争论是难免的，有争论才会有进步”，“很多事情书本上是没有的，看病也一样，不然还谈什么发挥，什么创造呢？”他同身边的医生谈及中国古医学时说：“中医、针灸，这里有好东西，整理和研究很必要，可是目的是往前走，如果光是盲从、开倒车，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百病都验的灵方，那就不对了。”

关向应在养病中，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病情时好时坏。为了能重返工作岗位，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他说：“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这个苦痛。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即使身体坏了，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还能做些别的工作。”后来，病情发展，左手浮肿了，但他依然非常乐观地说：“把左手锯掉了，还有右手，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医生要他静心养病，不要去想工作的事，他说：“二十几年的政治工作，使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总想马上解决。”一九四五年一月，关向应病情一度加重，一连几天呕吐不能进食，他知道病情很危急了，要求医生：“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死，主要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几天后，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见到中央首长，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说个没完没了。医生怕影响

他的病情，劝他少说些，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彭德怀从病室走出来对医生说："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这之后，关向应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他高兴地说："很好，没有弄得我措手不及，是么，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他的病情这么严重，为什么总还念念不忘工作呢？他说："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代，那是我最痛心的。""能为人民劳动，便是我最大的幸福。"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关向应的病情又一次恶化，他遗嘱全党："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仅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象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关向应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噩耗传到晋绥部队，贺龙极为悲痛，在关向应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任弼时在延安悼念关向应的会上说："他对于建党建军有很大的功绩，当湘鄂西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下，被迫退出时，由于他和贺龙同志的正确领导，得以保存了红军的实力，抗战中一二〇师的发展和晋

绥解放区的创立，也是他们的功劳。他服从党的纪律，重视党内团结，病中也常谆诫大家，只要我们时刻团结在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党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朱德总司令在关向应墓前讲话说：“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坚决的布尔塞维克品质。”他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关向应同志牺牲个人的优良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朱德高度评价关向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对于共产主义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坚强的信心，胜不骄，败不馁，作风正派，从不计较个人利益。毛泽东为关向应逝世题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挽联。这些感人肺腑的挽词、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对关向应的爱戴和尊敬。关向应从二十三岁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直到四十四岁逝世，二十一年如一日，在白色恐怖下，在敌人监狱中，在战场上，在同病魔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关向应对党忠贞不二，为革命鞠躬尽瘁，他将永远被人们怀念和学习。

（赵文翰）



何　　昆



何　昆

何昆(1898—1930)，原名德晟，字普发，别名克信，化名李维森，又名何坤。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金安乡牛头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何先梓，母亲曹春秀，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五。

何昆十岁那年，到本村何氏宗祠开设的私塾里读书。这所私塾，由当时永兴县著名进步教师何海棠先生执教。何昆在那里读了四年书，深受这位老师的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出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思想。那时，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报国救民的出路，这对何昆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何昆由于家庭贫困而被迫中途辍学，但他贫不丧志，坚持在劳动工余锻炼身体，学习武艺，希望有朝一日为国为民效力。

一九一八年，何昆离开家乡，到当时湘粤交通枢纽的坪石，在父亲和长兄何德明经营的一个叫“金生泰”的小客栈里做勤杂工。由于客栈生意轻淡，他不得不经常与父、

兄轮流挑着货郎担外出四处叫卖，以贴补家用，生活甚为艰难。但正由于这样特定的环境条件，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他看到军阀政客横行，百业萧条，官府恣意搜刮，员司舞弊徇私，地主对农民残酷压榨。他更看到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异常悲惨。不少贫苦农民吃草根，啃树皮，离乡背井，有的还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有这一切，都给何昆有着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激发和坚定了他解救广大劳动人民的决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创办的黄埔军校招生，何昆怀着满腔热情赶赴应考。军校当时规定考生必须持有初中以上的毕业文凭，何昆没有文凭，所以连考两次都没有被录取，但他毫不灰心气馁，终于在一九二五年该校第四期招生放宽学历的情况下被录取。

在当时的军校中，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任教和当学生的。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共产党人，是军校进步力量的代表，信誉极高，素为学生拥戴。

何昆入学后，努力学习，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政治活动。不久，他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何昆因暴露了

共产党员的身份，奉党组织之命撤出军校，到三水县石峡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国民党右派也公开背叛国民革命。他们查封革命群众团体二百多处，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一百多人，秘密杀害了一大批工农运动骨干。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和熊锐等都惨遭杀害。在这次腥风血雨中，何昆于广州黄沙火车站被捕。当天，他被关押在临时充当监狱的广州明星电影院楼上(现中山公园前面，惠爱路旁)，同时被囚的约有二百多人。反动派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何昆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积极鼓励难友设法外逃。当天夜里，更深人静，他悄悄地纵上楼顶，弄断了几根椽子，率领部分难友逃脱虎口(其余在第二天全部殉难)。何昆从楼上跳下来时摔伤了脚，他带着伤痛摸到一位同乡曹兴典开设的缝纫店内隐蔽。他和店内的工友很快打成一片。在工友们的掩护、照料下，很快养好了伤。不久，他化装逃出广州，奉命到武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何昆到达武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很快侦悉了他的行踪，便下令在武汉通缉他。何昆毫不畏惧，仍然在武汉四处活动。一天，他在马路上碰到一位在国民党武汉驻军中担任连长的同村人何德大，何以乡友的口吻关照他说："你还在这里走动，通缉你的字有箩筐那么大！"何昆爽朗地笑着说："怕什么！"

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何昆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有关工作。会后，他返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半，起义爆发，首先由叶剑英曾任团长的教导团开始行动，经过两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全城大部分地区。当天上午，宣告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在起义过程中，何昆积极参与筹划，具体进行组织，带领起义战士与反扑的敌人展开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因敌我力量太悬殊，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广州。后来，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分别与广东东江和广西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还有少部分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转战到韶关附近，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一起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失败后，何昆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何昆在赴沪途中，顺道回到永兴老家作了短暂停留。在这期间，他向亲友们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地方党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在何昆离家的前夕，他的妻子曹己花指着刚满一周岁的女儿广枚对何昆说："你很少在家里落脚，现在

外面风声又那么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一个妇道人家，单靠替人家砻谷臼米，怎么能把孩子抚养大?!”何昆抱起呱呱待哺的女儿亲了又亲，深情地劝慰妻子说：“我知道你在家里很苦，给人家砻谷臼米，当牛做马。但是，你无论在牛头下村，还是在坪石，到处都能看到当牛做马的穷人是大多数啊，我在外面跑，就是为了让全国大多数穷苦人今后不再当牛做马。”这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又依依分别了，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秋收斗争问题》的通告。通告指出：在秋收斗争中，不仅要扩大党在农村的组织，有系统的在农民中建立革命组织，同时要组织革命武装，建立游击队，为开展武装斗争、扩建红军作好准备。同年冬，中共江苏省委报经中共中央批准，选调一批熟悉军事工作的干部到南通、如皋、泰兴、海门等地开展工作，并将活动在这些地区的农民武装，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何昆、何扬、黄火青、徐德、张爱萍等，先后受命担任领导职务，何昆被任命为中共(南)通海(门)特委委员、红十四军军长。

一九三〇年春节后，何昆与何扬、张爱萍等，在中共江苏省委地下交通员周方护送下，由上海乘船去苏北。当时，张黄港、新生港等地已被国民党军警严密封锁，盘查很紧。他们绕道到达如皋东燕庄，先后与通海特委、如皋县委和游击队接上了关系。

何昆到任后，和中共通海特委书记、红十四军政治委员李超时一起，一面积极筹划红十四军的编组，一面加紧对已组织起来的赤卫队进行军政训练。他亲自做示范动作，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这些赤卫队员大多来自农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对军长熟练的军事技能非常钦佩，惊叹不已。在何昆领导下，仿照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做法，把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统一改编为赤卫军，把分散的武器集中起来，统一分配。何昆还对赤卫军进行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要求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省开支，在他的动员教育下，赤卫军战士开始不发津贴费，有时发也发得很少，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

为了检验赤卫军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何昆决定组织一次战斗，攻打靖江东北的长安市。敌人在该地设立一个据点，有二十多人枪守卫。当时，由于赤卫队的积极活动，拔除过一些据点，如(皋)泰(兴)地区已经形成一块方圆三四十里的游击根据地，地主老财纷纷逃到城镇或到据点里去躲避。所以，各据点的敌人都戒备森严，长安市也有戒备。为了打好这一仗，何昆精心组织指挥，反复研究作战方案，对部队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地方党组织，也发动群众踊跃参战。军民配合，把长安市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仅在北边通往游击根据地的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天色将黑，部队从戈家堡一带出发，半夜时分，到达攻击阵地。

按照何昆的哨音，赤卫军向敌人据点发起进攻。顿时，枪声夹杂着单声爆竹和火油箱里连珠炮似的鞭炮声，一齐响了起来。敌人从酣睡中惊醒，毫无抵抗能力，赤卫军和参战群众无一伤亡地攻进了据点，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周围的群众欢欣鼓舞，男女老少纷纷前来观看赤卫军。赤卫军向群众进行了革命宣传，尔后秩序井然地撤出长安市。

如此规模的军民协同作战，在当地还是首创。何昆在战斗中显示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深得战士们的崇敬和信赖。

一九三〇年二月，中共通海区特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通海区的政治形势和工作路线。会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各县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根据联席会议的精神，各县对游击队进行了整顿，吸收贫雇农和失业工人入队，清除作风不好的分子，为扩大武装斗争，建立红十四军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月二日，何昆和李超时等以红十四军的名义，公布了十大政纲：(1)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2)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行；(3)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4)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5)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8)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土地和工作；(9)取消军阀在地方强征的苛捐杂税；(10)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这十条政纲，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以

后，通海如泰的赤卫军，又接连打了一些胜仗，攻克四扬坝和四甲坝，打下卢家庄和东莱庵等地，惩办了地主恶霸和血债累累的国民党官吏，捣毁了国民党“保卫团”的分团部。在赤卫军和游击队不断胜利和正确政策的影响下，季家市、黄桥和司马墩等地的国民党军八十多人起义。

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赤卫军和游击队士气旺盛，但同时也暴露出纪律不严，组织编制不适应作战的需要。于是，何昆和李超时等一起，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决定正式宣布红十四军军部成立，下辖两个支队：通海地区的红军，编为第一支队（后改为二师），刘廷杰任支队长；如泰地区的红军，编为第二支队（后改为一师），由何昆兼任支队长，徐德和黄火青分任两个支队的军事特派员。

四月上旬临近清明节的一天，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这天，天气晴朗，春风和煦，红十四军指战员和如皋县的江安、卢港、石庄、磨头与泰兴的古溪、黄桥等地，方圆七八十里内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和少先队员，带着土枪、大刀、梭镖等各种武器，怀着赤热的心，纷纷奔赴会场。贲家巷周围几里内，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武器林立，威武非凡。在一棵大树上，挂了一面大红旗，广场中央，搭了一个司令台。大会开始，首先由中共通海区特委代表张辛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军政治委员，薛衡竞

任军参谋长，余乃诚任军政治部主任，并宣讲了大好革命形势。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呼口号，欢腾雀跃，欣喜若狂，声闻数里之外。随后，何昆军长发出阅兵式开始的口令，红军部队、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少先队员绕场一周，通过司令台接受检阅，部队拉了几里路长，群众第一次看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很受鼓舞。

红十四军正式成立后，威名震撼大江南北，而地主恶霸则恐慌万分，纷纷逃到上海或到大的城镇里去躲避。一些小据点的敌人，也龟缩到大的据点里。当时，上海报纸曾用"江北匪势猖獗……"等类诬蔑的语言加以报道，但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红十四军在通海地区活动感到不安。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大好形势，红十四军与通海特委研究确定，相机攻打如皋西南的老户庄(前曾称老虎庄)据点。它是如泰游击区与通海游击区之间的一个楔子，对红十四军开展游击活动及沟通游击区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过去红军游击队曾打过一次，没有打下，这次决心再打，拔掉这颗钉子。

为打好这一仗，红十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广泛地进行动员教育和组织准备工作。何昆将红军部队隐蔽集结在前后吴家庄一带，这里靠近老户庄，是块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能严密封锁消息。

四月十六日上午，老户庄的敌人不知道附近驻有红十四军的部队，一个当官的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几十个士兵，

耀武扬威地窜到吴家庄一带骚扰。这伙敌人与红军的哨兵接了火，群众听到枪声也行动起来．高喊捉"狗队"。何昆听到枪声也赶到现场指挥，但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就绪，敌人就仓皇逃回老户庄。这一仗虽没有打成，但也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群众也是一次实际的演习。何昆军长命令部队原地警戒待命，随即在阵地上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群众情绪这么高，不宜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加之原先就有攻打老户庄拔掉这颗钉子的打算，与会者决定，乘敌败退的有利时机，于当晚围攻老户庄。

老户庄，是如皋有名的大土豪张朝汉的老巢，庄内原驻有国民党的"保安团"、县警察队和省"保安队"一个中队等兵力守卫．这次接火后又来了一个连的兵力增援。老户庄的地形也比较复杂，三面绕河，只有东边一条通道，且垒高沟深，易守难攻。

繁星闪烁，夜色蒙蒙。在何昆军长指挥下，红军战士悄悄地向老户庄疾进。

按照何昆军长的作战部署，红十四军第二支队三个大队、赤卫队和前来支援的群众共一万多人，分三路进攻：第三大队和赤卫队从西面佯攻，并负责打援；一大队从东面进攻；二大队从东老户庄和前老户庄之间渡河，直取敌人"保安团"团部。战斗发起后，担任主攻的二大队指战员，在大队长张爱萍率领下，迅速冲击。出乎意料的是河水太深，敌人集中火力封锁，以致冲了几次都未冲上去。一大

队在东面攻了三次也没有攻上去。这时，何昆军长决定重新调整部署，把西、南两面留给赤卫队佯攻，以牵制敌人，把第二、三大队都调到一大队的攻击方向，集中火力，突击一点。三个大队集中后，何昆军长召集各大队领导人开会。他紧握拳头，象宣誓那样，坚定地说："老户庄就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要把它打开！"

这时，东方开始出现鱼肚白，阵阵冷风伴随着黎明吹来。红军战士为作最后一次冲锋而紧张地准备着。何昆军长把一切安排妥当后，自己拿了一支手提式机枪，手一挥，高喊："二大队的同志们跟我冲！"接着他领头向前冲去。

"冲啊！""杀啊！"

"我们一定要打下老户庄！"

"我们一定要活捉张朝汉！"

一片惊天动地的吼声……

二大队在前，一大队、三大队在后，还有手拿刀矛的赤卫队一齐向前拥去，路有多宽，队伍有多宽，分不清行列，看不到尽头，猛烈的枪声和冲杀的吼声交织在一起。

碉堡里的敌人拼命射击，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紧跟着又冲上去，经过一阵猛打猛冲，红军很快就占领了老户庄东头的晒谷场。

天大亮了，红军战士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制在晒谷场上，距离敌人的指挥中心还有几十米的一块开阔地，只要

冲过这几十米，敌人就完蛋了。可是，这段开阔地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着，战士们几次都没有冲过去。大家都万分焦急。

在这关键时刻，何昆军长紧握手提机枪，快步跑来，对二大队大队长张爱萍说："老张，让我来对付这炮楼上狗娘养的，我们如不赶快解决这些敌人，如皋城里的敌人一出来就不好办了！"。他说着就踏着张爱萍的肩膀上，一纵身爬到谷草堆上，露着半个身子，用手提机枪向敌人的碉堡猛射了一梭子。敌人的机枪不响了。何昆军长高喊："共产党员们，冲啊！""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看到军长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纷纷跳起来，呼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开始恐慌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何昆军长突然从上面跌了下来。只见他一只手捂着胸口，鲜血泉涌似的顺着手指缝流出来，脸色苍白。张爱萍立刻跑上去把他抱在怀里，但他对张爱萍说："打！快打！不要管我！一定要攻下老户……"这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闭上了双眼。

何昆军长牺牲后，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老户庄没能打下来，部队转移到周家埭一带休整。

何昆军长牺牲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为红十四军的建设，作出了最大努力；在通海如泰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影响。

一九六〇年，在何昆牺牲三十周年之际，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修建了墓碑。何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陆井夫）



吴 光 浩



吴　光　浩

一

吴光浩（1906—1929），原名吴光皓，化名陈新。一九〇六年生于湖北黄陂蔡吴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吴廷达，母亲陈氏，在自家的田地里勤耕细作，维持生计。吴光浩兄弟姊妹八个，他排行第四。自一九一三年起，他先后就读于本县灵鹫奄小学、自进学校和前川中学。一九二一年，父亲去世，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经济收入也随之减少，手头开支显得拮据起来。当时，吴光浩中学尚未毕业，是辍学，还是继续上学，家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最后，大哥吴光豪断然作主，卖掉两斗田，除作安葬父亲的费用外，其余则供吴光浩读书。大哥的决定，更加激励吴光浩刻苦学习，发奋上进。

不久，学校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他受新思想的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劳苦的人民大众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

些革命道理和闪光的语言打动和吸引了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心，使他对革命产生了强烈的要求。他对穷人说：只有学习马列的书，才能搞革命活动，才能打倒那些有钱的人，人民才能平等。他的话，振奋了村里一些年轻人，对他们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启蒙作用。

一九二五年，吴光浩在黄陂县中共党组织的推荐和他小学同学唐际盛的邀约下，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翌年吴光浩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光浩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连长，参加了威震神州、敲开武汉大门的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尔后又参加了攻克武昌城的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擢升为营长。

二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拟定的秋收暴动计划传到鄂南和鄂东之后，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员即着手组织暴动。

为加强对暴动的领导，中共湖北省委派吴光浩领导以咸宁、蒲圻为中心的鄂南起义。九月十日夜，吴光浩率领仅携有四十余支步枪的三百余名农民武装，向驻汀泗桥

（汀泗桥是鄂南的重镇，是通往咸宁的要道）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战斗打响后，周围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呐喊助威，并毁坏了铁路，断绝了交通。敌人张慌失措，夺路而逃，农民武装乘胜追击。此役，毙敌营长以下二十余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并烧毁了大地主张万顺的房子。揭开了鄂南武装起义的序幕。

农民武装占领汀泗桥后，武汉至长沙的铁路即刻陷于瘫痪。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大为震惊，急调夏斗寅的十三师独立一团、二团开赴鄂南，与咸宁军事警卫团及驻蒲圻的岳森一个师一起，合击农民起义军。吴光浩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果敢坚毅，沉着地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鄂南起义失败了。

湖北省委认真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鉴于鄂东区黄安、麻城两县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武装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在鄂东发动武装起义。十月，省委先后派吴光浩、王志仁、刘镇一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麻地区，改组了黄安县委，组成了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并任命吴光浩为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为了筹划黄麻起义，吴光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集中抓了两件事。第一，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建立各地起义的领导机构。他多次翻山越岭到黄安的箭厂河（今河南新县箭河乡）和上戴家，找当地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负

责人吴焕先、戴克敏等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把上级的各项指示迅速落实到群众中。第二，抓了农民自卫军的整顿。当时，麻城自卫军中有个旧军官，妄图拖枪叛变。这一阴谋虽未得逞，但使吴光浩深深地认识到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农民自卫军必须进行整顿。为了纯洁组织，他加强了自卫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在提高政治素质的同时，还加强军事训练，使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不断提高，从而使这支农民武装成为黄麻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十一月三日，吴光浩参加了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黄安、麻城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黄麻及全国的革命形势，根据上级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的精神，正式作出黄麻两县联合起义、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产生了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吴焕先等人组成的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山雨欲来风满楼”，黄麻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加快了步伐。起义指挥部在古丰岭和十丈山办起了“兵工厂”，几十架洪炉昼夜不熄地为起义部队赶制武器。还为起义部队缝制起义标志——“赤化带”（这是一种用红布条制成的起义标志，每个起义战士都将它斜挎在胸前）以及一面面绣有五角星、镰刀、锤子的红旗。

十一月十日晚，起义队伍对驻扎在七里坪的国民党三十军一个营有意识的接触，作为整个起义的一次预演。双方还没有接火，敌人仅看到起义队伍中林立的火把、刀矛、脚鱼叉和黑压压的人群，便仓皇逃窜。驻守黄安县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闻风也悄悄撤离了县城。

接着，又得到情报，撤离黄安县城的国民党军一个团突然返回。针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吴光浩等召开战前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暴动。

按照总指挥部的部署，担负进城侦察敌情和里应外合任务的尖刀班十二名农民自卫军队员，化装成卖柴的、做小生意的、说鼓书的，于晌午先期混入城内。七十多个勇敢、强悍的小伙子，由吴光浩率领，组成攻城突击队，整装待发。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 自 卫 军 一部，箭厂河的三堂革命红学和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共两万余人，迅速汇集七里坪，组成攻城主力部队，待命出发。另外，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按时开到了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处，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工事。担架队、运输队、送饭队等后勤组织，也相应地组织起来。

傍晚，起义队伍出发了。午夜，到达三里岗，作短暂的休息之后，队伍又急速前进，很快抵达黄安城北门外。战士们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耐着性子，等待攻城的命令。

砰砰砰……几声枪响，攻城战斗开始了。接着，炮声、枪声和喊杀声震撼了整个县城。这时，突击队员在吴光浩带领下，在西北城墙攀缘而上，与前来接应的尖刀班胜利会合，他们简短地交换了情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摸到城北门。几个守门的匪兵，被喊杀声从梦中惊醒，还没弄清东南西北，就做了俘虏。其中一个家伙企图抵抗，还未把子弹推上膛，就被吴光浩手起刀落，砍倒在地。消灭了守门的匪兵，打开了城门，等候在城门外的大队人马象决堤的洪水，涌进城里。

紧接着，突击队在吴光浩带领下，扑向火王庙。这是敌三十军的驻地，敌人回窜的那个团还未赶到，只有几个留营人员，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吓得六神无主，乖乖举手缴械。“同志们，打到‘老爷’大堂去！活捉贺守忠，一起算总帐！”只见吴光浩手臂一挥，几十个人紧跟在后，一阵风似地向县衙冲去。县衙里，敌县长贺守忠刚被枪声震醒，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闯，听说起义队伍打过来了，赶忙命令保安队固守，自己却往后堂逃命去了。前厢房的保安队员，从被窝里爬出来，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把枪架在床上向外乱放。说时迟，那时快，吴光浩带着起义军战士，一排子弹，从窗口打了进去。顿时，屋里乱成一团，有的哭爹喊娘，有的磕头作揖，有的撅着屁股打哆嗦，有的把枪从窗口往外扔，真是丑态百出，狼狈不堪。突击队员继续搜索，终于在后院活捉了国民党反动县长贺守忠。

起义胜利了！暴动成功了！十四日清晨，鲜艳的红旗，第一次插上古老的黄安城头。

十八日，庆祝黄麻起义胜利的万人大会，在黄安城南的校场岗隆重举行，由曹学楷主持。会上，黄安县农民政府、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正式成立。当宣布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成立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政府主席曹学楷和王秀松、吴先筹、陈定侯、戴继伦、田开寿等九名委员登上主席台，正式就职。

会上散发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宣言。紧接着，举行庆祝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大会，并举行了阅兵式。鄂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路，将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任命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汪奠川为鄂东军参谋长，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

黄麻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十分惊慌。他们纠集在一起，加紧筹划，妄图用军事进攻，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黄安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国民党第三十军独立旅约四百人，向黄安进攻，失败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当时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对敌人反扑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同时，也没有在占领县城后，迅速向外发展，建立

乡村政权，并以乡村为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所以在敌人再度进攻时，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由麻城突然奔袭黄安县城。当时，因鄂东军刚从河口打土匪回城，睡得很晚，非常疲劳，对敌人毫无戒备，战斗打响后，仓促应战，从半夜十二点到次日晨四时，虽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被敌人攻陷。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吴光浩率领余部，在血泊中杀出一条路，突出了重围。

突围部队集中于黄安城北二十里的左峰岭。这时，拿枪的人不多了，大部分是扛鱼叉、拿着刀矛和土枪的农民，他们围着吴光浩，齐声呼喊着："我们要打回去，替潘司令报仇！"吴光浩强压悲愤，含泪对老乡们说："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黄安城而和反动派拼死，只要我们有人有武器，坚持革命到底，将来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黄安县城来的。"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把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吴光浩和曹学楷、戴克敏等在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敌人占领黄安县城后，又乘势占领了

七里、紫云、乘马、顺河地区，从南向北大规模包抄过来，大有不消灭鄂东军进犯不止之势。会议认为，鄂东军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要跳出圈圈，摆脱敌人，减少中心区的损失。遂决定将现有武装和干部留一部分在当地坚持斗争，大部分由吴光浩带领到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会后，吴光浩在黄安北乡闵家祠堂召集队伍，清点了一下武装，共七十二人，四十二支长枪、十一支短枪，做了简短的动员之后，即向南进发。沿途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战胜重重困难，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胜利到达木兰山。

木兰山，位于黄陂县北，山高坡陡，方圆六七十里，地势十分险要。山上有宽宏的庙宇，住着一百多个和尚、道人。山周围有一千多户人家，并有长轩岭、塔耳岗、柿子树店等集镇，人烟稠密，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共产党在这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东北又与基础较好的黄安县高桥区相接，联系便利。从各方面看，是一个可作为暂时积蓄革命力量的地方。

为了使鄂东军在木兰山扎下根，取得佛界人士的信任和支持，上山前，吴光浩开宗明义，严格了军纪，教育战士爱护佛地圣庙，尊重他人信仰。上山后，部队停在寺庙前，吴光浩拜会了方丈，说明来意，最初方丈有些顾虑，强调寺庙不能驻兵，经吴光浩一再说明工农革命军有严格的纪律，不会糟践佛地，方丈才同意队伍进庙住宿。在双方

相处的日子里，战士们都不进佛殿，也不渎犯"佛事"，平时还帮助他们打扫庙宇、种菜、劈柴、挑水，使上至方丈，下至伙头，都认为这支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大不一样，戒备心很快就消除了。特别是那些做饭的、干杂活的和尚，大多是穷苦人家子弟，逐渐愿意跟革命军战士接近。战士们也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和打土豪、惩恶霸的故事给和尚们听，和尚们听后激动不已。和尚们还把粮食、蔬菜送到革命军的厨房，说："这是大家用气力种的，用汗水浇的，队伍只管吃饱，不碍事。"工农革命军与和尚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为了使战士们认识到个人的生命与革命的整体紧紧相连，在艰苦的环境里，必须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力量，才能生存。吴光浩以身作则，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有一次，他带队伍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路过家门而不入。家里得信后，派人上山传假话："母亲病危，速归"。吴光浩回家后，看到母亲并未生病，只见红烛洞房，高朋满座，逼迫光浩拜堂成亲。母亲思念儿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此时此刻怎能考虑个人问题呢？他急中生智地说："要我成亲可以，但我要到三合店去整个容(理发)，再拜堂。"母亲信以为真。就这样，吴光浩跑回了队伍。他反复想过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效忠祖国就是为母尽孝了，把全部身心献给革命，就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和抚慰。他的选择，感动得战士们热泪盈眶，鼓舞了战士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信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吴光浩等革命领导人在木兰山“玉皇阁”举行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同时建立了由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五人组成的党的委员会。会后，在吴光浩带领下，第七军深入木兰山周围村寨，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斗争。

木兰山附近的桥头李，和吴光浩的家乡蔡吴湾隔河相望，这里的大恶霸地主李波成鱼肉乡里的罪行，早为吴光浩所知。李波成又是亲手杀害中共黄陂县委第一任书记吴光荣的刽子手，其大儿子李本福奸淫民女，为民痛恨。一九二八年初的一天，他带领几个战士，夜袭了李波成的家，打死恶贯满盈的李波成父子，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还有一次，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附近的徐家店抓住一个姓刘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回家耍威风欺侮老百姓的，吴光浩命令战士当即把这个反动军官枪毙了。

罗家岗是木兰山东南有名的封建堡垒，岗上有个大土豪罗保元开的当铺，招牌为“罗隆昌”。“罗隆昌”在国民党反动势力保护下，对穷人敲骨吸髓，盘剥压榨，穷人们敢怒不敢言。鉴于“罗隆昌”有几十条快枪，筑有寨墙，设有岗哨，平时不好接近。第七军便在除夕夜晚，乘敌疏于戒备之际，由吴光浩、江竹青率领二十五名战士先接近当铺门口，等待里面的人开大门迎财神放花炮时冲进去。不料，

狡猾的敌人只在炮楼上放了花炮，大门一直没有开。因此，只好改变打法，攀墙越寨，硬打硬拼。经一场激战终于打开了当铺，缴枪十九支，革命军无一伤亡。当铺打开后，革命军立即出布告，通知四乡群众前来无偿领取当物，并把钱粮分给穷苦群众。

罗家岗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敌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敌十二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木兰山地区"进剿"，吴光浩得知后，将部队撤至观音沟。当时，有人主张把枪埋起来，分散隐蔽，吴光浩坚定地说："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生存，就不能胜利。"他果断地决定，为避开敌人优势兵力，自己率部队向黄冈转移，曹学楷、徐朋人等深入当地农村坚持斗争。

吴光浩率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穿过黄麻县境，到达黄冈北部，在大崎山与工农革命军第六军胜利会合。不久，遭到麻城反动民团郑其玉部的进攻，第七军遂与第六军分开，东进罗田之三里畈。由于敌人跟踪而至，第七军便折向西南黄冈附近之回龙山。回龙山地区敌情也很严重，革命组织均遭摧残，吴光浩率领第七军七十余人，日夜与敌周旋，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有时仅以稻草为被度过风雪严寒之夜。不久，蒋桂战争爆发，敌军从木兰山撤走。吴光浩率部队迅速离开回龙山，返回木兰山区。当他们与曹学楷、徐朋人等人会合时，热烈拥抱，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

时隔不久，木兰山地区又遭到敌人袭扰。于是，吴光浩等领导人在洪界山开会，决定将部队改编为四个短枪队，分头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打回黄麻。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其余两个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在黄陂、孝感活动。这样，四支便衣队，以木兰山为中心，采取昼伏夜出、声东击西的方式，传奇般地活跃在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上。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桂系十八军与蒋系第十二军发生矛盾，在十八军攻击下，十二军从湖北边界向河南撤退。这时，黄麻地区出现空隙，反动势力比较薄弱。吴光浩决定，由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回到黄安北部袭扰敌人。四月七日，戴克敏等率队一举消灭紫云区上戴家“清乡团”，缴枪十余支，檀树岗的敌“清乡团”闻风而逃。此时，木兰山地区敌情日趋严重，汪奠川所率一队九人，在黄陂东乡汪家西湾活动时，因一时疏忽，遭敌袭击，全部殉难。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第七军领导人在木兰山下陈秀冲召开会议，决定趁机返回黄麻老区。

第七军回到老区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抢劫后的悲惨情景，听到乡亲们对反动派的血泪控诉，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炽烈地燃烧起来。吴光浩率部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汇合，向土豪劣绅、反动民团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先后歼灭和赶跑了长冲、两道桥、长塘边、谭家河、料棚等地

的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群众兴奋地把这一胜利称之为"二次暴动"，并编成歌谣："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它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四

第七军返回黄麻地区，不仅鼓舞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且显示了老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打不散、摧不垮的。但很快引起了桂系军阀的注意。四月中旬，桂系军阀胡宗铎任湖北"清乡督办"，旋即命令十八军一部进入黄麻地区，实行严密的控制，疯狂的"清剿"。第七军在与优势敌军周旋中，往往一日数迁，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吴光浩感到，仅凭流动式的单纯游击活动，难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地区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

一九二八年五月，吴光浩与鄂东特委的领导人在黄安紫云区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河南光山县柴山保（今属新县）地区。柴山保是第七军在辗转游击时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它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是盘踞湖北的桂系军阀和盘踞河南的冯系军阀间的结合部，敌人的军事"进剿"，步调难得一致，第七军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从地理环境上讲，柴山保山岭险峻，层峦叠嶂，物产也很丰富，便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另外，它与黄安的紫

云区、麻城的乘马区紧相毗连，当地群众深受黄麻起义的影响，积极要求革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这里既可以得到老区群众的支援，又可以依托这里来逐步恢复老区的工作。会后，第七军在吴光浩率领下，进入柴山保地区，迈开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步。

部队进入柴山保后，为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采取了一系列极为有效的措施。吴光浩特别强调要宣传发动群众。他说："革命没有群众不行，如果没有群众，我们就站不住脚，这块地方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吴光浩与战士们一起写标语,贴传单。吴光浩还要求革命军要有严明的纪律，不贪小利，对老百姓公买公卖，派饭一桌付银洋一元，借被一床给三个铜板，野外露营吃了群众地里的红薯，要把铜钱埋在薯秧下。为分化敌人，第七军先实行减租减息而未急于分配土地，对土著武装也尽力争取，对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则予以镇压。在军事上，第七军的部队时聚时散，往返袭扰，巧妙地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正由于有了这些有力的措施，第七军的革命声威很快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尹家咀召开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宣布将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十月，重建中共鄂东特委时，吴光浩被选为特委常委，负责军事工作。

在此期间，部队在吴光浩指挥下，先后在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又打了不少胜仗，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一九二九年二月，敌十八军出动两个团，从南面分路向柴山保地区进犯；冯玉祥驻豫东南的部队，也在北面堵截。吴光浩命令红三十一师兵分三路，突出包围，然后向南面敌人比较空虚的侧后方进击。第一路为一、三两个大队，由黄安北部向西部活动，首先在禹王城歼灭了黄安仙居区"清乡团"，继又攻下地主的坚固围寨熊家畈、涂家湾。第二路为师部的两个特务队，一直深入到黄安县城以南，全歼高桥河"清乡团"。第三路为二、四两个大队，向东南突进麻城北部地区，歼灭了乘马区西张店"清乡团"及附近一些反动武装。敌人这次进犯，虽来势凶猛，兵力数倍于红军，但由于红军避实就虚，跳到敌人后方打游击，仍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三月二十八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十八军仓皇调走，吴光浩率部又乘机扩大战果和发展游击区。一天夜里，吴光浩亲自带一个小分队到麻城搞民团的枪，他巧设妙计，布置几个战士在城周围放枪，迷惑敌人，另几个战士拖着四个秤锤在街上跑，并大喊："穷苦人不要怕，我们共产党大队人马已到了。"秤锤在街石上发出"哒哒哒"的马蹄声，民团吓得不战而逃，吴光浩等顺利缴枪二十多支，安然返回。

一九二九年四月，基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初步稳定，根据中央巡视员的意见，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黄陂、

孝感四县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师委联席会，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吴光浩任特委军事委员。会后，鄂豫边区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截至五月，红色区域从北面的柴山保，向南扩大到黄安的八里、桃花一带，向东扩大到麻城的黄土岗附近，向西扩大到孝感县汪洋店。在横一百三十里、纵一百里的地区，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呈现出一派花红柳绿的景象。

此时，商(城)南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根据上级指示，鄂东北特委决定派吴光浩率十余人枪到商南帮助工作，军中有人担心他的安全，希望换个人。吴光浩告诉大家："我是主要领导人，越是艰苦，越是危险，越应该去。"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征程。在途经罗田滕家堡时，遭敌突然袭击，在奋力冲杀中吴光浩不幸牺牲。消息传来，鄂豫边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无不悲痛和惋惜。

吴光浩是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以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中，而且以一个人民公仆的谦恭永远为人们怀念。他的道德风范和高尚情操将永远鼓舞人们去努力学习、工作、奋斗。

(柳定敏)



李　兆　麟



李　兆　麟

一

李兆麟（1910—1946），原名李超兰，曾化名李烈生、孙正宗、张玉华、张寿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诞生于辽宁省辽阳县铧子乡小荣官屯（今属灯塔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李文斌在外地谋生。李兆麟刚满六岁，祖父就将他送进本屯私塾读书，翌年春入小荣官屯初级小学，一九二〇年春考入辽阳县立吕方寺高级小学，一九二二年毕业后，又在大荣官屯读了两年私塾。他读书刻苦，勤奋好学，成绩突出，考试总在前三名，十五六岁时本屯乡亲们就称他"小秀才"。

一九二五年，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李兆麟便随祖父在家务农。劳动之余，他抓紧时间自学，并在自己的书箱上刻上"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他的远大志向。他的家乡一年一度推选正副村长，李兆麟由于平时见义勇为，看见谁勒索民财，欺侮人，他就出面评理，主持公道。一九三一年春，他被选为小荣官屯副村长。

李兆麟有个姨夫叫张一吼，曾在东北军里当营长，思想比较进步。李兆麟常到他家，询问国家大事。张一吼因与李兆麟有亲戚关系，无话不谈，他的进步思想，使李兆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一九二九年张一吼迁居北平后，还常给寄些进步书刊，李兆麟收到这些进步书刊常读到深夜。一九三一年夏，张一吼介绍讲武堂同学翟乐全到李兆麟家乡双龙寺养病。翟乐全在东北军当过参谋，是中共地下党员，到双龙寺后，同李兆麟交上了朋友，常讲些革命道理，为李兆麟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看到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骨肉同胞惨遭蹂躏，痛心疾首。正当急于寻求抗日救国途径之时，参加抗日救国会的张一吼从北平写信给李兆麟，邀他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他见信后喜出望外，立即和母亲商量，深明大义的母亲杨长秋同意了儿子的请求。李兆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离开家乡，奔往北平。

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担任东北民众救国会常委委员的中共地下党员冯乃阁（又名基平）和夏尚志。满怀爱国热忱的李兆麟非常高兴，向他们表示了自己要抗日的愿望和决心，介绍了家乡辽阳地区出现了一些自发建立反日武装的情况，还建议中共党组织派人去领导。冯基平和夏尚志见李兆麟抗日救国的决心坚定，态度诚恳，就吸收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救国会。从此，李

兆麟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抗日救国活动。在北平期间，他为了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进入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以大学生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到门头沟煤矿和京西农村，向工人、农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有一次他带着一箱传单到西郊去，路上遇到了侦缉队要检查箱子，李兆麟沉着镇定地说：要查可以，不过耽误了时间你们负责！他又大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干什么的？侦缉队被唬得不知所措，只好恭恭敬敬的把他放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北平团市委工作并担任北平市反帝大同盟执委的胡乔木根据党组织的布置，交给共青团员林郁青一个任务，让他同李烈生、张一吼一起到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胡乔木在张一吼家当面向林郁青、李烈生等作了布置。兆麟听了非常高兴，他找共产党派人到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斗争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二

一九三二年二月，党组织决定派冯基平带领李兆麟、杨天寿等人到辽阳一带与翟乐全一起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孙志远、夏尚志、林郁青等也先后到达辽阳。在冯基平领导下，研究确定了活动方案，为了联络方便，决定由李兆麟以同乡、同学的有利条件，出面同当地武装部队联系。这时，辽阳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亮甲山的高迎翔和沙岭的

吴三胜，因敌人挑拨，正酝酿着一场武装冲突。高迎翔在亮甲山士兵大会上发誓，不消灭吴三胜死不瞑目。在此紧要关头，李兆麟亲自找高、吴二人，揭露敌人的诡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调解了他们的矛盾。吴三胜表示，同意把抢高迎翔的枪支弹药送还，并赔礼道歉。高迎翔也表示愿意重归于好。他们在辽阳东南山区坚持抗日二年多，互相配合，打了几次胜仗，给敌人很大打击。

经过李兆麟等人的奋力奔走，以辽阳二区区长苏景阳掌握的二百余人的武装力量为基础，把活动在辽阳二区和沈阳四区一带的“长江”、“燕子”、“天地荣”等山林队和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成一千多人的抗日队伍，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成立了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苏景阳任司令。这支队伍成立后，在辽阳地区给日军和亲日派势力以沉重打击。一九三二年春，在攻打铧子沟煤矿的战斗中，活捉了日本人八大矿矿长久留岛(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把伪警察署全部缴械。接着攻打沈阳，由于突然袭击，很快占领沈阳南关，驻守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紧急调集附近城市的关东军，企图消灭义勇军。苏景阳和李兆麟采取诱歼敌人的战法，将驻守辽阳的关东军一个中队引到柜子山一带，当敌人进入山口后，伏兵四起，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一百五十余人。当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义勇军已安全转移。接着，又在韭菜园子一带消灭投降日军的洪盛团土匪三百多人。后来，日军在《淞沪协定》签订后，从上海将陆军第十

四师调回东北，“围剿”东北义勇军。义勇军由于内部成份复杂，思想不一致，在强敌疯狂进攻下瓦解了。但李兆麟等组织的抗日武装，在辽阳地区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兆麟在组织义勇军的同时，还同冯基平、翟乐全、张一吼等人在小荣官屯一带成立了农民救国会。他还从家里要了八十元钱，派人到沈阳买了两台油印机，和几个同志在夜间刻钢板、印传单、写标语，组织农民和儿童积极分子，到双龙寺、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和张贴。他还把自己的母亲、妹妹、堂兄弟等亲属也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宣传工作。

李兆麟经过这段斗争的实际锻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加入了共青团，同年秋天转为中共党员。十一月间，李兆麟受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化名孙正宗。他通过煤矿的爱国青年杨坚的介绍当上了矿工，以挖煤、扛木头、推车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开展反日活动。不久，奉天特委又派共产党员侯薪和孙乙泰到本溪，他们三人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发展抗日救国会会员三百多人。李兆麟在沉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工作中染上了肺病，强烈的事业心促使他带病坚持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奉天特委将李兆麟调到奉天治病，病愈后，李兆麟到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工作，并担任青年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先到沈阳兵工厂进行活动，以后又到北大营和东山嘴子的伪靖安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他通过关系结识一个伪靖安军中的崔军医，经常以找崔军

医看病为名，出入伪靖安军兵营，和士兵交朋友，策动伪军起义，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许多官兵表示愿意起义，走抗日救国的道路，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在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李兆麟召集几个决心起义的官兵，商讨起义行动计划。会后，他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刚走出兵营时，迎面遇上邻居老大娘慌忙地走过来告诉他："你家被日本宪兵搜查了，千万不要再回家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兆麟不得不改变计划。离开沈阳，暂回老家。几天后李兆麟得知，奉天特委机关因叛徒出卖，已被敌人破坏了，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李兆麟的母亲和妹妹也被逮捕了。敌人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加上叛徒特务的监视，环境十险恶，不容许他在奉天继续活动下去，他便决定去哈尔滨寻找党组织。

三

一九三三年八月，李兆麟到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找到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接上关系，被分配到满洲省委军委作领导工作。此后，他化名张玉华，受满洲省委派遣，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北满的巴彦、海伦巡视工作，传达"一·二六"指示信（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和满洲省委决议，帮助当地建立抗日游击队。同年九月，满洲省委又派李兆麟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珠河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并介绍杨靖宇在

南满组织领导游击队进行斗争的情况。李兆麟到珠河后，同赵尚志、李启东一起研究制定了建立游击队的原则和活动计划。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珠河县正式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任队长。

一九三四年初，满洲省委为加强对珠河游击队的领导，派李兆麟（化名张寿笺）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李兆麟到珠河游击队后，协助赵尚志积极开展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各义勇军和山林队的首领加强联系，并通过协商建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联合军建立后，连打几次胜仗，游击队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加上义勇军和山林队，联合军发展到五百多人，力量越来越大。李兆麟同赵尚志商量，为打击敌人，壮大军威，决定西进攻打宾州城。五月中旬，赵尚志和李兆麟率联合军进攻宾州，部队经过奔袭突然出现在宾州城下，被围困在城内的守敌惶恐异常，紧急向哈尔滨日军求援。日军派出五架飞机和近千人日伪增援部队。联合军向日伪军展开英勇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七十余名，击落敌机一架，震撼了敌人，鼓舞了联合军的斗志。

一九三四年六月，珠河反日游击队，发展到四百多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吸收山林队和义勇军参加，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六月二十九日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赵尚志为司令，李兆麟任政委，下辖三个总队，分别活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一九三四年初秋，为了打击敌人“讨伐”的嚣张气焰，哈东游击队决定攻打哈尔滨东南重镇五常堡。赵尚志和李兆麟率领三百余人，于九月中旬的一天，部署一百人在拉宾线上，准备打援，其余兵力将五常堡包围起来，夜间突然攻进城内，守敌五百多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弃城逃跑。这一仗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被服、布匹等军需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了部队，扩大了影响。以后又打了些胜仗，使游击区的范围从原来的珠河扩大到延寿、宾县、五常、双城等五个县十二个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哈东支队吸收当地义勇军参加，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被分配到二团任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李熙山共同率领部队，活动于珠河铁道南和五常、双城地区，二月间在珠河县帽儿山附近击退了日伪军的讨伐队，四月间又联合道北义勇军，攻占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小黄烧锅。接着又进攻大亮子河，将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毁。敌人对第三军和珠河游击区连续“讨伐”，实行烧光政策，将游击区的群众赶到指定地点，并成大屯，割断第三军与抗日群众的联系。五月中旬，第三军司令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率第一团向东转移，将李兆麟调到一团任政治部主任。当部队到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一带时，得知大量日伪军在牡丹江沿江一带进行阻击。第三军司令部决定改变计划，停止东进，赵尚志率领军司令部返回珠河游击区，李兆麟率领第一

团留在方正地区继续活动。不久，在大罗勒密地区的三家子屯，李兆麟与李延录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会合，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拔除刁翎镇敌伪据点。九月十六日开始攻击，李兆麟率第三军一团攻打西门，第四军二团攻打东门，两面夹击，攻得勇猛，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伪警营长率部投降，刁翎镇被革命军占领。当晚，敌军从林口出援，革命军又乘胜急进林口，留守之敌见势不好，弃城逃跑。革命军进城后，得马数百匹。

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赵尚志在汤原县境内召开了北满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出席了这次会议，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会议根据《八一宣言》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经过协商，二十八日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会后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被调到第六军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此后，第三、六军各抽一部分部队，共同组建后方留守处，由李兆麟负责领导建立汤旺河后方军事根据地。三月十九日，李兆麟接到赵尚志命令，要他组织部队，消灭盘踞在岔巴旗、南岔、老钱柜一带以汉奸“于四炮”为首的森林警察大队。这股伪军有一百多人，不仅为日军乱砍滥

伐森林资源，搜刮民财，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对革命军后方基地也是个很大的威胁。李兆麟和第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率领一百五十多人，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到达岔巴旗。他们先抓住伪警察的两名哨兵，问明情况，然后就分别突进敌人集中居住的两个大院，俘虏黄毛、丁山、张保安、宫四炮四名中队长以下四十多人。紧接着，李兆麟组织一部分队伍，换上敌人的服装，乘着爬犁，押着几名敌中队长领路，顺利到达南岔，一夜解决了三个据点。次日休息，第三天又以急行军赶到老钱柜，直插离老钱柜十几里路的日军指挥部，打死森山大尉以下七名日军指导官，俘虏伪警察一百五十多人，缴获一挺轻机枪、一百多支步枪、四千四百多发子弹和几万斤粮食，遣散了伐木工人，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的森林警察大队。从此，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建立了许多密营，在山沟里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仓库和医院，成了三、六军的后方基地。同时，三、六军还联合建立了军政学校，赵尚志兼校长，李兆麟担任教育长。这所学校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办了三期，为北满各军、训练培养了许多军政干部。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在帽儿山(今伊春境内)召开联席会议。根据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按东北已有的四个游击区分别建立四个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李兆麟被选为临时省委委员。此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即成为

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一九三七年初，北满省委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下辖三、六、九军和祁致中领导的独立师，仍由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李兆麟在积极参与指挥作战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艰苦环境中加强部队建设，经常奔忙于北满各抗日部队之间。由“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独立师，一度思想混乱。李兆麟亲自到该师帮助工作，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从而巩固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后来独立师打了许多胜仗，被编为抗联第十一军。

五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是北满抗联发展的高峰，当时抗联有十个军，除一、二军外有八个军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反满十分活跃。七七事变后，北满抗日斗争又掀起新的高潮，各军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日伪军。日伪当局惶恐不安，惊呼“三江省已变为共产乐土”。六月，北满省委为加强对第三军的领导，决定由李兆麟兼任三军政治部主任。

李兆麟到三军后，主动同军长赵尚志研究部队作风建设，并向各师发出指示，号召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勇敢杀敌的优良作风。又经北满临时省委同意，将军事学校的教官和学员派到三、六军各部队中，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

一九三七年冬，敌人加紧对抗日联军集中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大讨伐”，抗联各军奋力反击，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但部队的伤亡也比较大，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的衣、食和枪弹都发生困难。一九三八年一月，北满省委派六军军长戴洪滨护送省委代表赵尚志赴苏商谈重大问题。为配合这一行动，李兆麟指挥三军十师和六军二师二百余人，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率一百二十余人，分别攻打鸭蛋河与罗北县城。李兆麟率领部队攻打鸭蛋河之后，连续两次冲破敌人的堵截，把队伍带到富锦县四区。这时，日伪军集中兵力，向松花江下游两岸的依兰、桦川、富锦、汤原一带进行疯狂的“讨伐”。三月中旬，日伪军、警、宪及特机关在这一地区进行大搜捕，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割断了部队与群众的联系，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的供应极端困难。部队一面克服困难，一面抗击日伪军的疯狂进攻。

一九三八年四月，李兆麟参加北满省委在依兰县青山里召开的第七次常委会议。会议刚结束，敌人的“讨伐队”就进山袭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兰生带领省委机关向西北撤退，李兆麟率领部分部队把敌人引向与省委机关转移的相反方向，到依兰的四块石，甩掉了追击的敌人，保障了省委机关的安全转移。接着，李兆麟率领六军教导队向罗北地区转移，经过长途行军，到达梧桐河，与六军一、二、四、五师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北满临时省委写信表扬李兆麟说：“由于你的机智积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你实为

布尔什维克的勇士，如有你这样不屈精神积极的努力……一定能使下江各地的各种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北满临时省委根据下江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六月初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了第八次常委会议，决定抗联各军要尽快地突破敌人对下江的包围，组织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远征，建立西北指挥部，指定李兆麟参加建立西北指挥部的准备工作会议。由于三军军长赵尚志已去苏联，还决定李兆麟以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并担负组织部队西征的重任。李兆麟虽未亲自参加省委这次会议，但接到省委指示后，积极贯彻会议决定。七月间，他在萝北县麻花村召集在该地区的部队团以上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开会，分析了形势，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省委关于西征的决定。会后，各军主力部队按计划踏上西进的征途。

为了牵制敌人，支援西征主力部队，做好下江部队的留守工作，李兆麟率领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下江，在萝北、富锦、宝清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八月下旬，李兆麟发现日军佐美骑兵旅奔向四军留守部队驻地，他抢先赶到四军驻地，同四军的指战员一起，采取近战，将日本骑兵打得乱成一团，当夜幕降临后，他和四军留守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十月间，李兆麟得知十一军一师三百多人，被敌人包围在富锦的南老道庙山谷里。他立即带领六军教导队的一百八十多人前去解围，经过一夜急行军，还通过了一片难于立足的沼泽地，第二天中午赶到南老道庙沟。他指挥部队向敌人

发起冲锋，实行内外夹击，打开了通路，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带领三百多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十一月，李兆麟率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的一部分队伍，开始最后一批远征，他们离开下江，踏上征途，经历了严寒和饥饿的考验。白天化为小分队行军，夜间集中宿营，带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就拣干蘑菇吃，甚至把皮带剁碎了煮着吃。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高寒条件下露营，他们就点起篝火，一边烤一边睡。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翻过小兴安岭，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达了海伦县，在白马石后方基地与先头部队会师。

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在抗日的烽火里，在西进的征途中，编写了一首著名的《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袭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充分反映了抗联战士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抗战必胜信念。同时也成为鼓舞抗联战士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英勇杀敌，夺取胜利的有力武器。

六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九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嫩海地区代表团，由李兆麟负责，开展嫩海地区的工作。会后又建立了讷河、肇州两个县委，将部队统一编成四个支队、两个独立师，设立了龙南龙北两个指挥部。李兆麟担任各支队和独立师的总指挥，并兼管龙北指挥部，辖第一、二支队，活动于嫩江、讷河、五大连池、龙门、通北、克山、克东等地区。四月十二日，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将北满临时省委改为北满省委；撤销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三、六、九、十一军共五百多人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建立第三路军指挥部。会上李兆麟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并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五月三十日，在德都县朝阳山后方根据地，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发表了成立宣言，并向全国通电。

自嫩海地区成立龙南、龙北两个指挥部，到建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指挥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部队在李兆麟等人的指挥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四月下旬袭击了通北伪警察署，尔后又袭击了龙门附近的紫霞宫分署和军用飞机场。五月五日攻进龙门火车站，接着又打进讷东的

三合屯。六月二十日攻入北安附近的李桂芳屯，同日还缴了德都县红花尔基警察所的枪弹，二十三日袭击纳河县高四阎王套院，并于同日打破曹乃修屯。七月末攻破红火鸡警察署。八月十五日攻陷老龙门车站，二十二日破克山县北兴镇。九月十八日攻占讷河县城。十一月进攻德都县伪警察署，经过一天战斗，毙敌百余名，缴获步枪百余支。由于第三路军龙北部队到处打击敌人，打得日伪军惶惶不安，使敌人的所谓“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及其大肆吹嘘的“五大连池会师”的预谋破产了。

一九四〇年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抗联统一编制序列，第三路军所辖第一、二、三、四支队，改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各支队按照总指挥部的部署，根据游击战的秘密、迅速、突然、坚决、流动等特点，主动灵活的袭击敌人。据统计，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第三路军各部队共作战四十多次，有三十多次取得了胜利，毙伤俘日伪军七百五十多人，其中毙伤日军一百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多件，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驻嫩江日伪军突然袭击朝阳山，包围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身先士卒率领教导队的战士迎击敌人，一天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击毙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以下日伪军多人。李兆麟和部分教导队员在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的掩护下突出重围。

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被袭击，遭受较大损失，在反包围

的战斗中，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和十余名教导队战士英勇牺牲。敌人自以为他们“围剿”三路军总指挥部取得了最后胜利，大肆宣扬“东北抗联已被最后消灭”，并积极筹备庆祝活动。正值此时，李兆麟部署各支队展开了攻势。活动在龙北的三、九支队，在冯仲云、王明贵指挥下，于九月二十三日联合攻占了克山县城；在龙南活动的十二支队，于九月十二日袭击了肇州县丰乐镇，以后又攻克了肇源县城。第三路军在龙南、龙北取得的胜利，不仅戳穿了敌人的谎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坚定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和抗联部队的战斗意志。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增调重兵进驻东北，关东军从四十七万人增至七十六万人，抗日联军处境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实力，第三路军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小分队继续在边境地区和山区坚持斗争外，大部队于一九四一年底由李兆麟率领转移到苏联境内。转至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组成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一九四二年七月，在南、北满和吉东省委合并组成的东北地区党委会领导下，教导旅开展了军政训练，并先后派出十五个小分队回东北，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李兆麟根据中共东北党委会的决定，于八月二十三日率百余名抗联干部，在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部队尚未到达之前，随苏军经牡丹江进驻哈尔滨。李兆麟到哈市后，很快成立起抗联哈尔滨市办事处，他一手抓人民武装的建设，一手筹组政府。十月一日成立了滨江省政府，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副省长，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派钟子云到达哈市，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委员会。李兆麟在地区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很出色。

刚刚获得解放的哈尔滨市，情况很复杂，地方的敌伪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先遣军”。他们造谣惑众，破坏治安。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于十一月十六日决定成立松江军区，卢东生任司令员，钟子云为政委，李兆麟兼任副政委。李兆麟当时的任务很重，一面同苏军一起接管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一面还要为中共中央派到北满开辟工作的干部和部队安排接待、转送等工作。这时控制哈尔滨市的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使共产党在哈市活动受到很大威

胁。滨江地区工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开会决定，工委和军区领导机关于二十一日撤出哈尔滨，迁到宾县蜚克图。并决定李兆麟辞去副省长职务，专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以中共代表身份留在哈尔滨。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当局派关吉玉、杨绰庵、余秀豪到哈尔滨，分别任省、市长和警察局长。李兆麟经常同他们打交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三月八日，李兆麟在全市各界妇女召开的庆祝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演，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一月十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妇女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事业，为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讲演教育了群众，刺痛了敌人。

国民党特务和敌伪残余，曾多次策划杀害李兆麟，甚至在中苏友好协会门前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越来越不择手段。国民党特务、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孙格玲伪装进步，打入中苏友协。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下午，孙格玲给李兆麟打电话，谎称杨绰庵要与他商定“国大”代表问题，说办公室人多不便，邀他到水道街九号去商谈。李兆麟在乘汽车赴邀的路上，车子发生故障开不动了，他怕误了时间，便告诉秘书汽车修好后再去接他，说完即独自前往。到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有人帮他脱去大衣，并将大衣锁进衣柜，手枪在大衣口袋里，没来得及取出。他被引进事前作了周密准备的房间，先给他喝了一杯投毒

的茶水，接着潜伏的特务便跳出来向他行刺，开始李兆麟还尽力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身上被刺伤多处，跌倒在地。这位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斗争，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民民族英雄，却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惨遭国党特务的杀害，党和人民深感痛惜。

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哈尔滨市人民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后来又建造了“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的墓碑，以示人民永志不忘，永远缅怀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和伟大的民族英雄。

（战　辛）



罗 荣 桓



罗荣桓

青少年时期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乡)。他的祖父罗汇吾以教书为业，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教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一九〇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衰落。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世代都是长工，为人宽厚，勤劳善良，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慎镇，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为他改名荣桓。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私塾，十二岁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等课很有兴趣，学得认真刻苦，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作文，称赞大禹公

而忘私的高贵品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被老师选为范文。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高小毕业后，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

一九一九年秋天，罗荣桓离开闭塞的南湾，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这时湖南的新旧思潮斗争激烈，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说纷纷出现。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他影响最深。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吸取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年底，罗荣桓积极参加了长沙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遇到地主萧罗仙不顾天旱歉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退佃，他父亲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受地主诬告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他以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罗荣桓被选为会长。罗荣桓积极开展平民教育，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他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他教算术。夜校还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和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

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迫使他不得不回乡暂避。

这年暑假，罗荣桓来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补习功课，准备考学。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揭露湖南政客易家樾反动面目等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一九二五年四月，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五月二十九日，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调集军队镇压，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青岛惨案，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青岛大学在学生会组织下，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罢课。罗荣桓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慰问死难者家属，募集救济金支援青、沪两地工人。他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揭露青岛惨案真相，呼吁青、沪各界联合

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起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在广州，罗荣桓广泛阅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书，以及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开展工农运动的小册子。广州的革命形势和这些新思想，使他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这年秋天，罗荣桓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先到县城和党的县委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然后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他又挨家边访问边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旧历十月)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罗荣桓是农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游行。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

来。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的仇视和反抗，他们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极力破坏农民运动。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并密谋暗杀罗荣桓。罗荣桓对这些诬蔑、恫吓毫不畏惧，写文章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荣桓在武汉读书的同学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去武汉。四月十四日，在农友的护送下，罗荣桓摆脱了地主豪绅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达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这时，罗荣桓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罗荣桓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计划，他指挥农民自卫军智取了通城，缴了反动民

团的枪支，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王武扬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同没有赶上八一南昌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农民武装编为该团特务连，谭希林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罗荣桓以共产党员、警卫团长卢德铭为榜样，同其他党代表一道，在工农红军中开创了连队党代表的实践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四个团，武汉警卫团为第一团。秋收起义受挫后，一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湘赣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了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在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毛泽东的讲话，使罗荣桓增强了坚持革命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一个特

务连，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罗荣桓后来回顾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不久，即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途中，罗荣桓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该连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有了最早的这批士兵党员，才使"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决策能够实现。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改编，到一九二九年底古田会议，两年零三个月中，罗荣桓曾历任特务连、九连、八连和三营的党代表。他是红军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他在九连工作时，始终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时，他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被子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而战士们有了病，他却一天几趟问寒问暖，还要伙房给做好病号饭。他以自己的模范行

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罗荣桓调到八连后，十分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了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他特别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连队吃的主要是红米饭，没有碗筷，饭熟了，由炊事员捏成饭团，一人一个。因为粮食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分完了饭才回来，有就吃，有时分完了就饿一顿。罗荣桓还要求全连党员分工对非党员特别是情绪易波动的战士给予具体帮助。对连队的政治教育,他也抓的很紧很及时。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逃散）。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只

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成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三营在巩固部队方面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中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坚持肃清封建残余，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军阀主义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罗荣桓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从不打骂士兵，即使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他任三营党代表时，曾对一个打了战士的班长谈话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这个班长承认并改正了打骂士兵的错误。

在人民解放军十个元帅中，罗荣桓是最早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他也是经过斗争实践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伟大正确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建党、建军及党对军队领导等

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当时任支队(营)党代表的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会议最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九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陈毅都未参加。这个会没有开好，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十月底，红四军攻打广东梅县时，罗荣桓率九支队打进北门，腰部右肋下负重伤，谭政等把他抬下火线。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撤到寻邬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下旬红军收复汀州后，罗荣桓住进傅连暲的医院治疗。

十二月初，罗荣桓伤愈出院，随即率领三纵队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这期间，陈毅由上海回来，传达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多次召集党代表座谈，罗荣桓参加了这些座谈，并积极反映了部队情况，介绍了政治工作经验。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镇召开，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罗荣桓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罗荣桓等“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这时党代表都已改为政治委员)，二纵队司令为曾士峨。罗荣桓来到二纵队，首先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要求部

队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课教育制度，按时上党课，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建设。

一九三〇年六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军长为林彪。罗荣桓到军部后，十分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当时部队刚开始设专职青年工作干部。他找军部青年委员肖华谈话，要求“首先把各师、各团的青年团组织建立起来，要调一部分年轻党员作团的骨干，将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经过他们，将连队的团支部和团小组建立起来，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还对肖华说：“要把部队搞得活跃一些，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要符合这个特点，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政治机关的努力下，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同年八月，罗荣桓被正式任命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十一、十二月间，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肃清“AB团”的活动。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估计敌情错误，出现了扩大化，使许多无辜同志被捕被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对待这一事件注意实事求是，坚持政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挽救释

放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红十二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当时部队中就流传着“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尽管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批评为“肃反不力”、“右倾”，但他却减轻了肃清“AB团”对部队造成的损失，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粉碎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胜利条件。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四军召开了动员大会。罗荣桓在讲话中，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讲完话他又领着部队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扫除了不久前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恐不安情绪。大会之后，部队即准备进入战斗。按照统一部署，罗荣桓与林彪指挥红四军向龙冈西北斜插过去，与红三军联接起来，使敌人陷入重围。三十日红军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又歼敌五十师一半，第一次反“围剿”至此胜利结束。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主力由边沿区移至广昌、瑞金地区做反“围剿”的准备。这期间，罗荣桓以全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

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后，他又召集了有驻地人民代表和广大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粉碎敌人的"围剿"。四月下旬， 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东固、龙岗一带隐蔽待机。这时，由于几万大军集结在大山中，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罗荣桓带领干部战士想方设法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他始终抓紧政治思想工作，领导红四军的部队经常上政治课，召开党、团员会议，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反"围剿"战斗中党、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红一、三军团由江西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参加的各次重要战斗，罗荣桓都亲临前线指挥。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红军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四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敌人大批枪支，部队转移时，敌军紧追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夺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红四军军委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职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组成红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四月，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向福建进军并攻占

了漳州。罗荣桓很重视城市工作，在红军入漳州之前，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并要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他还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穿长袍、戴礼帽的人都当成土豪。"进入漳州城后，红军良好的军纪，给漳州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拥护。接着，罗荣桓组织军团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了漳州市工农民主政府。不久，红军撤离漳州。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建议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罗荣桓也随之受到排挤，于一九三三年春被调离红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在受到排挤身处逆境之时，罗荣桓仍然坚持原则，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罗荣桓离开红一军团到宁都时，遇到两个也受排挤的老战友，向他倾吐了心中的不快。罗荣桓对他们说："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

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后来，他又对被撤职的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说：“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对扩大红军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给予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等先进单位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把罗荣桓等人的名字登在苏区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一月下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的优异成绩，在大会上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罗荣桓调到新成立的红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由于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坚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十月被迫长征。十二月，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一千多人，军委指示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红五军团，罗荣桓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以后，罗荣桓曾短时间到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在长征途中，罗荣桓跟随干部团行动，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筹粮和群众工作。九

月下旬，红一、三军团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罗荣桓在这里嘱咐部队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十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六年二月，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带领红一军团渡河东征。三月初，红一军团在山西中阳县以南的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进攻红军的阎锡山主力独二旅。罗荣桓随即在汾河流域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取得了显著成绩。五月，罗荣桓随东征部队返回陕西。六月，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罗荣桓调红大学习，并任一科（主要收师以上干部）政治委员。在红大，他一面参加学习，一面参加领导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罗荣桓调延安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独立师的政治工作。他同时还到红军大学第二期讲授中国革命史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受学员欢迎。

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结婚。七月十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任命罗荣桓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此后，罗荣桓即随一一五师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艰苦曲折的八年抗日战争中。

向山东敌后挺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一一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歼敌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十月，一一五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从敌伪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接着，罗荣桓又率领部队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成立，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南下，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同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山地区、巩固

战略枢纽的指示，二月中旬，一一五师移至汾阳、孝义地区。三月二日，林彪被阎锡山部队开枪打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三月中旬，罗荣桓和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晋西大宁的午城、井沟伏击日军，连续战斗五个昼夜，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九月中旬，又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两侧，三次伏击扫荡吕梁山根据地的日军，三战三捷，毙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十六名，缴获汽车三十余辆。显示了八路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九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他着重谈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问题。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去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十二月二十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从介休翻过积雪的绵山，进到晋东南的屯留、长子一带，在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迎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听取了总司令朱德作的形势任务报告。经过短期休整，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继续向山东进发。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罗荣桓率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一到山东，罗荣桓就和陈光决定，首先要打一个

胜仗，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三月三日夜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把驻郓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全部歼灭，俘团长以下五百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这是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第一个胜仗，八路军声威由此大振。樊坝战斗后，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与陈光决定，由杨勇、何德全、张国华等率六八六团三营等部队留在郓城地区，称东进支队第一团(后改为独立旅)，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三月六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召开了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十二日，他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造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

罗荣桓来山东时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中共中央

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三月下旬，罗荣桓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会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等人。罗荣桓向分局主要领导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正在这时，传来了顽固派秦启荣指使部队在淄川以东太河镇残杀路过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多人，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罗荣桓听到此事，极为愤怒，明确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揭露，在军事上应当狠狠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四月二十日，八路军向太河镇顽军发起反击，歼敌一部，收复了太河镇。

四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五月五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武装问题，二是政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游击部队应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之下，在独立团、营设立政治委员，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政治工作，依靠党来保证统一指挥，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他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插入敌人心腹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路中段的敌人。山东日军最高指导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五千余人，并配有大大小小汽车百余辆，大小炮百余门，兵分九路，于五月九日开始向泰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十一日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于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当时去东汶支队，不在师部，陈光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歼敌联队长以下一千三百余人，并于当晚突出重围。由于一一五师在陆房战斗中处于非常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伤亡了一些同志，丢掉了许多东西，因而部队思想波动。罗荣桓回到师部后，听到这些议论，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东平县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说明一一五师在敌人的重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有的同志埋怨我们的一些骡马驮子在战斗中丢掉了，我看这等于是敌人替我们搞了一次轻装，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这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更加有利于机动地打击敌人。现在丢掉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罗荣桓的讲话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内部团结。

陆房战斗之后，罗荣桓于七月下旬到达梁山宋江寨以

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回来，与罗荣桓会合。八月一日，部队正准备在前集召开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时，突然接到情报：有一股敌人从汶上直奔梁山而来。据侦察报告，这股敌人属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约三百余人，配有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野炮，准备到梁山一带进行“扫荡”。当时，一一五师师部所掌握的兵力不足一个营，但附近到处是青纱帐，便于部队隐蔽运动，在梁山南边二十余里还有杨勇独立旅的部队可以调来参战。而这股敌人没有后续部队，人数不多，孤军深入，指挥官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十分骄横。罗荣桓与陈光分析了上述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兵力虽不多，但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决定由陈光指挥这一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八月二日上午，将敌人全部歼灭，俘日军十三人，缴炮三门，骄横一时的长田敏江被击毙。梁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也坚定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发来一封嘉奖电报，还送来三万块钱表示慰劳。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存在。

九月，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分别越过津浦路，东进至鲁南。

师部教导大队已于五月先期到达。罗荣桓于十月份进入鲁南。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在抱犊崮山下的上大炉召开的直师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大战的起因和前途，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日本和英、美、法对中国的态度及政策，中国抗战的困难和危机。他着重强调："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罗荣桓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等为开创鲁南根据地的新局面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从湖西传来大批干部在"肃托"中被害的消息。他忧心如焚，立即率领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

湖西"肃托"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罗荣桓从靠近湖西的冀鲁豫支队杨得志的来电中，得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还接到苏鲁豫支队关于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逮捕的报告，他感到问题严重，立刻发电报，命令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立即停止捕杀，并将杨得志的来电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张经武

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郭洪涛发电报同罗荣桓商量一起去处理此事。罗荣桓在出发之前，再次发电报通知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罗荣桓带领保卫部干部及警卫部队十一月从鲁南抱犊崮山区出发，与郭洪涛、张经武会合后，昼夜不停地赶往湖西。他们穿过津浦路，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这时，四大队也已由鱼台县转移到单县朱集一带。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不进王凤鸣的驻地，而驻在附近一个村子里，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而后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同时，把带来的保卫部干部组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的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经过调查了解，湖西"肃托"首先是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的。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知识青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些学员不愿统一分配，要求回家乡工作。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干校处理此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将魏定远调到地委，由王须仁亲自审讯，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供出了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的所谓"肃托"，得到了王凤鸣和湖西区党委书记的支持，王须仁便有恃无恐，用种种残酷肉刑进行逼

供、诱供、指供。区党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托派”。

“肃托”的恶浪，从地方又卷入部队。四大队的营、连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许多人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送进监狱。至此，王凤鸣一手独揽了湖西的党政军大权，王须仁成为他的助手和打手，区党委书记也完全站在他们一边。

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听到湖西“肃托”的消息，兴高采烈，都等待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内乱”和“崩溃”，而湖西的群众，则人心惶惶，失去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任；部队干部、战士人人自危，怕被捕杀，有的被迫回家，有的逃到友邻部队。几年来党在湖西地区辛苦创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被摧毁。

罗荣桓派人把王凤鸣叫来后，不看他事先编造好的那些材料，也没听完他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辞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使得王凤鸣一下慌了手脚，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

罗荣桓气愤地说：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还有那个'苗子'（指的是二营副营长，因为是苗族，人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他是个奴隶娃子，十四岁就跑出来当了红军，来到湖西才几个月，也被你打成了'托派'！"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凤鸣，混身无力的瘫在椅子上。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这时也悔恨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教育他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象王文彬同志，张如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衣衫褴褛、面色憔悴的梁兴初，看到罗荣桓进来，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看着他身上的伤痕，愤慨地说："这简直是

胡闹！”罗荣桓向梁兴初问了些情况，告诉他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来的，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接着，罗荣桓和郭洪涛又去看望了受刑最重的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派人将他转送到卫生队，并亲自叮嘱卫生队负责人，要细心看护，精心治疗。他们又去看望了原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并立即将他释放安排了工作。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的“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已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再一个个的调查，决定快刀斩乱麻，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人员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接着是一片激动的哭声。罗荣桓的眼睛也被泪水蒙住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党、军队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人，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要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审阅修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许多受迫害的人被释放以后，揭露了王须仁大量骇人听闻的罪行。罗荣桓解除了王须仁的职务，交由保卫部门进行审查，后来他畏罪自杀。

罗荣桓以果断的行动和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制止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屠杀，为挽救湖西的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重大功勋。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担任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各条战线上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和千百万湖西人民一样，永远怀念着罗荣桓。

建立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罗荣桓在大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他指出，鲁南山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后方，创造八路军的山区根据地，能配合广大平原游击战争，将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打开鲁南局面，创建独立自主的根据地，罗荣桓狠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件重要工作。

团结万春圃，争取孔昭同，正确对待于学忠的东北军，是开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万春圃是鲁南山区很有名望和影响的开明士绅，家在抱犊崮东北的大炉。他是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的负责人，掌握着四县边联的军政大权。他性情豪爽，讲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共产党有接触的他的三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在他掌握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住在万春圃家里，经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罗荣桓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万春圃深受感动。他常对人说，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在和罗荣桓的不断接触中，万春圃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加亲近。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拥有几百条枪并有机关枪和迫击炮装备的武装，全部交给八路军指挥，后来这支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十八岁中秀才，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史。北伐战争以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侵入山东、韩

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同别人一道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冬，进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六师。罗荣桓经过调查，认为孔昭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部队号称三千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泗水、费县之间，对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中段构成很大威胁，这个地区也是八路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孔昭同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在自己的白绸子背心上写了“为国尽忠、为子报仇”八个字，天天穿在身上。石友三反共后，曾想把孔昭同的部队调到河北去，孔昭同拒绝北调，坚持在鲁南抗战。他还聘请在山东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根据这些情况，为了争取孔昭同，罗荣桓曾同孔派出和八路军联系的代表彭畏三作过多次深谈，一再阐共产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后来，应孔昭同的要求，罗荣桓又把黄玉昆派到孔师作政治部主任。黄玉昆到职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联系。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孔昭同与八路军关系日益密切，终于在一九四〇年春，断然与国民党割断联系，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一一五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

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苏鲁战区

总司令的于学忠，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团结友军政策，确定了正确的策略。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他同共产党建立过友好关系。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又要效忠于张学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这就是在东北军中流传的反映于学忠政治态度的一句名言。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虽然也是东北军出身，但他积极投靠蒋介石，深得蒋的信任。罗荣桓根据于学忠、沈鸿烈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的于学忠，坚决打击了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因而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解放郯(城)、码(头)，三打白彦，巧妙粉碎敌伪军扫荡，是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中几次重大胜利。

郯码平原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中的枢纽。拿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阎丽天任郯城县长，他公开反共，制造磨擦，取缔共产党在郯码地区的抗日活动，并妄图消灭临郯独立团。经过争取，阎与八路军联合抗日无效，一一五师遂派出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举攻占了码头镇。此后，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郯码

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鲁西北与鲁东南的交通枢纽。盘踞在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罗荣桓到鲁南后，曾派人去争取孙鹤龄一道抗日。但孙顽固不化，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致使白彦成为八路军向北发展并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严重障碍。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一九四〇年春节刚过，罗荣桓与陈光就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冒雪向白彦进发。二月十四日，六八六团迅速攻占了白彦，成立了白彦抗日民主政府，部队抓紧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不甘失败的日、伪军，接连在三月七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九日对白彦发起三次进攻，均在罗荣桓、陈光亲临、前线指挥下将敌击溃。在三次争夺战中，八路军歼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粉碎了日伪占据白彦的企图。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根据地军民极大鼓舞，使鲁南的敌、顽都受到很大震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近八千人的兵力，从邹县、滕县、枣庄、临沂、费县等据点，分十几路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消灭八路军各路部队。敌人在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后，从二十一日起，对大炉根据地中心区形成了大合围。这时，罗荣桓正在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他沉

着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决定继续把会开完，并指挥六八六团等主力部队迅速转到外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罗荣桓开完会率师直属队坚持在内线迂回穿插，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天拂晓，罗荣桓和师政治部在核桃峪附近发现了敌人，他命令警卫排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自己仅带两个警卫班监视敌人，直到敌人距离数百米时，他才带警卫班从容地骑马急驰而去。罗荣桓面对强敌如此镇定沉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八路军经过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历时二十多天，歼敌千余人，到五月上旬，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月，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村，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这是一一五师入鲁以来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各支队及旅级干部、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发展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由点到块，并逐步互相打通；"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

特别是进入山东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孤立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来一一五师入鲁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以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对敌顽斗争的指针。

在桃峪会议上，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指示，罗荣桓结合一一五师的实际情况，在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会后，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桃峪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将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六个教导旅，师的领导机关也得到加强与健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荣桓既是政委，又兼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多，任务繁重。一九四〇年六月，军委总政治部任命鲁西军区政委肖华为师政治部主任。十月，军委又批准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任师参谋长。有了主任和参谋长，罗荣桓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领导全师工作。

罗荣桓一贯重视政治工作，他认为：八路军的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八路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有政治工作的保证。我们所以能以低劣的武器装备同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奋战数年，并获得惊人的战果，这正说明了八路军政治质量优于敌

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保证战斗的胜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罗荣桓经常教育政治工作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把政治工作凌驾于其他工作之上。他还经常强调，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保证作用，不要和军事工作争权，工作方式方法也要与军事工作有所区别，必须通过更艰苦耐心的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政治自觉，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罗荣桓经常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得军事，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把干部教育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抓得很紧。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指导部队工作，很重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对一一五师政治部的宣传队——战士剧社的成长十分关心。

罗荣桓非常重视连队工作的建设，他一贯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为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一五师召开了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较全面而又简明的指示。他指出：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必须通过艰苦耐心的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启发战士的自觉；连队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抽象的东西。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他认为，青年是八路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进行战斗和完成各项任

务的突击力量。从红军时期，他就特别关怀青少年的成长，象肖华、梁必业等，就是在他的长期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军队政治工作著名的领导干部。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敌后，到一九四二年夏，在三年多时间里，罗荣桓熟练地运用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逐步地打开了以鲁南山区为中心的新局面，成功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不仅是八路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并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在山东敌后的抗日斗争中，在军事指挥方面最为人们广泛传颂的两件事，就是留田突围和“翻边战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带领日伪军五万余人，向沂蒙山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中共在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鲁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十一月四日，罗荣桓等率领一一五师师部转移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也随师部一起行动。在留田村，遭到敌人四面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当时，驻在留田的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大机关共有两三千人，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能不能突出敌人的合围，保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胜利转移，关系着整个山东

抗日斗争的成败。五日上午，罗荣桓在留田附近一个小村庄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向。罗荣桓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后果断地说："我们应该向南突围！"这个意见使大家感到意外，因为敌人的大本营就设在留田南面的临沂城里，畑俊六就在临沂坐镇指挥。为什么要向南面突围？罗荣桓接着对当前的敌情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判断：东面，沂河、沭河和台（儿庄）潍（县）公路都被敌人严密的封锁着，而且敌人预料到我八路军可能由沂蒙向滨海区转移，已经秘密地在两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封锁了每个渡口，如果我们东去滨海区，正好钻入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正是敌人疯狂扑来的方向，沂鲁山区又为国民党军盘踞，我军北上可能受到敌顽夹击；西面，是临沂通向蒙阴的公路，过去虽大部为我控制，现在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军能越过此路进入蒙山，那里也必定是敌人合击的目标；而南面，虽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区合围，临沂一带成了敌之后方，必定空虚。而且，敌人也不会估计到我八路军敢于向他们的大本营所在地的临沂方向突围。据此，罗荣桓提出直下正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再转向西北，进入蒙山南麓——沂蒙区和鲁南区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罗荣桓立即向特务营营长交代了任务，又给几个干部具体分工：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一、二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四连居中，卫护机关；

副营长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和收容掉队人员。他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最后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声响。

入夜以后，敌人在留田周围的各个山头上燃起一堆堆大火，枪炮声、马嘶声、日军的嚎叫声，阵阵传来，狂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铁壁合围”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向八路军发起总攻。就在这时，我党政军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士们，正在罗荣桓的带领下，乘着雾气迷漫的朦胧月色，静悄悄地向南疾进，迅速通过了张庄、高里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到了下半夜，就顺利地突出了重围。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他遂即命令部队折而向西，黎明前，在埠山庄宿营。这个村庄距临沂城只有五十多里，紧靠敌人控制的临(沂)蒙(阴)公路。天亮后，敌人的后续部队正从这条路上络绎不绝地向北开去，但却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我山东党政军机关在这里隐蔽了一天，入夜继续向西转移，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这里地处临费和临蒙两条公路的中间，是敌两路“扫荡”部队的结合部，虽然四面敌情严重，师部等在这一带却很安全地住了五、六天。

这次跟随一一五师突围的，有一名德国进步记者，名叫希伯。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来过中国，热情支持中国的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到延安和皖南、苏北的新四军采访，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陈毅等。一九四一

年九月，他从苏北跨过陇海路，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接见了这位国际友人，一一五师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曾准备让希伯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区去。希伯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战斗的事迹。"十一月五日夜间，希伯随一一五师从留田突围。他亲眼看到八路军几千兵马，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心情非常激动。突围后，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奋地跑去找罗荣桓，赞扬罗荣桓英明卓越的判断和果敢巧妙的指挥。他马上挥笔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为《无声的战斗》，译出后发表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不幸的是，二十多天之后，敌人在费县以北的大青山另一次合围"扫荡"中，希伯于十一月三十日壮烈牺牲。

从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师入鲁以来，在近四年的紧张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所谓"翻边战术"，就是将八路军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旬，敌人企图割断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蚕食滨海区之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称为海陵区)。罗荣桓亲自部署了海陵反蚕食战役的计划。他命令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逐个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伪据点。他要求部队动作要迅速，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

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十一月三日晚，教二旅出敌不意地逼近陇海铁路，攻克铁路北面的据点罗庄，伪军全部被俘。四、五两日又连克横沟、亭子埠、管圈沟。六、七、八三天，八路军乘胜前进，一面包围伪军据点，一面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伪军在八路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恐慌万状，有的投降，有的反正，有的闻风逃窜。从三日到八日六天之内，八路军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战役结束后，罗荣桓亲自听取了参战部队的汇报，召开了祝捷大会。

当八路军进行海陵战役时，日伪军又在沭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为了制止敌人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根据罗荣桓的部署，教二旅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又发起了郯城战役。郯城南靠陇海路，是日伪军在鲁南的兵站基地，城内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数百人。战前，八路军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动员了几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醋大庄等据点，把蚕食的敌人缠在沭河沿岸。并动员万余群众，对临沂至郯城的公路进行了四天大破坏。战斗从一月十九日夜开始，二十日夜我军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十八处敌伪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海陵、郯城战役之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这种积极主动开展对敌斗争的战术在以后的山东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海陵、郯城战役的前后及其间，罗荣桓还组织了讨伐顽军孙焕彩的三打甲子山战役。在整个战役中，罗荣桓参加研究作战方案，到参战部队进行动员，亲临前线指挥，及时分析敌情，改进攻坚战术，终于取得了歼灭顽军孙焕彩部两千余人、收复甲子山的胜利，扭转了滨海根据地中部的局面。就在这时，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得了严重的肾病，连续一个多月，尿血不止。在当时敌后的战争环境中，医疗条件极为困难，罗荣桓的肾病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仍然带病坚持着繁重的工作。

历 史 重 任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山东也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反复的“扫荡”、“蚕食”，当时山东只有滨海、鲁中、胶东三个地区还有比较集中的根据地，鲁南山区则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但在主观上，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敌强我弱和严重的三角斗争形势，有的领导人认识不足，影响了工作的深入；几年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对于这些问题，罗

荣桓曾向山东分局、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作过报告，并建议中央派人来帮助解决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春，刘少奇在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山东视察工作，于四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刘少奇先同山东党政军负责人分别谈话，交换意见，随后，召开了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也批评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提出中共和八路军今后在山东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罗荣桓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

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指示的基本精神，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在山东全党进行学习讨论，并贯彻执行。朱范村会议之后，罗荣桓和朱瑞、黎玉、陈光等山东分局负责同志，在刘少奇领导下，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是统一山东八路军的军事领导；三是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问题。这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陈光调回延安）。在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统一领导问题得到了解决。八月，中共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继任

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党、政、军领导重任，集于罗荣桓一身。在这以后的两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主力李仙洲部由皖北入鲁反共，而将东北军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如果李仙洲部入鲁，将成为山东各地方顽固派的有力支柱，也将使八路军处于对敌、顽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形势，罗荣桓一方面要求山东全党全军做好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坚持山东的三角斗争；另一方面，则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对各部国民党军队，按其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分别采取团结抗日、争取中立与坚决打击的不同对策。六月二十一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提出：于学忠部西开，八路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于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部北上反共则拟于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罗荣桓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亲自起草电报给各军区，指出，对同我有友好历史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不久，于学忠部西越津浦路离开山东，于部驻地为八路军接

收。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不得入鲁而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大大改善了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挫败了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罗荣桓当时曾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看成是“山东军民的一项杰作”。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以来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在山东根据地并未认真进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后，把减租减息当作最主要的任务抓紧进行。为此，山东分局多次下达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有关指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要求各地立即开展一个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此后，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又亲自到驻地的区、村检查指导实施情况。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一九四四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的号召。同年秋，又发出《关于部队协助地方群众斗争的指示》，规定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部队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斗争。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踊跃参军、参战，热情支持八路军，山东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使山东的斗争局面取得了有利于我党我军的明显转变。

减租减息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了大生

产运动。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组织换工，提倡合作，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各种农副业生产，使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罗荣桓还向部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战斗号召。要求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利，尽量做到自筹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罗荣桓还抱病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开盐田。在罗荣桓等军区首长的领导和带动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了一个生产热潮。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以后，山东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尚未形成热潮，主要原因是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重视不够。一九四三年山东党政军的领导统一之后，罗荣桓以很大精力抓了这一运动。当时，山东党组织已有很大发展，共产党员已由抗战前的二千余人增至十一万人。对大量新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以便坚持艰苦的对敌斗争，已成为山东党的迫切任务。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于同年四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今后建设的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

罗荣桓在领导整风运动时，要求大家认真精读规定的

文件，领会精神实质，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在学习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联系形势和抗日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他提出“学习成绩的好坏，要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来表现”。罗荣桓也经常参加干部学习，亲自同干部谈话，帮助某些人解决思想问题。

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坦白方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说：“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辞。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在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论述，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继承了中国百年来革命历史的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已经成为我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并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示范。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罗荣桓还指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与整风相结合，把它作为指导斗争的武器。

正当全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进行整风审干时，康生却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作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大搞“逼供信”，干扰运动的进行。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歪风，在山东受到了罗荣桓的抵制。当那个小册子从延安寄到山东时，罗荣桓看过之后，通知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因此，山东的整风运动，未受到康生的影响。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地区的整风审干工作贯彻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发展健康，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提高了觉悟。

山东经过一九四三年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经过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及整风运动，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到一九四四年初，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大体已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的状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日军对山东被迫采取了“重点主义”的配备方针。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罗荣桓领导山东军区加强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发动了一九四四年春、夏、秋、冬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一系列战役攻势。当时山东军区总的战略意图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下旬起，山东军区所属之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各军区，密切配合，先后对各地区的敌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作战。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共歼敌十二万人，先后收复了十八座县城，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胶济路以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

并与胶济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扩大了联系。还开辟与扩大了同华中、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山东八路军由一九四四年初的九万人，发展到二十三万人，并且改善了装备，从而增强了反攻的力量。这其中，倾注着罗荣桓的大量心血。

准备反攻和夺取最后胜利

一九四四年以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五个战略区内，敌人的分割封锁已被基本打破，过去遭受严重压缩与分割的鲁南区、冀鲁边及泰山区都逐步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这时，罗荣桓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打通与扩大五个战略区的联系，相机拔除深入根据地内部比较孤立的据点，以继续扩大解放区，为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作准备。为此，必须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争取大股伪军起义，加强城市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和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

为了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多次发出指示文件，分析了敌人“重点主义”的特点，详细地规定了边沿区域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政策，指出今后的对敌斗争不只是斗力，而且是斗智；不只是军事，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力量及指导能力的总较量。坚持边沿游击区的

各县委，正确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造成了在边沿区对敌斗争中的优势，使我八路军能够加紧对敌人的包围和压缩，粉碎敌人的推进，从而扩大了战役攻势的成果。

罗荣桓重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各地区普遍建立的武工队，成为打击敌人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威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罗荣桓领导下，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一九四五年一月，罗荣桓等军区领导人通令嘉奖模范武工队及队员，号召创造更多的、更全面的模范武工队。二月十五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发出《关于武工队组织领导的决定》，要求建设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等各方面任务的武工队。同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决定批转各地照办。经过这些工作，山东各地的武工队重新作了整顿与加强，发挥了对敌斗争的重大作用。

一九四四年，敌人改为“重点主义”的配置方针后，为弥补其守备力量不足，竭力扩充伪军，山东伪军猛增至二十万人。随着日军在战斗中的逐步失利，伪军已普遍感到日军不可靠。因此，争取大股伪军起义，便成为粉碎敌之“重点主义”的有力一环。在罗荣桓领导下，山东分局和军区于一九四四年初，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充实与加强各区党委及地、县委的敌工部门和武工队等，这一措施对于争取山东伪军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渤海军

区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攻势中，争取了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团长王道率部一千六百余人反正；滨海军区在冬季攻势的莒县战役中，争取了伪莒县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反正；一九四五年春季攻势中，在滨海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率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在同年夏季攻势中，鲁中又相继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率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这些大股伪军的起义，不仅给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及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以沉重打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

罗荣桓很注意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他反复强调，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根本问题，是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这样，才能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山东军区召开的各独立旅（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罗荣桓又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旅不论成立时间先后，均有进步，开始了新生，一改过去与群众对立的关系，而开始与群众相联系。他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大家明确军政工作的关系。各旅之间要互相团结、学习，互相鼓励进步。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检查，要求重新加以整顿，建立了济南、青岛

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逐步使工作有了新的开展。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同年九月，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会后，各地都把城市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为以后的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在准备反攻的各项工作中，罗荣桓始终把军事建设当作中心环节。一九四四年七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今后作战方针和部队整训问题。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军队建设的各项政策，制定了山东部队作战和建设的明确方针，研究了山东根据地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军队建设和当时的连续战役攻势有很大指导作用，对以后的大反攻也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加强山东八路军的政治建设，山东军区政治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抱病参加了会议，并向到会的干部作了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军委、总政的指示，切实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

胜利的一年，要求在一九四五年继续扩大解放区，组织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练兵，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各项号召。二、三月份，山东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席，大会选举罗荣桓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期间，罗荣桓在山东主持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重点是发展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和临沂、费县方向。正当准备发起夏季攻势之际，敌人突然增兵山东，五月一日以三万人的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山东我军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分析敌人这次"扫荡"和增兵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国内外的形势已发生了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急剧变化。因此，在对原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稍加调整后，即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军区遂相继对敌发起了攻势。经过夏季攻势，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二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五大战略区分别在胶济路南北联成一片，为我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病情也日益严重。五月二十七日，他曾电告毛泽东，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复电："荣桓同志：来电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之后，罗荣桓仍然一直抱

病坚持工作。

七月七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纪念抗日战争八周年，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强调这是经过七年的苦斗创造出来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当前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去完成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占区积极进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在会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敌人虽然投降了，还不等于缴械。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同我们争夺山东。因此，不要认为日本投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八月十三日，罗荣桓和黎玉、肖华联合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之一击，迫其迅速投降。会后，山东我军部队立即进行整编，共编为八个师，十二个警备旅，和一个滨海支队及海军支队，共二十七万人。从八月中旬开始，分为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

南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准备攻取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和烟台等城市。五路大军英勇作战，攻城夺寨，在半个月内取得辉煌战果，至八月下旬，山东的日伪军，被压缩在铁路沿线和少数孤城中。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遵照军委指示，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等领导下，立即调整部署，向临沂等中小城市进军。

攻占临沂的战役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罗荣桓对这一战役也最为关怀。当时，驻守临沂的日军，于八月十六日逃往枣庄，临沂城内由猖狂反共反人民的王洪九等三股伪军两千余人固守顽抗。八路军组织了五个主力团，于八月十七日开始，连续发起进攻，均未奏效。罗荣桓看到临沂久攻不下，非常着急。他本想亲自到临沂前线指挥，但因病情加重，连续尿血，未能如愿。他把在临沂前线负责指挥的领导找回来，详细听取了汇报。他进一步说明了攻占临沂的重要意义，批评了指挥上的轻敌麻痹思想，确定了下一步作战方案：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改变主攻方向，在城西北角实行土工作业，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部队按照罗荣桓指示的作战方

案，认真进行准备。九月十日清晨，爆破成功，经过激烈巷战，到十一日上午，八路军占领了全城，歼灭两千多伪军，历时二十五天的临沂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五路大军共解放县城四十六座，攻克烟台、威海等六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三十五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六万余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罗荣桓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路进入东北，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当时肖华正在博山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发急电让他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肖华到后，罗荣桓先让他看了中央来电，而后对他说："我们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中央决心很大，要我们先期进入东北。那里背靠苏联，是工业基地，可以作为大后方。有了东北，中国革命胜利会更快到来。你带部队到东北去，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局领导下，争夺这个对全国革命斗争有战略意义的地方。首先把农村和中小城市控制起来，搞掉汉奸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罗荣桓还对肖华说："你们到那里，困难一定不少，思想上要准备长期斗争，甚至要准备打游击，要有独立坚持的决心。"

肖华刚刚出发，罗荣桓又接连收到中央几次来电。九月十九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

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并决定调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调陈毅到山东工作。十月，中央又来电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遵照中央的电示，罗荣桓在九、十月间组织了山东部队六万余人，地方干部四千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并给山东留下了四十多个团，包括四师、八师等主力部队。

十月五日，陈毅到达临沂。罗荣桓向陈毅介绍了情况，研究了有关问题，于二十四日率轻便指挥机关，乘汽车离开临沂城，沿台潍公路向东北行进。行至黄县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从前方赶来送行。罗荣桓把自己骑了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许世友解下刚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

罗荣桓在龙口登上了小汽船，告别了山东大地和人民，于第三天拂晓，在辽宁金县以东的貔子窝登陆，然后到辽阳，十一月抵达沈阳，十二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从此，他又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东北战场上历尽艰难、赢得胜利的一位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历史，是一部艰难曲折斗争复杂的历史。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尖锐的斗争，复杂的矛盾之中，才显示了罗荣桓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经验，而且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是我军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他在山东七年

中，独当一面，大展宏图，为山东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的名字，永远铭记在山东人民的心中。

东北战场胜利的重要组织者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罗荣桓到达沈阳，在三经路博物馆找到了东北局，把机关人员安顿好以后，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了解了苏军、我军、敌军的基本情况。驻沈阳的苏军对我军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但因受《中苏条约》的约束，不让我在沈阳驻扎部队，并且准备在撤走时把沈阳交给国民党政府。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有十三万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装备又差，必须迅速整编，使其置于东北局统一指挥之下。在敌人方面，国民党全美械化的石觉部十三军和半美械化的赵公武部五十二军共约七万人，已海运到秦皇岛登陆，杜聿明也亲赴前线，指挥这两个军向我控制的山海关进攻。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罗荣桓着重考虑和大力抓紧的，就是战争和整编部队两个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东北局来电，要求我军"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并指示"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歼灭敌人"。东北局当即决定林彪去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就在这一天，蒋军集中第十三军全部和第

五十二军主力共五个师，在大量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向山海关我军阵地发起全面攻击。扼守山海关的我山东第七师和冀热辽部队奉命顽强抗击，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又有炮空优势，我军远道新来，立足未稳，械弹缺乏，加之兵力严重不足，遂于十一月十六日主动放弃山海关。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向林彪及西满分局发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的电报，提出：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我军应争取控制沿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使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之中，这样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可能。并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开展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组织。这些意见，同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罗荣桓病情恶化，经医院检查确诊是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动手术。东北局决定他去大连治疗。到大连后，因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建议他在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诊治，罗荣桓遂于二月十六日到达平壤，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平壤期间，金日成很关心他的病情，曾和夫人亲到医院看望他，并赠送一台收音机，供他收听新闻经平壤苏军总医院检查，他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因医疗设备不足，也无法进行手术，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于是，罗荣桓于三月上旬又回到大连疗养。他虽在养病，却时刻挂念着东北的全局。三月十五日，他致电林彪转报中央，提出：东北战争

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他建议加强我军主力，保持元气，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东北战局的变化。三月十三日，蒋军进占沈阳，接着又占领了辽阳、抚顺，铁岭。四月初，蒋军大举进攻四平，我军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罗荣桓在四月二十三日致电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对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军正在扩大战场，对我采取分进合击，便于我各个击破，并已开始遭到严重打击。或许今后敌人会引起警惕，不敢冒进。但我军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力量予以各个击破的办法仍将适用。就在罗荣桓发出这封电报的前后，我军在保卫四平的同时，先后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座城市，歼敌二万六千余人。实践证明，罗荣桓的这些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五月十八日，我军在抗击并消灭了大量敌人之后，主动放弃四平。

五月中旬，罗荣桓返回东北局。五月十九日，他参加了“前总”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召开的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和今后的作战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是主张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赞成后一种意见。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先退到哈尔滨。会后不久，罗

荣桓即随同东北局转移到哈尔滨。我军于五月二十三日由长春撤至松花江一线。蒋军于五月三十日进到松花江南岸后停止前进。

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在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对新的进攻未准备好，实际停战了四个月，到十月十日才开始向南满我军大举进攻。因此，从六月初起，东北暂时呈现一种缓和局面。东北局抓紧这一暂时休战的难得机会，接受了罗荣桓不久前三次电报的建议，在六月中旬积极部署了三项重要工作：一是迅速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二是确定坚持南满和整个东北斗争的方针，三是剿灭土匪。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于六月十六日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以林彪为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副书记、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爆发了全面内战。

为了及时总结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任务，以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东北局于七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并作了发言，他强调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和依托力量，要有明确的认识。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为是七月七日通过

简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会议是东北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两年后东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月下旬，罗荣桓在参加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因病情严重，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送他去苏联治疗。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带着两个孩子，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办好过境手续，于八月初换乘苏联火车，经过六七个昼夜的漫长旅途，终于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干部到车站迎接，安排罗荣桓一家住进豪华的莫斯科大旅馆。过了几天，又迁入专门接待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纽克斯旅馆。从延安到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住在这个旅馆，两个老战友一别九年，想不到却在异国重逢，真是“他乡遇故知”，都感到格外高兴。休息了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又经过四天全面细致的检查，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切口缝合不好，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当时罗荣桓头上冒着汗珠，忍着剧痛一声不哼，苏联医生翘起拇指连声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就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罗荣桓的伤口才完全愈合，身体渐渐复原，于是又回到莫斯科纽克斯旅馆休养。他每天除了读书、散步、请翻译讲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外，还去看望住在莫斯科的陈昌浩等老同志。他还经

常找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谈话，给他们讲国内革命斗争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后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当时，反法西斯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罗荣桓把自己的食品节省下来给他们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在当时还不很了解我国情况的苏联红军干部、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中，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在莫斯科学习的我党一些干部子女，对此也很不理解。罗荣桓虽然离开祖国到莫斯科治病已七个多月，但他对国内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听到这些议论，就极其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他说："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中国大得很，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罗荣桓的话使人们受到很大鼓舞。

一九四七年六月，罗荣桓谢绝了苏联医生要他继续疗养的建议，从莫斯科回到了哈尔滨。他的出院通知书上，除了写着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外，又增加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因而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并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但是，罗荣桓不顾医嘱，一回到哈尔滨，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从这时起，到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前，正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罗荣桓除参加东北局的集体领导，

参与重大战役的指挥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政治委员，他还着力领导东北我军进行了许多重要工作。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前，在辽东军区三纵队，就已出现并推广了诉苦运动。这种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首先是在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九连开始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苦大仇深的战士（包括被俘后参加我军的"解放战士"），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开展"磨刀杀敌"、"复仇立功"活动。这种把土改教育、阶级教育同战斗动员相结合的方法，空前激发了部队杀敌立功情绪。

罗荣桓十分重视辽东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认为"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他立即指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八月二十六日，《东北日报》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并按他的授意发表了题为《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成为激发部队阶级仇恨、提高政治觉悟、鼓舞战斗士气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同年九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辽东三纵队的经验，充分肯定了诉苦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不久后在全军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使诉苦运动发展成为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形式。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党的土地政策，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政治部又要求各部队及时组织学习。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和土地法大纲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一九四七年七月，根据罗荣桓的建议，东北局提出在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以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裕的后备兵力，并分工由罗荣桓直接领导组建二线兵团和筹备作战物资等工作。从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罗荣桓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二线兵团的有关问题，规定各地区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前成立三十八个独立团，第二批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分别组建一百二十六个独立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对这些新建的独立团，要首先进行政治教育，开展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为谁打仗，然后再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队生活作风。罗荣桓还提出："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和严格监督下，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各地动员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先后组成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共三十七万余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扩军计划。二线兵团的建设，对于扩大我军力量，推动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罗荣桓在倾注全力组建二线兵团的同时，还抽出时间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罗荣桓找到伍修权，对他说："现在部队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后方军工生产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成立一个军事工业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确定了东北必须成为全国军工基地、以支援全国战争为己任的指导思想，正式决定成立军工部，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此后，军工部在何长工、伍修权等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很快统一了东北军工生产的领导，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系统。到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已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〇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这些军工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我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罗荣桓仍任副政治委员。

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召开了政治

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的报告中，首先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神，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他还着重讲了建军的问题，提出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建军，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

这次政工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确定在东北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将新式整军的内容具体化为：干部“五整一查”（整思想、作风、关系、纪律、编制，查成份）；对战士则主要是开展诉苦运动，进行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从三月中旬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全面展开，到四月底结束。整军中未采用内部划分阶级的错误做法，经过发扬民主和深入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团结，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几次大的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也暴露了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罗荣桓认为对于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打开城市乱抓一把的流寇主义倾向，必须严加整顿，否则。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要求严格遵守城市纪律，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反对骄傲自满。五月二十五日，根据罗

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构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六月四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指出这个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东北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条守则的教育，并印成布告张贴。八条守则不仅对维护我军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军所到之处，收到安定民心，扩大我党我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罗荣桓在这一时期，除了认真进行上述几件重要工作外，还抓了一些易被忽视却事关大局的具体问题。有两件事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一件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妥善地解决了当时有些医院伤病员居功骄傲、违法乱纪的问题；一件是支持林月琴

创办了干部子弟学校，使后方留守处的许多孩子有了地方上学，解决了培养革命后代的重大问题。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显示了罗荣桓这位政治工作巨匠的远见卓识。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占压倒优势，国民党军被迫采取了重点防御，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根据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是关系着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能否彻底胜利的重大决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东北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犹豫不决，而罗荣桓却又一次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对中共中央、毛泽东战略意图的深刻领会。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等曾讨论了打长春的问题，并将计划报中央请示。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复电同意先打长春。五月下旬，林彪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未能攻克，遂提出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东北局同意，由罗荣桓去吉林前线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这次会后，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打退了敌人三次试探性的突围和抢粮活动，歼灭国民党军四千余人，争取了国民党军官兵一万八千余人投诚。

七月，东北局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作战行动问题，拟于八月中旬以主力南下作战，并估计到可能发生的

粮食接济等困难。这一设想向中央军委报告后，毛泽东于七月二十三日复电同意。

为适应主力南下后东北地区领导的需要，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分开，罗荣桓任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八月二十九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发出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指出：我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指示》号召东北野战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热烈响应《动员指示》的号召，根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东北局领导各地方党组织，动员东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全力支援战争。仅参战民工就动员了一百六十万，担架一万三千余副，大车三万六千余辆，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支前高潮。

九月七日，毛泽东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明确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根据军委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我东北各路大军在百万民工配合和广大解放区人民支持下，于北起长春、南至唐山千余里的绵长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纵主力，夜行晓

伏，长途奔袭，分别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敌军各据点；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到十月一日，我军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和锦州郊区敌人的据点，按计划将锦州紧紧围住，准备进行总攻。

罗荣桓和林彪、刘亚楼等随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的列车，九月下旬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迂回曲折地向南开进。在行进途中，罗荣桓在十月一日会签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指出：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正在我军准备夺取锦州的紧要时刻，却发生了毛泽东后来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所写的"战锦方为大问题"的事。这个"大问题"就是：十月二日清晨，前线指挥所的列车开到彰武时，林彪看到电台收到的一份情况报告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加了四个师。林彪早就顾虑攻打锦州时有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看到这个报告，打锦州的决心发生动摇，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在当日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四个"A"字的特急电报。他

电在报中简述了敌情和自己的判断后，贸然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显：葫芦岛的敌人得到增援，攻打锦州困难大，攻长春把握大，对攻锦明显动摇。说是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其实是在考虑改变方案：打长春。林彪的这次动摇，当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

十月三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急忙来到罗荣桓住处，把林彪发电报的事和电报内容报告了罗荣桓。罗荣桓刚起床，听完刘亚楼的话，顾不上洗脸吃饭，马上拉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罗荣桓心情沉重，又很气愤。作为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工作共同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牵动全局、事关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不经研究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呢？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不能容忍这种轻率行动。林彪见他们来了，便讲了昨晚向军委发电报的事，仍然认为回去打长春可靠一些。罗荣桓压住满腔怒火，尽量冷静地向林彪说明，回去打长春的做法不妥。他指出，现在几

十万部队拉到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敌人据点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而敌情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增加四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轻易改变中央早已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适当的。罗荣桓还向林彪严肃地指出："这样对待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要影响全国整个战局的。"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经过耐心的劝说和严肃的批评，林彪才要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刘亚楼问怎么办？林彪不吭声。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林彪点点头，却不肯动笔。经过商议，由罗荣桓拟稿又经林彪修改后，即于上午九时发出。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在报告拟采取的部署和对敌情的判断之后，电报最后说："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

军委领导收到这封电报，已是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这之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出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十七时的来电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

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等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十九时的第二封来电说：

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

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毛泽东针对林彪十月二日晚电报而发来的这两封电报，证明了罗荣桓的意见是符合军委意图的，他对林彪的批评、劝说，并及时向军委重新表明攻锦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军委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电报后，十月四日上午六时，毛泽东及时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毛泽东这封电报，肯定了东北野战军攻锦的决心，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回头打长春的理由。并且指出："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这就促进了领导思想的迅速统一，坚定了广大指战员争取胜利的信心，为"战锦"这个"大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

领导思想统一了，前线指挥所的列车继续南下，于五日到达锦州西北三十里的牤牛屯，立即向军委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六日收到毛泽东复电说："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要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可，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志，迫近城垣指挥。"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即直接指挥所)，设在锦州北面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罗荣桓听参谋长刘亚楼说要去看地形，不顾自己有病，同大家一道乘车、骑马，翻山越岭来到帽儿山上，用望远镜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环城工事，而后同林彪、刘亚楼听作战科长汇报情况。回到牤牛屯，野司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原来部队部署、敌情变化和察看地形的情况，又做了通盘研究，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

罗荣桓和谭政在攻锦州之前，召集各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野司的作战部署，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做好战时政治工作，搞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做到不争功，不争胜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和纪律。罗荣桓指着院子里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说:“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要教育部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在家里的，掉在地下的，都不要吃，也不要用钱买，这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在群众中造成极好的影响，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十月十四日，野战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三十多个小时激战，到十五日十八时，全歼锦州守敌十二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

九万余人。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东北国民党军全线动摇。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月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十万余人被迫投降。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蒋介石面对土崩瓦解的局面，又慌忙飞到沈阳，督促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妄图重占锦州；并令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准备接应东北残部撤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野司对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署。十月二十日，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必须以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动员令发出后，罗荣桓又分别给各纵队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不顾疲劳，不怕困难，不要怕少数人落伍掉队，不分昼夜前进，迅速赶到指定地区，截断敌人的退路。二十五日，野战军主力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经过激烈战斗，至二十八日拂晓，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廖耀湘被俘。十一月二日，人民解放军乘胜解放沈阳，同日解放营口。至此，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罗荣桓进入沈阳后，起草了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九、

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写进了林彪曾对打锦州一度发生动摇的问题，但是摆了客观原因，语气也很婉转。报告说："……后由蒋介石在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底稿刚拟好，林彪走进屋来，罗荣桓说："在综合报告里，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的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后来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林彪板起面孔，看完之后，将稿子往桌上一扔，转身而去。经过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这份报告还是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中央了。这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战锦"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原则的，是正确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即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罗荣桓等野战军首长，指示各部队移至指定地点进行休整。各部队在休整期间，分别召开了祝捷会、战评会、庆功大会、党委会和党支部大会、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表扬英模，动员继续作战。同时，还进行了配备干部、调整武器装备、补充新兵、争取俘虏等工作，并抓紧进行了战术教

育，改善了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根据华北蒋军的动态，向林、罗、刘提出了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十八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国民党军不战投降。命令还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这时，东北野战军正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讲话，总结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动员部队立即入关作战。二十三日，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向关内开进，二十七日解放山海关、秦皇岛。三十日，罗荣桓等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出发，向冀东地区前进，十二月七日到达蓟县。

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于傅作义同蒋介石及美帝之间的矛盾，其华北"剿总"集团是撤是守，是南逃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错误地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后才能入关作战，因而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将他所辖的全部兵力六十余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余里的铁路线

上，摆成一字长蛇阵。从全国形势看，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入关，在华北野战军协同下，对敌首先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由西而东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为不让敌人跑掉，要求人民解放军在两星期内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罗荣桓同林彪、刘亚楼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纵队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的据点之中，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退路。至十二月二十日，上述任务全部完成。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荣桓和谭政主持起草了《平津作战的动员指示》，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对于争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要求各部队鼓舞士气，做英勇善战的模范，做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指示特别强调："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以劳苦功高、居功骄傲、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礼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西柏

坡中央驻地，商讨一九四九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到西柏坡后，非常高兴地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罗荣桓立刻返回平津前线。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约法八章。新年以后，各部队根据政治动员指示和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指战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号召“打响进关第一炮”，创造“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连队。并深入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学习“约法八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要他们命令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陈长捷曾两次派人谈判，但只是拖延时间，并无诚意。为统一指挥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进行平津战役，中共中央于一月十日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之后，人民解放军于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向天津发起总攻。各路攻城部队在淮海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士气高昂，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解放了天津。十七日，塘沽敌人由海上逃走。至此，北平已成孤城，陷入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包围之中。

早在辽沈战役之后，傅作义就派人同中共地下党组织

联系，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天津解放前，傅又正式派出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直接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人多次谈判。但直到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时，傅作义仍然犹豫不决。

一月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傅作义提出两条办法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人民群众，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人民解放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傅部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函发出后，双方代表又经过具体谈判，傅作义最后接受了第二种办法，将其所属部队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公布了整编命令。三十一日，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人民倾城夹道欢呼声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站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持续了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大部地区。

一月二十九日，在通县潞河中学(现为通县一中)召开四野干部会，这时罗荣桓才有机会传达西柏坡中央会议精神。他在传达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松劲，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部队以战备姿态休整两个月，解决南下思想

问题，重点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还要求抓紧教育改造大批解放战士，加强与改善管理教育和党的支部工作，同时进行军事上的训练和准备。

罗荣桓还向到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结束时讲的进入城市要防止各种政治微生物的侵袭等问题。

二月下旬，林彪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罗荣桓留在北平，主持全面工作。他虽因劳累过度，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抓部队整训外，还抓了几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一是南下先遣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二是根据总前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同北平、天津市委商定，在平津招收了一万名知识青年，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三是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方案。罗荣桓到会讲话，着重讲了改编的方针和意义。他说，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是根本改换立场问题。因此，首先就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要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他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中发扬民主，而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步。罗荣桓还在会上宣布：为了实现改编，

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部队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三月二十五日由西柏坡迁入北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罗荣桓等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并参加检阅。

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他结合四野部队的历史和现状，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动员全军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作好大军南下的思想、组织准备，都起了重大作用。

高干会议结束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不久，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九十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罗荣桓正要准备随大军南下时，可是他在天津就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右肾，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病症，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紧张的工作，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中共中央很

关心他的病情，专门派黄树则到天津，负责为他治疗。毛泽东还写了封亲笔信，托黄树则带交罗荣桓，嘱他在天津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两句话来劝慰他。于是，罗荣桓留在天津休息、治病。三个多月里，同他过去在大连、平壤、莫斯科时一样，身在病榻，心里却一直想着部队，想着前方，也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天津市的建设。他还经常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及时表明自己的意见，随时对干部做思想工作。直到同年七月，才离开天津到北平。

六月七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罗荣桓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九月三十日，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罗荣桓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盛典。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百万大军统帅之一的罗荣桓，又投身到新的历史时期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继续贡献他的力量。

总政治部的好主任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罗荣桓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建议中央军委任命傅钟、肖华（原在一方面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甘泗淇（原在二方面军、一二〇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在组建总政治部新的领导机构时，罗荣桓明确指示：总政的部长、处长、干事，都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兵种选调，这样可以广泛的团结干部，熟悉各部队的情况，便于总结交流经验。九月，总干部管理部建立时，罗荣桓兼任总干部部长。他同样依据上述原则，任命三野的赖传珠和一野的徐立清为副部长，不久又调来二野的宋任穷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个野战军调来的领导人，就可以尽快地熟悉并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四十万人，这样庞大的部队，与和平建设时期显然很不适应。同时，部队主要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也不相适应。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军队精简一百四十万人，使总数不超过四百万人，同时，还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根据中央指示，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

参谋部(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部队精简整编和组建各军种、兵种、院校的繁重任务。到一九五一年底，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工程兵、铁道兵以及公安部队、军事学院等各军种、兵种及院校的领导机构，都相继建立，总干部管理部及时从全军选调数万名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迅速妥善的建立和充实了这些领导机构。全军复员一百四十万人的精简整编任务，也顺利完成。同时，罗荣桓十分强调我军的战斗队思想，特别是主持总政治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巨大的支持。

罗荣桓带病担负着这些繁重工作。由于过度操劳，他的高血压、心绞痛时常发作。毛泽东对他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怀，曾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中央愈是信任，罗荣桓愈是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建国初期，罗荣桓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罗荣桓认为，加强现代化建设是人民解放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而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突破口。一九五〇年，新总

政组建不久，罗荣桓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于八月一日由军委颁发全军。指示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指示还规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文化教育方针。这一指示发出后，得到全军热烈响应。经过充分准备，普遍深入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组织了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九五〇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着重讲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育指示》，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不按职务而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班，并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总政治部和各大军区还为部队培训了几千名理论教员。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总政召开的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地、联系实际地、稳步前进地"进行干部理论教育的方针。此后，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就

逐步走向正规，并形成了学习高潮。

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全军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罗荣桓指示总政治部于同年五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同志认识这一正规训练是人民解放军建军新阶段的开始，是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到训练中去。还要求注意训练的实际效果，反对走过场、赶进度、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罗荣桓还号召广大政工干部要深入到训练现场，学习军事，钻研技术，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发现在正规化训练中，有些人忽视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只强调官教兵，不实行兵教官，以致发展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向，使训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对此，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路线和领导方法。在正规化训练中同样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不能只提"官教兵"，而不提"兵教兵"和"兵教官"。

五十年代初期，总政治部决定起草政治工作条例时，罗荣桓找编写条例的人多次谈话，要求他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领会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的精神实质，认真总结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写出一

个符合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条例来。他同时指出：对苏军的经验也要好好研究，吸收它好的方面，对不适应人民解放军情况的东西，决不能照抄照搬。在条例起草过程中，罗荣桓还抱病听取编写组的汇报，一再强调，军队历来受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实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扬三大民主，实行军政、军民、官兵的团结一致，这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是传家宝，决不能丢掉或削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对于人民解放军是否要坚持政治工作的体制和传统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和陈毅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修改中，他们召开会议，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使政工条例的修改很快完成，并正式颁布。

政工条例颁布后，部队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忽视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罗荣桓在病中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尖锐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文章说：“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正规化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对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为了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的精神，为了坚持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为了使政治工作条例顺利实施，罗荣桓在五十年代繁忙紧张的岁月里，以抱病之躯，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罗荣桓和傅钟、肖华给毛泽东报告，建议开办政治学院，很快得到批准。首先建立了由罗荣桓、肖华等七人组成的筹委会，罗任主任，并提出了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的指导原则。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在边建校边办学中正式开课。罗荣桓和肖华、莫文骅及总政治部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开课式，罗荣桓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介绍了在延安办“红军大学”的情景，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结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重任，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他强调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的共同财富。他还要求政治学院要象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主持制定了《办院基本方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上报中央军委得到批准，使政治学院有了明确的办院方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在政治学院授旗开学典礼大会上，罗荣桓讲话说，我们的教学方针是：每门课程都要系统地进行教学，但又是有重点的；教学应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当前党的路线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军事。此后，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在教学中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他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应当系统地、完整地学习，着重领会精神实质和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他总结了政治学院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五结合”，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相结合；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和学习当前国际

国内形势以及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七年，这期间，学院还先后开办了速成系、完成系、高级干部短期轮训班、政治理论教员培训班、在职干部读书班、理论研究班等各种班次，为部队培养轮训了一大批团以上政工干部和理论教育骨干，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这几次影响到全党、全军、全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对于罗荣桓这位曾经统率百万大军的元帅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在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罗荣桓个人自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和纠正这些失误。但是，他本着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结合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经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察觉了这些失误，并在一定范围内，在可能条件下，力所能及的做了一些纠正的努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罗荣桓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还告诉他，中央酝酿让林彪来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征求未出席会议人的意见。罗荣桓表示，林彪和彭德怀都是一方面军的，林身体不好，是否考虑其他更合适的人担

任这一职务。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九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从这时起，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疾病日趋严重，身体更加衰弱，然而，他仍然以坚强的党性，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又同林彪的日益暴露和发展着的错误，进行着艰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同林彪的分歧和斗争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后，罗荣桓同他的分歧，首先是关于谭政问题。一九六〇年一月，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给抗大的题词概括为“三八作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认为“三八”这个简称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加斟酌。林彪听到谭政的不同意见，十分不满地说：“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就在这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点名指责谭政，除了“反对三八作风”外，又加了两条“罪状”。一条是把总政提出的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斥之为“糊涂观念”，“教条主义”；另一条是把总政组织全军进行文化教育，给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林彪一点名，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谭政等人被诬陷为组成

了“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〇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林彪却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对罗荣桓的任命。

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参加。对于批判谭政，林彪事先也没有同罗打招呼。罗荣桓不同意说谭政反党反毛主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同林彪有不同的看法，罗荣桓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他找谭政谈话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并热情地建议谭政：下去搞调查研究。半年之后，罗荣桓又建议中央军委召集总部有关领导人和部门，专门听取了谭政关于军工生产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制定了改进的具体措施。罗荣桓对于处在逆境中的谭政，也如同对其他干部一样，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以保护、鼓励和支持。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罗荣桓同林彪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坚持党的学风的原则问题。为了维护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罗荣桓在他逝世的前几年，同林彪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九六〇年十月，林彪提出了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到一九六一年初，扩展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后来，又添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句，凑成了所谓“三十字方针”。

这个“方针”，在十余年内，危害全军，流毒全国。罗荣桓对林彪这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和必将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对刚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梁必业谈话时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妥当。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和贺龙一起到南京、福州、长沙等部队和院校视察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听取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和连队的干部、战士进行广泛交谈，对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荣桓还反复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多次对部队的干部战士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象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见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未免太简单了！”在视察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时，罗荣桓又明确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对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罗荣桓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回信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看法。信中写道：“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

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林彪问还有什么意见，罗荣桓坚持原则直言不讳地说：“草案中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啊？”罗荣桓让梁必业将“概则”中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林彪听后，脸色阴沉地问罗荣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作声，末了才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林彪没等罗荣桓讲完，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悻悻而去。

对于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罗荣桓就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反映，他用电话向总书记邓小平讲了这一问题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这件事，邓小平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过：“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

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林彪在提出“带着问题学”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把“四个第一”，鼓吹成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此后的几年内，林彪的这个思想不断膨胀，又接连提出了“精神原子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这一套唯心主义和空头政治的东西，对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对于林彪的“四个第一”，罗荣桓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一提法当时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并被写进了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不能正面反对这个提法，他却用重新解释的方法，力求给这个错误提法以正确的含义，尽量避免这一套错误东西对军队建设造成更大的危害。到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的“带着问题学”、“四个第一”等错误提法，已经在部队中产生不良后果。罗荣桓从一些文件中看到，当时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只强调“红”，而贬低“专”；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的倾

向。“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作风明显滋长。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而解释和领会的关键则是要运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和十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以及其它场合，罗荣桓都做了重新解释的工作。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了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他分析红与专的关系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

罗荣桓对于“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四个第一”、“红专”关系等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引起了刚愎自用、居心叵测的林彪的极端不满和忌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有一次恼怒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更有甚者，林彪竟然歪曲事实，信口雌黄，诬蔑罗荣桓“反党”。罗瑞卿在林彪摔死后写的一份揭发材料中说：一九六一年

五、六月份的一天，海军的一位负责人到林彪家里汇报工作。汇报中间，罗瑞卿也去了。汇报中谈到罗荣桓二月份在福建前线视察，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立即打断了汇报人的话，发怒说：“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其实，罗荣桓讲的“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提出的“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泽东的号召。这个提法并没有错，林彪所以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借题发挥。接着，林彪就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林彪在这里说的“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指的是半年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罗荣桓听了总参动员部的汇报，并看到许多材料中反映部队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很有意见，但又不敢反映。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看到问题不敢向党反映，是党性问题。他经过慎重考虑，指示总政治部发一个建议，要求各地驻军“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建议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

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林彪看到后，急忙于十一月十日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表示不同意总政这个“建议”，危言耸听地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并于十一月十五日批示肖华：“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毛泽东作了批示，总政通知全军执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解决。林彪所以在半年之后又把这件事翻出来，并且无限上纲，给罗荣桓扣上“反党”帽子，无非是为了对罗荣桓进行打击报复。后来，林彪同其他干部谈话时，还诬蔑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

同林彪进行的这场尖锐斗争，直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逝世时。并没有结束。由于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一直怀恨在心。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尽管罗荣桓已逝世三年，但林彪仍不放过。他不仅叫叶群在总政治部的一次会上大讲“罗荣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而且还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诬为“阎王殿”，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受到株连，叶群指使吴

法宪等人在总参办公楼贴她的大字报，胡说她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还授意一些人在大会上对林月琴指名攻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官。林彪一伙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却越发使人钦佩敬仰。

“人类庄严一典型”

罗荣桓虽身居高位，却不争名、不争利、不伸手、不特殊，在党内是普通党员，在军内是普通战士，在人民中间是普通群众。人们从普通中看到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叶剑英在《悼罗荣桓同志》诗中说他：“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这个评价，罗荣桓是当之无愧的。

罗荣桓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井冈山时期，他同战士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吃红米饭、南瓜汤。长征到达延安后，在红军大学，他和人们一起动手修窑洞，建校舍。一九四二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久旱不雨，部队缺粮，他就带头吃野菜、树叶、地瓜藤。建国后，他强调要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一九五六年，他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湖南衡山，县里准备设宴欢迎他。罗荣桓婉言谢绝，却提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对这种糙米饭，他吃

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罗荣桓对待子女亲切慈祥，要求严格。他常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罗荣桓留在衡山老家的大女儿罗玉英，全国解放时已二十多岁，在家结了婚。她听说爸爸还在，而且"当了大官"，想到北京来，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们来此，也只能帮助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罗玉英等来京以后，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以后参加了工作，又要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经过几年的锻炼，光荣地入了党，并成长为国家干部。罗荣桓说过："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罗东进和罗南下这两个孩子上小学时离家比较远，有次星期六家里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

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去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罗东进和罗南下放学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两人步行了很久，才回到家里。罗荣桓看到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的两个孩子，问清原因后，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 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持下去。”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随后又写了几行字交罗东进随身带着：“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惕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

长期以来，罗荣桓一面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一面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他认为，与疾病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一小时。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病人，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处处为医

护人员着想，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用感激的口吻说："你们是党派来工作的，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最后的斗争。由于肾功能的衰竭引起了尿毒症，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向腹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而隔半小时再抽出来的腹膜透析的办法。这种治疗，肚子胀得象鼓一样，他都一声不吭。他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吃饭呕吐、混身奇痒的痛苦，每当他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时，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人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后却安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有一天朱德到医院看望罗荣桓，对他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作斗争啊！"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作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罗荣桓问身边的人员："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象完全忘

掉了自己的病痛。弥留之际，他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这位和他同甘共苦近三十年的红军女战士，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北国严冬，寒凝大地，凛冽的北风不时掠过古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七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提议到会的人起立默哀，而后毛泽东十分难过地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后来，毛泽东又写了《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十二月十七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以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来到北京医院，向安卧在花丛中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十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一万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举行罗荣桓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致悼词。悼词说：罗荣桓同志在他光荣的一生中，“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战斗，坚持工作，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罗荣桓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树立了不朽的功勋。”“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将永远不忘。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

（李　圭）



周　维　炯



周　维　炯

一

周维炯(1908—1931)，一九〇八年出生在现安徽省金寨县的楼房村。父亲周本怀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母亲漆氏，生维炯姐弟六人。维炯排行第二。全家靠租种地主四亩薄田为生。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很清苦。周维炯在五六岁时就常和父亲到河里抓鱼摸虾，或给务农的父亲送饭送茶。

周维炯五舅父漆先涛，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以教私塾为业。维炯常和比他大一个月的表兄漆德玮（后任红军副师长）到塾堂听舅舅讲书。一次，他舅舅给学生讲解《卖炭翁》诗句，问一个学生："那么冷的天气，卖炭翁冻的腰都直不起来，为什么要把炭卖给人家，自己不烧着烤？"小维炯居然抢先答道："跟我父亲一样，自己烧炭舍不得烤，自己打鱼舍不得吃，想卖钱买粮食回家吃！"他舅舅一把将小维炯抱在怀里，亲了又亲，说："好孩子，说得是！"这年维炯不满七岁，舅舅便教他读书。

维炯二舅父漆树仁，是武举出身，曾做过河南长葛县知事，因不堪官场上的黑暗，告老还乡，带回六支钢枪，在家教习长工操练护庄。他听说小维炯聪敏，就教他武术和操练。由于维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到十三岁时，已成为家乡闻名的文武双全的英俊少年了。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穷乡僻壤的文人学士也深受影响，漆先涛塾馆里经常聚集一些有民族意识的学者，谈论国家兴衰和内乱外侮等情况。这些，使周维炯深受启发。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民族之大，国民之众，举世不二，而今倍受外侮，齐家、治国、平天下，实为吾辈无旁贷之责……。"漆先涛阅过批曰："后生可畏！"漆树仁看过批字说："汝子可教也"！

维炯好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书籍，经常和同学们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特别是和表兄漆德玮，既是总角之交，又是同窗挚友，经常谈至深夜，并和他一起研究孙子兵法，练习武术。一次，一位学长前来干涉，他不听，那位学长拉他见老师评理，先涛对那个学长说："圣人还学六艺哩，你是无知之辈！"支持维炯他们坚持练下去。

一九二一年秋，维炯和德玮十四岁，进入南溪明强高等小学读书。南溪是商城县南乡重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明强小学是一所颇负盛名的学校，开设的大部分是新文化

课。周维炯勤学苦读，毕业考试，获得全校总分第一名。红榜贴出后，轰动了南溪镇，称誉他是“山窝里飞出的大鹏鸟!”当年秋，他和德玮又一同考入商城县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在五四运动以后，很多进步教师来这所学校讲学，《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这里广为流传，并成立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豫皖青年学习分会”、“英(语)数(学)研究会”、“演剧社”、“歌咏队”等进步组织，政治空气十分活跃。周维炯进入这个学校，顿觉视野开阔，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刊，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次年春，董事长兼英语教师廖石甫，诬指教师罗志刚(共产党员)行为不轨，造成六位教师集体辞职，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一怒之下，扭住廖石甫要老师上课。廖石甫依仗自己是董事长，又是当地有名的绅士，就煽动族中一部分人来学校行凶，并挂牌开除一部分同学。公告牌刚挂出来，就被周维炯等学生砸掉了，并由周维炯等组织了告状团到商城县衙告状，要求撤换董事长，挽留进步教师。如不答应要求，全校同学来城请愿。商城县长李鹤鸣怕事情闹大，下令撤了廖石甫的董事长职务，由学校出面向罗志刚等六位教师道歉，辞职教师复了职，学校复了课。斗争的胜利，使周维炯感到集体力量的伟大，正义斗争是必胜的。

一九二四年秋，在志成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占谷堂、袁汉民等到笔架山、南溪一带讲学，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

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由于周维炯思想进步，敢于斗争，很快和李梯云、漆德玮、漆禹原、李遵吾等一批进步学生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维炯入党后，努力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同学到社会上进行反压迫、反剥削、反封建礼教的宣传。一九二五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双河山大庙会期，党组织准备就此进行一次反压迫剥削、反封建礼教的大宣传。周维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编了一出《农人怒》的话剧。内容是：一个地主逼债，强占一个贫苦人家的姑娘做小老婆，姑娘誓死不从，又逼其做童养媳。姑娘跳塘反抗，被一个长工救了起来，后来和这个长工相爱逃跑，又被地主抓回。当这个姑娘最后被逼悬梁自尽时，台下一片哀叹声和哭泣声。这时，周维炯带头高呼口号，顿时，“打倒封建主义！”“废除封建礼教！”“铲除剥削制度”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因而引起了一些地主豪绅的反对。一个姓冯的绅士前来阻止演出，说：“这个戏助长邪恶，有辱佛门，败坏风化！”周维炯痛斥说：“你有没有姑娘姐妹？叫你姑娘姐妹给地主做小老婆、当童养媳，你愿不愿意？你姑娘姐妹跳塘悬梁，你心疼不心疼？”这个绅士无言以对，抱头窜去。周维炯硬是带同学们在双河山连演了三天。

一九二六年秋，周维炯在农校毕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便和漆德玮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往武汉黄埔分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周维炯在这里聆听了毛

泽东、彭湃、恽代英等人的教导，近一年时间的深造，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维炯在现实面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他和漆德玮等一起被党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士兵和农民运动。这时，全国虽然处于革命低潮，由于周维炯家乡地处鄂豫皖三省边区，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国民党鞭长莫及，因而，革命形势依然很好。由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县和部分区乡农民协会相继建立，广大农民斗争热情极为高涨。周维炯根据中共商城县委指示，以教书为掩护，以办农民夜校的形式，向农民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自卫武装。

一九二八年春大旱，商南地区农民大部断炊。周维炯根据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农民抗租抗税和向地主土豪开展借粮斗争。胭脂坳大地主吴少群，十分狡猾，把数百担粮食分散藏在十几个佃户家，唆使佃户阻止农协会向他借粮。其他一些地主如此仿效，一度出现农协会和一些地主佃户之间的冲突，使借粮斗争受到影响。周维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农协会揭露地主的阴谋，并组织一些与佃户有亲朋关系的会员，同佃户串连，要佃户们不要中地主的诡计，要和穷人心连心，不要给地主利益当保护人。为解除佃户们怕承担责任的顾虑、农协会采用打借条的办法借粮。佃户们很快觉悟了，从胭脂坳到银山畈，从大埠口到冈家

山，十多户地主屯积的三千多担粮食，都被农协会分给了农民。与此同时，组织农协会员对少数顽固抗拒借粮的劣绅进行斗争。从此，农民协会的声威越来越高，借粮斗争遍及商城南乡。一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纷纷向商城县城跑反，要求县政府派兵镇压。商城县政府多次派兵弹压，但每次都遭到农民协会的坚决抵抗。最后，商城县政府应商南绅士要求，在李家集设立了团防局。团总周凤山刁狡奸诈，表面上不和农协会对抗，但经常暗地瓦解农协组织，抓捕农协干部，并且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实为地方一大害。周维炯以商南十三乡农民协会的名义，历数他十条罪状，通过二舅爷漆树仁(其子漆德玮也是共产党员)和商城县长李鹤鸣同僚关系，告了周凤山一状。不久，周凤山便狼狈逃走。李鹤鸣想请漆树仁出任团总，漆树仁感到年老不能胜任，但又怕这个要职落到积极活动想当团总的商南劣绅柯守恒身上。便向李鹤鸣推荐了商南大绅士、笔架山农校董事杨晋阶当了团总。

二

正当商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共商城县委和中共鄂东特委派员来商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时，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鄂东的黄麻起义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同志们深受鼓舞。会上决定：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农民武装，相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会上成立了商城南邑区委(又称商南区委、丁家埠区委)，周维炯被选为区少共书记，负责青年和士兵运动。会上拟定了工运、农运、兵运、筹枪、筹粮、筹款等一系列计划。为了掌握武装，决定派周维炯、漆德玮、汪永金、廖业琪等一部分共产党员，打入民团，在士兵中发展党组织，掌握枪支弹药，待机暴动。不久，周维炯便通过二舅漆树仁的关系，打入了杨晋阶民团，漆德玮也打入了县民团大队。

周维炯到民团后，便仍以在笔架山农校读书的学生身份，恭维杨晋阶。杨晋阶很是高兴。杨晋阶觉得自己当团总是漆树仁的推荐，又听说周维炯在武汉受过专门军事训练，所以对周维炯参加民团求之不得，大摆宴席，邀集地方乡绅名士作陪，欢迎周维炯入伍。席间杨晋阶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对周维炯大加奉承，说周维炯是县长李鹤鸣的至交，文才出众，军事精通，实为国家栋梁，当即委以民团军事教练职务。周维炯也乘机扩大影响，纵谈天下大事，畅论国民革命，从孙子兵法讲到现代战争，从军事训练讲到商南防御……使四座宾客，无不敬佩，都为杨团总能得到如此干才举杯庆贺。杨晋阶也高兴得前仰后合。从此，周维炯便成了民团中的红人，倍受杨晋阶器重。民团士兵都称他为“炯爷”。

杨晋阶民团共三个中队，近百人枪，分驻在斑竹园、吴家店、白沙河几个小镇上。团部有四个班，住在水陆交通便利的丁家埠集上一个大庙里。民团里的士兵，平时除了帮杨晋阶催租讨捐外，就是闲游浪荡，欺压百姓，根本不搞什么训练，有些士兵连左右转都不懂，军事素质极差。周维炯到民团后，定了训练制度，每天坚持训练五六个小时。由于他身体力行，耐心教授，不打不骂，士兵们军事素质很快提高了，纪律也好多了，经常受到杨晋阶的表扬。副团总张瑞生是个流氓出身的兵痞，不学无术，开始对周维炯有些嫉妒，后来看杨晋阶如此器重周维炯，也就不敢怠慢。周维炯对张瑞生以礼相待，张瑞生对周维炯也渐渐地好起来，团里有什么事，常叫周维炯代办，自己也落个快活。

周维炯不但训练有方，而且作风正派，待人和气，又知古通今，久而久之，不但士兵们和他亲近，连镇上市民和周围的老百姓也和他混得很熟。

周维炯在民团站稳脚跟后，即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他首先利用当时容易接受的烧香结拜的方式，在贫苦士兵和周围农民中组织兄弟会，周维炯虽然不算年长，但因他见多识广，处事稳重，为人正直，大家都非常尊敬他，把他当成大哥哥看待，无不言听计从。开始，周维炯以讲岳飞和梁山泊英雄的斗争故事向弟兄们灌输民族精神和敢于反抗权贵的思想，慢慢地讲到帝国主义如何欺负我们，地主

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受苦受难，我们当兵的有什么责任等等，来启发弟兄们的阶级觉悟。不久，周维炯便积极慎重地在民团中发展了七名党员，在周围农民中发展了四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周维炯被选为支部书记。他动员党员和士兵们与周围的老百姓交朋友，扩大革命力量，并在党支部里宣布了起义计划。

一九二九年春天，商南地区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正值春荒，群众生活痛苦不堪。党组织一面领导群众开展抗税抗捐斗争，一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三月，商城县委召开各特支、支部委员会议，检查起义准备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抓紧进行。起义时间，开始定在八月十五，大家认为时间太远，又定在五一劳动节。周维炯提出：这是个革命节日，敌人可能加强防范，而且一般骨干和农民也不习惯，建议改为立夏节（当年的阴历五月六日），这个节日山区大家小户都知道，地主老财还要大吃大喝庆贺一番，便于我们行动。县委同意这个意见，起义时间定为立夏节晚上。周维炯的任务是负责整个商南武装起义的军事部署，并亲自组织领导丁家埠民团团部士兵起义。

周维炯接受任务后，立即到各起义点检查起义准备情况，研究起义具体事宜。对团部士兵参加起义，周维炯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立夏节这天，周维炯主动担任值星，他以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和过节为名，将枪支弹药都集中放到一

间房子里，便于顺手夺取。下午他向副团总建议放半天假，并从丁家埠各商家摊派了鸡鱼酒肉，以备过节之用。晚上，团总杨晋阶在牛食畈收捐未回，周维炯怕事情有变，立即派人通知斑竹园党组织派肖方、华尔中等人去监视，相机行事，又指使党员田继美违反集合命令，罚其站岗，以便和四位农民党员控制外部情况。

晚饭开始了，五张大方桌摆满了酒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散。张瑞生走进来，摆出一副十分慷慨的样子，说："弟兄们，今天过节，大家随便坐，菜不多，酒可要多喝一杯。今晚、我要和诸位痛痛快快地醉一醉。"他这些话，既是客套，又象命令。人们纷纷就座。周维炯和另一名共产党员陪着张瑞生以及几个班长坐一桌，其余分坐另外四桌。周维炯带头向张瑞生敬酒，党员们也都跟着敬，士兵们哪敢怠慢，也都趋炎附势，敬个不停。张瑞生喝来劲了，又提议猜拳，直喝到二更天气，张瑞生和团丁们一个个醉烂如泥，摇摇晃晃地倒在床上。周维炯见时机已到，喊了声"动手"，大家立即控制了存放枪支的房间，封锁了宿舍，捆绑了张瑞生。周维炯站在天井院中间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缴枪了！"团丁们从昏醉中惊醒，慌作一团。周维炯站在宿舍门口，又大声说道："弟兄们，不要惊慌，我们就是共产党，枪已全部被我们缴来了。共产党打富济贫，是给咱们穷人打天下的。"大家一看是周教练讲话，立即静了下来。周维炯激昂地说："你们都是穷

人，是团防局逼来当兵的。我们要打倒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你们愿意和我们干更好，不愿干的可以回家，我们绝对不难为大家。”团丁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周维炯又说：“大家回去也没有饭吃，还要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经过周维炯一番说服，团丁们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就这样，丁家埠民团三十多人全部起义。

这天夜里，南溪、斑竹园、吴家店、白沙河、徐王庙等地武装起义，也都获得成功，正在收捐的杨晋阶及其四个随从，也被肖方、华尔中等擒住。各地党组织和起义军民纷纷召开庆祝会，欢庆起义胜利。五月九日，各地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党代表徐其虚（鄂东特委成员），副师长漆德玮（未宣布，因其当时在商城县民团），下辖九十七、九十八团。这是鄂豫皖边区第二支红军。从此，豫南地区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在成立红军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处决了河南省党部委员罗维楚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红三十二师成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使广大群众很快得到了现实利益。一些地主老财，纷纷向商城县里逃跑告状，要求县政府派兵来打共产党。县长李鹤鸣指定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对起义军进行收买改编。王继亚便派漆德玮来执行这个任务。王继亚认为周维炯起义，也不过是因某些利欲权势未能达

到所致，漆德玮是自己新提拔的中队副，又是周维炯的亲表兄，去做策反工作正合适。他对漆德玮说：周维炯反正后，立即委任他为丁家埠民团团总，否则派兵“清剿”。漆德玮是在周维炯打进丁家埠民团后打入县民团大队的，在立夏节起义时，因被调往商固边防，故未能参加。周维炯起义后，他早想回来，但没有合适机会。现在王继亚要他回来策反，满心高兴，但怕中王继亚欲擒故纵诡计，便向王继亚提出：周维炯可能是黑杀党（商南农民协会自发成立的一种秘密处决劣绅的恐怖组织，因每个成员都穿黑衣服，戴着只露两只眼睛的黑马虎帽，又多在夜间行动，故社会上称之为黑杀党），翻脸不认人，怕去了回不来，想带部分武装，如果谈判不成，就设法把周维炯诓出来干掉。王继亚同意了漆德玮的意见，漆德玮遂挑了八名精明强悍的士兵（都是共产党员），各带一支短枪，顺利地回到了红军的怀抱。周维炯、漆德玮这对莫逆之交的战友又团聚了，红三十二师又有了一名副师长，真是猛虎添翼！

商城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混过，任过军阀杨森的团长。他刚愎自用，根本没把周维炯这支起义军放在眼里。策反失败后，他恼羞成怒，主动向县长李鹤鸣请战，并夸下海口说：周维炯那几个毛猴子兵，人不过百，都是些草芥之辈，只要我王某出马，消灭他们，易如反掌。

阴历四月八日，王继亚带了一个连的兵力，经余子店、

四道河到南溪，分两路向活动在大埠口一带的红三十二师进攻。当晚，王继亚率领的一部分驻在南溪西面的吴家祠堂，另一部驻在余福山的土地庙里，形成钳形攻势，两处相距五里，可及时接应。周维炯探明情况后，决定先打土地庙那一股。便命令肖方等四人携带短枪，扮成打柴农民，接近土地庙前山包干掉敌岗哨，他自己带大队直取土地庙敌人；漆德玮带一个班在离吴家祠堂不远的上坊子阻击王继亚来援。傍晚时分，肖方等四人很容易干掉了土地庙的岗哨，周维炯率大队迅速包围了土地庙，经几分钟激战，敌四十八人全部缴械投降。王继亚听到枪声，率部来援，被漆德玮的一班人堵住，正打得激烈时，周维炯大队赶到，一个猛冲，王继亚部溃不成军，夺路逃回县城。不久，王继亚被李鹤鸣撤了职，气病而死。接着李鹤鸣本人也被其上司以"剿匪不力"革去了县长职务。

三

打了王继亚以后，红三十二师又连续消灭了几个地主护庄队，得枪三十多支，红军发展到二百人枪。为了向皖西发展，周维炯派人去同打入金家寨六保联络自卫团任团长和教练的共产党员袁皋甫、何子凡取得联系。五月十九日，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到达金家寨以西之南庄畈，活捉了六保保董汪建青，策动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之后，成立了六

区(金寨属六安县六区)游击队。五月二十日，周维炯又率部攻打鄂豫皖边区重镇金家寨，守敌汪东阁二百多人弃城逃跑。二十一日挥师东向，缴获燕子河黄英老八团步枪十余支，在流波確打败了诸佛庵民团，支援了流波確农民自卫军起义。回师途中，师部通信员送信说：河南有一股流散土匪，近百人枪，住在狗脊岭，要来投诚红军。周维炯派人去联系，为首土匪的连长吴云山提出条件：弟兄们要求人入伙，队伍随调不随编，枪支要钱买。周维炯和师里负责同志研究认为：红军正在发展时期，枪支弹药缺乏，便答应了全部条件。遂将这支队伍编为第一百团，由吴云山任团长。这支队伍土匪恶习不改，不但不服从调动，还经常抢老百姓东西，强奸妇女。我们派去作政治工作的同志，他们也任意辱骂。周维炯等师部领导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毫无效果。七月间，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周围反动派的不安。湖北军阀夏斗寅一个团，河南军阀任应岐一个团，以及商城、罗田、麻城、六安、霍山等地民团四千多人，向我中心根据地南溪、丁家埠一带进攻。红三十二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暂时跳出根据地，转入外线，到鄂东和红三十一师联合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开至葛家湾时，一百团不听调动，要住下休息。周维炯考虑：这支队伍严重不纯，很不可靠，不采取果断措施，终是隐患。于是，师党委决定在葛家湾将一百团缴械，士兵解散。但一百团士兵，都是土匪出身的亡命之徒，武器装备也好，红军九

十七、九十八团，人枪也不过二百，弄得不好，会两败俱伤。因此，周维炯决定：当晚由他带两个警卫员，以召集一百团连排长开会之名，把连排干部控制起来，同时将其士兵包围，以其连排长作人质，将其缴械解散。同志们怕周维炯有失，要求多派人去。周维炯说："他们连排长一共就六七个人，我们如果人去多了，引起怀疑更麻烦。大家考虑再三，也只有这样做较为妥当，便派了警卫班隐蔽在会场外面监视。晚上，周维炯和两个警卫员，将一百团连排干部调至村东头一个庄子上开会。周维炯单刀直入地说："今晚请大家来，有一个事宣布：师部决定将一百团改编，不听编的，以军法论处！"

会场立刻紧张起来，有个排长正准备掏枪行凶，警卫员顺手一枪，把他打倒了。这时，周维炯手握双枪，一步跳上桌子，大喝一声："你们士兵全被包围了，你们谁敢动一动，我就敲掉他！"但这些亡命之徒，哪肯就范，都掏枪还击，两个警卫员被打倒了。周维炯手疾眼快，左右开弓，连发数枪，打的就剩吴云山一人活着。正在外面监视的师部警卫班冲进房来，把吴云山吓的直发抖，他大声叫喊："请师长饶命，我是真心投诚，主要是部下恶习不改，如能宽恕，我一定跟红军干到底！"

周维炯收起枪说："今天，我们是不得已才如此。你如真心诚意跟我们干，还是我们的好同志。"

这时，整个村子枪声大作，周维炯命令吴云山上房喊

话，要大家接受改编，不愿干红军的，可以发路费回家。经过一阵喊话，枪声才停下来，周维炯叫吴云山将队伍带到一个禾场上集合，问大家愿去愿留。结果，除了吴云山等三十多人愿留下外，其余每人发了四块银元，然后将他们遣散回家。留下来的人，一部分编入了九十七、九十八团，同时又从这九十七、九十八团调出六十多人到一百团，仍由吴云山任团长，然后连夜向鄂东转移。

红三十二师转移到外线后，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清乡"、"搜剿"，一些外逃的反动势力，也纷纷返回，组织"编练队"、"清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报复。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党组织也受到很大破坏，共产党员、基层干部、红军家属有五百多人被杀害。商城县亲区民团头子顾敬之，在汤家汇用铡刀铡死红军家属和群众一百多人。商南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占谷堂，被捕牺牲。

进攻商南之敌，发觉红军主力转入外线，对根据地实行报复之后，便离开商南。红军回师后，立即给地方民团、编练队、还乡团等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镇压了一大批反动分子。在占谷堂牺牲的南溪，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上，烈士家属控诉了敌人的滔天罪行，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为烈士报仇。这时，有人向周维炯检举，说周维炯的小舅漆自洲(时任河南省某厅处长)上个月从开封和任应岐部一道窜回来，和顾敬之等民团勾结谋害红军家

属，倒算回去大量被分的财产，并骂共产党是乱国之寇，骂红军是土匪，骂农民协会是殃民会。周维炯对他这个小舅的反动本性是早有认识的，他办农协会，组织减租减息，就被小舅大骂过。周维炯怕他与人民为敌，多次开导他，均遭他痛骂。现在听说他又如此反动，极为气愤地说："共产党的政策，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说他是我舅舅，就是老子娘也不行！"说罢，就派人把漆自洲抓来了。漆自洲一见周维炯就卖起长辈资格，大骂不止，并动手打周维炯。周维炯大喝一声："你敢动手！"立即命令警卫员："把他绑起来！"

漆自洲还认为这不过是吓唬他，挣扎着不让绑，嘴里大叫："你们这几个小红毛猴子少造孽，我帖子早到开封了，不出十天，叫你们全部完蛋，现在悔改，为时不晚，有我九爷给你们讲情！"

警卫员见他来头大，有点犹豫，周维炯上前抓过绳子，把漆自洲两只胳膊一扭，绑了个小靠子说："我们不要你讲情。"

就在这时，漆自洲的老婆带了三十多个乡亲和一挑子地契、银元来保漆自洲。周维炯对来人说："你们都是我们父老兄弟，舅舅他是革命的敌人，他勾结民团杀害红军家属，写信叫国民党来打共产党，这样的人不能保，你们回去，由我们交给人民处理！"下午，就把漆自洲杀了。

杀了漆自洲，商南地区人民拍手称快，当即有人作歌

唱道：

外甥作官，舅舅问斩，大义灭亲，只有共产。

四

一九二九年十月，蒋冯战争爆发，双方都急调兵力应战，无暇对根据地用兵，因而在客观上，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极为有利。中共鄂豫边特委和六(安)霍(山)中心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发动六安、霍山地区农民、士兵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十一月初，六安三区数千农民包围区自卫团，缴枪十余支，建立了一支七十多人的武装游击队。中旬，六安六区古碑冲、七邻湾、南庄畈一带农民，在六区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袭击金家寨汪东阁民团，缴枪二十多支，成立了六区游击大队，接着南下麻埠、诸佛庵等皖西重镇，揭开六霍起义的序幕。

霍山县西镇事务所，极为反动，燕子河、闻家店、长山冲等地大地主，经常聚集在这里密谋镇压农民运动，人民恨之入骨。中共燕子河党支部在刘仁辅、徐育三领导下，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赤卫队，准备暴动。十一月十八日派人到红三十二师联系，要求派人支援。当时，周维炯得了疟疾，发高烧，两天没有吃饭。当他知道情况后，立即亲自带一个连，于当晚十点钟赶到闻家店，和刘仁辅、徐育三等当

地党组织负责人分析形势，决定分三路进攻，红军一个连和一百多名赤卫军混编为三个突击队，周维炯、刘仁辅、徐育三各带一队，先解决闻家店、楼房湾、燕子河三个地主自卫团(每团约二十人枪)，然后在长山冲会师，总攻西镇事务所老巢。战斗十分顺利，三个多小时，闻家店、楼房湾、燕子河的敌人就基本被消灭了，缴枪四十多支。拂晓前，各路大军进入长山冲，活捉了正在策划大逮捕的乡保团总和地主豪绅三十多人，西镇事务所自卫团团总陈先觉被当场击毙。起义大军乘胜攻入浸水河西镇事务所，不到半小时，留守的三十多个敌兵，除当场被打死三名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一夜之间，整个西镇地区反动势力，全部覆没，西镇地区人民见了青天。为了庆祝胜利，当天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西镇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感激红三十二师的支援，刘仁辅、徐育三将所缴枪支分一半给红三十二师。周维炯不但没要，反而留下一个排的枪支给他们，并说都是革命武装，为了共同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不要推辞。刘仁辅、徐育三等感动得热泪盈眶。

西镇起义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至今仍广为流传：

河南老红军，(红三十二师属河南商城)
支援我西镇，
钢枪打先锋，
后跟赤卫军，

民团和土豪，
一夜消灭尽，
全区大暴动，
换了新乾坤！

红三十二师在驰援西镇前，就得知商城县民团和李克邦、顾敬之等地方民团，为征收捐税，混战于商城北乡的消息。城里只有少量民团和三百多名红枪会众驻守。周维炯从西镇回来，就和师党委研究攻打商城一事。又经过一番侦察，十二月二十五日拂晓，由十六名精悍的红军战士化装成卖柴草、卖油条的，混进城里，控制四门岗哨，部队隐蔽在县城周围树林里，以南门枪响为号，发起总攻。太阳刚出来，就听南门几声枪响，周维炯立即和红军战士们一齐向城里冲杀。此时，敌人刚刚起床，仓促应战。这些乌合之众的红枪会众，不堪一击，很快被打退下去。周维炯率一排人冲入县政府，和敌警卫队展开巷战。周维炯两支手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红军战士一束束手榴弹，飞向敌群，敌警卫队不支，举手投降。红军占领了县政府，在门楼上插上了红旗。县政府除反动县长参于北乡混战不在外，大小官员全被捉获。整个战斗，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师部立即召开师、团、营、连干部开会，布置了四项任务：一，加强警戒，不让逃进城里的地主老财跑掉；二，维持好社会秩序，保护经商；三，砸开监狱，释放“犯人”；四，县苏维埃政府迁驻商城，改商城为赤城。会后出

了安民布告。这个一向为反动统治者作乐的商城，如今变成人民的乐园，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有个私塾先生王霁初编了一首歌谣唱道：

民国十八年，
红军打商城，
打得民团乱纷纷，
救出我穷人。
二十五清早，
红军计划好，
手提油条肩挑草，
就把城破了。
城里县卫队，
外加红枪会，
一见红军软了腿，
成了火浇水。
张灯又结彩，
万民乐开怀，
穷人翻了身，
庆祝苏维埃！

一九三〇年一月，由于六霍暴动的不断胜利，中共六霍中心县委在流波礓召开各游击队、赤卫军党团骨干会议，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这是在党领导下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的第三支红军。周维炯

很快和红三十三师取得联系，准备向东发展，扫除商南和皖西边界残余之敌，使豫南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经过协商，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周维炯和徐百川担任正副指挥，兵分两路，南北合击，从二月中旬到三月上旬，仅二十多天时间，全部歼灭和驱逐了麻埠、独山一带数股顽敌，缴枪五十多支。三月下旬，两路红军在地方赤卫军配合下，又一举攻克霍山县城，守敌一部被歼，缴枪一百多支。这是红军打下的皖西的第一座县城，军威大震。紧接着沛河以西的徐家集、新安集、赵家圩子、陈家圩子等地农民举行大暴动，红三十三师迅速发展，豫南、皖西根据地连在一起了。

皖西根据地建立后，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在红三十一师的大力配合下，向西横扫盘踞在长岭关、松子关等险关隘口的敌人，打通了通往鄂东的要道，鄂东、豫南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从此，鄂、豫、皖三省边区根据地形成一个整体，人口二百万，三支红军也发展到二千多人，并有近万人的赤卫军武装。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运动。

五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

别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周维炯任第三师师长。六月中旬，红军再次攻克霍山县城，全歼守城民团一千多人。敌驻六安潘善斋新编第五旅前来反扑，遭红军迎头痛击，俘敌副旅长以下七百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接着南下英山。当时有军阀唐生智一个旅驻在县城至金家铺一线。军部决定由漆德玮率第二师先打敌驻金家铺一部，周维炯率第三师布防于离县城十五里的狮子坳，控制去英山县城通道，阻击县城援兵，并截击金家铺可能向县城逃窜之敌。果然不出所料，金家铺之敌遭红二师突然打击，仓皇向县城逃跑。这时，县城敌人也倾巢来援。红三师拦截和打援同时进行，而敌人又两倍于我，部队一时有些紊乱。如不把敌援兵全部堵住，不但金家铺之敌不易歼灭，红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周维炯立即命令副师长肖方带一个团(只二百多人)誓死堵住金家铺溃逃之敌，不让其向县城逃窜，他自己带一个团在狮子坳阻击援敌。战斗近一个小时，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红军弹药消耗难以补给，有的战士只得用刺刀、石头和敌人拼。周维炯考虑这样继续下去，对红军不利，便抽调两个排兵力，绕山梁迂回到敌人背后突袭，打乱敌人部署，实行前后夹击，歼灭敌人。当红军两排兵力从敌后猛烈开火时，敌人误以为被包围，顿时阵脚大乱，慌忙向左侧运动，就在这时，周维炯右臂负伤，鲜血直流，战士们急忙上来帮他包扎。他说："杀敌要紧！"他左手挥枪，跳

出掩体，大喊："冲啊！"红军趁敌混乱之机，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敌人冲去，一阵猛烈拼杀，敌溃不成军。这时金家铺逃窜之敌，由于被红军前堵后追，待援无望，全部缴械投降。红二师立即赶到狮子坳与红三师共同围歼被阻援敌，激战一个小时，敌全部被歼。但这时阵地上却没有看见带头冲锋的周维炯师长，原来他因流血过多，昏倒在乱草丛里。

将出援之敌歼灭后，红军占领了英山县城。周维炯经过急救，不久恢复了健康，他又率军攻克罗田县城，并在四姑墩、小河溪等地重创敌戴民权新编二十五师、彭启彪新编十四师。

红一军组建后，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威大震。但这时，正值第二次左倾统治了全党，鄂豫皖根据地也深受危害。当时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责令红一军不惜牺牲，向京汉线出击，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把根据地所有青壮年都编成补充军，年老的编成守备队，并贯彻"反富农路线"，把军队和党政机关中家庭稍富裕的干部、战士都"清"出了革命队伍。周维炯对上述做法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一再强调不能离开根据地打无依托之仗。他的意见不但未被采纳，还被说成是"地方主义"，"富农路线的同情者"、"机会主义"。直到十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目前还没有全国武装总暴动的可能"的精神传达到鄂豫皖边区时，上述左倾错误，才有所收敛。这一时期，红军在向京汉线出击时，虽然也打

了一些胜仗，但也受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特别是皖西根据地，曾遭敌第五旅和地方反动民团数千人的疯狂摧残。革命干部、红军家属和群众万余人惨遭杀害，烧毁房屋不计其数，整个皖西根据地几乎全部被敌占领，不少群众拖儿带女外出找红军回根据地杀敌报仇。当时驻在湖北滕家堡的红一军，得知这一消息，决定立即打回根据地，远程奔袭金家寨。周维炯奉命率红三师先行，两夜一天急行军，行程三百里，将金家寨团团围住。第三天拂晓，全军赶到，向敌发起攻击，战斗两个小时，全歼守敌八个民团和敌四十六师两个营共一千五百余人，缴长短枪千余支、迫击炮两门。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麻埠、独山、叶集、苏家埠、韩摆渡、霍山等地的顽敌，前后半个月时间，就收复了皖西根据地。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得知其皖西爪牙被歼，急调一个师兵力，分三路向皖西根据地进犯。红军在鲜花岭设伏，阻击其中路两个团，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难以前进。周维炯组织了一个炸弹队，迂回向敌指挥部冲击，数百枚手榴弹砸向敌群，敌阵势大乱，红军趁势猛冲，生俘敌团长以下两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使红军半数换了装备。

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并，成立红四军，周维炯任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三月，敌岳维峻三十四师奉武汉绥靖公署之命，由孝感向豫南窜犯，被红

军包围于双桥镇。岳维峻依仗其兵多、武器好、弹药足，又有护镇河作屏障，拼命抵抗，激战半日，未分胜负。这时，武汉敌人已派飞机来援，如不能速胜，对红军不利。周维炯根据一个俘虏供出的敌指挥部位置，亲率三十三团，冒着敌机轰炸和密集的炮火，强渡护镇河，迅速通过双桥镇东边的开阔地，向双桥镇猛进。他们前仆后继，终于有近两营兵力冲进双桥镇，直扑敌指挥中心，一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灵，红军趁势发起总攻，岳维峻见势不妙，突围逃跑，被红军活捉。此役毙敌一千多人，生俘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多人，缴获各种枪六千多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俘敌最多、缴获最大的一次胜仗。

一九三一年八月，红军南下强攻英山县城。该城两面环山，两面临水，有城墙、护城河、铁丝网等坚固工事。城里有敌张汉泉一个团和地方反动武装二千多人凭险固守。战斗一开始，红军就有很大伤亡，十一师副师长王树声也负了伤。时任十一师师长的周维炯，调来了一个营的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对北门猛烈轰击，并亲自率两个营敢死队，从北门搭人梯，强行登城，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这时红十二师一个团乘势攻击，打开了北门，红军大队一拥而入，城内两千多守敌，全部被歼。

在这之后，周维炯率领红十一师又参加了罗田、曹河、洗马畈等著名战役。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张国焘却大肆撤换党政军领导干部，频繁地调编部队，并推行他

的“进攻安庆，震撼南京”的根本没法实行的冒险计划，使本来可以得到更大发展的红军,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周维炯和其他军师领导，对张国焘这些错误作法，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张国焘非但不接受，反而诬指周维炯和曾中生、许继慎、肖方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对抗分局指示”、“反党”。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离间计,周维炯这位风华正茂、屡建战功、年仅二十四岁的红军名将，被张国焘以“反革命”、“改组派”逮捕后处死。周维炯在停止呼吸前，还大声地痛斥张国焘:“老子暴动后，一天没离开过红军，没离开过根据地，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你打死老子，老子不怕，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

周维炯热爱党,忠于革命事业,但他也爱人生。他有父母兄妹,有和他感情非常好的未婚妻。但自参加起义后,由于战事紧张，他连一次家也没有回去过。他父亲想他想急了，带着他的小妹跑了一百多里路找到了他。他只讲了几句话，就跨马出征了。他的未婚妻想念他，好容易打听到他的行踪，不知在路上等了多少次，有一次等到了，他也只下马深情地表示:“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话毕,扬鞭而去。周维炯“二十年后还要革命”的话语，正是他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心声！　　　　（台运行）



柳　直　荀



柳　直　荀

一

柳直荀(1898—1932)，又名柳克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高桥方塘冲(今花园村)。柳直荀的祖父早年中过举人，后为乡村“蒙童馆”私塾先生。柳直荀的父亲柳大谧，曾留学日本，同黄兴、孙中山等人有过往来，是位出名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于辛亥革命后从日本回国，虽学问精深，但拒不为官，避居乡间，以教书和译著为业。他取古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寓意给儿子命名“直荀”，殷切望子成为不随俗沉浮且刚正不阿的人。

方塘冲三面环山，翠竹满坡，风景优美秀丽。在这里，柳直荀从七岁开始接受祖父严格的、封建式的文化启蒙教育，同时，也受到贤惠母亲和贫苦乡邻勤劳、纯朴、善良品德的熏陶。

一九一一年，十三岁的柳直荀离开家乡，来到高桥镇新办的国民学校就读，一年后考入长沙广益中学。辛亥革

命刚刚过去，革命热情还在一些进步的人们心中激荡。从旧书斋里出来的柳直荀，不仅对数学、地理、自然常识等新鲜课程怀有极强的求知欲，更为那些进步老师讲述的太平天国、义和团、黄花岗之役等英雄事迹所激奋。

在广益中学就读期间，柳直荀和大弟柳瑟虎一同寄居在“板仓杨寓”——杨怀中先生家。杨先生与柳直荀的父亲同为东乡人，并一起留学日本，有着“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之厚谊。杨先生也是湖南有名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国外滞留九年，悉心研究教育和哲学，具有倾向进步的伦理思想和注重实践的人生观。他也是辛亥革命后回国的，不为利禄所动，一口回绝了湖南省都督、立宪派头子谭延闿委其为教育司长的重任，甘愿到省立第一师范当了一名普通的伦理学教员。

柳直荀寄居“板仓杨寓”，不仅从学业上得到敦促教诲，开阔了知识视野，还不断受到杨先生爱国思想的启迪影响。这里是英才荟萃之地，杨先生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人经常来此聚会。这是一些富有才华、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们满怀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急切地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师生关系平等融洽，他们在一起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讨青年求学的目的及应立什么样的志向，从怎样锻炼增强体魄，到如何改造变革社会；从国家与民族的兴衰到黎民百姓之职责…… 这样的聚会，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柳直荀。他经常和杨先生的女

儿——县立第一女子高小学生杨开慧一起，静静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谛听。毛泽东等人的远大抱负和真知灼见，使柳直荀眼界大为开阔，深受启发和鼓舞。他庆幸自己得以结识这些有志之士，并决心以这样的人为楷模，努力成为一个于国于民有利的人。

一九一六年，柳直荀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在这里他就读长达八年。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学校，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个据点。雅礼大学奴化教育盛行，以英文作为通行语文，把基督教定为必修课，还规定学生每星期必须做“礼拜”。在这所洋味十足的学校里，多数学生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而柳直荀却十分显眼地与众迥然不同：剃着光头，身着粗布长衫，脚蹬方头布鞋。他从不信奉上帝，不仅自己不参加做“礼拜”，还向同学们宣传无神论。一次，美国基督教会一个叫爱迪的“神学博士”来雅礼传教，不少青年学生受骗入教。柳直荀立即组织了一些进步同学进行反宣传和抵制活动，既不参加听讲，又不入教。柳直荀的举止言行自然引起校方注意。在学校当局的怂恿指使下，一伙“教徒”前来纠缠辩论。但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大辩论中，那些教徒一个个理屈词穷，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校方为了挽回面子、收买人心，特办了酒席，把柳直荀为首的几个学生和爱迪博士请到一起，企图借觥筹交错之机瓦解学生，以售其奸。针对爱迪博士大肆鼓吹的“上帝仁慈”、“人人相亲”的鬼话，柳直荀和同学

们与他顶撞起来。柳直荀说："上帝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人为地编造出来欺骗人民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偶像。"他还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你们口口声声大讲什么'仁爱'，但为什么还要制造那么多杀人武器，屠杀平民百姓？难道这就叫'仁爱'吗?!"校方看势头不妙，赶忙将柳直荀等人连拉带拽地"劝"了出去。后来，为怕此事传扬，丢尽洋博士的脸面，只得不了了之。而柳直荀通过此次斗争，组织能力及领导才华已显露出来。

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柳直荀也按捺不住激情，精神奋发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他不顾当局所下的不准学生参加游行集会的禁令，毅然冲上社会，和长沙爱国民众一起集会游行，在街头巷尾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政府卖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五月七日，柳直荀和雅礼大学进步学生一道，冲破校方阻挠，参加了长沙各校学生联合举行的游行大会。游行中，队伍被军阀张敬尧的军警冲散。柳直荀和几个同学回到雅礼，把没来得及散发完的传单、标语贴到校园的墙上、电线杆上。一个名叫哈尔辉的帝国主义分子气势汹汹地跑来阻止："这是雅礼校区，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学校，不准贴传单！"柳直荀毫不示弱，冲到哈尔辉面前质问道："你这个雅礼的地界不在美国，是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为什么不可以贴？"一句话顶得哈尔辉瞠目结舌，悻悻而去。在柳直荀的带领下，同学们的爱

国情绪更加高涨。“请救山东人的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传单贴满了雅礼校园。

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柳直荀作为雅礼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省学联的工作，更加积极地领导雅礼学生的斗争。六月三日，省学联号召总罢课。在雅礼，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学监的恫吓威胁，部分同学怕被学校开除而不敢参加罢课。柳直荀一面义正辞严地质问校方：“难道爱国也有罪吗?!”一面耐心地向存有顾虑的同学做开导工作。他说：我们罢课，是为了配合整个社会，迫使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迫使政府废除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目的是不当亡国奴。他还开导大家说：如果当了亡国奴，中国人连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有自主自立的权利，还谈什么好好读书呢？他激励同学说：“救亡图存，匹夫有责。国家陷于沦亡，岂止学籍被开除，连生存也将难保。”柳直荀的话在理又感人，不少同学打消了顾虑，投入罢课斗争。

在省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长沙各校仿效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救国十人团”。柳直荀在雅礼先后组织起二十多个“救国十人团”，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面对焚烧日货的激动场面，他兴奋地说：“中国就象一头睡着的狮子，一旦醒来，会无敌于天下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

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反动当局大为恼火。八月，军阀张

敬尧派遣大批军警，查封了省学联及由毛泽东主办的进步刊物《湘江评论》。接着，张又召集各校代表，严令制止学生的“取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学生及各界的极大义愤。在毛泽东等人的发起下，湖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柳直荀自始至终，都是这一运动的骨干和组织领导者之一。驱张，即驱张敬尧，系皖系军阀的一个将领。一九一八年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任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张氏兄弟四人，敬尧、敬舜、敬禹、敬汤，盘踞湖南多年，作恶多端，人们每提及，无不咬牙切齿。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为大造声势，形成舆论压力，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等地进行活动，柳直荀被指定留在长沙负责宣传工作。十月，湖南各界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成立了联合会，柳直荀被选为总干事。十一月，省学联宣布重新组建，恢复活动，柳直荀当选为评议部长。早在一年前，柳直荀就在由他创办和任主编的雅礼大学《救国周刊》上发表过《湖南人民誓死反对出卖湖南第一纱厂》的文章，揭露张敬尧企图把省办的第一纱厂出卖给日本人的罪恶行径。为配合反帝爱国宣传和驱张运动的需要，《救国周刊》又接连出了四期，在民众中反响很大。此外，柳直荀还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通过大量内容充实而有份量的通讯稿件，报道了“驱张”代表团在各地的活动情况，发表了全国各地支持湖南“驱张”的声援

电，揭露了张敬尧祸湘的罪行。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在湖南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下，终于迫使张敬尧于一九二〇年六月滚出了湖南。

一九二〇年暑期，柳直荀从雅礼大学预科毕业，升入该校教育系。他受教育界一些进步人士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影响，组织部分进步同学，开办了一所“谊群补习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家境困难的子弟。补习学校带有职业学校性质，既学文化又学实际技能(如印刷技术等)。直荀和一些同学利用业余时间授课，只请了一名专管校务的工作人员。一年后，柳直荀和创办学校的几名同学又发起成立了“协均同学会”，意为“协力均担天下事”，同时将“谊群补习学校”改名为“协均补习学校”。后来，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经向政府申请注册，补习学校改为正式的初级中学——协均中学。柳直荀在兼任数学和生理卫生课的同时，又自告奋勇担负起总务工作。不久，柳直荀又接任了校长职务。从“谊群补习学校”到“协均中学”，柳直荀先后工作了六年时间。他充分地利用这个阵地，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传授进步思想和革命真理。他向学生强调：青年时期要发奋学习，少扯谈、多做事，不要追求安逸生活和讲吃讲穿。他还抨击国家的贫穷落后及黑暗现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他教育学生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以民众利益为重，号召学生们勇敢地起来反抗反动的专制制度。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还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干部。罗荣桓元帅青年时代就曾在此就读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柳直荀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成熟进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是分不开的。

“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文化书社”。柳直荀是该社最热心的顾客之一。他常来这里借阅和购买进步书刊，甚至将《新青年》偷偷带入雅礼大学，给进步同学传阅。一九二〇年十月，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柳直荀是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党的“一大”后，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又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柳直荀时常来此参加学习和讨论，他和夏明翰、蒋先云、姜梦周等同在一个小组。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柳直荀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逐步树立了献身共产主义的信念。毛泽东曾多次向人赞扬说：“直荀很会分析问题，能说服人。他虽读的是教会学校，但思想确实进步很快。”还说：“他有觉悟，工作很努力，很认真。”一九二四年二月，在何叔衡、姜梦周的介绍下，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批准，柳直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等人一起，满怀激动之情，站在马克思的画像和一张写着“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的红纸面前，庄严地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从

此，柳直荀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党的事业。

二

一九二四年暑期，柳直荀从雅礼大学毕业，同时获得文学士学位。根据党的安排，他参加了徐特立领导的湖南教育工作者协会，以“协均中学”校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一面教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这年十月，在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介绍下，柳直荀与杨开慧的同学、好友李淑一结了婚。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举国悲痛。柳直荀带领协均中学师生，臂戴黑纱，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整个长沙群情激愤。柳直荀立即向协均中学师生讲述惨案的经过，愤怒地控诉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犯下的血腥罪行。接着，长沙各界召开了两万多人的声讨大会，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柳直荀参加了该会的领导工作，积极组织游行和宣传等声援活动。

八月二十七日，在湖南《大公报》创立十周年纪念专刊上，柳直荀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沙物价指数》的文章。文中列举了长沙十种日用品的价格在四年间上涨的情况，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表达了对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十月十七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长沙大金码头，长沙各界举行了万余人的示威游行。柳直荀参加了这次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带领部分群众烧了码头的趸船及日商戴生昌轮船，还带人冲入日本领事馆，扯下日本国旗。这年冬，反动军阀赵恒惕枪杀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和株洲农民运动领袖汪先宗，民众激愤，柳直荀和郭亮等同数千群众一起，从小吴门火车站迎接黄静源烈士的遗体，祭奠后举行了抬柩游行。柳直荀还参加了汪先宗烈士追悼大会，在会上悲愤地介绍了烈士的事迹及牺牲经过。

一九二六年春，柳直荀接受党的指派，从事湖南农民运动。他经常深入长沙附近的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湖南成立了省政府，柳直荀被委为省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参加筹建全省农民协会的工作。柳直荀利用北伐军节节胜利、人民意气风发、反动派惊慌失措的有利时机，向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提出“撤消清乡督办公署”和“接收长沙县团防局”两个提案。这两个提案被通过后，柳直荀立即动员郊区千余农民包围了“清乡督办署”，迫其交出武器装备。接着，又把长沙县团防局“接收”，将其改造成农民自卫队。在柳直荀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各级农民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下面来省农协请示、汇报工作的络绎不绝，柳直荀的工

作越发繁忙，经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有时工作到深夜，就在办公处和衣而卧打个盹。为了党的事业，柳直荀宁可牺牲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甘心去做禄微事繁的工作。他毅然辞去了月薪八十元的协均中学校长职务，回绝了长沙市米捐局局长的“肥缺”，专事农民运动。他每月从省农协领取三十元工资。虽然生活水平骤然下降，经常以烧饼、咸菜充饥，但柳直荀的工作热情更高了。

十二月一日到二十八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柳直荀被选为农民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他不仅负责安置会议代表的食宿，还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意见、提案，编辑大会日刊，以及审阅新闻报道稿件，十分繁忙。大会的第三天，农民代表大会秘书处根据工、农两会主席团的共同商定，向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发出了邀请专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应邀从武汉回到长沙，于十九日在望麓园召开座谈会。郭亮和柳直荀带领几十名工农两会的代表参加座谈会，兴奋地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形势的见解。翌日下午，工农两会在教育坪召开隆重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还专门分析了当今中国学生的现状，指出青年学生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而奋斗。在二十八日的两会闭幕会上，

毛泽东又作了“关于联合战线”的演讲。毛泽东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讲述使直荀和全体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这次农民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后审议、通过了四十项提案，其中包括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缔高利贷、农协组织问题，以及关于农村妇女、青年农民、工农商学大联合等重要内容。这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柳直荀当选为省农协的执行委员、常委和秘书长。

一九二七年二月，在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的联名呈请下，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郭亮和柳直荀均为主席团成员。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省县两级特别法庭，严惩了一批罪行累累的恶霸，使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清算和斗争更加深入开展起来。

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柳直荀立即与省农协负责人谢觉哉等联名发出声讨蒋介石的通电。蒋介石的叛变使千百万人民惨遭杀戮，湖南的反动派也乘机活动起来，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湖南区委作出决定：将臭名昭著、腐朽顽固的土豪劣绅头子叶德辉抓捕，交省特别法庭审判、镇压。叶氏巧取豪夺，盘剥民脂民膏，囤积粮食，倒卖古物。他还参与过镇压长沙饥民的暴动。这是一个恶贯满盈、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透顶的家伙，也是一个老奸巨猾、行踪诡秘的家伙。柳直荀具体负责抓捕任务，他象敏锐的猎手对付狡猾

的狐狸一样，很快掌握了叶的行迹。为诱蛇出洞，柳直荀利用父亲午亭先生的名望，拿着父亲的名片去“拜访”叶德辉。叶一出来，便将其抓获。四月十四日上午，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六百多个团体共十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随后，省特别法庭将叶德辉的罪状一一公之于众，宣判处以死刑。同时还宣判、处死了长沙反革命首领俞敕华、徐国梁以及杀害黄爱、庞人铨烈士的刽子手李佑文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接着，湖北夏斗寅叛变，湖南军阀何键也加紧了反革命策划。形势越来越险恶，为防事变，省农协通令各县加紧组织农民自卫军。在长沙，省总工会和省农协联合开办了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班。柳直荀担任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的主任，组织学习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印发的各种教材。

四月底至五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湖南省委领导人大多参加会议去了，柳直荀被留下临时负责。五月中旬，种种迹象表明情况越来越紧急，在此紧要关头，原省委主要负责人惊慌失措，离开了长沙。郭亮、柳直荀、夏明翰等人挺身而出，组织了临时省委，坚持斗争。二十日，柳直荀抽空回家，嘱咐李淑一收拾东西，带两个孩子暂回娘家住一段。他对妻子说：“时局也许会缓和一些，但这是激战前的沉寂。我近日不可能回家来。”说完匆匆离去。

这天晚上，益阳县农协来人报告说：何键的部队于日前将县工会和农协突然占据，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均被缴械。形势更加险恶了。二十一日，长沙一片沉寂。当天下午，柳直荀接到临时省委书记郭亮发出的“立即部署好应变措施，然后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通知。他顺路来到李淑一的娘家，匆匆吃了点饭。李淑一送他出来，穿过一条小巷上了东长街。望着妻子担忧的神色，柳直荀用坚定的语调说：“反动派不会宽恕我们，我们也决不会宽恕他们！”说完大步离去。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们夫妻的最后一别。柳直荀到省农协召集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各项应变措施。晚十时许，柳直荀正准备赶去参加临时省委的紧急会议，突然街上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反动军官许克祥悍然发动了血腥的马日事变，一千多人的反动军队同时将省总工会和省农协包围。叛军在省农协前后门架起机枪，命令里面的人投降。柳直荀临危不惧，指挥驻在省农协的自卫队员奋勇抵抗，因寡不敌众，连续十余次突围不成。快天亮时，柳直荀决定分头越墙突围，由他和伍文生两人担任掩护。待大家安全撤离后，柳直荀爬上西厢房屋顶，伏瓦而行，跳入隔壁民宅，得以脱险。柳直荀冒着大雨赶到协均中学一个共产党员工友家，在他帮助下搭上小火轮渡过湘江。

在湘潭，柳直荀向脱险出来的郭亮汇报了省农协的情况。接着，在郭亮主持下，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分析了面临的严重时局，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立即以省总工会、省

农协的名义，迅速组织起工农自卫军，反攻长沙，打倒许克祥。柳直荀以省农协名义，通告各县：定于五月三十一日会攻长沙。为实现这一壮举，柳直荀亲自在沿江各县发动、组织农军，在湘潭县设立了农军总指挥部，柳直荀任总指挥。在他带领下农军攻打县署，夺了团防局和警备队的枪支。几天功夫，在姜畲、易家湾一带就集结了万余工农义勇军，控制了通向长沙城南的要道。与此同时，宁乡、长沙农军集结在长沙城西岳麓山后山一带；醴陵、萍乡农军进抵株洲一带；衡山、衡阳农军开至护湘关一带；浏阳农军抵达长沙东黄花市。各路农军雄赳赳气昂昂，高唱"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从四面八方向长沙挺进。五月三十日，农军和从长沙退出来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将长沙城团团围住。只见通往长沙的各条道路上，梭镖如林、红旗蔽日。此时，龟缩在城里的许克祥叛军不过千余人，加上何键的一个教导团、一个警备大队以及唐生智的警卫团，也不过三千余人。如果此时抓紧战机，必能全歼这些惊恐万状的瓮中之鳖，其政治影响必将波及全国，给遭受严重损失的大革命带来新的转机。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国共两党中央均派代表来到阵前。国民党代表声称来"调查和解释误会"，希望"不要发生暴动"。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竟协同制止这一壮举，指责反攻长沙是"小孩子把戏"，指示"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并强令各路农军撤兵。就这样，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丧失了有利形势。其后果，不仅使已陷入灭顶之灾的许克祥叛军得以解围，继而使革命遭到更加惨痛的损失。撤走的农军由于人心涣散，最后都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地主武装各个击破，打散了。农军反攻长沙失败后，反动派顿时嚣张万分，疯狂地进行报复，实行残酷的大屠杀，短短二十天时间，长沙城及附近二十个县，被杀害的革命者就达一万多人。

血雨腥风笼罩了整个湖南。

三

湖南的大革命遭受挫折，柳直荀亦与党失掉了联系。为了找到党，重整旗鼓干革命，柳直荀曾去安源，因中途遇险不得已而归。长沙城里敌人大肆搜捕，柳直荀因是显赫人物，自然难以藏身。他托父亲筹借了两千大洋，说是要外出经商，实为前往武汉找党。行前，他听父亲讲，亲戚中有人想劝他自首，凭学问和本事找个安稳职业。柳直荀回答父亲说："我做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用不着向谁自首。倒是那些背叛工农民众、背叛国民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许克祥该向工农低头认罪。"他坚定地向父亲表示：人生在世决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我信奉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决不中途变节做叛徒。他还引古语以明志："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不从俗富贵以偷生。"柳直荀以行商模样，登车前往武

汉，此后，再也没有返回故里。父亲筹借的款项，柳直荀后来把它全部交给了组织，作了党的活动经费。直到全国解放后，党组织才将柳午亭老先生的这笔债务还清。

在武汉，柳直荀得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改组，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部分队员以及在湖南湖北难以容身的工农运动负责人，编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柳直荀和郭亮等几十个湖南的共产党员前往九江贺龙部队里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柳直荀随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设农工委员会，直荀为该会成员之一，随军从事政治工作。八月五日，柳直荀随起义军撤离南昌。在抚州，部队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一个第三师，周逸群任师长，柳直荀所在的教导团划为第三师序列。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行军和壬田、会昌两次激战，部队于九月下旬进驻潮汕地区。三十日，国民党反动派以两个师的兵力，在军舰的配合下，向潮汕地区进犯。其时，起义军主力正在揭阳、汤坑地区作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守潮汕的起义军苦战了一天，被迫突围。突围后的部队又与反动民团遭遇，被敌人打散，最后只剩下柳直荀、郭亮、王德荣等七人。经商议，他们决定绕道韩江，取水路先去香港，再转赴上海。不料，他们误上了一条海盗船，被“蒙

汗药”催眠入睡，各自被反剪双手，财物被洗劫一空。当他们醒来，发现被弃于一条小船上，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到第三天，大家感到精疲力竭，似乎只得坐以待毙了，突然发现一艘外国商船，柳直荀打起精神，凭借雅礼大学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向其呼救，并编了一套商人遇盗的经历，被这艘行商的英轮带至越南西贡。这一行落难者身无分文，幸亏郭亮腰带上有一小块金扣子被海盗疏忽，用来换了点钱，历尽周折艰辛，才转到香港，又经香港党组织的帮助，到了上海。

十一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郭亮、柳直荀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并鼓励他们：失败了不要沮丧，要有赢得胜利的信心。大家深受感动，积极要求投入新的斗争。不久，郭亮被派往湘鄂赣边开展工作，柳直荀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员奔波来往于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负责传递文件、转送情报和巡视检查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以郭亮为书记组成湘西北特委，特委委员有贺龙、周逸群、徐特立和柳克明（即柳直荀）。柳直荀和徐特立因工作一时脱不开而没有到任。这期间，柳直荀仍然担负着党的秘密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结合自身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柳直荀先后发表了《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和《马日事变的回忆》两篇文章。前文热情歌颂了湖南的农民运动，从“粮食的管理和支

配”、“对于政权之夺取与对于国民党的认识”、“土地问题之爆发”三个方面列举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生动地记载了农民专政的情形。五月，在马日事变一周年时，发表了《马日事变的回忆》一文，文章详细叙述了事变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歌颂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雄气概，缅怀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文章深刻总结了马日事变的教训，指出："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文章还肯定了围攻长沙的壮举，指出："虽则失败，然而这次英勇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同时又指出："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

这年九月，直荀根据党的安排，准备去苏联学习。在哈尔滨等待出国期间，他以“高方”的笔名翻译了美国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优生学者威廉·鲁滨生的著作《优生学与婚姻》。后来，由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交通受阻以及国内各项临时性任务的耽搁等故，柳直荀的留苏之行始终未能实现。

年底，周恩来到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和整顿北方党的工作。其时，柳直荀因执行临时任务正好在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负责秘书处工作。其后便担任省委秘书长一职。省委秘书处设在一个小古玩店内，柳直荀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古董商人。为

了减轻党的负担，获得一定经济收入，柳直荀积极地给报刊投稿，翻译资料。由于他时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加上生活节俭，健康受到很大损害，身体日益瘦弱。

一九二九年初夏，为便于隐蔽和工作方便，组织上决定让柳直荀把爱人和孩子接来同住。柳直荀便给其弟柳瑟虎写信，让他转告李淑一举家迁居天津。不料，此信被长沙邮局的特务拆封。由于内有一张柳直荀在天津照的像片，且背后题有“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两句诗，使敌人如获至宝，妄图追踪逮捕。李淑一接信后，考虑到孩子太小，准备寄养在长沙，然后只身去天津。因她安置孩子而耽搁了几天，敌人沉不住气了，抄了她的家，并将她逮捕。经柳午亭、李肖聃两老先生多方托人营救，李淑一被保释出狱，但却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根本无法离开长沙。因柳直荀地址用的是代号，敌人也一时无法找到他。后来，柳直荀收到父亲托人转发来的一封“仪姊病急，速转医院”的电报，方知家中有变，为防敌人追捕，经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工作。

柳直荀到上海后，从事工人运动，在杨树浦区一家日本纱厂工作，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不顾积劳成疾的病体，坚持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党的影响。他在给柳瑟虎写的一封信中谈到身体不佳的状况：“兄近来肾脏患病，右肾微觉胀痛，小便时间下带乌色的血块，劳累过甚时尤甚。”柳直荀没有因此而使革命工作受到影响，始终保

持着旺盛、乐观的情绪。一次，柳直荀到沪江大学看望一位原雅礼大学的同学，这位同学很为他的处境担忧，他却坦然地说："你们做教育工作，生活很安定，我这个工作是把头提在手里干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柳直荀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崇高的，而且是必胜的，因而他的革命信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四

一九二九年冬，柳直荀从上海重返武汉，担任中央军事部巡视员和长江局秘书长，并一度代理湖北省委书记。他身着长袍或西装，扮成洋行商人或传教士模样，往来于武汉与湘鄂西各根据地之间。柳直荀那种坦然的举止风度，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得沿途明警暗探及封锁线敌之岗哨都不敢怠慢。

一九三〇年初，柳直荀到湘鄂西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决定组建红六军的指示。当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是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人。柳直荀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写信令促段德昌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一师一、二两个纵队会师合编。二月五日，在监利县汪家桥成立了红六军，军长孙德清（孙一中），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四月，鄂西成立苏维埃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随着党政军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湘鄂西地区的革

命运动和根据地建设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六军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于七月四日在公安县陡湖堤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由柳克明(直荀)兼任。红二军团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而且标志着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七月中旬，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在江陵县普济观召开会议，对部队行动方针以及根据地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会议决定健全红二军团各级政治机关，任命了政治工作干部。会后，部队分两路进发，攻占了长江和汉水两岸许多城镇和敌人据点，扩大了根据地。

红二军团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所面临的形势却是极为复杂而又严峻的。由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李立三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力量，盲目地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错误地提出“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在此精神影响下，湖北省委亦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完成地方暴动，集中红军进攻武汉、宜昌、沙市等中心城市，“夺取湖北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

七八月间，中共鄂西党组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

论贯彻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左倾战略意图。会议期间，身为中央军委特派员的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等人与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总指挥贺龙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周、贺认为，应先肃清监利、江陵等县的反动武装，巩固苏区内部，然后逐步向外发展。柳直荀和特委则坚持应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精神，先攻取荆州、沙市，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为此，周、贺被指责为"右倾"，受到批评。红二军团按照柳直荀和鄂西特委的意见自洪湖西进，先克沙洋，随后向沙市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红军伤亡达千余人，也未攻下。柳直荀和特委仍不采纳周、贺的正确主张，而是令红二军团放弃沙市，改向武汉进军。

九月，邓中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湘鄂西，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上，邓中夏传达了中央要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周逸群再次提出意见，认为不应轻易抛弃洪湖根据地，而应"巩固地向外发展"，波浪式地推进。并指出，在当前形势下，象长沙那样的中心城市，就是打下来也站不住。柳直荀听后，深受启发，联系前一段失利的教训，他认为周逸群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便转而与贺龙等一道，支持这个意见。但由于邓中夏的坚持和不好违抗中央指示，最后还是通过了"南征计划"。只采纳了贺龙的一个建议：渡江前，先攻下监利县城，拔除敌人阻塞我洪湖根据地南北

通道的这一最大据点。

攻打监利的战斗于九月二十二日拂晓打响。红二军团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两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解放了监利城。二十四日，在邓中夏主持下，召开了前委、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特委书记并兼红二军团政委、前委书记，随红二军团工作，将周逸群调地方工作。监利解放后，在南河寺办起了洪湖军政干校二分校，周逸群、柳直荀等人任教，柳直荀担负有关农民运动的课程。十月中旬，红二军团再次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截断武长路（武汉至长沙），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开始实行“南征计划”。初期，红军取得了一些胜利，连克石首、华容、南县、临澧、石门等城镇，当打到津市、澧州时遭到挫折。此时方知红一、三军团已停止进攻长沙，于是，红二军团便停止了南征。当途经石门、松滋交界的杨林市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红二军团打破敌围攻后在刘家场稍事整顿，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一九三一年二月，红二军团转移到长阳县枝柘坪，部队已由三万多人减缩到三千人。前委决定在此进行休整。三月初，柳直荀随许光达率领的红六军十七师到松滋、公安地区筹粮，队伍进至高河厂一带活动时，曾试图打通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于九日攻了一下藕池，因守敌顽抗未克，又撤回长阳。

这时，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者，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新的中央代表夏曦来到湘鄂西后，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红二军团发来指示信，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红三军的领导人是：军长贺龙，政委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不久，分局书记夏曦又写信来传达中央指示：鉴于邓中夏在湘鄂边犯有流动游击错误，撤销其职务并调离。夏曦的到来，对湘鄂西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损失更为严重，更令人痛心。

在枝柘坪整休期间，柳直荀领导红三军政治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他们根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建军经验，制定并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这一文件规定：“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争；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争。”文件还规定了红军的十大纪律。在政治工作的大力开展下，红军中的军阀残余、脱离群众和违法乱纪等现象，得到了有效地克服，促进了红军军政素质的提高。

五月底，红三军开始向鄂西北进发。当路经均县草店镇时，忽然被一伙号称“神兵”的武装队伍截住。经了解，这是当地穷苦百姓为抵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土匪的抢劫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柳直荀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向“神兵”宣传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打消了他们的疑

虑。当他们听说红军要去解放均州时，不仅同意放行，而且还要配合红军战斗。红军进至均州城下，守敌与城内八大豪绅倚仗城池坚固联合顽抗。红军巧妙地运用火攻，烧塌了城门，攻进县城。均州解放后，柳直荀主持召开了庆祝均州解放、安葬革命烈士大会。大会公审、处决了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典狱长，并将一公园改名为红军烈士公园。柳直荀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铁打均州被红军突破，钢铸头颅为革命牺牲"，横批为"浩气长存"。石工将此对联镌刻在公园的石牌坊上。尽管后来这块石牌坊被敌人破坏了，但红军的英名是永存的，红军的光荣业迹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六月，由于国民党军举重兵进攻，红三军撤离均州，转入武当山地区。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拥有道士上万，一般种地的百姓都信教。部队一进山，柳直荀就在行宫堣召集了连以上政工干部开会。他向大家分析了部队撤出均州后的思想状况，宣传建立武当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并提出不要烧菩萨、打道士，不要强迫群众改变迷信观念。他说：菩萨、神像是老百姓自己立起来的，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丢掉，用简单粗暴的办法硬要人家一下子丢开，是不行的。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虽然不讲迷信，不信神鬼，但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不然，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被反动派利用来挑动群众反对我们。由于政治工作及时，红三军在武当山区表现了良好的军纪，赢得

了广大群众以及道士的拥护和赞誉。当红三军离开时，柳直荀与贺龙等领导人前往天柱峰顶的紫霄宫，向道士晓以大义，希望帮助安置几百名伤员，道士欣然承诺。后来，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多次进山搜捕这批红军伤员，由于道士们的妥善掩护，没有发生意外。

六月中旬，红三军经艰苦转战，到达房县。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更有力地开展根据地的建设，红三军以各级政治机关为骨干，组织大批干部、战士到地方工作。在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柳直荀担任书记。房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柳直荀又兼任中共房县县委书记。在红三军的大力工作下，逐步开辟了以均房地区为中心，包括谷城、保康、竹山部分地区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

五

在柳直荀为首的鄂西分特委的领导下，均房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仅房县就相继建立起十四个区、一百零五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工会、贫农团、劳动妇女协会、童子军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柳直荀利用紧张忙碌的空隙，及时总结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的经验，撰写论述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登载在由谢觉

哉主编的湘鄂西《工农日报》上。由于劳累过度，柳直荀的身体日渐消瘦，而他对于同志们的关心劝告却只是报以一笑了之，从不肯接受半点特殊照顾。每当他带领小分队下乡打土豪搞到一点肉，总要原封不动地送到红三军军部去。他说："扛枪打仗的同志比我们更需要营养。"一次，柳直荀从乡下回到县城，正好碰上贺龙，贺龙军长见他穿着一身破旧军装，满身满面的尘土，高卷着裤腿。打着赤脚，既赞许又关切地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呀，倒真成了个工农分子了。"

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陈桂中旅进犯房县，被贺龙率部击退。不久，国民党地方军张连山、马大脚等又带领三个团两千余人再犯房县，贺龙挥师再次迎战，在连山坡与敌激战七昼夜，柳直荀负责安置群众及后方供应工作。开战后，突遇天下大雨，两三天不见停，城里街道被淹没，城外河水暴涨。柳直荀想：部队出发急，干粮带得不多，要想办法保证前方红军战士吃上饭。他发动县政府工作人员分头到群众家做工作，动员群众捐献一部分粮食给红军做饭。柳直荀考虑到刚翻身的贫苦百姓生活并不宽裕，便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一是日后政府如数偿还，二是只做南瓜米粥就行了。柳直荀组织人员将做好的饭集中装了几大木桶，又用羊皮缝成口袋，吹上气，做成皮筏子，与饭桶绑在一起，由水性好的红军战士和群众，从城外西门河推送着羊皮筏子到对岸，使前方红军战士及时吃上饭。这次战斗，

歼敌七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红军的威名大振，周围敌人闻风丧胆。

八月下旬，红三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由贺龙率主力东下洪湖地区。柳直荀奉命留在房县。在柳直荀主持下，鄂西分特委以留下的红三军教导团为基础，加上房、均两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红九军二十五师，其余武装力量分编为六个游击大队。

红二十五师组建后，即开赴房县北乡剿匪，为民除害。原房县伪保安团团总陈茂炳得知红三军开拔和红二十五师外出的消息，立即纠合反动道会大刀会、白带会、圣坛会等三千多人前来窜犯，攻占了县城。中午时分，北门外又开来一支大刀会的队伍，他们声称是来慰问陈团总的，叫开了城门，队伍一进城，突然亮出一杆红旗。原来这是柳直荀布下的一条巧赚城门的妙计。当柳直荀在龙王沟消灭土匪东治成部后，接到县城失守的报告，为避免公开冲突造成伤亡，他让一些红军战士穿上缴获的大刀会服装，巧取了县城。这使敌人始料不及，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夺路逃命。时隔不久，青峰区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千余名“大刀会”匪徒的报复性袭击，区苏维埃主席李华宾等六人突围后受到追击。柳直荀接到报告，连夜带人赶去援救，埋伏在假骨山一带。当敌人追击至此，红军犹如从天而降，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直荀率队跟踪追击，一直打到匪巢柳树椏，活捉匪首曾荣华，歼敌三百多，为民除了一大害。

十二月底，国民党保康保安旅旅长刘正真带了两个团近三千人窜至房县。当时，红二十五师一个团在外执行任务，县城只有一个团，连同赤卫队不过千把人，且武器弹药非常缺。柳直荀与红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商量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奇袭取胜的办法。于是，红军主动撤离县城，转移到马栏河一带。敌得知这一消息后得意洋洋，以为红军自知不是对手，望风而逃了。匪团长宋江楚急不可待地要乘虚而入，占据房县县城，而老奸巨猾的旅长刘正真却下令停止前进。他伸手摸了摸脸上那道被红军留下的伤疤，想到红军的厉害，不免一阵心惊肉跳。只听他奸笑一声，狡诈地说："共军一向诡计多端，说不定这是空城计，我刘某不是傻瓜，不会自投罗网！"于是，便命参谋长带一个团驻扎三教堂，自己带一个团驻在上达河，同时传令派岗布哨，严加防范。柳直荀得知此情，不禁冷笑道："好个狡猾的刘正真，你不上钩，我就下网了，总有办法整治你的！"他与汤慕禹师长商量，擒贼先擒王，先打上达河，并决定仍采用奇袭的办法。上达河镇在房县城西约五十里处，有三百来户人家，一条大街贯东西，下街头紧靠一条小河，上街头背倚大垭山。红军分为三路：一路由柳直荀带领，从正面下街头进攻；一路由汤慕禹带领，从上街头围歼；一路由魏国龙团长带领，从后街堵截逃跑之敌。

二更时分，柳直荀带一路红军，清一色便衣短枪，顺河边悄悄摸到下街头，活捉了一个披着被子站哨的匪兵，从

而掌握了敌分布情况，然后分兵向敌旅部、团部摸去。灌饱了酒肉的敌人正睡得懵懵懂懂，冷不防被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惊醒，顿时象炸了窝的马蜂，乱作一团。敌旅长刘正真慌忙推开地主小姐，企图换便装潜逃，没等他化装完，就被冲进来的红军活捉了。敌团长宋江楚也被从鸦片馆活捉。夺路逃窜的敌人被汤慕禹师长带的一路红军拦截痛击。一小部分从后街逃出镇外的敌人又受到第三路红军的追歼。至日出三竿，三路红军胜利会合，又一鼓作气将驻扎在三教堂的另一团敌军歼灭。这次重大胜利共歼敌一千余人，缴步枪、手枪近千支，机枪十二挺，还有大批弹药。在房县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柳直荀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只见他清瘦的脸庞由于胜利的喜悦而放着红光，黑亮的大眼睛闪着激动的神采，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着。他赞扬了红二十五师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精神。他说，红军为人民除害的功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面对胜利，柳直荀告诫全体军民：千万不要放松革命警惕性，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敌人不甘心失败。一九三二年初，大刀会、白极会等会匪一万多人和国民党均(州)、光(化)、谷(城)三县保安总指挥余希珍率所部三千余人，杀气腾腾扑向房县。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直荀为首的鄂西北分特委决定，红二十五师撤离房县，将部队改编成数支小型的游击队，采取分散活动，以游击战与敌

周旋。不久，鄂西北分特委又接到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要红二十五师主力，即原红三军教导团返洪湖。这样，红军的力量更弱了，均房根据地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为了做好迎敌的准备，柳直荀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成商人模样，巡回各区乡，了解敌情，发动群众，指导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在敌人的不断围攻下，鄂西北根据地缩小了四分之三。敌人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妄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红军困死、饿死。时值数九寒天，游击队在冰天雪地里打游击，极其艰难。柳直荀在此险恶形势下，对革命胜利依然充满信心，革命意志坚如磐石，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最后之成功，当归功于最后之努力者。"用以激励自己及身边的同志们。随着局势的严重恶化，斗争日益艰难，鄂西北分特委再次作出决定：为有效地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向洪湖根据地转移；均房根据地完全转入地下斗争。正当此时，柳直荀接到通知，要他参加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受阻，致使通知迟误了多日。

在牛镇候船期间，柳直荀抽空给柳瑟虎写了一信，信中写道："兄近来身体一如往昔，虽在忙碌中仍不感疲乏……。"这是柳直荀自来到湘鄂西工作两年来所写的第一封信，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家信。寥寥数语，使其献身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跃然纸上，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品格。

六

一九三二年三月，柳直荀来到监利县周老嘴。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于一月二十九日结束。在这里，柳直荀得知会议期间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万涛等多数代表对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夏曦所推行的王明左倾路线意见很大，在讨论夏的政治报告时，针对他来湘鄂西的半年中造成的损失及危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正当会议僵持不下时，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关向应到会，他全力支持夏曦，否定了万涛、潘家辰等多数人的意见，并将他们定为是进行反对中央分局的小派别。这样，大多数人的意见被压下去了，大会完全接受了左倾冒险主义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进一步肯定了一九三一年提出过的所谓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方针。并决定，大会以后的各项工作以及红三军的军事行动，都要依照这个方针进行。柳直荀得知这一情况后，不由陷入难以平静的沉思。他回想自己刚来到湘鄂西时，由于盲目执行立三的左倾，不注重根据地建设，专进攻大的城镇，曾使红二军团遭受到一系列挫折，在斗争实践中，才逐步引起警觉，吸取了教训。他深感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奉行的方针、策略是正确的，万涛等同志

所提的意见是中肯的，是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避免重蹈复辙。因而，他观点明朗、态度坚决地表示站在这些同志一边。柳直荀的态度，自然引起中央分局领导的不满，鉴于同为大革命时期的长沙战友，他只受到警告与批评，而万涛和潘家辰却被宣布为“反党分子”予以逮捕。柳直荀虽然回到洪湖根据地，回到日夜想念的红三军战友中间，但却痛苦地再次尝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三月底，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数万人向洪湖根据地进犯。由于中央分局领导在军事方面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前提，否认游击战、运动战，而要求红三军与敌实行阵地战、拼消耗，致使红三军在瓦庙集附近与进攻之敌对垒激战，从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七日，整整七天七夜的拼耗，付出了伤亡千人以上的代价，也未能阻止敌人。这次战役的失利，主要原因是分局领导指挥失策，加上洪湖根据地上一年遭受严重水灾，外流逃荒者甚多，兵员无法补充，武器弹药也无法补充。然而，分局领导却不顾事实，一面说是取得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一面又把失利归罪下面，说是由于红三军中存在的“游击主义”错误导致的。瓦庙集战役后，由于说有“反革命分子有意图的破坏”，而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和政治部主任潘克鲁逮捕。接着，又根据他们工作笔记中涉及的一些人名，进一步逮捕了一些人。见此情景，身为红八师政委的柳直荀（红三军重建后，任八师政委）深感痛心和迷惑不解。他多次去找分局领导及

政治保卫局，为这些人辩解，并对株连的作法表示异议，但均无济于事。不久，以湘鄂西军委名义发布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这一文件把红军的正当游击当作游击主义加以批判，要求红三军实行所谓“正规化”建设。文件还指出：“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柳直荀被撤掉在红三军的职务，调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

五月，红军捉到一名国民党侦探，经审讯供称：他与苏区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有联系，曾密谋约定五月十八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此案逮捕了有关人后，由于保卫机关采用逼供信的作法，致使涉嫌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保卫局认定柳直荀从鄂西北带来的队伍中“反革命改组派”很多，并进而怀疑到柳直荀。经罗织罪名，柳直荀被诬为“改组派的书记”，并说红二十五师返洪湖，是柳直荀“抛弃房县苏区的阴谋”，等等。就这样，左倾的“肃反”政策，将包括柳直荀在内的一大批湘鄂西党政军领导骨干投入冤狱。

六月至八月。湘鄂西根据地受到国民党军十万重兵之“围剿”。在此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既听不进贺龙等人提出的跳出敌后、从外线打击敌人的建议，又不顾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领导对肃反扩大化的批评，而是错误地坚持“两个拳头打人”。在军事上，把红三军分成两路，一路出击，一路分兵把口，削弱了

机动作战的力量，使得出击不能造成对敌重创，守卫不能抵御进攻。在政治上，坚持实行“火线肃反”，使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大敌当前被就地杀害。九月上旬，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攻入洪湖根据地腹地，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政府机关等不得不仓促突围。突围前，将监禁关押的干部、群众全部杀害。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湘鄂西党政军的领导骨干，长期以来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柳直荀这位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监利县周老嘴蒙冤受害，时年三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严重危害，郑重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况，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柳直荀终于被洗冤雪耻，得到党和人民的公正评价。

一九五六年四月，身为内务部长的谢觉哉写信给李淑一说：“我和直荀同志相处过一个时期，熟悉他的品德，他是个临难不苟免的人。‘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胡虏平了，良人不远，然而良人的不朽业债永远记在史册上，记在人民的心上”。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致函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同时附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光辉诗篇：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既是对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热情歌颂，又是对先烈们最崇高的褒奖。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为纪念湘鄂西人民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悼念英勇牺牲的烈士，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一座"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碑高二十六米，背面有贺龙的题词："革命烈士们的业绩鼓舞着我们前进"。碑文中写道："在几次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湘鄂西的人民，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英勇地牺牲了。其中如周逸群、鲁易、柳克明、万涛……等先烈人物。"

柳直荀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战士，他英雄的名字将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永远受到人民的纪念。　　　　（郑珠滨）



贺　炳　炎



贺　炳　炎

一

贺炳炎(1913—1960)，于一九一三年农历腊月三十除夕夜，生于湖北省宜都县江家湾山村的一间小茅屋里，一声婴儿的啼哭，为贺学文这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穷苦人家增添了一份新年的欢乐。父亲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母亲晏兰儿高兴得连连轻声地唤着“么娃”。

明言祖辈姓向，世居宜都县江家湾，种田为业，家境贫寒。父亲贺学文是宜都县九道河人，因生活所迫，长年在外帮工，后来到江家湾煤矿背煤而落籍。明言原随祖姓，取学名向从炎，后改随父姓，更名贺炳炎。

贺炳炎出生时，祖父母早已去世。姐姐向从秀，哥哥向从新，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背煤的微薄工资来维持。他六岁时母亲病故，凄风苦雨，生活艰难，姐姐被送出做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婶婶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中抚养。九岁时贺炳炎随父亲在江家湾、郑

家垴煤矿背煤。风里来，雨里往，一个弱小的少年，历尽艰辛。后因年少体弱，力不能支，只得托人说情，到松木坪地主刘晴轩家放牛。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在他幼小心灵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他不愿忍受欺压，怀恨离开刘家。先后从师学过篾匠、裁缝、杀猪、打铁等多种手艺。

家庭社会地位的低下，亲身经受的凌辱，使贺炳炎从小直觉地感到贫富不均，人世间的不平，打心眼里仇恨豪强，反抗压迫。他常常喜欢替穷家小孩打抱不平，纨绔子弟也惧怕贺么娃三分。

二

贺炳炎的父亲贺学文，大革命时期是农民协会会员，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背井离乡，在湘鄂交界地带四处躲藏。一九二八年秋，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石门、澧县、松滋、宜都边境一带活动，贺学文毅然参加了红军。

一九二九年阳春时节，贺龙率红四军在五峰、宜都、松滋边境的渔洋关、王家畈、松木坪、刘家场一带打游击，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团防。贺学文随部队回到了家乡。父子相见，贺炳炎恳求父亲让他去当红军。贺学文看到他年小体弱，考虑再三，要他先跟内兄兰良鉴学好打铁手艺，以后再来接他。贺炳炎挑起担子，跟着内兄走乡串户，他

走到哪里都打听着红军的消息。一天，他和内兄在松滋胡家台子打铁时，听说红军要开走，夜里他趁内兄睡熟，悄悄出走，赶上部队，毅然追随父亲参加了红军。父子同当红军的事，在部队中誉为佳话。

贺炳炎参军时，正值贺龙等初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武装向根据地疯狂“围剿”的严重时期。红四军与国民党正规军、杂牌军、团练乡勇之间，“围剿”与反“围剿”，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贺炳炎参加红军后，随红四军转战各地，战斗十分频繁。他从小惯于吃苦耐劳，尤其是入伍后耳闻目睹国民党军对苏区人民烧杀掠抢的事实，使他逐渐明确这个斗争是生死的斗争。在党的教育与“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的影响下，他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初步懂得了这个斗争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当时那样的艰苦生活和残酷斗争的环境下，他从不叫苦，更没有动摇。在每次战斗中无所畏惧，并且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贺炳炎在斗争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一九二九年六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斗争目的更加明确，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数次负伤勇气不仅未减，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他的阶级仇恨和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在短短的两年里，他由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骑兵连长兼政治指导员。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十多万敌人，采取分

路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湘鄂西根据地压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部队转到外线作战，腹地只有一个警卫团和少量地方武装。这时，贺炳炎正在湘鄂西(洪湖)军校受训，并担任区队长。

一天，川军范绍增师仗着人多装备好窜进根据地偷袭湘鄂西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重要机关所在地新沟嘴。贺龙一面派人命段德昌率红九师两个团不分昼夜地赶回，同时命令军校学员阻敌。当敌人进到陈垞子口时，军校学员奉命出击。因为人多枪少，贺炳炎把手枪让给战友，自已操起一把菜刀冲入敌阵，一连砍倒几个敌人，并和其他学员一起夺过敌人的枪向敌人冲击，敌军溃逃。贺炳炎的勇敢精神轰动全军校并受到表扬。

军校结业，贺炳炎担任了红三军手枪大队区队长，旋即升任大队长。这时，反“围剿”的斗争还在进行着。八月十三日，红七、八两师奉命进攻荆州。很快，七师攻入沙市，与荆州守敌对峙。八师刚刚攻入草市，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八师遭敌两侧伏击与正面反冲锋，腹背受敌，情况危急。贺炳炎闻讯后，主动带手枪大队冲入包围圈，打开一条道路，接应八师突出重围。战斗结束后，贺炳炎不畏强敌、当机立断、英勇奋战的行动，受到总指挥部嘉奖。他所率大队被授予“模范大队”的称号。

正当革命处于艰难困苦的时刻，中共中央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蔓延到红三军，使洪湖革命根据地遭到更大

的困难。一九三二年九月，红三军从洪湖突围出去，被迫实行跋涉鄂、豫、陕、川四省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七千里小长征”。

一天，贺龙、关向应当面命贺炳炎和原少共省委书记宋盘铭以三个县的游击队约二百多人组建襄北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宋盘铭任政委，任务是掩护被敌人追逼的三四千洪湖地方干部和灾民往襄北安置，并拖住围追红三军主力之敌的后腿。论环境，此时敌人重兵压境，据点星罗棋布；主力已撤离根据地，敌人围追堵截；原来在红军压力下暂时隐蔽起来的地主恶霸势力再度复活，根据地遭到敌人残酷的破坏，广大群众流离失所，情况十分严重。团长贺炳炎，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牢牢记住关向应政委“只要不脱离群众，就会有办法”的教导，想方设法带领这支臃肿不堪的队伍绕过城市、大镇，专拣山路还要小道走，避开敌人大部队，相机打击小股敌人。还要向敌人夺取粮食供给部队，养活灾民，夺取武器装备自己。沿途遇到的游击队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求参加独立团，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经过两个月与敌周旋，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大洪山区，队伍也壮大了。贺炳炎一面安置灾民，一面整编部队，正式亮出“襄北独立团”番号，这时已有千余人枪，都是由各县游击队和地方干部编成。有一个连的成员全是各级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故笑称“主席连”。整编后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也不弱。其间，尽管敌人几次

出动正规部队“围剿”，独立团采取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有时出击至敌占区，使敌人捉摸不定，无可奈何。待敌人发觉红军主力已走远上了当时，独立团则紧紧咬住不放，拖住敌人的后腿。在东起应城、京山、天门，西至荆门、当阳的广大地区内,积极展开活动，在运动中大量杀伤敌人，壮大自己。十一月，他们奉命与红军主力在鄂豫边会合。这时，独立团已达一千七八百人。他们边走边打，一个多月走了一千多里路，终于在鄂豫边找到主力。归建后贺炳炎调任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担任全军后卫。红军主力经过艰苦转战，于一九三三年初到达湘鄂边。二月，红三军在鹤峰走马坪进行了整编，全军编为七、九两个师，贺炳炎先后担任红二十五团、十九团团长。这时，贺炳炎的父亲贺学文任红军司务长，后牺牲于鹤峰。

湘鄂边山峦连绵，人稀地瘠，在封建地主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生活十分困苦。由于红三军所属部队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都集中在这一带，敌人封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使得红三军在人员补充、弹药供给及生活方面，均极困难,处于空前艰难的境地。村庄集市大多为敌人盘踞，部队不得不在深山野林里风餐露宿。没有粮食，常常以野菜充饥。时值隆冬,指战员大部分仍着单衣草鞋,夜间只好挤在一起靠体温御寒。而红军内部的肃反进一步扩大化，贺炳炎也不明不白地被当作“改组派”逮捕，捆绑达二十九天，险些被杀。这使贺炳炎苦闷，困惑不解。但他对党仍

是无比信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后来，他一被释放，出任新兵大队长(亦称特科大队)时，即加倍努力地奋发工作。该大队系“神兵”改编，作战勇敢，但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许多人相信在打仗前吞砂念符之后可以刀枪不入。贺炳炎因势利导，言传身教，使这支部队很快变成了勇于战斗的劲旅，打了很多胜仗。新兵大队发展到一千多人，补充了各部队。一九三四年，为了改变红军的困境，总部决定向贵州东部开辟新的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沿河县溪滩凤翔一带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苏维埃和地方武装，扩大部队。他们首先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的一个保卫团，抓了俘虏，缴了枪支，壮大了自己，又以里应外合的办法打开了恶霸地主所谓天险的寨子。继而打退了敌人正规部队的数次进攻，消灭了军阀王家烈的两个正规营。游击队的胜利，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扩大了根据地，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不久，游击队升编为独立团以后又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十月二十五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地区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独立师编入主力，贺炳炎改任红六师十八团团长。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利福塔一举消灭了湘西地方军阀十几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此后贺炳炎调总部任管理科长兼作战参谋。

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调集了十九个师，二十几万兵力，分成六路，四面包围，妄图在桑植、永顺一带歼灭红

二、六军团。面临多于红军十几倍的敌人，形势异常紧张。红二、六军团决定放弃内线作战，转到外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再乘胜转入反攻。在每次战斗中，哪里情况紧张，贺炳炎就受命去临时指挥，每次都顺利完成战斗任务。在后坪之战中，敌人凭着人多势众和有利地形，使红军攻击部队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先后派出两个突击组，皆因敌人火力猛烈，未能拿下来。眼看歼敌计划就要落空，贺龙急令："贺炳炎上！"贺炳炎一跃而起，在战友们的掩护下，迅速接近了制高点，正在这关键时刻，贺炳炎中弹倒下，使贺龙一怔。突然，贺炳炎连掷几颗手榴弹，猛地飞身上了制高点，只身突击成功！他忍着剧痛，找到了两挺机枪和很多手榴弹，远敌以机枪射，近敌用手榴弹打，使红军主力得以重新组织反攻，将敌击溃。六月，红军围城打援，围困了宣恩之敌。敌四十一师从来凤出发，经中堡驰援宣恩。红军在中堡伏击，展开激战，苦战三天三夜，红六师十八团伤亡严重，全团营以上干部只剩下曾其云和总支书记余秋里。贺炳炎在火线接任十八团团长，余秋里升任政治委员，他俩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又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主力完成歼敌部署。红军主力总攻后，歼敌四十一师三个团，生俘其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中堡战斗结束，红军迅疾南下包围龙山县城，围困四十多天。这时，红军得悉敌八十五师由北向南朝板栗园开进，企图解龙山之围。总部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八月三日，东

红军连夜行军，赶到板栗园埋伏，贺炳炎率十八团在南口东侧山上筑起工事。贺龙总指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贺龙幽默地对贺炳炎说："贺炳炎，今天要你做瓶塞子，就是塞住这个瓶口！"他用马鞭梢指着东西两条山脉当中一条大冲又说："敌人进来后，我军前后一堵，他就会成为瓮中之鳖。"等到十一点钟，敌人果然来了，敌师长谢彬坐着滑竿，几十个士兵前呼后拥。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以后，贺炳炎朝司号员做了一个手势，司号员立即吹起号来。他又令通信兵朝各营打旗语。号声四起，旗语高扬，三营打出了第一枪，几挺机枪顿时喷出了火舌。两边山头上的冲锋号也响了，手榴弹象下雹子一样一排排朝山冲飞去，炸得山摇地动，烟尘蔽天。敌人狂喊乱窜，拼命抢山头。战斗中红四师师长卢冬生受伤，指挥部命贺炳炎指挥红四师要尽快消灭敌人。贺炳炎一边指挥全师战斗，一边率领十八团一千多人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敌八十五师全部被歼，师长谢彬被击毙。八月八日，红军又在芭蕉托战役中击溃敌十个团，从而取得了粉碎敌人二十多万军队"围剿"的胜利。贺炳炎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被誉为"孤胆英雄"。

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长征。贺炳炎任红五师

师长。十二月，在云南瓦屋塘战斗中，贺炳炎右臂第六次负伤，须立即截肢抢救。但手术器械因部队转移已驮运走，一时无法取来，医生只好用伐木的锯子锯掉贺炳炎的右臂。止痛药物没有，只好代之以“吗啡”。贺龙忧虑地说：“吃这么多吗啡，往后怎么打仗嘛！”贺炳炎听后，将吗啡掷之于地。疼痛时，他就把毛巾塞在嘴里咬住，最后毛巾都被咬烂！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翻过三座大雪山，到达甘孜，改称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贺炳炎任红六师师长。这时，张国焘已经公开反对中共中央，贺炳炎坚决站在朱德、贺龙、徐向前、任弼时一边，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顶住了他的要挟。他深入连队进行宣传，把全师指战员集合起来讲话，无情地揭露张国焘的罪恶阴谋。他说：“张国焘发给我们的小册子，除了军用地图，其它统统烧掉！真中央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我们要跟着朱德、贺龙坚持北上，去会真中央！”贺炳炎及时让红六师指战员明白了张国焘反党真象，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红六师担任了全军后卫的重任，既要向围追红军的敌人作战，又要收容整个部队的伤病员。部队穿过千里茫茫的草地时，野菜已被前面队伍挖光，贺炳炎亲尝百草，寻找充饥的草根。一次，有的战士因实在挖不到野菜而赌气不挖了，贺炳炎诙谐而坚定地说：“为了活着，为了共产主义，我们还是再找一找吧。”部队实在挖不到时，只好把皮带烧焦煮烂

充饥。贺炳炎配有一匹战马，自己很少骑，经常用来驮伤病员。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轻伤员拽住马尾，自己拖着残疾之身独臂为伤病员引缰。贺炳炎就是这样以身作则，领导红六师战胜艰难险阻，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于十月二十日，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四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贺炳炎因左臂内尚有一粒子弹未取出来，伤着神经，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日的宣言。贺炳炎顾不得伤病痊愈，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毅然离开医院，奔赴抗日最前线，担任了由红六师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团长。不久，他随师部挺进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残暴的日军在这一带施行了极其野蛮的屠杀，复仇的火焰在部队里炽烈地燃烧着。

十月，团长贺炳炎和团政治委员廖汉生根据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领七一六团直插敌人后方。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贺炳炎立即组织了工作队，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出

部队帮老百姓秋收。同时对日军活动多方侦察。十六日，根据群众送的情报和自己的侦察，得悉日军从大同集结了许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贺炳炎决定在雁门关以南伏击。他一面继续派人监视敌人的行动，一面和政委一起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召开连以上的干部会，对作战方案进行周密的研究。全团将士同仇敌忾，为侵略者安排好了坟墓。十八日上午十点，敌人汽车渐渐进入八路军伏击圈。这时，突然发现敌人又有不少辆汽车从南面开来。敌人为互相接应，打算在雁门关会车，以防遭袭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贺炳炎镇定自若，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全团一起，以突然动作，力求将敌人全部歼灭在狭窄的黑石头沟”。待日军两队汽车全部开进黑石头沟，贺炳炎一声令下，全团指战员从山上朝着公路扑过去。敌人遭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慌忙进行抵抗。可是，在英勇无畏的八路军将士面前，日军汽车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三小时激战，歼灭了日军五百余名，缴获了许多辆汽车，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振奋了八路军的军威，并用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贺炳炎因此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一九三八年一月，组建一二〇师第三支队，贺炳炎任支队司令员。他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即：“懂得与解决广大群众的痛苦，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团结群众，取得斗争的胜利。”因而他能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广泛团结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三八年部队在山西文水、交城一带虽然活动时间很短，但由于他正确执行了合理负担的政策，争取了广大群众，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大清河北岸，他坚持团结抗日的旗帜，很快肃清了汉奸，改造了土匪，改变了汉奸、土匪及各种坏人称王称霸的混乱局面，并使其中一些人发扬了抗日的一面。在他的努力下，区、乡政权迅速地建立起来，开辟了根据地，并使部队发展壮大。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支队由原来一百六十二人，扩充为三个团，另有三个特务营，将近五千余人，巩固了大清河北岸的抗日根据地。

是年冬，贺炳炎率三支队转战冀中，频频打击日军，屡建奇功。在莲子口战斗中，他们击退日军数百人的进攻，冀中群众称三支队为“老八路”。大清河北板桥一仗，他们与日军浴血奋战一天一夜，粉碎了日军对三支队的三路合击，打出了威风，老百姓称颂：“三支队真会打胜仗。”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贺炳炎统领一二〇师留在冀中的一、二、三、六支队，参加反顽斗争。他以连续不断的战斗行动，从冀中打到冀南，配合友军消灭了石友三、张荫梧等顽固派部队。尔后他返回冀中，坚持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他们奉命回晋绥，参加百团大战，在米峪战斗中歼灭日军一个中队，生俘二十名日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包括九二步兵炮一门。此役结束，贺炳炎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一九四二年贺炳炎带职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后转入

中央党校，参加了延安整风，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一九四四年，贺炳炎偕廖汉生带领三五八旅百余名干部同三五九旅王震部南下，来到处于日、蒋、伪联合包围之中的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合，开辟新区。贺炳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强击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不仅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得到迅速发展，部队扩展到一个独立旅四个独立团。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与组建了拥有襄西、襄南、襄北及洪山四个军分区的江汉军区，并任军区司令员。

五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用一百六十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贺炳炎奉命返回晋绥，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同年十一月调任晋绥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在晋北，阎锡山的部队龟缩于同蒲沿线的几座县城里。为大量消灭敌人巩固解放区，不得不实行攻坚。但这时的解放军不仅缺乏攻坚经验，尤其武器很差，没有重型武器。贺炳炎深深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想办法完成任务，不能不是指挥者的责任。于是他组织部队反复研究、试验，终于找到了多种爆破方法，数月内他们连克朔县、宁武、崞县诸城。爆破攻城予以推广发扬，除包装炸药外，还创造了“爆炸杆”“爆破筒”以及用追击炮抛

射炸药、坑道爆破等方法，形成了普遍的爆破运动。这些，对以后蟠龙、清涧等地的攻坚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成为西北战场攻坚战斗中的有力武器。随后贺炳炎转战晋中，出色地取得了汾考战役的胜利，全歼敌艾子骞部。一九四七年五月，贺炳炎转到西北战场，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白白送掉六十五个旅之后，仍然不死心，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仅陕甘宁边区，敌人就调集了胡、马军二十三万多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了。三月二十四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贺炳炎率一纵队牵着敌人的鼻子，将五个旅的敌人引诱到了安塞，又掉头向东，赶到青化砭参加战斗。当敌人三十一旅进入伏击圈，二纵王震部即从尾部打响，一纵新四旅、教导旅自两侧合击，分割穿插，把敌斩成数截，干脆利索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战斗，全歼敌三十一旅旅部并一个团近三千人，旅长李纪云被生俘。

敌主力五个旅到安塞扑了个空，赶忙回头，贺炳炎继续率一纵与敌周旋，伺机反击，使敌误认为一纵队即西野主力。一纵将敌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牵着向西，使西北野战

军主力隐蔽集结，在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四千余人，旅长麦宗禹被活捉。

羊马河得胜后，贺炳炎率一纵继续采取“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达到使敌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接着，由王震二纵一部牵着敌人九个旅到绥德，又由西野主力在蟠龙打响。五月二日拂晓，一纵从西南，二纵独四旅从东南，新四旅从东北，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月四日半夜，自命为“新生力量”的敌精锐部队整编一六七旅被全歼，毙俘其旅长李昆岗以下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山炮六门，军衣四万多套，面粉一万二千余袋，并击落敌机一架。西北野战军从战场上取得这样丰裕的物资补充，还是第一次。

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被拖、疲、打搞垮了，这时兵强马壮的西北野战军开始了内线反攻。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西野主力从榆林主动撤出后，部队集中在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彭总决定一、二纵队歼灭敌钟松之三十六师，三纵箝制刘戡部，阻其增援。八月十九日贺炳炎率一纵、王震率二纵从东西两侧向沙家店发起进攻，激战一天一夜，于二十日黄昏全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和一百二十三旅（旅长刘子奇被生擒）、一百六十五旅。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后，贺炳炎率一纵参加了宜川、西府、陇东战役，收复了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区，解放了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在宜瓦战役中，贺炳炎纵观全局，当机立

断，及时堵住了友邻部队因故未能封住的缺口，创造出全军闻名的“硬骨头六连”和刘四虎等英雄集体和个人，保证了西北战场取得空前大捷。贺炳炎因功勋卓著，受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嘉奖。一九四九年一月，西北野战军一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总结中给予一军高度评价，他说：“一军是个有党性的部队，在西北战场上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因此，它胜利地完成了艰苦的繁重的战斗任务。”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反攻，贺炳炎率一军乘胜前进，连克三原、岐山等城，歼敌五十七军一万多人。接着攻克了陇县，解放了秦安。随即他率部进军青海，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进占西宁。至此，青海全境解放。他们在进军青海途中，所经之地尽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民聚集区。贺炳炎等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因而深得各族人民衷心拥戴。进占西宁后，贺炳炎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他及时抽调大批干部、党员参加各级政权工作，配合部队清剿敌人残部，直至匪患荡平，建立了安定的社会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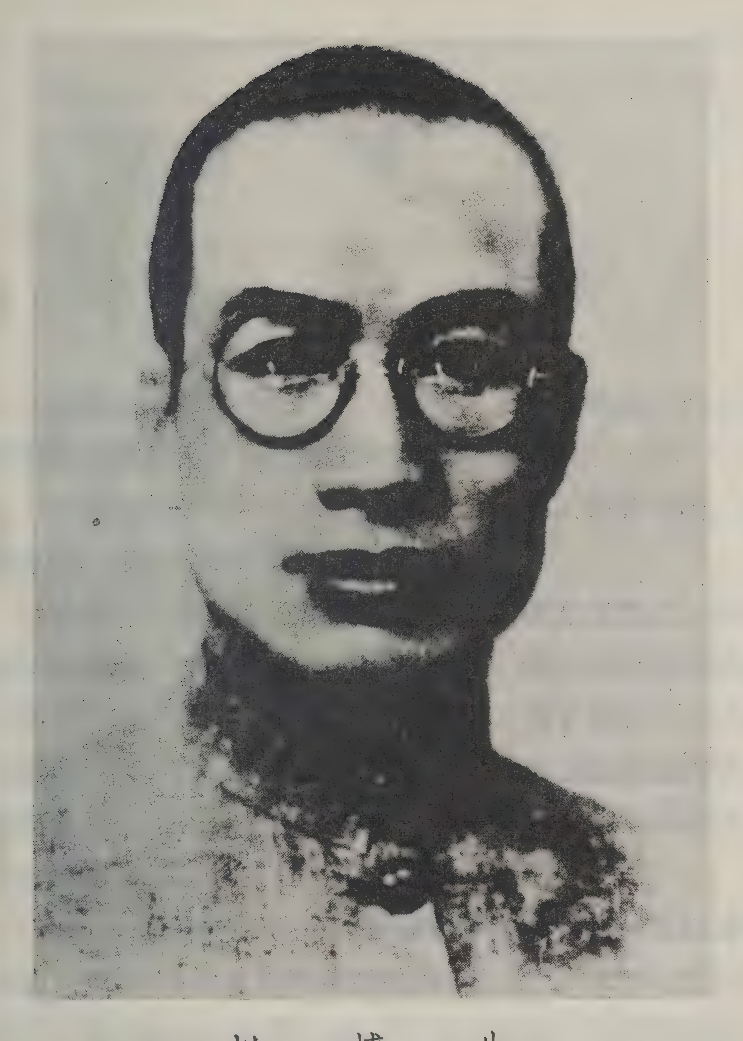
六

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后，贺炳炎已是重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关节炎、肾脏病等缠住了他这个伤残

的躯体，迫使他不得不长期治疗。可是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和人民军队将军的气质，特别是在朱德总司令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下，向伤残、疾病展开了另一场战斗，为党的事业继续奋力拚搏。一九五二年，贺炳炎调四川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九月，贺炳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三月，贺炳炎担任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书记、成都部队司令员，九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贺炳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负伤十六处，并失去了右臂，建国后又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病情恶化，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在成都病逝，终年四十七岁。

贺炳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四川省暨成都市两千多军民举行公祭，王震代表贺龙元帅致的悼词中说："贺炳炎同志三十一年革命斗争历史，充分证明了他具有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战胜困难、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优良品质和模范的斗争活动，将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学习。"

（刘忠武　冯万斌）



赵　博　生



赵　博　生

一

赵博生(1897—1933)，小名连科，学名恩溥，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人，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生。

父亲赵以明，一生务农，憨厚、朴实。母亲刘氏，能耕会织，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赵博生，七岁时进本庄私塾读书。读完私塾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一九一四年，他去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未考取。经他再三要求，才当了旁听生。他刻苦学习，半年后，终于以合格成绩被录取到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一九一七年夏毕业，被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接着，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响应。在这革命的洪流中，赵博生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身欲救国，必先求学，百般知识，无不学问中得来；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

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然欲达到此目的，非努力求学，则不能成功。”同时，他还立志做一个“模范军人”。

可是，他的这个志向却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五四运动以后，皖、直、奉三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进行混战。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一败涂地，段祺瑞向直系求和。这时，赵博生从皖系转到了直系军中，起初学习无线电，继而担任无线电中队长。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张作霖从北京退守关外。一九二四年九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失败，赵博生又落入了奉系军中。如此辗转几年，三易其伍，始终落在一个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军阀混战的圈子里。他忧虑、焦灼、苦闷，发出了这样的悲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去拉洋车……。”

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曹锟政府，成立了国民军。从此，赵博生就开始在冯玉祥的部队工作。

国民军倾向革命，有比较严明的军纪，官兵都佩带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赵博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为这就是新的前景了，因此非常刻苦自励。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俭朴。由于他的品行和才能，使他在国民军中很快享有新秀的声望。随之，他的职位也逐步提高，历任团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等职。一九

二五年，他任第五旅参谋长，思想更倾向革命。有一次对部下讲演，他生动地比喻说："中国好象将要倒塌的一座大楼，人们住在里面，将有死亡的危险。这座大楼必须落地重修，才能坚固。这个责任，就是吾辈军人的天职。"并认定现在的作为就是"重修大楼"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年底，国民军被各派军阀联合打败。第二年一月，冯玉祥宣告下野，随后去苏联考察学习。冯玉祥走后，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又遭失败，只好退到绥远、察哈尔一线。赵博生随军退守包头。一九二六年八月，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和原苏联红军第三军团长乌斯曼诺夫等一起，由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召集全军在绥远省五原县易旗誓师，发表宣言，改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又称西北军)，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自任联军总司令，委任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国民军联军废除了打骂制度，整个部队政治空气浓厚，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在联军，赵博生获得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其中刘伯坚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使他向往革命，不满军阀统治。

五原誓师后，赵博生率部经宁夏等地向陕西推进，实施冯玉祥在李大钊等人帮助下确定的"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部队一路疾进，于十一月下旬直捣陕西，解

除了直系部队对西安杨虎城部队的长期包围。次年五月，国民军联军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转战河南，先后击败许昌、郑州、新乡等地的北洋军阀部队，从北方策应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六月，冯玉祥在反革命势力的高压下有所动摇，随之，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顷刻间，第二集团军中革命空气骤然消散，宣传社会科学的讲演停止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报停刊了，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了…… 赵博生对此感到茫然、痛苦、愤慨，常对有觉悟的官兵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要坚决地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

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在四大集团军中势力最大，有四十万人之多。一九二九年，蒋冯矛盾加剧。这年夏天，冯玉祥将国民军撤到潼关以西。赵博生随军到了西安。在西安，他担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西安城防司令。时值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凄惨景状，蒋介石却趁机下令不准粮食进入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异己。赵博生对反

动军阀之间的混战、倾轧极为不满。他忧国忧民地写下了《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久，他作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来表示自己的心情。歌词是：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从这首歌词中可以看出，赵博生期望“警醒”、“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决心为“实现大同”而努力奋斗！歌词写好后，他用八十块银元请一位教授谱上曲子，然后亲自在自己所掌握的特种兵旅教导大队中教唱，以激励部属救国救民。

一九三〇年四月，冯玉祥联合山西的阎锡山及其他军阀势力，组成倒蒋大联合，展开中原大战，给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重大损失。留在西安的赵博生，没有参加这次新军阀的混战。十月，冯玉祥大败。后来，冯部主力部队在河南郑州等地被蒋介石收编，残部由宋哲元掌握。十一月，杨虎城率部入陕，直趋西安，要赵博生所在的十四军投诚，接受改编。当时十四军孤军无援，处境危险，军长陈毓耀决定投降，听任改编。赵博生不愿意继续留在军阀部队里参加混战，决计另找革命出路。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教导大队全队人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他将这支有五百人的队伍，组成一支“三民主义救国军”，自任军长，孙毅佐之。在杨虎城入西安前夕一个夜晚，以演习为名，带出城外，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

行军第一天，遇上户县县长去西安给宋哲元送款子和军需品。赵博生告诉该县长说：“宋哲元已去山西，杨虎城进了西安，陈毓耀投降了。”该县长遂将所送款物统统交给了赵博生。当天，部队进至劳峪口附近露营，他将大部分款物分给了官兵。第二天上午，部队登上了秦岭，下午到达东江口。在这里被土匪武装所阻，队伍停了下来。因寡不敌众，只好白天隐蔽于村庄，夜晚露营在野外。如此多天，军粮无着，又率队上山以核桃等为食。此时，杨虎城部的一个参谋长，原是赵博生的同学，多次派人持函前来联系，劝说赵博生回西安听候改编。无奈，赵博生又率部回到了西安，不过，“救国军”的大多数人员均未投归杨部，而是分开各奔前程了，等以后视情况“聚而再举”。分别前，

赵博生提议给“救国军”的成员印发《同仁录》。但印刷局不肯接印，直到改名为《秦岭游记》后才给印。《秦岭游记》上除登载序言、日记外，还刊有各人姓名、籍贯、通信地址及誓言，分别时，每人一册。赵博生在誓言栏中写下的誓言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

赵博生离开西安后，与警卫员孙芳桂等人来到河南吉鸿昌部。赵博生的五叔赵以元，与吉鸿昌为结拜兄弟，担任二十二路军少将交际处长。因为这个关系，加上赵博生素以廉洁多谋而闻名，因此受到吉鸿昌的欢迎。在此闲住期间，他表示先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再干。吉鸿昌和赵以元劝他留下，准备任命他一个新的职务。正在这时，被蒋介石收编的、驻守在山东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派人来邀请赵博生去二十六路军任参谋长，襄助军务。他接受了孙的邀请，去济宁任职。后来，他先后将李青云、郭如岳、孙毅等旧属也介绍到二十六路军。

三

孙连仲原系冯玉祥的亲信将领。中原大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发了横财，并被宠以重任，因此人们叫他“孙肉头”。当时的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合计约三万人。蒋介石对这支原属国民军的部队是歧视的，士兵的月饷只有蒋之嫡系部队的百分之六十五。

一九三一年初，蒋介石开始调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命令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三月，二十六路军进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五月，在永丰县的中村与红军初次作战，二十七师师部和一个旅大受损失。不久，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同年七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此时，二十六路军已被推到宁都。九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实际上已陷在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

二十六路军被困在宁都之后，薪饷没有保障，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就死了几千人。宁都城的四郊埋遍了士兵的尸体，当兵的伤心地指着一排排坟堆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站队的！"官兵中普遍产生了厌战思乡情绪。赵博生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更加愤慨。平时，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设法给放了。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希望找到共产党，因而更加怀念老政治部长刘伯坚，认为找到刘伯坚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他曾派李参谋到上海找刘伯坚。但因求访无门，没有达到目的。赵博生没有就此而作罢，而是不时地在作试探。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风趣地问罗："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

赵博生渴望找到共产党。在这些日子里，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时刻关注着他的政治态度。该路军原来就有中共地下党员。部队开到江西后，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特派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朱瑞到中央军委兵运科工作，主持“兵暴训练班”，负责培训对二十六路军等国民党军进行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这年五月，王超、袁汉澄（即袁血卒）、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来到军委训练班接受训练。朱瑞向他们传达了军委派他们去江西二十六路军进行策反工作的指示。临行前，向他们交代了接头的暗号和注意事项，并告诉他们：“今后如遇到紧急事情需要红军帮助时，可直接到苏区同红军联系，就说你们是中央军委朱瑞叫来的。”三人打入二十六路军后，与该路军中一直同上级党组织保持着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了关系，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策略，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刘振亚继续在七十三旅，李肃到七十四旅，袁汉澄往七十九旅，王超到总指挥部。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已经发展二十多名党员，如李青云、罗亚平、王铭五等。约在六七月间，为了统一领导该部队的暴动工作，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下辖官长党员支部和士兵党员党支部。

一天，特支在宁都城北门外石拱桥背刘记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煮鸡吃作掩护召开会议，第三次讨论赵博生

的入党问题。“特支”的同志听了王超对赵博生的分析后，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他到江西后的言行，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对二十六路军的现状是很不满意的，是倾向革命的，于是决定先写一封万余字的长信去试探他一下。这封信主要内容是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及二十六路军的困难处境与光明前途。此信由罗亚平送去，利用工作之便，压在赵博生的办公桌上，随时注意观察他的反映。为慎重起见，在送信之前，“特支”作了四种打算：第一，如果赵博生能够接受信中的主张，就直接向他表明态度；第二，如果他迟疑不决，就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第三，万一出了问题，罗亚平就立刻转移到苏区或准备牺牲，其他同志不暴露；第四，如果仅是一般的追查，就说此信是拣到的，应付一下。

赵博生在办公桌上发现这封“亲启”信后，急忙拆开，很快读完，并仔细琢磨着信里的内容。隔了一个多星期，他把罗亚平叫到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先是让坐、沏茶，然后从桌上摆着的几本书里拿出“特支”给他的那封长信。他以和蔼的口吻对罗亚平说：“我看这信虽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罗亚平一见信皮就知道赵参谋长找自己是什么事，但态度镇静。接着，赵博生指着信上已划了红道道的地方不断地称赞：“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得很好，说得完全对！”罗亚平仍然没有作声，认真地观察

着。突然，赵博生神色庄重起来，诚恳地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结果没有找见。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

在"特支"汇报会上，罗亚平带着满意的表情，详细地汇报了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后来，王超代表党组织出面跟赵博生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罗亚平作介绍人，并上报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感到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矢志革命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当时，二十六路军中秘密流传着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赵博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积极认真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炮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怒潮。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继续留在江西"剿共"，于是联名他促总

指挥孙连仲拍电报给蒋介石，请准许“回北方打日本”，以拯救民族与家乡的父老兄弟。孙连仲在强大的压力下，电呈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未等复电，他就命令部队向北开拔。可是，这一行动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指令孙部立即返回，“死也得死在宁都”。此后，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先后离开了二十六路军。一些中高级军官看到这种情景，更感到处境危险，前进将被红军消灭，后退又为蒋介石的军令所不容。基层官兵情绪更加不振。官兵们都在伺机探寻出路。

此时，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公开代行孙连仲的职权。他在“特支”的领导下，积极稳重地在士兵和中高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他在对部队讲话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要求大家：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不做亡国奴，就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平日，他与部属交谈时常说：“我们所住的、穿的，都凝结着工人的血汗；我们所吃的，全是农民辛勤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时机一到，我们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并为我们自身的解放起见，即拼命、流血、牺牲，亦在所不辞！”他说到做到，而且生活朴素，作风正派，为人表率。他关心士兵的疾苦和痛痒，把部属看作是自己的兄弟。他身为高级军官，但不带妻室。他在日记中写道：“妻丑无子，而不再纳娶。”他的这些高尚品质，博得广大

官兵的尊敬和爱戴，也给官兵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力量。他们骂蒋介石丢掉大好河山，“还剩什么赤”；骂孙连仲“喝兵血”，丢下我们不管。在兵营中公开呼喊：“红军主张抗日，我们联合红军抗日去！”

赵博生对中高级军官，主动搞好团结。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是河北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赵博生利用这种同乡、同学和旧交的关系，经常与他接近。当董告假回原籍“省亲”返回宁都后，赵博生带着孙连仲“暂免董振堂旅长职务”的电报去看他，并说：“有什么事，我们团结在一起，才不被人吃掉。”董振堂表示同意。此后，他们彼此更加亲密起来。由于赵博生的影响和具体帮助，董振堂也积极参加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赵博生邀请旧友孙毅、李青云、郭如岳、孙芳桂等参加“西安举旗拟入汉中”一周年纪念会，互相温故知新，共勉前程。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中共中央，途经南昌时，不料被捕，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落到敌人手里。十二月五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当时，刘振亚是“特支”书记，袁汉澄做组织工作，王铭五负责宣传工作。这份电报是罗亚平收译的。他把电报交给了主持二十六路军军务的参谋长赵博生。赵博生获急电后，与“特支”的同在一起，

机智、果断地对付着这突然的事变。他们判定王超不是有意出卖党的组织，否则赵博生等也要被“严缉”。他们决心化险为夷，将此事转化成起义的导火线。于是，他们立即分头紧张地开展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在下级军官、士兵和党员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袁汉澄、郭如岳去瑞金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组织起义事宜；赵博生负责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赵博生坚定、沉着，立即给南昌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又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弄来一张证明，交给袁汉澄，让袁等顺利通过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到苏区去汇报。尔后他经过缜密思考，要罗亚平假造一份南昌行营拍来的电报，准备用它去找董振堂、季振同。电报的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电报拟好后，他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

董振堂自得悉他的七十三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行营查抄一事。一直表现愤懑。这时，又看到赵参谋长带来的“火速进剿”的电报，认为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要下新的毒手了。于是，赵博生向董说出了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的计划和争取七十四旅一道行动的设想。董振堂本有抗日爱国思想，心中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并私下多次设法寻找刘伯坚和中共党组织。他对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表示坚决赞同，并表示协助赵博生做争

取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工作。

季振同也是赵博生的同乡。季的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实力最强的旅之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驻在城内，担任城防。“特支”和赵博生认真分析了季振同的情况，认为存在着不少有利因素。于是，赵博生就和董振堂一起，带着那份“火速进剿”的行营来电，来到七十四旅旅部找季振同。季振同看完电报，毫不迟疑地表示：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去！接着他们三人一起共商举义机宜。之后由季振同去做本旅主力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的工作。

十二月上旬的一天，一架国民党飞机，送来给赵博生的亲启“机密”件。他拆开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那两个决议案和蒋介石企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员的“手令”。赵博生镇定自若地再次妥善地应付了蒋介石的“手令”，他同时加快了二十六路军起义准备工作。

时间万分紧迫。袁汉澄带着那张总指挥部执法队的证明，星夜通过二十六路军的警戒岗哨，进入苏区，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坚等，向他们汇报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研究，对二十六路军起义作了具体指示：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万一不能全部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党组织能够掌握到的他它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局部起义时，已经暴露了的共产党员，如赵博生等立即随起义部队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则继续隐蔽

下去；起义时间定为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并指示在可能情况下，将宁都的地方反动头子严维绅。黄方梯逮捕起来。为了确保和配合起义的胜利，中央军委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和牵制广昌县境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并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

赵博生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段秘密的准备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后，更加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组织工作。他借点名的机会，向部队作了广泛的政治鼓动，在起义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做出决定：趁孙连仲不在部队的有利时机，采取果断措施，举行起义。当时，士兵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歌子：

红军来了，缴枪吧，
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
红军来了，都欢迎，
打倒卖国军阀，回北方！
……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刘振亚、袁汉澄等又在一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了举行起义的问题。当时，有三个方案：一是二十六路军全部举行起义，实现这个方案困难较大，但只要争取了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也是可以做到的。二是七十三旅起

义。由于领导坚决，下面有些军官通不过也好解决。三是只将七十三旅学兵连拉到红军去。实现这个方案最容易，最有把握。大家都同意争取实现第一个方案，都等待着十三日夜晚的到来。

在这决战时刻，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从南昌给二十六路军运来的两万套棉军衣和十一月份的薪饷已经到达广昌，不日就可以运到宁都。为了得到这批眼看到手的物资和薪饷，党组织临时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即由原来的十三日改为十四日，并派袁汉澄和七十三旅郭如岳、七十四旅卢寿椿秘密出城，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固厚村，向负责联络指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汇报、请示；又派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星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冬衣和薪饷兼程运到宁都。经请示，中央军委及时批准了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这一临时决定。

赵博生为了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参加起义，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做团结季振同的工作。他遵照党的决定，拥护季振同做起义和起义之后的领导人，还亲自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去住，以坚定季振同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他在对七十四旅官兵们讲话时，要全旅官兵听旅长的话，并用生动的比喻对大家说：你们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讲完，他要大家互相认识认识，拉拉老乡。

去固厚村的代表回来后，“特支”紧急召开有赵博生、

董振堂、李青云等人参加的行动会议，对举行全军起义作了认真研究、周密部署和明确的决定：从十四日黄昏开始，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由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在总指挥部解决各旅、团以上的主官问题；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通往苏区的要道和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人员并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城东传教士住过的西式二层楼房里。

十四日，赵博生通知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于下午四时将总指挥部的警戒交给七十四旅一团三营，特务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黄昏，按预定的部署均各就各位。总指挥部的楼房里，灯火辉煌，赵博生以参谋长身份正在设宴请客。宴会分别在楼上、楼下举行。楼上是团以上的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为了使宴会达到预定的目的，事前大造了一番舆论，说参谋长晚上的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有南京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宴会以后还要打麻将等等。六时许，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留在宁都的那些旅长、团长们，一个个都应邀前来总指挥部参加“盛宴”了。总指挥部的警戒虽早已撤换，但因他们的装束和总指挥部特务营一模一样，加上天黑，所以谁也没有发现换了人。八时许，赵博生在席间，简明地向到会的军官们讲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当众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席间立刻骚动起来，大多数军官表示拥护；有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宣

布所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了他们的武器和私章，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达命令，调动他们的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在此同时，楼下警卫营的士兵也按预先的布置一举解除了卫士们的武装。总指挥部的行动胜利结束，宁都城临时宣布戒严，赵博生重新颁布口令，亲自写了“解放”两个字，指挥全城各部统一行动。

季振同选拔七十四旅的精锐，由卢寿椿带领占领北门外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

李青云带领学兵连一部分，控制二十五师电台。

郭如岳带领学兵连另一部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

……

由于二十六路军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只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有几人伤亡，除没有参加宴会的师长李松昆带走一个团外，其他没有任何损失。到次日凌晨，赵博生等率领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计一万七千多名官兵起义。

拂晓，起义部队依次集合，赵博生来到队列前，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并且带头扯下了帽上的国民党的帽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随后，他挥手率领起义部队跨过梅江，浩浩荡荡地开往中央军委代表来迎接的地点固厚村。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兵运工作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它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加剧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内部分化，支援了红军的革命战争，壮大了红军力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在合影留念的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五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达固厚村时，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早已在那里等候。赵博生忙迎上去，一一握手。刘伯坚关切地说："昨晚，我一夜都未睡着，以为你们有的可能牺牲了，我真替你们担心。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根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这天，赵博生和刘伯坚一起讨论和修改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宣言。它向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白军士兵们庄严宣告："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

加入工农红军……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十六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由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从此，红军又一支坚强的战斗骨干力量迎着革命的风暴光荣地诞生了。

接着，部队开往石城县的秋溪、龙冈一带整编。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了，可是官兵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仍然表现出许多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他们过不惯红军的生活，受不了红军的纪律。为了改造好这支部队，赵博生带头协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工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将自己十多年的积蓄，全部献给了党，并经常用谈心的方式启发官兵的思想觉悟，教导他们遵守红军纪律，去掉不良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他还常以自己的格言：“为劳苦工农谋利益是莫大的光荣”，“要负责任就不要怕挨骂，怕挨骂就不要负责任”来教导部下。他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整编后，赵博生偕同其他领导人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

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五军团参加围攻赣州的战斗；四月，与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的战役；后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七月间向粤北的南雄挺进，在水口打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一次战斗中，赵博生的左臂受了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八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之后，赵博生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的战役。十七日，他和董振堂一起发表了告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干部书，号召他们"赶快觉悟起来"，"把眼光放远大一些，看看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趋势"，"赶快过来当红军，我们高举着苏维埃红旗等候和欢迎你们"。

这一时期，赵博生按照党的需要，努力厉行军团副总指挥和第十三军军长职务。凡是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们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拼马刀最为厉害，杀得敌军胆战心惊。苏区军民中曾流传着这样的赞语：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马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因赵博生指挥作战有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一枚一级红旗奖章。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动员了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三十九个团，约六十三万人，并亲任总司令。

他首先以主力进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的红三军，使这两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转移；后又调兵南下，向中央根据地进犯，到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四师已经进至金溪、南城一带。为了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左翼的长沅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

长沅庙是个只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的小山地。赵博生深感这次战斗的重要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积极指导构筑工事，缜密布置兵力。敌军来势十分凶猛，先是集中炮火轰击红军前沿阵地，接着便发起集团冲锋。赵博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实施灵活的指挥，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的进攻，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一月八日，红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遂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赵博生来到与敌人相距只有百米远的地方指挥，不幸右额中弹，当场倒地，壮烈牺牲。

赵博生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红五军团发来了唁电，对赵博生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指战员要继承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纪念赵博生，一月十三日，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决定全苏区在一月二十一日这天举行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德亲笔题了“博生堡”三个大字。

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虽死犹生，精神长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李　直）



袁　国　平



袁　国　平

一

袁国平（1906—1941），原名袁幻成，后称袁裕，字醉涵，湖南邵东县人。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袁九洄，是个弹棉絮工人，为人老实厚道。母亲刘冬秀，是拳师之女，十八岁同袁九洄结婚。她性格倔强，不畏权势，且能识一些字，遇事颇有主见。袁九洄夫妇生有两男二女，袁国平排行第三。刘冬秀深感丈夫因不识字备受别人欺负之苦，决心省吃俭用，一定要子女上学读书。

袁国平六岁进私塾，尔后转入宝庆循程小学学习。童年的袁国平，个头瘦小，衣着寒伧，常受富家子弟欺凌，在忍无可忍时，就使出母亲教他的几手拳脚，教训他们一顿。也因此孩子们都很服他。他自幼爱慕英雄，邵东农民起义领袖贺金声，宝庆的蔡锷，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都是他崇拜的英雄。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循程小学的师生在校长刘葆初、体育老师石建殊的带领下，也积极投

入这一爱国运动。袁国平每天领着全班同学上街宣传，查禁日货，并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杂志。从此，在他少年的心田里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循程小学毕业前几个月，袁国平的父亲去世。他勉强支撑到小学毕业，即辍学在家帮助哥哥弹花、管理帐目。每逢中学招生，有些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就来找袁国平代考。当时代考之风盛行，称之为“杀枪”。袁国平出马，每考必中。但每当他看着这些纨袴子弟背着书包上学时，深为自己不能上学愤愤不平。

一九二二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收公额生，宝庆招四名。一师是所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考大学，都不进这个学校，而进公立或私立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穷或因其它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所学校。因此投考一师者较多，非成绩优良者不能考入。袁国平由于学习根底厚实，考取了一师。全家欢喜不尽。不久，他带了简单的行装，去长沙投入新的学习生活。

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一师范，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带动下，成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活动基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常常起着带头作用。袁国平在一师一面勤奋学习，一面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同学推举为一师的学生代表参加市学联，尔后又当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这年，

他作为学联代表积极领导和参加了抗议日本水兵枪杀长沙示威群众的抬棺游行和全市性的罢课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湖南省学联与省各界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省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头一天，长沙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豢养的一批打手闯入会场，占据灵堂大门进行捣乱。学联马上组织学生和工人两支纠察队，一路越墙而入，另一路由袁国平带领直冲大门。仅用半小时，就把这批流氓赶出追悼会场。

袁国平在学校十分爱好文学，是一师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之一，并受到一师国文教员田汉的钟爱。以后田汉离一师赴上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袁国平于一师毕业后也应田汉邀请去上海参加"南国社"工作。不久，"南国社"被反动派查封，袁国平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他痛感要改造社会，振兴中华，非有枪杆子不可。适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他决定投笔从戎。

二

一九二五年十月，袁国平和一些爱国青年一起，在上海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初试合格后，便乘船赴广州。到广州后，经复试被录取入伍，编入政治科(又称政治大队)第三队。当时在黄埔军校师生中，左、右两派斗争异常激烈，

政治科共产党员的数量多，右派诬蔑它为“赤化科”。袁国平在黄埔军校积极参加左派学生的政治活动，是第四期学生中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这年年底，袁国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这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决定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改为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随军北伐。袁国平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袁国平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

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发展，引起敌人的仇视。一九二七年五月，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发动叛乱，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于夏、许的叛变行为，革命军广大官兵十分气愤，纷纷表示要与反动派决一死战。当时，革命军中广泛流传“留书攻城”、“留书杀敌”的壮举。袁国平在随北伐军开往鄂西前夕，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准备诀别。他在照片背面写道：

亲爱的母亲：

一九二七年五月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

斯时，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也奉命出

发鄂西，抗御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就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

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儿醉涵于整装待发之际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充满战斗激情的家书，抒发了袁国平为“抗御强寇”而舍身赴敌的壮志豪情；表达了袁国平在反动势力面前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

不久，袁国平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八月九日，起义军进军广东，在三河坝同前来进犯的钱大钧部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大杀伤后撤向汤坑，继又转战广东汕头。同年十二月，袁国平奉命赴广州参加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他负责接待来广州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向他们宣传党发动起义的有关指示。

广州起义失败，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人赤卫队撤出广州，向花县进发，十六日到达花县。当时，在与中共广东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举行了党的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国平任党代表，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团三个团。因花县离广州很近，又紧挨铁路，担心广州敌军很快赶上来，师党委遂决定去海

陆丰，与红二师会合。

部队在东江因道路不熟，走了弯路，拖延了一些时间，于二十九日才由河源蓝口跨过东江，三十日到达河源康禾驻扎。三十一日部队一早从康禾出发，途经紫金、河源交界的青山峰，穿过羊肠小道，走过曲径溪涧，于上午到达紫金的黄花村。当地农会干部和地下工作人员向红四师领导汇报，说国民党紫金县县长邱国忠，多次向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请求派军队进剿苏区。红四师领导获悉这一情况，便决定冒充广东派来的“援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东江第一座县城——紫金。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红四师与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海陆惠紫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刘琴西率领的紫金县赤卫队和刘立道率领的红二师第五团共五百余人，在紫金县龙窝胜利会师。刘琴西、刘立道、叶镛、袁国平等领导同志集中在一起开会，筹备召开庆祝大会，研究处决丘国忠等十七名反动分子等事宜。五日上午，在龙窝以南的炮子圩召开了六千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了反动县长丘国忠等人。群众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当晚举行提灯游行，敲锣打鼓放鞭炮，沉浸在一片欢乐中。红四师在炮子圩只住了三四天，便起程奔赴海陆丰。

一月二十三日(阴历正月初一)红四师到达海丰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并协助彭湃开展以海陆丰为中心，包括惠来、潮阳、普宁、惠阳等县东江流域的土地革

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使敌人十分惊慌。国民党军急忙派几十万兵力对东江根据地进行“围剿”。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红军越打越少，处境日益险恶，最后被迫撤离东江。

一九二八年十月，袁国平奉中共中央之命随彭湃经香港去上海。他在上海做短期地下工作后，便转入湘鄂赣根据地工作。

三

一九二八年七月，由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取得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一九二九年六月，袁国平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前委”，以加强和统一对闽西、赣南、赣西根据地和主力红军的领导，袁国平是前委十七个委员之一。从此以后，红五军便在湘鄂赣边区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六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刘仁八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组成红三军团，下辖红五、红八军，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并兼红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七月，红三军团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和

湘桂军阀混战，长沙守敌空虚之机，于二十七日一举攻占长沙。红军以八千余人打败了三万之众的敌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军进城后，袁国平领导军团政治部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于二十九日利用伪国民报馆出版了《红军日报》。这种广泛占领宣传阵地的惊人速度，曾使当时的《大公报》为之赞叹。该报报道说，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红军占领长沙九天，就出版了《红军日报》六期，先后几次刊登了《共产党十大纲领》、《土地纲领》，连续发表了《告工农书》、《告劳苦青年书》、《告劳苦妇女书》、《告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敌方士兵书》等，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各项政策。

袁国平亲自为《红军日报》撰写社论。他在《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的社论中写道：“湖南苏维埃政权在胜利的长沙暴动之后，矗立起来了。这一政权的建立，给予全国统治阶级以莫大的打击和威胁，促使他们更快地走到完全死亡的末路；同时又给予全中国劳苦群众以莫大的兴奋，更加坚定了他们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决心，推动中国革命高潮的很快到来，使获得彻头彻尾的胜利。”对于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他在文章中具体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我们应坚决的以专政的手段，镇压我们的敌人；第二，彻

底实现苏维埃政纲，很快解决土地问题；第三，猛烈的扩大红军；第四，必须坚决采取进攻的精神，与敌人作继续不断的奋斗。”在为《红军日报》写的另一篇题为《扩大红军》的社论中，袁国平对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红军在国内战争中负有伟大的任务，他是统治阶级的掘墓人，工农革命的先锋队。只有红军扩大了，才能战胜反革命派的临死挣扎，消灭一切革命障碍，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使劳苦群众获得真正的彻底解放。为此，他极力呼吁“一切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应该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冲破一切家庭观念、保守思想和地方主义，毫不返顾地到红军中来参加光荣的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红三军团集结在湖南长寿街及其附近整训。一天晚上，中共江西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了该县。袁国平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立即前去联络。他带回了红一军团前委要三军团进攻永和市的指示信。当红三军团占领永和市后，朱德和毛泽东率红一军团直属队也来到永和市。立即召开了红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确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会上，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中共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红三军团便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军事上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

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九月，红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它同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一起英勇作战，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卓著。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动用了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共约六十三万人的兵力，向南丰、广昌进犯。二月二十七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出其不意向敌人发起进攻，经一天半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接着于三月二十一日向敌第九、第十一师两个师发起猛攻，歼敌第十一师大部、第九师一部，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冲昏头脑，提出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决定把一九三〇年以来一直并肩作战的红一、三军团分开。一九三三年夏，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以红三军团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七月二日，东方军由江西广昌的头坡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骆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七月十九日首战告捷，拔除了宁化泉上土堡，一举全歼守敌一个团，毙敌三百余人，俘敌九百余，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余支、机枪七挺、迫击炮二门，解放了清流、

归化两县大片土地。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东方军又取得了在连城朋口歼敌三个团的胜利。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的红四、红五、红十九、红三十四师于连城东南面的下堡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和袁国平都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全军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八月十六日，东方军奉命北上，年底又奉命第二次入闽，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东方军胜利完成两次入闽作战任务，返回江西。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影响下，决定联共反蒋抗日。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蒋光鼐、蔡廷锴派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代表往延平前线与红军谈判。东方军立即将此事电告后方。周恩来回电指示派袁国平前往与陈接谈。二十三日，彭德怀、袁国平与陈公培举行会谈。彭、袁在会谈中一方面肯定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同时批评了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的错误，指出这是蒋介石妄图使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以取渔人之利的阴谋，并且建议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经过这次会谈，闽西前线的局势得到了缓和。

一九三四年二月，袁国平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在红军艰苦卓绝地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四次"围剿"和东

征入闽作战中，袁国平领导红三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战胜了数倍、数十倍于我的优势敌人。他十分重视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并且善于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创造了不少适合于红军革命战争环境下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一九三三年，袁国平对第一次东线战役政治工作的总结，曾得到一方面军部队的普遍好评。

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在一次政治工作总结发言中说："现时工农红军正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时工作差不多占据了政治工作的全部。一切政治工作均应配合作战计划，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除了依据一般任务，给下级以一般指示外，还应分别给以个别的具体指示，使防御者能达成坚固的防守目的；反击者能实施坚决的进攻；追击者发扬猛烈追击的精神。""政治工作的指导还应有高度的预知性。政治部门应时常估计到情况的变化，预见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现象，预先指示下级以政治工作任务和方法。如果等情况发生后再给下级指示，是常常失效，因此是没有价值的。战争环境使战时政治工作的集中指导受到限制，所以政治机关给下级的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以及给下级工作的自动性。"这些论述对当时红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袁国平是一个出色的宣传鼓动者。他常常在紧张的行

军途中，在马背上起草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就迅速印发、张贴，用以宣传人民、打击敌人。他经常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演讲。他作报告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强调材料可靠和用实例说话。因而他的报告不是空洞无物，而是材料殷实，富有针对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作报告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这在当时红一方面军里是很有名气的。陈毅曾夸奖他说：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任命刘少奇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中央军委分配工作，并随红三军团参加长征。七月二十一日，红三军团改称第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九月，红军长征过草地后，在甘南地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原红一、三军团编为“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袁国平出任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局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历时一年的长征宣告结束。袁国平在长征途中历经艰辛，在胜利到达目的地后，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为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他写下不少诗词抒发自己的胸怀，其中和毛主席长征诗一首为：

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

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
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
夜辟茫荒笑开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袁国平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二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六月，该校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袁国平任该校第三科(即普通科)政委。十一月，第三科与红二、四方面军两所随营学校合并，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刘伯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委。一九三七年三月，第二校改为“抗大步兵学校”(亦称庆阳步校、教导师)，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在步校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经常到干部和学员中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他常常到课堂与学员一起听课，到训练场看部队操练、作指导。他民主作风好，能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从不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

一九三六年秋天，西北军事形势一度紧张。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实现西北大联合。而蒋介石却督促张学良“围剿”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指示：仗非打不可，不打不成交，打是为了给对方一点颜色看，以扫除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

步校接受了打击张学良部下于学忠部队的任务。组织指挥好这一战斗困难不少，步校的成员虽都是红军骨干，但因来自三个方面军，政治水准、战斗作风、纪律状况不一样，既要打好仗，又不使部队受损失，任务十分艰巨。袁国平为确保战斗的胜利，他在战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组织和具体部署。然后，自己亲自带领一个连去攻打敌人据点。由于战前准备工作充分，上下思想统一，组织指挥得当，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步校学员分赴前线。这时袁国平和爱人邱一涵及步校部分同志留在陇东，袁国平任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邱一涵在特委做妇女工作。

在进入全面抗战的新的历史时期里，许多人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怀有刻骨仇恨，一时不能理解毛主席关于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政策。但袁国平思想敏锐，很快就领会了中共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并且积极向广大干部战士和党外人士进行宣传。他对同志们说：以前我们的敌人是地主、土豪和国民党蒋介石；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们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我们认清了这个大前提，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联合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袁国平到甘肃镇原县检查工作。一到住地，他就去给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各界人士作演讲。他在演讲中精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热情宣传了我党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信仰，共同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赶走日本侵略者。他的演讲扣人心弦，令人振聋发聩，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分量，打击了右派，争取了中间派，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情绪，博得与会者的普遍赞扬。他们说，袁先生真是个人才，很了不起，令人折服。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里，袁国平时刻惦念着前方的战斗。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全国越烧越旺时，他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自己能亲临前线杀敌。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中共中央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致项英的电报中称赞袁

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袁国平由延安经西安到达皖南岩寺。他到达岩寺那天，正值军部召开由军直和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平满面笑容来到会场，到会的干部全体起立欢迎，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项英副军长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的任命、介绍了袁的简历后，袁国平站起来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目前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敌后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要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了的就立即派出精干的先遣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游击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我们要批驳那些"抗日亡国"论者。卖国投降、背叛祖国的汉奸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声音宏亮，语言生动，深深吸引了全场干部。

新四军刚刚建立不久，全军政治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为加速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至十九日在岩寺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袁国平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在总结中指出，自新四军成立以来，全军政治工作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本军任务的要求。为创造铁的新四军，他提出了关于政治工作的四条基本任务：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

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具有伟大的政治理想和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工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从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间断的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新四军第一届政工会议结束后，袁国平即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前线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通过在前线约两个月时间的视察，对坚持敌后抗战更充满信心。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

此次苏南之行，他亲眼看到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回首自己十几年的革命生涯，百感交集。他在视察中赋诗曰：

十载辛酸斗兵戎，
愧我吴下旧阿蒙。
半壁河山沉血海，
满地干戈抖沙虫。

北伐长征人犹在，
千伤万死鬼亦雄。
弹丸挣扎鱼龙变，
地覆天翻见大同。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策略上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甚至以让出华南、华中，承认国民党政权为钓饵，引诱蒋介石投降，分裂抗战阵营。而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则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袁国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尖锐地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不管敌人内阁改组后的内政外交如何变动，然而敌人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政策，始终没有变。在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更成为最主要的战争形式，它将对全国持久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有着决定性作用。他号召全军“继续长期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准备粉碎敌人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任何新的进攻与‘扫荡’，为坚强自己，消耗敌人，争取敌后完全相持与准备胜利反攻而奋斗到底”。

一九三九年一月，新四军军部移到泾县云岭。二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了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会上，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

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袁国平为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依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并适应抗战统一战线环境，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颁布全军试行。

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给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袁国平十分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袁国平在《抗敌》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分析了江南敌后环境的特点，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八个月的经验，全面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务。他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战胜困难，追求胜利。为加强军队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确立与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设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提高政治

部主任的权力；其次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生活；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论述每一项政治工作任务时，都具体分析了它的现状和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做的具体方法。他这篇文章是对敌后游击战争中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新四军以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九三九年春，原新四军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教导总队学员都是来自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江南各沦陷区抗日爱国的男女知识青年，一般经三至六个月的学习即分赴前线。袁国平对教导总队的工作十分关心，把它视为培养训练干部的熔炉。他经常到总队作关于抗战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不断壮大新四军干部队伍作出了贡献。

随着日军侵华战场的扩大，敌人拼命扩大伪军来弥补其兵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加紧做好瓦解伪军的工作，对夺取敌后抗战的胜利便具有特殊的意义。袁国平对瓦解伪军工作十分重视，他不仅在每次布置政治工作任务时，都把瓦解伪军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亲自对伪军的种类、数量、成份、组织系统、敌人控制伪军的方法等作了具体深入的调查，从而制定出一整套瓦解伪军的政策和具体工作方法。一九三九年五月，袁国平在

《论江南伪军工作》一文中，全面论述了敌人重视扩大伪军的原由和我党我军争取伪军反正的重大意义；详尽地介绍了江南伪军的种类、组织系统、数量和成份，敌人控制伪军的手段，伪军的政治情绪和当前思想动向，以及伪军领导人的情况，提出了今后做伪军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应采取的正确政策和对伪军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透过这篇文章，使我们看到袁国平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新四军在驻地云岭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袁国平在会上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意义。他说："中国革命有长期革命战争的特点，军队是担任革命战争的武装，因此革命政党必须特别注重对军队的领导，如果忽视这一点必然会使革命受挫折。"他明确指出当前全军党的工作必须围绕下述中心任务来进行：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保证大江南北抗战任务的完成；二、努力响应党的号召，发扬党员在建军工作中的积极性和模范作用，与一切违背建军工作的倾向作斗争；三、继续努力巩固和坚强党的组织。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新四军政治部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袁国平作了《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宣教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

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一切革命没有这个前提是不会成功的。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铁军，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军队是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一切工作的积极性，作战的勇气，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建筑在信仰马列主义、建筑在这个伟大理想上面。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巩固，战斗情绪才能坚持。所以宣传教育工作是掌握着革命军队和群众的精神钥匙。”他在报告中还阐述了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方法。他说：“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行动是理论的实践，并使理论向前发展，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马列主义本身不是在头脑中杜撰的，而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所以在教育中，不但要学生了解原则，同时要说明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求学生根据原则及各个不同的具体环境灵活的运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把握新的原则来补充与发展理论。”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下列具体教学原则：(1)集体学习，集体研究，互相帮助；(2)中国化，通俗化，国际的精神，民族的作风；(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反对平均主义；(4)教、学、做的完全一致；(5)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6)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7)循循善诱，循序渐进；(8)批判精神，科学态度；(9)基本教

育与宣传鼓动互相联系；(10)计划要切实，检查要深入；(11)博而又约，约而又博；(12)环境教育，学习空气。袁国平提出的这些宣传教育原则和方法，至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袁国平自红军时期起就一直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来到新四军以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丰富实践中，进一步发挥了他作为我军一名优秀政治工作者的才干。在这期间，他对我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他的许多报告、讲话、文章以及他亲手起草的文件、材料，都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份宝贵的遗产。但是，在此期间，由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我军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工作中过多迁就国民党，把国民党首领的言论、宣言编入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教育，给新四军政治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袁国平热爱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他在给其友人翰君的信中说："处此风涛险恶时代，只有斗争才能生存，于人、于党、于阶级、于民族均同此感。""狱中也为革命学校之一角，生平所受折磨最多，惟未尝铁窗风味，常以为革命生活之美中不足。一个革命者如能入狱不屈，其伟大正与在战场绝不退却同其意义。"

袁国平酷爱读书，他不打扑克，不下棋，唯一喜好就是读书。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总要挤时间看书、写东西。他有个习惯，每天睡觉前要看点书。在宿营地如此，行军作战也不间断。他除读马列著作外，还读小说、线装本的古典散文、诗词，广为涉猎。由于他勤奋读书，所以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较好的文学修养。他既能写押韵的诗文，又能编写歌词。他也很喜欢美术。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抗敌画报》，每期他都要亲自审查。

袁国平在工作中原则性很强，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他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干部的特长，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又关心培养工农出身的干部，提高他们的水平，因而他得到同志们的普遍爱戴。他生活朴素，衣着简单，公家发什么就穿什么，从不特殊，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他家境贫寒，母亲一人在家生活困难。但他从不主动要求组织额外给予照顾。他在写给他侄儿振鹏的信中说："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象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中国正在大变动中，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大家都当亡国奴。所以我希望家里在这方面能够想得远些，能够原谅我！"

袁国平和爱人邱一涵互相尊重，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照顾。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同生死共患难，为着

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一九三九年三八妇女节，他俩曾与朱镜我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被评为新四军“模范夫妻”。

五

一九四〇年四月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皖南新四军加紧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力。顾祝同调兵遣将，加强对皖南新四军和军部的包围。完成包围后，顾发电要新四军派人去上饶谈判，企图迫我作城下之盟。袁国平于四月十一日动身去上饶。到达上饶后，他首先与国民党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谛、张超进行洽谈，尔后与顾祝同的代表岳星明谈判。接着袁国平直接与顾祝同谈判。顾坚持要新四军四、五支队和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部南调，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往苏南。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顾据理力争，舌战良久，未能作出决定。二十二日，中央决定停止由袁国平继续谈判，待周恩来返重庆后直接与重庆当局谈判。袁国平便于五月二十八日返回新四军。

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全面阐述了中央的路线。项英接到指示后，当日召开东南局军分会常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会上袁国平和曾山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之方针与路线，以及各种策略。中央“五四”指示在皖南传达后，袁国平于五月十九日启程去重庆，向中央军委副

主席周恩来汇报皖南情况。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回皖南后敦促项英执行中央指示，尽快撤出皖南，同时要项、袁在军事上尊重叶挺军长的领导，做好团结工作。袁国平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指示。约十一月底，叶挺和袁国平乘坐新四军派来的汽车回到皖南军部。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指示，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自从国民党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炮制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限共"、"防共"政策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袁国平发表了署名醉涵的《论合法不合法》一文，对顽固派的种种诬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在文章中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说明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不仅不是破坏兵役法，破坏军令、政令的统一，而正是实行了蒋介石的"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宣言。对顽固派诬蔑"新四军制度特殊，不是国军，是'土匪'"、"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游不击"、"新四军到处扩大部队，破坏兵役"、"新四军用士兵薪饷作宣传费"等种种谰言逐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新四军所作所为都符合抗战建国纲领，有利抗战，有利团结和进步，因而都是合法的。相反，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则是完全非法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此后，袁国平还发表了《声讨亲日投降派》等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恶

行。

随着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皖南形势不断恶化。袁国平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十分愤慨，对抗战的大好形势可能遭到破坏非常担忧。他写信给他哥哥醉如说："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不幸在江北、华北均发生摩擦，是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在皖南由于我们委屈求全，并以不卑不亢精神坚持立场，幸至今尚未进入流血的冲突。""和平巩固端赖双方之精诚相见，我之忍让亦有一定限度，如妨碍我之生存，亦不能一让再让，此点仍希国人能寄予同情。"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按照预定的阴谋，在安徽泾县茂林以东山区，以重兵围歼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奋起自卫，誓死不屈，多次进行突围。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光荣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袁国平遗体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被重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解放后在江苏省委工作，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因病逝世，与袁国平合葬在一起。

（田华洲　魏　蒲）



郭　滴　人



郭　滴　人

一

郭滴人(1907—1936),福建龙岩湖洋乡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八日。其父郭荣章是个温厚勤俭的佃农。由于家庭穷困，郭滴人上小学后,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帮做家务,或下田做些农活。郭滴人在学习上很勤奋用功，在校成绩辄列前茅，为师友所器重。他还能写一手娟秀遒劲的好字,村上每逢喜庆，常请他代书对联。他从小看到贫苦农民遭欺压，自己和许多童年伙伴也备受富豪子弟的凌辱，屡感世道不平。父辈们以为自己经受的苦难是命里注定的。郭滴人则不以为然，他痛恨压迫者，说他们是人面兽心的恶狗,对恶狗不可退缩，要敢于斗争。他在小学四年级时,已能阅读侠义小说，经常给同伴讲劫富济贫、敢于造反的故事。其时，凡是县长来乡里催粮征税，地主豪绅都在祠堂里设宴款待他们。郭滴人闻讯，总是邀集同伴，发动乡人闯入祠堂，抗租抗税，使他们无法畅饮。有一次，他还把烂污泥抹在大门外的官轿座位上，弄得县长狼狈不堪。在

地主族长们摆席算帐时，郭滴人站出来揭穿他们的骗局，说他们的帐是“老爷们的酒肉帐”。族长们对此十分恼火，骂他是“滚地龙”，声言要“教训”他。亲人们都为他担心，他却毫不畏惧地说：“他们说对了，我就是要做‘滚地龙’，要把咱乡土地翻滚过来，叫他们不得安身。”从此，“滚地龙”的名声暗暗传开，乡里的穷人都盼望他有朝一日能破土翻腾，为大家出气。

小学毕业后，郭滴人因家穷上不了中学，就到漳州叔父郭涵波的小杂货铺里当学徒。后来，听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可免费供给贫寒学生伙食及一些学习用品，便在叔父的资助下与同乡好友郑日晖、黄振椿（马宁）等人前往集美学校就学。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撰写了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文章，在校刊和报纸上发表。一年后，学校闹风潮停课，学生都散了。郭滴人也于一九二四年回乡任族办的新积山初级小学教师。

郭滴人在新积山初小任教期间，统治龙岩的北洋军阀赖世璜与地方豪绅相勾结，强迫农民腾出一半土地种植鸦片烟，规定每亩征收鸦片捐大洋十二元，不种或歉收的，均不得减免，农民怨声载道。郭滴人挺身而出，组织各校教师，发动学生和农民，手持“种烟必拔，包捐必杀”的纸旗，在湖洋、赤水、石碑前等乡进行抗烟示威。军阀赖世璜虽然到处张贴告示：“煽动抗种鸦片烟者，予以军法惩

处。”但是，郭滴人和小学教师黄阁辉不怕威胁，坚持斗争。他们在龙门圩场召开的农民群众大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鸦片的种种危害，揭露军阀豪绅狼狈为奸，迫害农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奋起抗争。这次斗争，震动了整个龙岩县，各界人士也纷纷起来抗议种烟。龙岩进步青年创办的《岩声报》发表了题为《湖邦社反对种烟的声浪》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滴人等人的革命行动。赖世璜逼种鸦片的阴谋终于被人民群众的斗争所粉碎。

斗争的胜利使郭滴人豪情倍增，意气风发。他看到封建势力统治着每个乡村，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觉双肩沉重。怎样点燃烧向旧世界的大火呢？他渴望找到真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六年春，郭滴人得到好友郭朝隆、郭友才的资助来到厦门中山中学，找到老同事陈庆隆。时值中共两广区党委派罗明到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陈庆隆邀郭滴人一起去农讲所学习，郭马上同意，二人同赴广州。他们如同涓涓细流汇入澎湃的大海一样，来到朝气蓬勃的农讲所。滴人到所后心胸开阔，精神振奋，随即改名为滴人（原名郭尚宾）。人们问他为何改名滴人，他豪迈地回答说：“我要点点滴滴为人民。”

农讲所的主要教务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周恩来、萧楚女、林伯渠、恽代英和彭湃等也常到所讲课。他们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精辟阐明马列主义原理，使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农讲所还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组织学员们到海丰、陆丰实地参观考察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郭滴人在学习中，常把自己深思的问题提出来与同学商讨，并直接向毛泽东请教。

一九二六年六月，经李联星（一九二九年被军阀张贞杀害）、陈庆隆介绍，郭滴人在番禺学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由于革命形势急速发展，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九二六年九月，农讲所提前结业，三百多名学员奔赴全国各地。郭滴人与陈庆隆、李联星等八名闽西籍学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北伐军东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十月，东路军击溃北洋军阀周荫人所部，收复了闽西。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同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福建汀漳龙办事处岩平宁分处”工作，领导（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的农民运动。他们还在龙岩城郊创办“农民运动宣传人员养成所”，为开展农运培养骨干，并吸收进步青年陈国华、谢宝萱、陈柏生、陈品三、罗怀盛、陈昆照等同志入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龙岩县党支部成立，陈庆隆任书记，郭滴人任组织委员。这是闽西较早

成立的一个党支部。工作千头万绪，没有经验，郭滴人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满腔热情地团结进步青年，依靠广大农民，积极把工作做好。他与陈庆隆在考塘乡、湖洋乡建立农民协会，摸索出一些经验，然后分头活动，又陆续建立起各区乡的农民协会。

在一次湖邦区的农协大会上，农友们在讨论减租减息问题时，国民党右派郑菊人突然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说："你们的本分就是种田。地主租给你们田地，你们就老老实实地耕种，只要不妄动，有什么困难，地主是会怜悯你们的，也会帮助你们的。"郭滴人当场予以痛斥："农民整天辛苦耕作，吃不饱，穿不暖，卖子借债过日子。地主不劳动，手白脚嫩，作威作福，到底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接着，郭滴人带领农会会员游行示威，地主惶恐万状。

郭滴人在城区积极建立学生组织。他省立第九中学即龙岩仅有的一所中学，建立了学生会，使这所学校后来成为起义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郭滴人还和陈庆隆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支持国民党县党部左派青年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和国民党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主任张旭高等人开展工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宣传、组织群众，打击、摧毁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郭滴人等召开了龙岩各界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农民代表最多，店员工人、学生和妇女代表也有一定席位。会议通过了限制封建剥削、实行"二

五”减租、对半减息；废除不合理的学徒制度；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禁止纳妾、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严禁算命卜卦；坚决禁鸦片烟、禁赌、禁娼等决议。这些决议是在革命派与以大劣绅杜连茹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的激烈斗争后才通过的。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郭滴人辞锋锐利，说理透彻，在驳斥论敌时，往往使对方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农讲所回龙岩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半年里，郭滴人不知疲倦地来往于城乡之间。他除了与党支部的同志商讨工作，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交换意见外，还在家乡的开明、积山小学兼教“常识”课。郭滴人办事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在这期间，张旭高等人在群众运动中采取了过“左”行动，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带人烧毁城隍庙和天子庙的神像，在农民中引起强烈的抵触情绪。有人来问郭滴人：“神像烧了，祖坟要不要挖掉？”郭滴人耐心地启发道：“烧毁神像是有些过分了。祖坟当然不可挖。但是要想想，年年祭祖坟，土豪劣绅坐轿去，分的祭品特别多，农民赤脚走路，诚心敬祖宗，分的祭品才二两猪头皮，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可见世上有什么神呢？”他还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编写山歌在农村传唱；他也常向乡人讲述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特别是介绍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的情况。他说：“石灰、泥和沙分开时没作用，用水拌和起来成三合土，砌墙建屋非它不可；一、二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任扭不

断。”这些通俗的比喻，使农民领会到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农民们都说郭滴人讲的事理最容易听懂，称他为“我们的贴心人”。

由于郭滴人等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没有把农协里的贫雇农团结为核心力量，所以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许多农会便自行解散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十五日龙岩杜连茹一伙勾结反动军队，纠集流氓地痞，捣毁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解散工会和农会，陈庆隆、郭滴人等革命者受到通缉，白色恐怖笼罩全县。郭滴人当时在乡下，他的族兄弟郭金湖和许多老农都劝他隐蔽起来，等待时机。但他坚定地说：怎么能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退缩回避呢？要是人人都等待时机，时机永远来不了。你们应该帮我考虑怎样去冲破难关，怎样继续进行工作。他急于了解当时的形势，各地农会组织情况和同志们的情绪。他痛苦地总结检查了半年来的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考虑着以后的工作方针和做法。此时，全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郭滴人和其他同志在农民中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郭滴人身穿粗布汉装，足蹬圆口布鞋，爬山涉水，来到穷乡僻壤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党渐渐地在农村中扎下了根。

郭滴人有个婶母叫苏红爱，是受尽欺凌的寡妇，同情、赞助郭滴人的革命工作。她家住村边，附近邻居全是朴实的农户，是个秘密活动的好据点，郭滴人就住在这里（以后

省委书记罗明和邓子恢也曾到这里小住)。苏红爱和女儿做交通员，为郭滴人找来青年教师罗超和陈根元（都是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农民积极分子。郭滴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各地农会多已瘫痪，许多农民感到恐惧，一些积极分子面临这种形势也不知所措，十分焦急。郭滴人便在夜间走乡串村，召集农协中觉悟较高、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谈心。仅两三个月时间，他就在东肖后田、曹溪董邦、石粉、西陂、黄竹坑、张白土、湖邦、小池、江山等地农村，先后建立了秘密农会。后田的陈锦辉，湖邦的郭益乾、郭炳林、郭义海，江山的郭金满、廖秀芳、林斯吉以及悠远的林营熙等都是这时入党的农民。在这期间，郭滴人还与永定、上杭党的领导人张鼎丞、林心尧等密切联系，研究斗争策略，相互支援。

一九二七年七月，邓子恢从江西回到龙岩，党支部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农运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八月，闽西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苏庆云(国民党左派，以后参加了共产党)被委为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常务委员，邓子恢任县党部秘书，郭滴人任组织委员。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公开活动的机会。在原来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龙岩除了溪口、雁石、内外山前等区外，农民协会遍地开花，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近十万人。许多地区还建立了“党支部——秘密农会——公开农会”三套组织，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三

一九二七年秋，闽南著匪陈国辉部改编的省防军第一旅进驻龙岩。陈伪装开明，企图拉拢革命势力，一时还不敢张牙舞爪。于是，中共龙岩党组织趁这有利时机，加紧开展工作，恢复了工会和农会，实行了“二五”减租。不久，陈国辉原形毕露。他在地头蛇林尚轩(充任陈的营长)支持下，暗中策划了一个一举扑灭革命势力的阴谋。党支部注意到这些情况，十一月间，派邓子恢同自福州南下漳泉的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一军联系，要求派部队到龙岩支持革命势力，打击陈国辉及其爪牙。陈闻讯，率部退驻漳平。郭滴人召集了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准备欢迎十一军，但久等未到。他看到与会群众有些不耐烦，就上台揭露陈国辉的罪行，指出陈是外地人，人地生疏，竟然如此熟悉龙岩情况，是因为有林尚轩、林树宏等地头蛇作内应的缘故。于是愤怒的群众立即行动，捣毁了林尚轩、王梓阑、林树宏的住宅。次日，蒋蔡部队只一个营到达龙岩，住了二三天就经永定到广东去了。得到蒋蔡部队撤走的消息，陈国辉立即率部回到龙岩，对革命势力进行报复，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龙岩。陈国辉悬重赏通缉郭滴人、邓子恢等“重要分子”。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斗争的需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福建省委指示成立龙岩县委，罗怀盛为书记，郭滴人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陈品三任军事部长。县委设在东肖的后田村。不久，省委派人来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福建省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方针。龙岩县委立即作出决议，根据本县实际，加紧宣传组织工作，发动群众抗缴所有捐税，对地主、族长进行算帐斗争，公开宣传土地革命。县委的同志经常分头深入各区乡开展工作，尽管反动派到处侦缉，企图捕捉他们，但乡村是农民的天地，许多觉醒了的农民(特别是秘密农会的积极分子)都严密地掩护他们，即使在大白天来往于山区乡村，也不会出事。

一九二七年冬，郭滴人、邓子恢、陈品三在后田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二五”减租，向族长清算公帐款取得胜利后，又在村里开办青年夜校和青年国术馆，他们亲自到馆里讲课作指导，使青年们都获得一定的政治、军事常识。郭滴人还特别注意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冬，他们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田党支部，由陈锦辉任支部书记。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粮食不断涨价，后田党支部为保障群众生活，决定限制粮价，禁止地主运粮出境。这就直接触犯了地主的利益，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地主们妄图压服农民，雇用了一批流氓、地痞，也设立一个“老人拳

术馆”，并企图暗杀陈锦辉等农会负责人。县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后田党支部的要求，决定实行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后田村地主用公偿款买了几头猪，准备做“关帝福”。农会会员挤进去，对地主大喊：“公偿款是公众的，我们也要分猪肉。”地主竟令狗腿子操起木棍殴打农会会员，群众怒不可遏，准备反击。县委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批准了后田党支部武装暴动的计划。当夜，陈锦辉带领“青年国术馆”武装，杀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狗腿子陈北瑞，冲进“老人拳术馆”，正在筵席上美餐的地主豪绅望风而逃。农会武装缴了地主的全部武器。当晚召开全村五六百人的群众大会，揭露地主的阴谋和陈北瑞的罪行，并责令地主交出田契借约，当众烧毁。郭滴人代表龙岩县委庄严宣布：“从此田租不交，旧债不还，田地由农民分配。”第二天，又将地主的粮食一千多桶分给贫苦农民，没收了族长掌管的公款四五百元。五六天后，陈国辉派一营军队前来镇压，县委早作了准备，群众的物资多已搬藏背后大山，暴动队员与敌相持了几个小时，为避免无谓牺牲，县委决定撤至隘头山。为了对付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保卫革命成果，县委迅速在永定大排公学成立了以陈锦辉为队长的闽西第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郭滴人和邓子恢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袭击敌军，捕杀反动分子，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闽西根据地的劲旅。

后田暴动打响了党领导龙岩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统治的第一枪，它标志闽西革命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阶段。为了庆祝暴动后的第一个春节，郭滴人豪情满怀地给大家拟了一对新春联："欠租欠债用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

一九二八年四月，邓子恢调上杭县委工作，罗怀盛也调往漳州，年仅二十二岁的郭滴人担任了领导全县的工作。他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各区乡党支部及秘密农会日臻完善和巩固，城区的工运也在发展，第九中学建立了共青团组织，许多学生踊跃参与秘密活动。这期间，县委机关迁到董邦村，郭滴人仍象往常一样抽空巡视各乡，深切关心基层组织，关心群众的生活。许多农村老人回忆说：那时滴人同志虽然很年轻，但大家都把他看作亲密的长者。他总是笑嘻嘻的，待人亲切真诚，讲话很有风趣，很会打比方，不罗嗦，句句在理，大家都听他的话。

一九二八年七月，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十一月，特委在永定合溪召开扩大会议，邓子恢、郭滴人等参加了会议，省委书记罗明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指示各县加紧发动、组织群众，准备举行大暴动。

一九二九年二月，郭滴人在龙岩中甲乡附近的山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代会，到会代表三十多人。回龙岩巡视工作的邓子恢向大会介绍了永定县溪南里的分田经验。会议讨论了党的"六大"路线，并通过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决议。会后，郭滴人和邓子恢在县委所在地董邦村

起草并印发了《为打倒陈国辉，实行土地革命告群众书》，两人还编写了数十首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山歌，散发各区乡。

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入闽西，歼灭了盘踞在长汀的省防军第二旅郭凤鸣部二千余人。这一震撼闽西的胜利消息，使龙岩革命群众得到极大鼓舞。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郭滴人和县委的同志们紧张地进行全县总暴动的部署，准备迎接红军。他们还分头到大池、小池、江山、湖邦、红坊、东肖、西陂、曹溪、铁石洋等地，与各乡党支部研究扩大武装，组织暴动队等问题，对暴动前的准备，做了周密布置。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县委接到红四军向龙岩进发的通知，郭滴人连夜赶往小池，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龙岩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又立即赶回县委驻地，做好攻打龙岩城的准备。五月二十三日凌晨，红四军兵分两路攻打西、北两城门。郭滴人率领游击队和各乡农会会员一千多人，埋伏在城南，配合红军攻城。战斗很快结束，消灭陈国辉留守部队一个营(陈率主力参加广东军阀混战)。当天，爆发了全县农民武装暴动，以策应红军。城里到处贴着显眼的标语："欢迎红四军来岩！""消灭陈国辉！"毛泽东进城后，由郭滴人陪同到九中发表演说，学生极受鼓舞。下午，红军撤离龙岩，转攻永定。六月三日，为诱敌主力回援，红四军第三纵队与郭滴人、邓子恢率领的游击队发动了二占龙岩的战斗，第二次攻克龙岩城。为了进

一步迷惑敌人，红军又绕道上杭至连城新泉。此时，陈国辉率主力由粤回岩。六月十九日，红四军兵分四路逼近龙岩城郊。郭滴人亲率地方武装一千多人密切配合红四军三打龙岩城。在数小时之内，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全歼盘踞在龙岩城的陈国辉主力二千余人。陈国辉化装逃脱。

龙岩解放后，闽西局面大定。一九二九年六月，龙岩县委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讨论闽西特委颁布的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在开展纷繁艰巨的土地革命中，郭滴人根据永定溪南里的分田经验，制定了分田的原则和政策，并在后田村先作试点。他深入群众，征求意见，又与邓子恢共同反复研究，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因分田的时候正是水稻抽穗时节，便只好分青苗，仅十多天就分配完毕。在后田取得经验后，即向全县推广，前后不到一个月，全县各区乡都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一九二九年九月，龙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建立起来了，还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郭滴人被选为县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党团工作、干部培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建设等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解决，郭滴人总是认真负责地带领干部研究处理。他教育干部不要老坐在机关里，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郭滴人对共青团的要求是严格的，经常到团县委指导工作。他也极关心少先队和儿童团，有空时就同少年们一起游戏，讲故事，从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趣。

郭滴人对蜕化变质分子是深恶痛绝的。当时，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郭江文接受三百元的贿赂，偷开路条放走了民愤极大的在押土劣，郭滴人对此非常气愤。尽管郭江文是自己的堂兄弟，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情同手足，但他仍然严肃地在县委和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上提出处以死刑的建议。他这种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得到了全县人民的赞扬。

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会剿”。敌五十六师刘和鼎部进占龙岩，但只盘踞城区，四周乡村仍在我党控制之下。由于红四军在江西打击敌军后路，闽粤两路敌军又有内部矛盾，在我闽西军民的不断反击下，敌人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间撤退。刘和鼎部临撤退时抓走了三十多位革命同志，拘押在厦门监狱。关在这所监狱里的还有厦门地下工作者十多人(其中有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和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省委决定组织劫狱，郭滴人配合省委行动。声震全国的“五·二五”劫狱胜利后，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到龙岩。

四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初，闽西苏区已拥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漳平、平和等县，纵横三百里，人口近百万的红色区域。不幸的是，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

在中共中央的左倾影响之下遭到破坏。一九三〇年六月，立三的左倾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七月，闽西党在龙岩列宁学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出席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筹备会的郭滴人作政治报告。会议在当时已经滋长起来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主观地夸大了闽西的有利形势，通过了贯穿着左倾错误的决定。九月、十月，闽西刚刚创建的二十一军连续两次出击东江，使部队受到损失。以后，又将部队拉去打上杭、平和、连城，连遭失败，军力大大削弱。在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郭滴人，由于受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度执行的立三左倾错误，给闽西革命带来了损失，不过，当革命遭到挫折时，郭滴人敢于正视现实，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一九三〇年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闽南军阀张贞部也向闽西进攻，苏区周围团匪又趁机骚扰，闽西苏区内外情况日益严重。十二月，闽粤赣边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特委（邓发任书记，郭滴人为宣传部长），纠正了以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对其思想实质，却没有加以彻底清算。这些左倾思想的根源，导致了一九三一年春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一起重大错案。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了以林一株为主审的闽西苏区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

民主党分子”大会，开始在闽西苏区内部“肃清社会民主党”。四月四日，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新左倾的中央就关于“肃反”工作致信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提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现象要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从而使闽西苏区内“肃社党”这一错案进一步发展。五月十四日，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作了《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提出“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口号，致使五、六、七月间，“肃社党”事件在闽西苏区酿成很大恶果，数以千计久经考验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蒙冤受诛，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郭滴人一开始也曾轻信了关于“社党”活动耸人听闻的报告，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肃反”斗争。同时，在左倾气氛十分浓厚的情况下，郭滴人未能摆脱党内“左”倾错误的羁绊，在“肃反”初期曾经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随着斗争的展开，他发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员相继被害，连他亲自培养入党的早期暴动领导人，也蒙冤受屈，使他感到运动已被引入歧途。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赞同。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发来的指示，撤销了闽西肃反委员会和林一株主席的职务，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为及时制止肃反错误继续蔓延。九月底，闽西政治保卫处首先采取断

然措施，严厉制裁了在“肃社党”事件中滥用职权、肆意杀害大批革命同志的林一株等。一九三一年秋，郭滴人和张鼎丞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汇 报 了闽西“肃社党”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严肃地批评了闽西肃反工作中乱抓乱杀的严重错误，十分沉痛地指出：“这样搞法，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毛泽东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闽西，进一步纠正错误。郭滴人和张鼎丞回到闽西后，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一大批被关押的同志，从而基本上稳定了闽西苏区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郭滴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局长。他在专政机关工作，十分注意党的政策，经常教育干部不要打骂虐待犯人，更不准搞逼、供、信。干部有过失，他从不大声呵斥，而是充分地说明道理，使人口服心服。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成立省苏维埃政府，郭滴人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并担任文化部长。不久，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郭滴人为省委常委。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红军东路军总部在长汀召开关于攻打漳州的军事会议，郭滴人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罗明、张鼎丞、李明光等出席了会议。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克龙岩，郭滴人随军回到龙岩。二十日东路军进占漳州，地方工作亟待开展。龙岩群众一向热爱党，

拥护红军，但是由于"肃社党"的严重错误，许多革命青年被杀害，坚贞、干练的中、下层干部几乎被杀光。龙岩的广大群众对党只是敬而远之，情绪十分低沉。重整龙岩的担子很重。郭滴人于四月回到龙岩后，不避艰辛，毅然主持党政领导工作。他路过湖洋乡也没有踏进家门。一到城里立刻召集干部研究工作，下乡宣传发动群众，重建工会、农会，恢复区、乡政权，组织游击队，消灭民团、土匪。人们看到郭滴人回来了，心头又燃起热火，各方面工作顺利展开。红军攻下漳州后，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需要抢运。郭滴人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农民支前队伍，赶往漳州搬运，从漳州运往连城、长汀，再转送瑞金。由于郭滴人、曾心田（县委委员）、郑德生（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魏金水（县苏维埃政府秘书）等人的努力，又出现了农民积极支援红军的热潮。一九三二年秋，郭滴人回到省委，先后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地方工作部部长。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职务。

郭滴人始终认为，罗明深入群众，对闽西的情况比较熟悉，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工作上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正确的。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指责郭滴人

是“罗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撤销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加以打击，再次调到军区宣传部，最后调到一个地方去监督几十个人修筑工事。在此期间，还逼他写“声明书”。他一个字也不写。郭滴人被调来调去干些杂务，备受冷遇。在这样的逆境里，郭滴人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始终没有动摇，他坚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他仍然拿起笔杆，积极宣传党的扩军政策。他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奋斗”的文章中指出，扩红是当前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区，进行长期斗争的有效办法。但是，地方赤卫队武装同扩红一样重要，不能因扩红而削弱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保卫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郭滴人进入瑞金沙洲坝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学习，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六月毕业，被分配到宁都参加红军的扩红宣传工作。

五

以王明为代表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郭滴人将要离开多年来哺育他成长的中央苏区，告别朝夕相处的苏区的父老兄弟，心情极为沉重，依依不舍。临出发前，他把亲生骨肉——唯一的稚子郭壮友交给老乡

张清海，深情地说：“你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相信你胜于我的老婆。我将要离开瑞金了，为国不能为家，请你把我的骨肉抱回龙岩抚养吧，就象你亲生儿子一样。”说罢，掏出仅有的五块银元交给张清海。他又找到革命老妈妈苏红爱，说：“看来我这块木头还可以用做小器具。我就要随军出发了，不管要去多少年月，革命一定要胜利。你们回家乡去要保重，要坚信红军会回来！”

在长征路上，郭滴人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做宣传鼓动及地方工作。由于长征中继续执行错误政策，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对此，郭滴人十分悲愤。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对此，郭滴人更是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尽管他患了肺病和痢疾，但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战胜了病痛和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他带领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路上深入细致地做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又调到中央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

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整整十年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把他磨练得心红志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休息，不顾病痛，终于大量咯血，病倒在床。但他仍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还利用一息尚存的时刻，赶写《红军长征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郭滴人与世长辞。噩

耗传出，人们无不极感沉痛，他才三十岁啊！几天后，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县隆重举行郭滴人同志追悼会，称赞郭滴人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优秀干部”。黄亚光代表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郭滴人光辉的一生：

“……滴人同志在他一生的工作过程中，能够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能把党的策略、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路线与任务而奋斗。他不怕单独负责，当他接到党的任务时，他是勇往直前地干，非到任务完成总不放手。

“他对待同志，对待干部能细心说服、教育，没有以不好的态度去对待同志。

“因此他在地方上，在红军中，在各机关团体中，都使人感到他是党的最好的干部之一……”

一九五六年十月，郭滴人烈士的骨灰从陕北运回龙岩，移葬在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左侧。在移葬仪式上，郭滴人的生前战友、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与福建省省长魏金水专程前往参加葬礼。邓子恢作了《纪念闽西的伟大革命者郭滴人》的讲话：“……郭滴人同志，他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走完了他的光辉一生。他战斗的一生为闽西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永远受到闽西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郭滴人，以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履行了他生前“点点滴滴为人民”的誓言。（郑学秋 郭 翔）

黄　　苏

一

黄苏(1908—1935)，一九〇八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市)一个贫苦粤剧艺人家里。黄苏的父亲，是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粤剧艺人，一家四口，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九一三年，母亲病故。黄苏不仅失去母爱，而且还要象母亲一样照料弟弟，操持家务。两年后，黄苏有了继母，但境遇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

一九二三年，十五岁的黄苏，在香港给一个洋老板当杂工。当时议定负责室内卫生工作。可是黄苏一进到他的家，什么脏活重活都让他做。商店进货，原来是由临时雇工搬运，现在都要黄苏干。再加上室内勤杂，买菜、做饭、拖地板、冲厕所、刷痰盂等等，使他经常忙到深夜。商店的洋老板，抽大烟，打麻将，玩女人，整天泡在吃喝玩乐中，玩腻了，就找工人的茬儿，硬要从鸡蛋里挑骨头，指责这也没干好，那也做得不对。黄苏是条硬汉子，秉性刚烈，

哪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在一次激烈的争辩中，他痛斥了洋老板的无理刁难，愤然离去。后来他得到一位老电器工人的帮助，学习检修电泡。他拼命工作，勤奋学习，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电器工人。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我国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于六月上旬，派邓中夏到香港发动大罢工。香港工人，在苏兆征、杨殷等人的启发教育下，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一天，邓中夏在香港工人骨干会上详细介绍五卅惨案后愤怒而又沉痛地说：几十年来，我们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次，为了向老牌帝国主义进行强烈抗议，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大罢工。黄苏听后，周身热血沸腾，顿时，帝国主义的暴行历历在目：美丽富饶的故乡——佛山，被英帝炮舰政策摧毁了，在饥饿死神的威逼下，亲人们背乡离境，浪迹香港，给资本家洋老板做牛当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香港广大劳苦大众，哪一个不是被榨得干干的，腰包被掏得空空的。那一张张瘦削饥黄的面孔，正是帝国主义残酷敲榨的铁证。黄苏决心照着邓中夏、苏兆征的要求行动，投身罢工运动。从这以后，他走街串巷，贴标语，送传单，挨家逐户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动员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一次，一位工人忧心忡忡地对黄苏说，我们工人这么分散，派别那么多，凭你们这点骨干就能把几十万人发动起来？问题提得很实际。当时的香港，工

会不少，可是不统一，分了三大派：一是工团总会派，下有七十多个工会组织；二是华工总会派，下有三十多个工会；三是无所属派。上面这些工会，多数还是旧的行会工会和黄色工会，要组织起来罢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苏沉思片刻，把邓中夏给他们骨干讲的罢工有利条件加以归纳，有板有眼地讲开了。他语重心长地说，只要大伙齐心协力，泰山可移。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沙子是散的，但用石灰和水一掺和，就能紧紧地粘在一起，结成一团。它象钢铁一样坚硬，台风刮不散，重锤砸不烂。那位工人听了这番话，频频点头，当即要求参加罢工。就这样，黄苏夜以继日地做宣传发动工作，在短短的半月里，就发动了一大批工人参加罢工。在他的宣传推动下，洋务工、清洁工、电灯工……相继罢工了。香港垃圾满街，粪便溢巷，成了臭港。昔日威风凛凛的英国殖民当局，在工人运动的洪流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六月十九日，在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直接领导和海员工会的带动下，香港几十个行业二十多万工人行动起来，香港瘫痪了。工人们有组织地陆续返回广州。七月五日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成立，黄苏任队长。黄苏认真执行封锁港口、缉拿私运、严惩走狗、防范工贼破坏的任务。他积极组织军政训练，使队员们的军事技术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斗志十分旺盛。黄苏率领队员们以简陋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当时，纠察队里有五名干将，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邓

中夏在一次讲话中，称他们为“五虎将”。黄苏在“五虎将”中，号称“小老虎”。他年纪小，个头不太高，但身体很结实，腰圆体壮，臂力过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和毅力。一瞪眼，一挥手，一跺脚，真有点虎气，敌人无不怕他三分，工人们亲昵地叫他“我们的小老虎”。在尖锐复杂的罢工斗争中，黄苏锻炼得坚强而成熟了。九月，他被选送到纠察特别训练班学习。十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一月，以纠正纠察队、职工为主要职责的模范纠察队成立，不久，黄苏任该队队长。纠察队分布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的沿海各港口。他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对日夜执行封锁港口任务的纠察队进行慰问，宣传政策，并及时建议表彰先进，惩办违法乱纪分子，从而加强了纠察队的建设，推动了罢工运动。

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各种革命团体被取消，办事机构被封闭。中共广东区委在四一五政变前夕，已令杨殷组织秘密赤卫队，建立各工会的赤卫队基干队伍。黄苏在杨殷直接指挥下，与反动军警特务工贼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斗争虽然一次又一次遭到残酷镇压，但赤卫队骨干队伍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广州起义中，黄苏任赤卫队的敢死队队长。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黄苏率队破坏电灯、电话。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坚持了三天失

败了。黄苏率队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刻，才转移到香港。

黄苏到香港后，即与省委取得联系，很快被分配到摩托车职工总会任书记，并直接负责汽车、电厂、灯泡、煤气、洋务等单位的工运工作。不久，他调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八年四月，黄苏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委员，次年三月，任省委常委。当时，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左"的思想指导下，黄苏多次奉令组织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但都遭到重大损失，许多党团员惨遭杀害。从血淋淋的教训中，黄苏认识到"左"倾盲动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他自觉进行抵制，把大型活动改为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并教育党、团员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到第一线暴露身份，从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香港，敌特如麻。黄苏在香港工作期间，经常被敌特跟踪堵截，但每次都安然脱险。一九三〇年十月的一天下午，黄苏到九龙望角区省委发行科检查工作。发行科设在一个商店的四楼上。几小时前，这个机关被敌人破坏了。此刻，两个特务正潜伏在里面，以捕捉来人。黄苏同往常一样，直赴机关大门，举起左手推门，刚抬起右脚迈步，在这一瞬间，一双粗黑的大手紧紧抓住黄苏的衣领。黄苏机警地把身子顺势往前猛靠，那人倒退一步，黄苏用尽全身力气，挥动双拳来个猛虎掏心。这家伙不堪"小老虎"一扑一剪，便四脚朝天倒下了。躲在门后的另一个家伙，见来人勇猛强悍，不敢靠近，便从门后抓起一条粗大门闩击

来。黄苏转身跑到楼梯口，从四楼跑到一楼，然后潜进小巷一个木工房(地下工作联络点)，隐蔽起来。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梁广闻讯赶来。见他头部流血，踝子骨也肿起来了，马上叫来一辆三轮车，把他拉回住处。经过一个月精心治疗，才恢复健康。这时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输送一批战斗骨干给闽西根据地。黄苏于十二月离开香港到达闽西。

二

黄苏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福建省工农苏维埃执委。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三〇年年底，黄苏到闽西后担任新红十二军政委。此时，蒋介石调集七个师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盘踞闽西的军阀张贞，积极配合，疯狂向根据地进攻。黄苏临危受命，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与军长左权，积极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亲自抓提高部队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的教育工作。通过整编整训和作战准备，部队的战斗士气提高了，接连打了几次小胜仗。一九三一年的二月，在龙岩的大池、小池战斗中，歼敌数百，击溃张贞部的二九二团。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的虎岗会议，接受了王明“左”倾代表的意见，提出了“誓死保卫龙

岩、虎岗，准备与敌人打硬仗”的方针。红十二军奉令强攻龙岩、坎市、上杭等地，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在军事失利的同时，在闽西根据地还大搞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均遭严重破坏，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虎岗被占，岩、杭、永中心根据地也相继沦陷。根据地核心区域由原来的四十八个区缩小到二十二个区。黄苏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赤胆忠心，面对左倾盲动带来的损失，非常痛心和焦虑。一天，他对军长游瑞轩（左权于五月调离）说，如果我们不改变原来的作战原则，仍然对优势敌人死打硬攻，这点队伍，恐怕很快就要拼光。只有坚决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多日来，军长游瑞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经过黄苏一点，游军长高兴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黄苏的双手说，我的好政委，我们想到一块了。于是他们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经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黄苏在发言时，特别强调不能为一城一地的得失去硬拼了，要根据敌我情况，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变零为整；要避实就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扎口子，打埋伏，奇袭、奔袭等战法，痛击敌军。到了六月，部队逐步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初步扭转了闽西的严重局面。十月，老红十二军与新红十二军在长汀会师。十一月，部队整编，新红十二军全部编入老红十二军。不久，黄苏任三十四师政委。黄苏党性强，能上能下，毫不计较，欣然赴任。一九三二年十一

月,红十二军调到江西前线。不久,黄苏复任十二军政委,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军进行一次大的整编。一军团原属的七、九、十一师,加上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二两个大师。八月,李聚奎接任一师师长,黄苏接任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黄苏经常率部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打过很多的硬仗、恶仗。一九三四年春,黄苏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三

黄苏从红大毕业后,奉命组建红八军团。八月,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集贤圩组成。军团长周昆,军团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团下辖二十一、二十三师两个师,共七千人。二十一师原来配属江西军区,曾打过几仗。二十三师,完全属于新建,全部都是新兵。十月十七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进行战略战移。黄苏等率部跟随红三军团之后,从右翼掩护中央纵队前进。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队伍,不用说打仗,连走路也不大会。如何带领这支队伍行军作战,进行战略转移,黄苏日日夜夜都在盘算。幸得上级派来一位才华卓越的好主任罗荣桓,这才使他心里踏实些。当部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信丰河,继续往西前进时,干部战士出现很多思想问题。在

一次政工干部汇报会上，罗荣桓从实际出发，讲了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大意是：现在政治工作不是上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骗，而是要靠党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现在深入白区行军，有时吃不上，有时睡不了觉，几乎天天要打仗，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困难很多。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有些硬是克服不了。怎么办？那就要号召大家忍受。对这种困难，你不承认，人家不服气，你要承认它。然后号召大家忍受，首先是靠党员、干部来忍受，再把群众带动起来。黄苏高度赞扬罗荣桓的讲话，要求全体干部按这个意见扎扎实实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黄苏还说，一些干部对一年来的斗争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目前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不承认这点，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谁说红军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跟着党，跟着红军，哪里好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就走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红八军团战胜敌人。红八军团这支新部队，靠着党的领导，靠着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工作，于十一月下旬，越过粤汉路，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桂边境。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突然电令红八军团到灌阳县水车地区与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络。由于追兵紧跟在后，去水车还要绕道，仍返回道县。午夜，红八军团到达预定会师地点——水车。这时，六师已奉命赶往湘江。同红八军团不期而遇的是全军后卫红五军团三十

四师。于是，红八军团无形中成了全军的后卫。当时敌军云集，前堵后追，部队陷入重围。战斗紧张时，敌我已搅在一起。黄苏临危镇定自若，指挥部队，左冲右突，终于跳出敌人包围圈，于十二月一日下午抢在敌人前面，到达湘江边的麻子渡。渡过滔滔湘江之后，整个红八军团只剩下两千人。

四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红军夺取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后，部分红军进行整编，红八军团撤销，部队并入红五军团。黄苏仍回红一军团一师任政委。当时红一师正奉令迅速袭占施秉、余庆，直奔龙溪，抢渡乌江。十二月十六日，黄苏在新柳赶上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详细介绍了部队行军路线、战斗任务、作战能力及当前部队的悲观失望情绪和游击主义习气。他们一起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大限度提高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坚强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为加强教育的针对性，黄苏随三团行动，摸索情况，研究问题。三团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原是湘赣秋收起义军，三湾改编时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井冈山时期编为红四军三十一团。它战斗力强，善于独立活动，并且一贯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连队的支部工作搞得很出色。一年来，由于中央的"左"倾盲动，丢了中央苏区，迫使红军转战万里，几次战斗，损失较

大。大家见老政委回来了，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都倾泄出来了。有的追根寻底地问，你心中有底吗，我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自从离开中央苏区，象孩子离开了娘，整天四处奔波，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现在又来到贵州，脚板都快磨穿了，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还往哪里走？……黄苏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师部。他思考着回答这些问题。十二月三十一日，红一师占领余庆县城，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李聚奎作了出征以来的军政情况总结报告，黄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精神，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任务是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界根据地，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苏区。他针对部队思想状况，在会上作了许多解释工作，最后郑重指出，新苏区的建立，只有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创造出来。摆在眼前的第一件事是，要在元月三日，战胜一切困难，渡过乌江，粉碎敌人利用乌江天险夹击红军的阴谋。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各级干部立即奔赴连队传达。这消息，象一股强劲的春风，一扫指战员的满脸愁云，个个都很高兴，这回总算有了目的地，有个歇脚的地方了。莫讲是抢渡乌江，就是火海刀山也要闯过去。乌江是贵州省内的大江，横贯全省，流入四川。这里江岸陡峭，水流湍急，惊涛拍岸，历来被称作“天险”。军阀侯之担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派亲信林秀山旅把守。这家伙把乌江南岸的船全部掳走，在北岸修筑工事把守，妄图把红军阻挡在南岸。作为先遣队

的红一师，昼夜兼程，奇袭龙溪，按时赶到乌江边，并根据总参谋长刘伯承“佯攻渡口，主攻小道，利用好时机，抓紧架桥”的指示，紧张而又有秩序地进行抢渡准备。一月三日晚，担任一梯队的一团，决定一营二连首批抢渡。为使抢渡一举成功，黄苏从全师挑选出三十六名熟悉水性的水手试渡。经过激战，有十三人渡过了江，巧妙地潜伏在陡峭悬崖下。次日下午三时，有力地配合了二连占领登陆点。工兵连迅速架起了浮桥，按一、三、二团顺序，渡过了乌江。一九三五年元月七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一月中旬，红一师进驻遵义东关休整。黄苏这时更加忙了，他组织部队总结行军作战经验，表彰先进；对部队进行关于赤化黔滇川边区和入城十二条口号，八项注意的教育；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这使红一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有的说，进了贵州，能经常听到中央的指示，行动目标明确，不再蒙在鼓里瞎闯了；有的说，到了遵义城，好象回到了中央苏区那样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五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主持了军委工作。红军内部形势已有根本好转，但敌情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

多个团，共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李聚奎、黄苏率红一师作为先头部队，从松坎出发，沿川贵公路北上，拟在泸州、宜宾之间过长江。一月二十七日进抵赤水县属的黄坡洞、复兴场，被川敌章安平、达凤岗两个旅阻击。经激战后，黄苏向师长建议，立即撤出战斗，折回元厚。一月二十九日，红一师一渡赤水。在赤水河畔，毛泽东给李聚奎、黄苏、谭政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并说遵义会议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恩来是个好同志，错误有一份，纠正错误，总是站在前面。然后他赞扬了红一师，说红一师作战英勇顽强，还能机动灵活贯彻军委作战意图，不是死板机械地执行命令，虽然多次被敌人前堵后击，但损失不大，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最后用商量的口吻说，部队要整编，你们当团长、团政委行不行？当将视线转向黄苏时，风趣地说，你可当过军团政委啊，现在名义是师政委，实际是团政委，才三千多人。这时的黄苏，心里暖烘烘的，从不落泪的铮铮铁汉眼睛也不禁湿润了。因为他饱尝了左倾盲动主义的苦头，现在毛主席重新回到党中央、红军领导岗位上来，这就意味着敌人的“围剿”就要被粉碎，革命的胜利就在前头。黄苏等率部渡过赤水河”到达川南古兰地区。因敌情有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二月

九日，部队折向云南扎西待命，在这里休整几天后便挥师东进，乘虚直插贵州，二月十八日，在太平渡二渡赤水。二十日，部队进驻桐梓县高桥一带休整，准备再度攻占遵义。在这里，黄苏给全师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大家听后精神振奋，喜形于色，好似透过迷雾，看到阳光，思想顿时豁亮了。在两天的学习讨论中，大家联系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讲述左倾盲动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坚决拥护毛主席回到中央和红军领导岗位上来，统帅全军，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二十二日，黄苏对两天的学习情况作了总结，并针对少数人对东奔西转不理解，作了解答。他说，蒋介石纠集川黔湘滇四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四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合围，企图把红军装进他的口袋里。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战法，指挥红军与蒋介石打圈圈。时而南上北下，时而东转西奔，目的就是为了调动敌人，甩掉敌人，择机歼灭敌人，然后跳出包围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新的根据地。目前，敌人的重兵被甩在古兰地区，而遵义地区的敌人却被装进我们的口袋里。大家听了都很兴奋。有的说，打圈圈是为了

跳出圈圈，那就多打几个吧！有的说，南征北驰有这么大好处，再来几次，我会，走得更快，跑得更欢！有的说，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蒋介石服服帖帖听从指挥。会后，大家纷纷争当进攻遵义的突击队。遵义战役结束，蒋介石重操故伎，妄图以堡垒战术和重点进攻相结合，采取南守北攻方针，压迫红军于遵义就歼。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徘徊，诱敌围集。待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黄苏等奉命率部和其他主力一道，突然北上，于三月十六日在怀仁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姿态，又把敌人引向赤水河以西。红军乘敌调兵之际，立即回师东进，重返贵州，于三月二十一日四渡赤水。这时几十万敌军被甩在赤水河西岸，黄苏等奉命率部调头南下，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敌碉堡封锁，渡过乌江，向贵阳虚晃一枪，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彝族区，直奔大渡河。广大指战员高兴地说，多亏黄苏政委及时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交给我们，不然，我们这两条腿哪来这么大劲啊！

六

抢渡大渡河，事关重大，任务艰巨。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师组成先遣支队，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聂荣臻任政委。一师一团为渡河先锋团，黄苏派巡视员肖锋、吴富善、金行生随行，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一团

到达安顺场，该团一营占领了新民街渡口。李聚奎、黄苏跟随刘伯承、聂荣臻相继赶到，观察地形，听取汇报，最后决定，从一营二连挑选连长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名勇士首批抢渡。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是红军渡过的水流中最湍急的河流。泅渡、架桥都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缴获的那一条小船上。黄苏端起大碗，为战士们敬酒说，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和革命的成败，祝勇士们奋勇前进，船开得胜。第二天黎明，杨得志团长一声令下，阵地上所有平射炮、迫击炮、轻重机枪，象暴风雨一般，飞向对岸。十七勇士象离弦的箭，登上木船，猛向对岸划去。小船随着汹涌波浪和四周满是炮弹溅起的浪柱，颠簸晃荡着前进。经过半小时的殊死搏斗，胜利登上东岸，占领了渡口工事。一团于二十五日完全控制了渡口。当二、三团拟相继渡河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来到河岸。鉴于渡船少，水流急，无法架桥，决定兵分两路，夹河北进夺取泸定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干部团为右路，渡河后沿东岸北进，从后面袭击泸定桥，截击敌人增援部队；左路以二师四团为先锋，后随整个中央红军，沿西岸北进，抢夺泸定桥。泸定桥离安顺场三百二十里，是四川通往西藏的咽喉。过了大渡河，李聚奎、黄苏率领二、三团，沿着刀削斧劈的小道疾驰，两天走了三百二十里，途中还打了两仗，击溃敌人两个旅，活捉敌江防团长肖绍成。在行军途中，黄苏的坐骑

驮的是伤病员的背包，他自己跟随战士们行进。有时赶在队伍前面，组织宣传队，呼喊战斗口号："足可断，头可抛，一定拿下泸定桥！"有时又在队伍后面，帮助战士扛枪拉炮，搀扶伤病员前进。二十八日夜间，警卫战士不幸掉进深沟，黄苏立即跟着跳了下去，把战士扶上来。二十九日凌晨，黄苏随三团赶到泸定桥城郊的安乐坝，歼敌一营，随即攻进泸定城，次日支援西岸四团，迅速夺取了泸定桥。接着，黄苏率部从二郎山旁通过行人绝迹、野兽成群的万山老林，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越过荒无人烟、水草丛生纵横几百里的沼泽草地。九月到达俄界。为了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整编，把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苏先后任二大队、五大队政委。直罗镇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已决定黄苏到陕南七十三师任政委。因为战斗就要开始了，他坚决要求打完这一仗再去就任。他带领二师四团担任主攻，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拂晓，向敌人重兵扼守的要害部位冲击。当黄苏率部夺取第五个山头时，不幸壮烈牺牲。指战员踏着黄苏烈士的鲜血，迅速占领了直罗镇。不多一会儿，红军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全歼一〇九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央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礼。黄苏自觉地为这个伟大的奠基礼贡献了宝贵生命。十一月三十日，红一方面军在

东村召开营以上军政干部会，总结这次战役胜利的经验。聂荣臻介绍了黄苏在这次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奋击的事迹及其斗争历史。毛泽东在最后总结发言时说：如果对这次胜利意义估计不足，这是不好的，部分的损失，换得了大的胜利，不应以一些牺牲而悲观。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国全世界工农的解放，我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黄苏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曾国方）



谢　子　长



谢　子　长

一

谢子长(1897—1935)，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化名秋阳。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他从十四岁起读冬学，十七岁转安定县城小学——文笔书院就读。有一天，他看到一帮人围着取闹，挤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穷孩子正从一个地主少爷的裤裆下往过钻。他不觉怒火万丈，一把推开小少爷。问明情由，原来是这孩子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向这帮少爷讨钱，才受到这样的侮辱。谢子长愤怒地赶开小少爷，掏出仅有的几个铜板交给这个穷孩子。从此，他经常省吃俭用赈济这个孩子，深得同学们的称赞。

在安定城，他还亲历了一场“民乱”。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街道上传来急促的敲锣声，夹杂着“土匪进城了”的惊叫声。谢子长爬到墙头一看，是成百上千的农民扛着锄头、斧头拥向县衙门口。谢子长跟着跑了过去，东打听，西打听，才知道知县私加了羊圈税，逼得农民活不下去，

大家造反了。农民们要求知县免去羊圈税，贪婪成性的知县不仅不免税，还想寻人治罪。百姓忍无可忍，把狗知县杀了，还分了县衙门和土豪劣绅的财物，震动了周围十几个县。这件事对谢子长影响太深了，使他看到了民众力量的威力。

一九一九年，谢子长考取西安省立一中，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因受五四运动影响，未及毕业即回安定县任教。安定小学是县立第一小学，当局规定，免收学生的学杂费。可是王校长串通县官，巧立名目，私自决定要每个学生交八百个铜钱作为补贴办公费。其实，这笔钱都被校长装了腰包。谢子长知道这一情况后，和师生们一起商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详细算了这笔帐，写了十几张“揭帖”，贴在校门口、街道上。县官看到揭贴手忙脚乱，急忙派教育科长来校镇压。谢子长又组织学生自治会的师生和他当面对质，无情地揭露了校长贪污八十多万铜板的罪行，迫使官府撤了校长的职。

天下乌鸦一般黑，撤掉一个王校长并不能改变穷苦人的景况。谢子长面对军阀的横征暴敛和土豪鱼肉人民的现实，越来越感到办学救不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思来想去，他决心另找救国之道。

一九二三年，他只身赴山西，报考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决心以武装打垮旧世界。

太原学兵团是军阀办的一种讲武堂，入学要经过目测

和笔试。考官一看他那又矮又瘦的身材，连笔试都未让参加，就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谢子长遭冷遇却不气馁。他每天都要到学兵团走几遭，与学员们广交朋友。同时，又与店掌柜混成熟人，请他帮忙。接着，他写了一份“秦人在晋言志书”，贴在学兵团大门口。由于文章写得豁达磊落，辞华才茂，学兵们都被迷住了。在学兵们的竭力保举下，考官专门给谢子长一人开科考试，各门成绩远远超过已录取的学生，被破格收入学兵团。太原三年，他除学军事外，还抽出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进步报刊，看到了新的曙光。一九二三年秋，他赴河南、北京考察社会，广结友谊。在北京结识了陕西籍共产党人李子洲，接受了马列主义。一九二五年秋，他又赴北京，与李子洲、魏野畴以及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共商反对军阀大计，并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组织——共进社。这年冬天，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谢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底，谢子长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陕北与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等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安定县任县民团团总。

搞起民团后，谢子长首先用它来对付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谁欺压老百姓，谢子长就整谁。西区有一个绅士无恶不作，儿子又任区团总，比老子更坏，人称“狼儿子”。谢子长就派人把他抓来，狠狠地揍了一顿，教训得他告饶找保后才给放了。

谢子长当团总，办事公道，铁面无私。一次，他的一个亲属从乡下往城里带了一些大烟土，被城门上站岗的团丁检查出来。此人说是谢团总的父亲让带的。团丁立即把此事报告给谢子长。谢子长说："谁说的也不行！就是我父亲进城也不能让他带烟土，公事公办。"

谢子长这样做，老百姓欢迎，绅士们却既害怕又恼火，由原来支持办民团变为千方百计刁难，县衙也不好好供给经费了。这样，民团的经费便很困难，连伙食费都支不出。没粮食了，谢子长派人到他家去驮粮；没经费了，谢子长就派人到他家开的铺子里支。他不惜出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团丁的生活。快过冬了，团丁们只有一套单衣，怎么能御寒呢？谢子长思来想去，把铺子里的羊皮、兔皮全找了出来。嫂嫂、姐姐们知道他的心意，没明没夜地做呀做，把边边角角对在一起，勉勉强强缝了七十多件紧身坎肩，发给团丁每人一件。平时他和大家同甘共苦，常常吃苦在先。周围的朋友、群众有时给他送点吃的，他都要"共产"。有一次，一个亲戚家办喜事，谢子长送了一份厚礼。请客时，谢子长因公务忙没去。这位亲戚过意不去，特意给谢子长送来一块很大的油炸糕。在陕北，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吃油糕，穷家百姓平时谁能沾油呢？谢子长让勤务员把油糕切开，给每个团丁分一块，他只得了几十分之一。

当时，谢子长的朋友、共产党员李象九，利用他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

乘着石谦扩大实力的机会，谢子长的民团被石谦收编，他和李象九都当了石谦的连长。他们俩在石谦部秘密建立了中共特支，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为了发动农民，谢子长经常利用他担任十二连连长名义，打击土豪劣绅。他从宜川整训回安定时，路过瓦窑堡。这地方，是陕北有名的重镇，不光有乌黑发亮的煤炭，还是小小的经济中心。榆林的皮毛，定边的食盐，山西的日用杂货，都在这里聚集出售。那条窄窄的街道，挤满了商号，什么魁胜店、协成店、汇川通、兴隆昌……

当时正是过元宵节的时候，不少看热闹的百姓听说谢子长来了，都跑来找他告状，告的不是别人，就是肤施县(今延安市)的商税局长薛国钧。

从前，瓦窑堡人烟稀少，土地宽广。有一次，住在肤施的一个大官叫龙仁垓的带了秦、吴、冯、阎四个卫兵来这里巡察，发现这里有山有水，就把四个卫兵留在这里。这四个人各人给自己圈了一块地，盖了房屋，称起王来。谁要在此地域居住，都要交税，这就叫“卫地税”。因此，瓦窑堡虽属安定县界，但税是由肤施县收的。薛国钧担任了肤施县商税局长后，仗着和井岳秀是同乡，手伸得更长了。他不光收卫地内的税，还收卫地外的税。他在瓦窑堡设了分局，每到红火日子，就亲自坐镇。群众在城东刚交过税，走到城西又得交一次。因为薛国钧的势力大，群众敢怒不敢言。

听了大家的冤屈，谢子长觉得这正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正月十五早饭后，乡里人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进城了，街道上的秧歌热闹极了，谢子长带了几个战士，混到人群里。他其实没有看热闹，而是监视薛局长怎样坑害老百姓。不到半天，这位薛局长就搜刮了二百多块银洋。约过午时，私囊已鼓的薛局长得意洋洋地回到协成店，叫了几碟菜，喝起酒来。谢子长带了几个人闯进去。他要薛国钧到外面商量一件事。薛走出门外，只见挤满了群众，几百双眼睛都盯着他。谢子长高声说："薛国钧，今天大家要你把重收的税款退回去！"可薛国钧仗着有井岳秀这个后台，阴阳怪气地说："百姓出粮纳款，官府收粮收税，古来如此。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句话，把大家激怒了，都要求谢子长教训教训他。谢子长让士兵把薛国钧吊在拴牲口的横木上，用马鞭子狠狠抽起来。到底在马鞭下屈服了，薛国钧答应了全部条件，一瘸一跛地离开了瓦窑堡。

一九二七年，谢子长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进步学生和绅士，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为了发展农民运动，他说服了安定县知事张鸣盛，成立了农民协会，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农民协会章程》等文件，并作出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八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各项决议案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定。

在这次会上，谢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为了贯彻会议的决议，谢子长又组建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及安定县农民运动训练班，领导县农协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他们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炟辉、王伯阳；在城隍庙前，斗争了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了文契、帐簿，宣布欠债作废，废除苛捐杂税。这使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在搞农民运动的同时，谢子长和李象九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两个连里的班、排长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谢子长从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请来一些进步教员，给士兵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连队里订有我党出版的《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五一劳动节还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到一九二七年，石谦的部队已扩编成旅，有五六个连长和一百多名士兵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石谦本人也逐渐倾向革命。谢子长又建立了中共安定区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在谢子长和党组织的领导下，陕北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二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席卷了全

中国。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消息传来，谢子长义愤填膺。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他和冯景异等共产党员领导安定县农协召开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军阀和蒋介石镇压革命的罪行，决定武装农民，继续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八月间，中共陕甘区党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清涧巡视工作。魏野畴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继续留在石谦部队开展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开展工作。

军阀井岳秀盘踞陕北多年，实行严酷的封建统治。石谦自幼跟随他，因作战骁勇，不断得到升迁。共产党人在石谦部队中长期活动，石是睁只眼，闭只眼。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他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对士兵讲话时曾说："井大人哄了我几十年，我现在才灵醒了。"公开表示对井岳秀个人崇拜的动摇。这话传到井的耳朵里，井非常恼火。再加上全国性反革命的反扑，井岳秀决心剪除石谦。

八月下旬，井岳秀要过生日，石谦决定去榆林拜寿。行前，谢子长他们预感到形势不妙，一再劝石谦不要去。可石谦觉得自己为井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井不会对他怎样。

刚到榆林时，井岳秀对石谦分外热情。把他安排在一所幽静的四合院里。随后，还不时宴请他。一天下午，石

谦正在公馆休息，突然闯进一个大汉，说是井大人有密信送给石谦。说罢，对着石旅长就开了两枪，石谦立时倒在血泊中。

石谦被刺后，井岳秀很快委任石旅中最反动的营长康子祥代理旅长，同时向石旅发了两项指示：一是来榆林迎接石谦灵柩准备厚葬；二是命令李象九带兵去延安，准备改编成“骑兵团”，命令谢子长连去宜川换防。井岳秀企图借机把这支部队彻底瓦解。

情况紧急了！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决定。谢子长、李象九一起研究了几次，也未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正在这时，去区党委汇报的唐澍回来了。他这次到西安，正赶上中共陕甘区党委召开会议。组织部长李子洲向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八七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我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区党委做出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领导好全省的武装斗争，把陕甘区党委改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任副书记，刘志丹担任军委负责人。省委还决定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任命唐澍为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为委员。

听了唐澍的传达，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部队人心浮动、旅长被杀而心寒的机会，在清涧县举行起义。一来，可利用迎灵柩时向战士们讲清石谦旅长遇害的经过，

激发大家的义愤；二来，清涧守军是李象九营，比较集中。宣布起义前，于古历十月十二日起，所有进入清涧的牲口驮。均不准出城，其余一切照旧。十六日下午四时封了大商号的银柜，六点半钟派出部队实行戒严，割断电话线，打开大商号的烟土库，全部没收。又将国民党县长和大绅士叫到营部楼上，由李象九讲话，声言借用钱物，不加伤害。

部队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下，于十七日正式举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组织严密，未遇到任何意外即告成功。起义后部队如何行动，一种意见是去延安打高双成，另一种意见是先肃清内部，向宜川进发，最后按唐澍的意见向宜川进军。遂派人通知宜川参加起义的李瑞成连、王振娃连，到时为内应。十七日下午途经延川时，与王有才(共产党员)连会合，连夜赶到延长，收缴了祁梅卿营两个连的枪械，打死反动营长祁梅卿。二十日，部队行进到宜川距城五里时，隐约听见城里有枪声，估计是李瑞成、王振娃两个连接到信后动手了。部队以急行军向城里赶去，敌人逃往延安。至此，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会师，共有九百多人，长短枪一千余支，辎重弹药近三百驮。

首战告捷，一部分人陶醉了，主张好好休整一下。敌人并没有睡觉。井岳秀令其心腹高双成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高双成调集了两三千人，在起义军到宜川后的第七天，分两路包围了起义军。

是固守还是突围出去？在这个问题上，起义部队的领导人里面有了分歧。唐澍、谢子长主张突围出去，不能坐以待毙。李象九却认为宜川自古难攻，敌人攻几次伤亡大了，会不战自退。唐澍说服不了固执的李象九，便离开宜川到西安汇报去了。

谁知，敌人围城十多天，在起义军麻痹时，战斗打响了，不到二十分钟，宜川的屏障凤翅山就失守了。李象九仓促决定连夜撤退。因准备工作没做好，还没撤出南城门，突然，紧随二营驮辎重的一百多匹骡马受惊乱了营，把作为后卫的三营冲散了。三营以为二营被敌人打的折了回来，急忙退回城里，压上城门。

出师不利，还没有真正交战，部队就损失了一半兵力。李象九泄气了，坐在石阶上发呆。谢子长走了过去，坚定地说："不能迟延了，必须趁黑夜冲出去。我亲自带领一营作突击队。"李象九这才重新整理队伍，冒着枪林弹雨，杀出一条血路。

部队撤出宜川后，遭到堵击，再加上李象九指挥失误，部队损失很大。在这关键时刻，李象九提出南下向韩城的王保明部靠拢，争取让王一起行动。谢子长、阎揆要等则主张北上打延安，理由有三条：一是延安高双成旅分兵固守宜川，延安守备薄弱；二是参加起义的士兵大多数是安定、延川一带人，北上离家近，士气不会受影响；三是占领延安有可能促进事先串连好的高士秀、王保明两个旅统

一行动。但是，因李象九是主要负责人，他又一次坚持南下，于是部队在十二月份突围到韩城。到韩城时，起义部队只剩下三百多人。起义的失败给坐山观虎斗的王保明带来发财的机会。他同井岳秀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是军阀内部狗咬狗之争，根本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采取统一行动。李象九投奔他，原想得到支持，谁知这个家伙落井下石，趁机将起义部队收编了。谢子长、阎揆要和从西安返回的唐澍见事不妙，乘王保明还没动手进行改编之机，在韩城西庄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谢分别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二攻宜川，因把情报搞错了而未能攻下。接着，又连续失利，清涧起义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谢子长奉省委指示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许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起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起义中，谢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率部英勇作战。六月初一个夜晚，陕东赤卫队同敌渭南县保安团在该县塔山脚下发生激战，谢子长闻讯，率部增援，两面夹击，把保安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六月十九日，敌又兵分三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军委决定不同敌人死拼硬打，先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尔后，宋哲元又指挥一师国民党军，从赤水东西川向高塘进攻，

用重炮袭击革命军的前沿阵地。谢子长奉命率部防守，奋勇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起义失败后，谢子长离开部队，回省委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八月，谢子长回到西安。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委员。在特委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军事行动委员会，具体负责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谢子长任书记，马云泽和赵文尉（李锦峰）任委员。谢子长肩负着党的重任，于一九二九年初来到宜川县凤凰山梁占魁部搞兵运工作。

梁占魁原是黄龙山里的土匪。在军阀混战的空隙趁机招兵买马，队伍扩大到数百人。谢子长来到梁部后，昼思夜想，打算尽快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和控制的革命武装。为此他确定：第一，加强兵运工作，策动敌军官兵起义，尔后消灭小股和零星之敌，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第二，千方百计发动群众；第三，收编改造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同时派赵文尉去宜川后九殿一带搞兵变。

正在这时，宜川城里发生了武装冲突。曾在杨虎城部担任过旅长的黑子斌赋闲在宜川老家。而驻守宜川的冯玉祥部差税繁重，弄得民不聊生。黑子斌代表宜川人民抗粮抗税，被冯部扣押在宜川城内。于是，黑子斌的旧部——宜川县民团联络梁占魁、黑老一等绿林好汉围攻宜川。谢子长觉得这是宜川正义之士与反动统治间的斗争，是促进

陕北革命的良好机会，遂积极鼓励梁部参加。可是，终因冯部势力强大，围城失败，谢子长只得离开宜川。

一九二九年秋，陕子长又受命去甘肃、宁夏进行兵运活动。

在这期间，冯玉祥为了即将开始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把他在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到河南参战。为了控制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乘机扩军，不管什么人，他都收编。谢子长到平罗后，受到苏雨生的热情接待。苏的参谋对苏说："谢子长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不能用啊！"苏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只要把兵带来就行。"接着，委任谢子长为十一旅旅长，要他去宜川后九殿收编杨庚武、周维祺的队伍。

谢子长回陕北后，很快动员了三百名学生兵。这些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专门组成了学兵队，由党员张东皎任大队长，驻守离平罗不远的贺兰县李岗堡。

由于苏雨生大肆扩大势力，又自任军长，和西北的马鸿逵等"五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志丹、谢子长当即在九旅召集党的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大家看到，西北还没有大队红军，要站稳脚跟，解决吃、穿、住问题，必须与军阀挂钩。如果苏马开战，党控制的各部应迅即回陕北、陇东，以扩军为名，发展部队。一九三〇年二月，"五马"向苏雨生部开战。"五马"以优势

兵力击溃苏雨生的部队。苏部退至下马关，被杨虎城编为警备骑兵旅，住陕西彬县城内。

苏雨生溃败后，谢子长和刘志丹带领部分部队撤退到陇东，与庆阳五属清乡司令谭世林挂钩，改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从宜川后九殿改编的周维祺的三百余人为第一营）。三团驻吴旗三道川，利用合法身份，收集各地躲避反革命追捕的一部分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开展活动。

在此期间，苏雨生旧部、土匪出身的张廷芝被改编为谭部直辖第二团，驻三道川兰家砭。因为张的主力被苏雨生裹到下马关去了，二团其实是空架子。狡猾奸诈的张廷芝时时刻刻挖空心思算计别人。他给周维祺送了两匹骏马、两包大烟土、二百块大洋，并把周请到金佛坪暴家梁寨子设酒宴招待。宴中，张廷芝让其十八岁的妹妹张够够和周维祺猜拳碰杯，弄得周神魂颠倒。张乘机向周许亲，同意将妹妹嫁给周，并商定借百余轻骑，打算到下马关把他的旧部接回。后来，谢子长、刘志丹答应借给三十个骑兵。张廷芝带着三十个骑兵到下马关后，苏雨生很高兴，摆宴接待。半夜，张廷芝背信弃义，包围了苏的手枪队，缴了手枪队三分之一的枪后，连夜带队逃走。沿途，又对三团的三十个骑兵说："这次胜利归来，多亏诸位弟兄相助，应为你们设宴庆功洗尘。怎奈三道川地方狭窄，不如到安边

城内的大商号、大酒馆一聚。"三十个骑兵跟张到安边，张果然摆宴。时至半夜，张趁大家酣醉时，又将这三十个骑兵全部缴械。第二天早晨，张廷芝又找了一些人，回到三道川。周维祺为了招亲，让部下二百多人全部缴枪。接着，张廷芝突然出击，包围了刘志丹的第二营。因为谢、刘无思想准备，部队被击溃，谢子长、刘志丹等少数人死拼硬打，逃出虎口，退到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一带。这件事对刘志丹、谢子长的教训太深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任何敌人都不能抱幻想，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力量。

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陕北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接着，调他到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受训。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省委决定，把原由杨仲远、阎红彦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受训回来的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

三

一九三二年二月，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正宁县三甲原的细咀子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仍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成立那天，近千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细咀子村的旷野里，威武

雄壮。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缨枪闪闪发光。每个红军战士的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这时，正宁、旬邑一带的农民，抬着猪羊，吹着唢呐，从四面赶来祝贺。陕西省委代表荣志卿，旬邑县代表伍伯昌和谢子长都讲了话。当伍伯昌代表地方党和群众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予谢子长时，他高高举起，当空一挥，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西北高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武装的旗帜。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送来了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还介绍了中央红军的一些政治工作制度。谢子长领导了部队的整顿工作，纠正军阀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成立战士委员会……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游击队成立后，首先袭击了职田镇。夜里，游击队乘黑出动，悄悄摸到职田镇。骑兵一马当先，冲进敌区公所，捉住了反动区长和民团头子，其他战士则把土豪捉来游街，穷苦百姓扬眉吐气。接着，开仓分粮，当众烧了区公所的文书、帐本和地主的契约。没见过哪一支军队对穷人这样亲，没见过天下有这样的好事。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敌人听到这个消息，坐卧不安。驻旬邑的军阀部队立即调来一个营，并纠集彬县、长武的民团千余人，向红军游击队扑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任敌军连长的共产党员赵明轩派人

送来情报，把敌人的部署统统告诉了游击队。谢子长当机立断，决定给敌人当头一棒，让敌军尝尝红军游击队的厉害。

当晚，谢子长命令部队撤出职田镇，在镇东二十里的羊坡头埋伏下来。并且派人给赵明轩通了消息，让他见机行事。

第二天拂晓，敌军扑到职田，进镇一看，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敌人抓了几个人拷问，都说红军游击队向东“逃跑”了。趾高气扬的敌军立即挥师东进尾追。

那时候，敌军还未和红军游击队打过仗，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到底有啥本事。为了给敌军造成恐惧心理，赵明轩故意牵着马走，走几步就张望一下。兵士们从未见过连长这个样子，都奇怪地问：“连长，你怎么不骑着马走？”赵明轩装得很神秘的样子说：“打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牵着马，走起来方便得多。”

占据有利地势、埋伏在羊坡头的红军游击队，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当黑压压的敌军进入包围圈后，谢子长猛地跃出土坎，带着战士冲向敌阵。埋伏在后面的神枪手瞄准敌人，一枪一个。敌人有点乱了，可敌营长仗着人多、武器好，重新部署了一下，又蜂拥而上，向红军游击队扑来。子弹象蝗虫一样乱飞，好几个游击队战士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负了伤。眼看阵地将被突破时，突然敌后出了奇兵，敌营一下乱了。原来，谢子长神机妙算，事先在敌侧翼部署了一部分兵力。当敌人一个劲地向前冲时，这部分

兵力便从敌侧翼杀了出来。敌人以为被包围了，乱成一团。赵明轩借机上马，掉头就跑，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呀！"敌人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游击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旬邑城前，毙俘敌人三百余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羊坡头告捷，第一次显示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凶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谢子长率领部队由旬邑的清水原南下耀县照金镇，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来到通往韩城的交通要道——柳林的香山庙。

香山庙是陕西有名的娘娘庙之一。庙宇从沟底一直修到山顶，地势险要。这里住着二百多尼姑、和尚。他们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牛羊，囤积了大批粮食、金银财物，还存有不少大烟土，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庙里的和尚很反动，处处欺骗坑害百姓。群众进去烧香，每次要交两块白洋。长期以来，由于神权的压迫和群众的迷信，这座庙宇成了军阀统治者的帮凶。谢子长决定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和尚，便从庙里拉出许多粮食分给附近的贫苦饥民，又将山上的部分金银筹为游击队的粮款。

红军游击队驻香山庙期间，谢子长主持召开了队委会，讨论省委指示，总结作战经验和发动群众的经验。在这次会上，谢子长第一次提出走毛泽东指引的井冈山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月，游击队离开香山庙，东跨桥山，在焦家坪包围

了宜君民团。

这次袭击，敌人是毫无准备的。游击队的骑兵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出现在焦坪，正值早晨，三十多名民团还在被窝里蒙头大睡呢，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使民团全部缴了械。尔后，谢子长率队回到离三甲原不远的寺村原、湫头原，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代会、少先队等组织。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陕甘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壮大，分为三、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

这时，陕军与甘军在陇东又发生了混战。乘这间隙，谢子长指挥部队围困了山河镇。

山河镇是正宁县府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游击队一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和赤卫军就拿起大刀、长矛，配合游击队把堡子里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团团围住。一直围了十多天，眼看镇子就要被攻下来了，敌人突然向山河镇增兵，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紧接着，敌人又增援了大批部队，谢子长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派几个同志骑马去通知各部撤退。之后，谢子长把部队撤到离山河镇一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子外，悄悄埋伏在高原的坡坎下。第二天拂晓，敌人的马队追来了，敌人的指挥官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走在最前面。谢子长下令："敌人不到三十米，不准开枪！"敌人越来越近，一位神枪手扣动扳机，敌人指挥官一个倒栽葱掉下马来。紧接

着，谢子长从沟坎中跃出，带领部队发起冲锋。敌人因没有了指挥官，乱成一窝蜂。游击队则越打越猛，一直追到正宁城根，歼敌二百余人，缴获几十匹好马，还有不少枪支弹药。

山河镇战斗后，据旬邑中共地下党组织报告，旬邑县城内警戒疏忽，防守不严，谢子长当即决定，奔袭旬邑县城。虽经连日行军打仗，部队很疲劳，但战士们一听说要攻打旬邑县城，个个精神振奋。攻城开始后，城下的神枪手用排子枪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谢子长带着几个战士插到城下，搭起云梯，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城头。进城之后，迅即打开城门，红军游击队一拥而入，全歼守敌两个连，杀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长。下午，部队撤出县城。接着，游击队在正宁县，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就在欢庆胜利的时刻，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把围攻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谢子长身上，诬蔑他是“逃跑主义”，遂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谢子长对党忠心耿耿，虽然遭受了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对党的事业，仍然一丝不苟。离开部队后，他被派到甘肃搞兵运。

甘肃靖远一带，驻的是甘肃省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子元。王原是苏雨生部下石子俊旅的一个团长。石旅开到甘肃后，王子元和石子俊闹翻了，另打起一个旗号。王子元大肆扩充势力，通过关系投靠了陕军孙蔚如，被任命为旅长。在

王、石部队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还建有党的秘密组织。石、王分裂后，党的组织也一分为二，王子元部的党组织改为团委，仍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

谢子长、焦维炽等人被陕西省委派到王子元旅后，立即改组了党的团委，由焦维炽任书记，执法队长（共产党员）石子建、张秀山等人为委员。当时王旅的司令部是我党的势力，执法队由我党掌握，王子元住在公馆里，很少到司令部去。公馆的对面是警卫连，由王子元的侄儿一营营长王治邦兼连长，这是王子元的主要实力。谢子长分析了王旅情况，计划把王旅大部分人拉走，就派王兆卿先去海原发动炮兵营兵变，以便和靖远同时起义。后因炮兵营长沈毅民（共产党员）投靠了敌人，该营兵变未成。

在王旅搞兵变，有许多困难。一来，谢子长和王子元很熟悉；二来，王旅许多军官都认识他。他到靖远后，不好公开活动，就在城里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和焦维炽二人住了下来。焦维炽出面到王旅教导队和各连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召开各种会议。

在团委会上，谢子长和焦维炽传达了省委要求马上发动兵变的指示。接着，谢子长向大家说明了组织兵变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源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他要求大家仔细讨论兵变计划，各抒己见。有的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

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攻打王的公馆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正当大家积极准备起义时，进行起义准备的张东皎突然被王子元扣留了，执法队的枪也被缴了。

原来，不知什么人走漏了风声，说谢子长来到靖远。消息传到王子元耳中，王子元产生了怀疑。谢子长和自己是很熟悉的，为什么不来看我？只见张东皎到处奔走，一定是干什么秘密活动。他立即下令扣留张东皎，搜查司令部。

这一异常行动引起谢子长的震动。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王子元将采取什么行动？思来想去，他觉得起义必须提前到当晚进行，如果迟延了，可能一个兵也带不出去。他的想法完全符合当时实际。在缴执法队的枪时，敌人把石子建的笔记本抄去了，上面记有兵变计划，王子元已掌握了将要发生兵变的情况。

黄昏时分，谢子长、焦维炽由石子建带路，溜出城东门，住在小店里等候。晚上，二营营长吕振华、五连连长曹炳奎以及张秀山等同志把部队带出来，天亮到了打拉池，宣布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可是，因当晚失掉联络，谢子长和焦维炽没有赶到，只好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

听到起义的消息，敌人派骑兵追了上来。起义部队边打边退，最后被敌骑兵包围。起义部队遂分为两队，一队

去定西，一队去静宁，坚持了一个多月，由于众寡悬殊失败了。

随后，谢子长到了兰州。不久，张东皎在靖远被释放后也来到兰州。碰巧，王子元派机枪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取枪支、子弹、军衣及现款。谢子长和张东皎便去做工作，要杜参加红军。杜鸿范虽不是共产党员，听了谢子长的话，决定和红军一起干。他把领到的枪、子弹及军装都装上船顺黄河而下，到河口上岸，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八支队。

谢子长离开陕甘游击队后，陕西省委就派人到部队推行左倾政策。正在这时，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省委代表强令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村，使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这危难时期，省委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把谢子长请回来担任总指挥。

九月十二日，敌人分三路进行“围剿”，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歼灭于照金地区。情况十分严重，谢子长与刘志丹商定，避实就虚，以退为进。经一夜急行军，于次日绕道到照金镇北山，居高临下，袭击进入照金之敌，在大雾中激战了一个半小时，全歼耀县民团，俘虏了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胡三、副总指挥党谢芳及耀县民团头子柴子发。三天后，又布置了安子洼战斗，击溃了来犯的军阀贺高侯部。红军游击队在照金地区共歼敌四百余人，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剿”，扭转了困难处境，大大鼓舞

了部队和群众的斗志。

九月中旬，红军游击队在敌优势兵力追击下屡战失利。十月上旬，游击队撤至人烟稀少的合水平正川、瓦子川一带。这里条件艰苦，部队住在梢山的破窑洞里，没有粮食，没有棉被，衣服褴褛，一些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谢子长鼓励大家说："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谢子长和刘志丹一起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甘肃一带活动；阎红彦、杨仲远率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带三十多个老战士和一些伤病员继续活动在平定川、瓦子川一带。他们缺吃少穿，无医无药，极为困难。谢子长一面积极做思想工作，一面与同志们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放哨…… 他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鼓舞着大家战胜困难，坚持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兵活动，游击队得到发展，物质条件也有了改善，不仅自己渡过了难关，还把一部分款项支援了中共北方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陕甘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会合了，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红军南下淳化照金地区，准备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正当部队南下时，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极力推行左倾政策。他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诬

蔑谢子长、刘志丹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土匪路线”，并擅自决定开除谢子长党籍，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受训”。谢子长从革命利益考虑，一再要求将刘志丹留在红军中工作。杜衡不得已才将刘志丹降职使用。在左倾政策之下，红军南下终南山，一九三三年六月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被打散。杜衡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在群众协助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地区。

四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谢子长夜行到绥德县白家川的无定河渡口，刚一见到前来迎接他的同志，就急切地问起当地的斗争情况。

谢子长回陕前，安定县原有一个红军九支队，十几个人。一九三三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队长强世清回到家乡强家湾，打死安定县长，夺枪闹革命，以九支队一部分为基础，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一游击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接着，一支队在强世清领导下，南下照金，回到红二十六军驻地。一个多月后，一支队返回安定，白天分散隐蔽在群众之中，晚上把队伍集合起来打土豪，扰民团，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不久，这支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

一支队的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惧，他们调兵遣将，围攻"清剿"。在枣树坪战斗中，支队长强世清负重伤被俘。为避开敌人"清剿"，一支队分散活动。不料，有的人被敌人抓住后熬不住拷打，叛变了。敌人枪杀了强世清等同志，一支队基本上垮了，安定地区的武装斗争转向低潮。

听了介绍，谢子长坚定地说，一次二次不行，就搞它三次四次；文的不行，就搞武的。当时，大雪纷飞，他顾不得这许多了，冒着大雪向安定走去，决心把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连在一起，建成一块大的根据地。

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加上敌人重兵压境，又实行了连环铺保，谁家来了人都要向保长登记。在白色恐怖下，谢子长不能到村里住，白天钻到山沟里，晚上回村找可靠的老乡吃一口饭。他把一支队幸存的五个同志找到一起，在刘家圪塄宣布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谢子长亲自给大家讲政治，讲军事，讲历史。他说，"陕北历来就有革命传统。米脂的李自成，安塞的高迎祥，延安的张献忠，都是群众领袖。我们也要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他还介绍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情况，要大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刘志丹听到一支队恢复的消息，派人送来二百块大洋，帮助支队渡过难关。随后，一支队在谢子长领导下，采取夜战、奇袭等办法，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一天，群众送信说，胡家抓沟来了个伪乡长姬占富，收粮要款，打骂群众。

谢子长果断地决定处决他。战士们很快抓来姬占富，把这家伙在山沟里杀了。一下子，群众的热情象干柴燃火一样烧起来，一支队很快发展到三四十人。不久，又和庆阳游击队会合，力量更大了。

姚则峁河村在游击区内，村里有个地主贾生金，十分反动。为了对付红军，他请来反动军队张建南营在村里修筑碉堡，建立反革命据点。谢子长知道消息后说："不能让敌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先抓贾生金!"

六月二十五日，谢子长亲自带领部队到姚则峁河。张建南听到风声也领上营部和一排兵力来到姚则峁河。天亮时，红军从东边进了村子，先头的几个战士迅速进到贾生金的院子。此时，张建南从村西窜来，直进贾生金院，和刚进院的红军接上了火。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但敌人毕竟是草包，被红军用手榴弹轰出村外。狡猾的张建南抢先占了西山制高点，几个红军战士攻了几次都未攻上去。

在这关键时刻，谢子长亲自带领第二突击队冲了上来。他喊道："一支队主攻，庆阳游击队掩护!"他挥着驳壳枪冲上去又大喊道："拿下这个山头就是胜利!"红军战士跟着谢子长冲上去了。敌人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人，狼狈退却，红军占领了西山。

这是一支队恢复后的第一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整排，缴枪二十多支，俘虏六人。四月八日，红军在柏山寺和群众一起召开祝捷会。群众听说红军打了胜仗，便将猪呀，

羊呀送给红军，慰劳子弟兵。红军立即开展扩红和建立政权活动。不久，红军便发展到二三百人。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七月，在安定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在谢子长指挥下，游击队连连取胜。仅在安定地区就成立了不公开的赤源、秀延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形势非常好。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安定城守敌张建南、李丕成狗急跳墙，大肆搜捕革命群众，并杀害了近百人。广大人民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噙着眼泪，要求红军打安定，救亲人。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谢子长决定攻打安定县城。

参加这次战斗的共有一、二、五三个支队和五百多名赤卫军。谢子长亲自作战前动员，他说："打安定城的主要目的是营救狱中的同志，要不怕牺牲，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第一次攻城，到虎口救人，不能轻敌，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他命令谢绍安、刘明山的第一支队负责劫狱；贺晋年的第二支队负责掩护；李胜堂的第五支队把敌人火力引向城东。各支队都做了充分准备。

安定城，是国民党安定县政府所在地。该城石头垒墙，背靠南山，三面临川。七月十五日夜，部队从东沟门一带整装出发，午夜一时左右到达安定城。红军摸到城根前，登云梯爬上城墙，一排子枪打跑了炮楼上的敌人。谢子长站

在炮楼上指挥战斗。这时，李胜堂支队在东门也打响了，他把敌人引向东城。贺晋年支队分三路，一路打山上炮楼的民团，控制制高点；一路冲进衙门；一路掩护。谢绍安、刘明山的支队摸到监狱后，打开铁锁，大喊："我们是红军，老谢领人救你们来了！"里外配合，开监砸锁，然后一起撤到山上。这场战斗因在黑夜进行，敌人摸不清虚实，再加上守敌张建南在姚则峁河刚失利，余悸未息，没敢进行反击。天亮，狱中二百多名战友和群众全部转移走了。这是陕北红军战争史上的又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陕北人民，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红军的发展，使陕北军阀井岳秀惊慌万状，派遣重兵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为了粉碎"围剿"，根据陕北特委指示，谢子长率部南下，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二十八日，召开了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各支队干部会议，清算了高岗的错误，撤了高岗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四十二师政委，并决定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的"围剿"。这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胜利和希望。

谢子长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根据地就获得大发展，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部队走一路，群众欢迎一路，到处张贴着

“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谢青天!”的红绿标语。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爱戴之情，群众还编了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
“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
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
欢迎歇几天。

一九三四年夏，国民党西北军阀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八月十五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回到安定地区。部队侦察员回来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井岳秀增派八十六师姜梅生团到横山县石湾镇驻防。姜梅生派他的二营六连到安定县景武家塌一带寻找红军作战。谢子长根据井冈山游击战的经验，决定抓住这个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深入根据地内部的孤立之敌。他召集红三团和一、二、五支队的领导研究战斗部署，决定由王世泰带红三团担任主攻，贺晋年带各支队助攻。

景武家塌离石湾二十里，住有十多户人家。周围有五座山，名大郎山、二郎山、三郎山、四郎山、五郎山，村庄就在二郎山和三郎山之间北大沟的半山上。

十七日深夜，红军和游击队从孙家河等地出发进入阵地。谢子长带陕北红军游击队占领二郎山，把守北大口，切断敌人向石湾方向逃跑的后路，阻击石湾来增援的敌军。王世泰带领红三团占领村庄脑畔山，扼守敌人南逃的路。赤卫军、地方干部和部分红军战士分别占领其余山头。此时，敌人还蒙在鼓里，根本没想到红军已经把他们装进铁桶。事后，群众说："好汉访英雄，大将访地名，大山都叫红军占了，肯定打胜仗！"

战斗打响后，贺晋年带领谢绍安、李胜堂、刘明山等十余人组成的突击队先摸进村庄，与敌接火。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敌连长喊破嗓子叫："不能下沟，往山上冲！"霎时，双方展开激战，敌人拼命向上冲，妄图攻占制高点，红三团战士用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敌连长又纠集士兵向北突围，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又冲了过来阻击。谢子长抓住战机，命令号手吹号，全军发起总攻。突击队冲进村庄，击毙敌连长。几座山上的红军战士和赤卫军猛虎般地冲了下来，敌人腹背受敌，左右挨打，象受惊的鸭子败退到南大沟。这里，正是红军预计歼敌的地方。红军猛冲猛打，南北夹击，敌人无一漏网。这一仗，红军缴长短枪一百多支，除毙伤之外还生俘敌八十多人。

景武家塌的胜利，使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许多村庄都"红"起来。有的村庄，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党

的组织公开了，安定县八个区除几个点外，大部分成了革命根据地。

在玉家湾稍加休整后，谢子长率队连夜向清涧前进，寻机歼敌。八月二十三日在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二十六日，又夜袭清涧河口镇。

河口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村庄周围设有工事，高山顶上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红军攻了几次，都未攻下。天亮了，还没能攻下，谢子长焦急万分。谢子长亲自带队攻击。碉堡里的敌军看到红军又发起冲锋，雨点般的子弹扫了过来，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过谢子长胸部，他不顾伤痛，继续坚持指挥，终于重创了敌人这个连。

农历九月，在崖窑沟以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谢子长亲自给红一团授了旗。这时，敌团长高玉亭带一个营在白庙岔骚扰，谢子长带红一团和红三团去袭击。在董家沟山上与敌遭遇，激战几个小时，杀退了敌人。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规模“围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谢子长决定二打安定城。

当时，安定城里有四大民团，最可恶的是大团总李丕成、二团总李丕盛，这兄弟俩是国民党驻军张建南的两条恶狼。他俩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群众，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谢子长决心除掉这两个人。事先把派进民团的地下党

员白应奎、刘光汉找来，交代了任务。九月十五日夜，谢绍安带保卫队直接来到城门，和刘光汉接头。刘明山带一支队直插后城，顶住张建南，掩护谢绍安。李胜堂的部队准备打援。刘光汉把城门打开后，部队进入城内，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巧的是，那夜李丕盛有点反常，一会抽烟，一会查哨，好象发现了什么，在院子里乱转。谢绍安冲上城门楼时，被李丕盛看见了，李丕盛拔腿逃跑了。谢绍安一个箭步跨进李丕成房内，把李丕成一枪打死，二十多个民团队员全部投诚。张建南听见前城枪响冲出来支援，被红军打了回去。

打死李丕成的消息传开后，广大群众异口同声地说："谢青天又给人民除了一个大害。"不久，张建南和四大绅士逃到瓦窑堡，四大民团也先后被消灭。谢子长幽默地说："无论是四大民团，还是四大绅士，都是一百二十斤重的肥猪，迟早离不开屠家的手。"

十月，在谢子长领导下，又以清涧二支队编为红二团，绥德、吴堡的游击队编为红三团。十一月份，在这三个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十二月份，谢子长直接组织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公开的苏维埃政权——赤源县苏维埃政府。

后来，因缺医少药和战斗频繁，谢子长已发炎的伤口日益恶化。他实在不能随部队行动了，党组织只得决定他

离队休养。由于敌人到处搜捕他，同志们今天把他抬到这里，明天抬到那里。当他转移到安塞韩家湾村时，敌人距他只有十多里。由于大队红军离得远，保卫队的同志十分担心谢子长的安全。他对同志们说："你们抬我走吧，万一走不出去时，就把我一枪打死。绝不能让敌人把我活捉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的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选举谢子长为军委会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选举时，有的同志考虑到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由刘志丹当主席。刘志丹坚决地说："老谢是老大哥，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应当选他当主席。"

不幸的是，谢子长的伤口严重恶化。他住在灯盏湾。看望他的群众和干部站满院子，住满了村子。警卫人员怕影响谢子长休息，动员他们走，但男女老少流着泪，谁也不愿离开，都要最后见一面谢青天。在大雪纷飞的一天，刘志丹又一次来看望他。当刘志丹带着药品和食品走进他的窑洞时，泪水禁不住簌簌而下。谢子长听见刘志丹又来了，强挺了挺身子，用手示意志丹上炕来坐。他看到志丹满脸热泪，自己也不由地淌下泪水。在场的人都泣不成声。刘志丹忍住悲痛，要看护把药拿来，亲自把药贴在子长的伤口上。用手摸了摸他盖的那块又薄又小的棉被，关切地

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在这种时候，谢子长仍然想着战士。他说:“土窑洞冬暖夏凉，我不觉得冷。战士们行军打仗连窑洞也住不上。我被子坏点没关系，等战士们都有了盖的我再换。”他们就两支兄弟部队的统一指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谢子长对刘志丹亲切地说:“现在陕北和陕甘连在一起，革命力量就更大了。我和你们一起干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和同志们身上了。”刘志丹安慰他:“买药的人快回来了，伤病是会治好的!”谢子长又说:“不必为我东买西买了，党和人民都很困难，我怕不行了。”饭后，刘志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短暂、战斗的一生，享年三十八岁。谢子长把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连他在内，他家里有九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有五人是共产党员。谢子长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崇高品质，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纪念谢子长，一九三五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一九三九年毛泽东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墓撰写了碑文。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

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彭真等也题了词。谢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称颂。

(师银笙)



董　振　堂



董　　振　　堂

一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人，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董俊青，以种田为业。董振堂兄弟三人，兄升堂，弟庆堂。父亲很希望三个孩子都能读书成才，因家庭经济力量不足，只能让长子升堂去念私塾，次子振堂三子庆堂在家劳动。

董振堂幼年，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他目睹侵略者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比愤恨。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在离李家庄五里的毕家庄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发展教徒。有些教徒依仗着洋人的势力，鱼肉百姓，欺压同胞。为了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教会势力的欺侮，他立志读书救国。董振堂向父亲苦苦央求道："让我念书去吧！我要好好念书，学了本事，让洋人、洋奴不敢再欺侮我们！"十三岁那年，他进了邻近的曹庄初级小学。

在学堂，董振堂年龄较大，穿的又是粗布衣服，常受

富家子弟嘲笑。这使他更加奋发学习。买不起笔墨纸张，他就用麻刷子蘸水，在墙上练字。没有油灯，他就背靠窗子，借黄昏时天空中微弱的光线读书。十九岁那年，董振堂以优秀成绩考入冀县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董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苑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六个月后，又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炮兵营当新兵。一九二一年暑假后，董振堂进入保定军官学校，被分到第九期炮科。一九二三年春，在董振堂毕业前夕，有个同学代直系军阀吴佩孚邀董振堂到洛阳工作。他同哥哥升堂商量后，拒绝了邀请。毕业后，他与何基沣等同学被分配到北京政府陆军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但待遇很低，许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用人取才重实际，就专门要求到陆军第十一师去。

到十一师后，董振堂、何基沣和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被选派到师部参谋处工作。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四人接受了南苑绘制地图的任务。当时，军队中军阀制度盛行。当他们冒着酷暑绘图到一个月的时候，上司前来检查，不满意，把这里的参谋、教官和见习军官约一百多人，召集到大军帐前训话，并拉出了两个参谋，每人痛打四十军棍。站在旁边的军官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吭声。

事情发生后，一些见习军官，不到一个星期就逃跑了一半。四个绘图的人，除董振堂外，其他三人都想离开这个部队。董振堂在四人中年龄最大，三人都称他“绍仲兄”。他象一个忠厚的长者，关切地为他们备水备饭，问饥问渴。一天工间休息的时候，趁其他人不在时，何基沣把自己想逃走，去投奔一支能够救中国的军队的打算告诉了振堂。董振堂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走到哪里都一样。赤手空拳，怎么能救中国。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锻炼身心，互相勉励，不怕任何困难，先在这里干几年，等我们掌握了实力，有了机会，就可以救中国。何基沣接受了他的劝阻，打消了逃走的念头。

两个月的绘图，很快结束了，他们又面临着去向问题。保定军官学校分到冯部的见习官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董振堂主动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当时，名义上规定排长每人每月发二两半银子薪饷，因冯玉祥的部队没有兵饷来源，实际上每月都发不了。董振堂同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小时以上，还要参加修路、种树等许多杂务劳动。这样的生活，使许多下级军官忍受不了，而他却硬是坚持了下来。出操、演习、抬土、挑砖，凡学兵做的事，他都做；上讲堂、做示范，一些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做。学兵们公认，董振堂最大的特点是：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关心士兵。董振堂一贯艰苦朴素，和战士同甘

共苦，因此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拥护。

一天，他正在同战士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他有吃苦耐劳精神，非常赞赏。有一次，炮兵到野外演习。演习结束后，冯玉祥叫董振堂对大家讲评。董振堂就按照现场的地形、时间和“敌情”状况，清晰明了地讲了一番。冯玉祥听后非常高兴，以后对他更器重了，将他提升为炮兵连连长。

二

一九二四年十月，董振堂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随后，冯玉祥将部队编为国民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奉军在津南作战。陆炮营埋伏在马厂迤北铁路西侧，集中炮火，击毁了奉军的装甲列车。之后，董振堂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

一九二六年八月，冯玉祥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一起由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在绥远省五原县举行易旗誓师大会，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又称西北军），冯玉祥任联军总司令。论功行赏，冯玉祥将董振堂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接着，董振堂随冯玉祥西征，经包头、银川等地，到西安，打退了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部队。事后，董振堂率部驻西安南关一带，

进行整顿补充，准备攻打吴佩孚。

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作战，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左、右两路出荆紫关和潼关。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率下，东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途经河南淅川县和鄂西老河口及襄阳、樊城等地，一举击溃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并包围该军于邓县。经过几天激战，孙部攻城失利，敌军于学忠部全面向孙部展开进攻。为使全军得以安全撤退，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到互亭镇一带布防掩护。他接受任务后，将主力埋伏在互亭镇附近，并将自动火器集中使用，阻击敌人。待敌人接近时，他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以主力从两翼夹攻，敌军大败。他乘胜率部追击，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炮，使于学忠等部不敢再犯，孙连仲部得以安全转移到淅川去休整。

左、右两路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为支援孙连仲部，曾派方振武部出河南南阳。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此时，吴部军心涣散，于学忠和张联升等部已进退失据，彷徨无主。董振堂亲率一旅，从内乡、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勇猛插入敌军心脏地区，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樊城西面的竹莜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他的警卫旅。吴佩孚侥幸逃脱。此后，于学忠也逃走，他的部队被改编。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这年冬，在河南北部，奉军孙殿英部和白俄骑兵大队占据着卫辉城，董振堂奉命率部进攻。在激烈的攻城战中，他身先士卒，冒着弹雨，受伤不退，裹伤再战，最后攻克了卫辉城，全歼守敌。

一九二八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奉军在韩岭山、安阳、林县一带展开大战。奉军依靠飞机、大炮的掩护，向国民革命军猖狂进攻。国民革命军奋勇抵抗。这次大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结果击溃奉军，完成北伐使命。

同年六月，董振堂带领部队由河北向河南移防。部队先到新乡，后又进驻开封和洛阳。在洛阳，董振堂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洛阳地区，当时是土匪聚集的地方，素称"难治"之地。军阀的散兵游勇，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为害乡里，骚扰地方治安。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置，使之明是非、辨善恶、权轻重、度利害，自觉改过从善，不再为非作歹，只对那些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才派兵剿除。他这样做了以后，地方治安有所改善。

一九二九年夏，反复无常的韩复榘、石友三叛冯，冯部撤到潼关以西。这年正值陕、甘大旱，粮食供应十分困难。陇海铁路只能通车到河南灵宝，运输十分不便。为了避免因陕西受灾而造成军队缺粮的困难，冯玉祥下令所有西进部队都要多带面粉。许多部队的官兵，怕行动时负担过重，没有认真执行这一命令。当时，董振堂任第五师师

长，他真诚地服从命令，把所有的乘马全部用来驮军粮，而且他也象士兵一样，背一袋面粉，徒步行军。因此，进潼关后，董振堂的第五师，军粮充足，避免了与饥民争粮的惨剧，赢得了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当时，陕甘一带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扩大地盘的好时机，不但不设法救济灾民，反而严禁米粮西进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第二集团军。一九三〇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出兵讨伐蒋介石。董振堂率领第五师东出潼关，参加讨蒋的豫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冒雨驰援皖北亳州，经七昼夜激战，击退强敌，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冯部失败，冯玉祥转进晋南。董振堂所部退守黄河北岸新乡一带，因被孙连仲监视很严，未能率部追随冯玉祥。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队伍调往山东济宁地区，然后把原第二集团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董振堂原来所在的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任旅长。

三

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出于“调虎离山，消除异己”的

险恶用心，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同红军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以实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已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衮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了，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由于这个团把交通堵死，弄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先以原国民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继之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了数日，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把董振堂恨在心上。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编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通过其他的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堂心里十分清楚。他认为决不能依靠蒋介石。他曾派人到山西同冯玉祥联系。但冯玉祥感到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出路何在？董振堂一直在沉思着这个问题。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孤城宁都。在宁都，许多官兵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疾病，加上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几个月内就死亡几千人。有些军官，为了吃“空名”，贪污兵饷，还没等伤病士兵死去，就用破席裹了去埋，其凄惨景象，目不忍睹。

宁都周围的红军，在军事上严重打击了二十六路军，政治上则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号召他们倒戈。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对红军的主张产生共鸣，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但也有一些官兵由于对红军了解不够，倒戈的决心还不大，他们心情苦闷，只希望快点返回北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亡，华北危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处在内战前线的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本，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而战。他们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用电报请示蒋介石，一面下令全军北上。但蒋介石却继续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不可轻言抵抗”的老调，顽固地推行其反共内战政策，不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六十多里到达湖岭嘴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病去了。内战外患，促使二十六路军爱国官兵义愤填膺，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

二十六路军，原来是冯玉祥的旧部，受过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的影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先后被“礼送”走了，但党的影响在这个部队仍然存在。董振堂在大革命时期，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他觉得象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人，都是做人的楷模，却被逐出国民军。他怀念这些人，曾想

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下落，但毫无音讯。这年五月，参谋刘振亚（共产党员）请假回家，董振堂又托他到上海打听刘伯坚等，但也没有消息。正在这时，二十六路军的南昌留守处被蒋介石抄了！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不肯南下江西进“剿”红军的报复。

处于绝密状态的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始终没有停止过活动，积极开展着工作，及时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了共产党。但董振堂并不知道。

赵博生与董振堂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通过赵博生这个渠道，传给了董振堂。

董振堂看到东北和华北的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腐败，在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他及时给河北老家亲属写信，告诉家中，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到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当时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家里收到这封信，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宁都暴动的消息，才明白董振堂写那封信的用意。董振堂预料到起义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其亲属，所以才写了这封信。

在准备起义的日子里，组织工作十分周密。董振堂将七十三旅旅部搬到七十四旅旅部的东边，以便与赵博生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起研究问题。为不引人注目，他们

经常利用相互借阅书籍和打猎的机会，进行密谈，并决定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让部队出操、上课，积极做好起义部队的各项工作。

董振堂住在宁都城衙门东侧的一幢房子里，准备起义的同志曾几次在这里讨论起义的事。他们一起研究七十三旅连以上军官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可靠程度，对一些思想有动摇的军官，董振堂亲自找他们谈话。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董振堂在宁都城东南的山坡上，召集一部分下属军官开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跟我董振堂多年，河南大战八个月，我们的血汗都流在一起，我们幸好没有死，要是死了，那才冤枉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打仗为了谁？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打过败仗。咱们西北军的失败，是没有钱，没有粮，没有弹药供应，被人出卖了！我也跟大家一样，被人出卖了。蒋介石把我们调来江西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日本？日本鬼子侵占了咱们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红军和我们既无冤，又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也是工人农民。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咱们跟红军联合起来，弟兄们赞成不赞成？我决不会领着弟兄们去跳火坑。假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弟兄们，请相信我董振堂吧！"董振堂平日不多说话，不善言辞，但此时此刻，他竟讲得如此诚挚感人，几乎使所有的军官都点头称是，愿意跟他走。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臻成熟。正在这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在回上海途中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搞去了。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内有中共活动的情况后，立即指令南昌行营拍出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的“手令”，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因总指挥孙连仲在上海治牙病未归，“急电”和“手令”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工作的赵博生手里。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党组织研究了这个突然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

十四日黄昏，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部队开始行动，宁都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七十三旅旅部周围，警卫排荷枪实弹。旅部里边，董振堂召开紧急会议。他简短明了地命令：“今晚要行动，到红军那边去！学兵连要把北门和东门把好，警卫连加强巡逻。李青云到学兵连去！郭参谋到特务连去！……”听了旅长果断的命令，大家立刻分头行动。在细雨蒙蒙的暮色中，旅部贴出新标语：“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接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是预先约定的全城行动信号。各支起义部队听到这

振奋人心的枪声，立即行动起来：

董振堂的好友、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掌握八十旅。

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五旅。

董振堂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意外的事变。

……

宁都城里，国民党的官僚和太太小姐们，三五成群地被押进学兵连连部。多数地方的行动都在顺利进行，唯有两处遇到了顽抗。一处是二十五师师部。起义部队前去捉拿这个师的师长李松昆时，其警卫人员进行反抗，李松昆越墙逃走。事后得知，他逃到城北四十里的砍柴岗，把驻防在那里的一个团带走了。再一处是二十五师电台。起义部队去夺取时，遭到顽固抵抗。董振堂闻讯，前往策应指挥。十几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

回到旅部后，董振堂连夜用电话、信件和派人等各种方法号召大家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

十五日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胜利。一队一队的起义部队不断地向高塔走来。董振堂站在高处，大声向自己所领导的部队宣布：

"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不受国民党的气了！""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到红军那边去！"

说着，他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从身上撕下来，又把国民党的一面青天白日旗当众撕碎，扔到一边。队伍中立刻响起震天动地的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

接着，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向中央根据地进发！部队的前锋是董振堂率领的七十三旅。

宁都起义的广大官兵，发扬高度的正义的、民主的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毅然弃暗投明，加入了伟大革命斗争的行列。

四

宁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人民。它对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起义后，起义军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这份长达三千多字的宣言，表示了原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在宁都起义后"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的决心；控诉了国民党军阀的沉重压迫；热切地号召一切白军官兵"掉转

枪口”，“站到苏维埃这边来”！

十六日上午，前来迎接起义部队的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了委任状，董振堂为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后来，部队开到石城县的秋溪、龙岗一带进行整编。十三军驻龙岗。

十二月下旬，十三军军部的党组织召开支部会。会上，支部书记李青云首先报告了宁都起义的经过。然后一致讨论通过了董振堂的入党问题。

在部队进行整编和政治教育过程中，董振堂虚心向红军干部学习，并经常深入连队进行检查。他最关心部队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常去警卫部队检查询问："干部有没有打骂战士的？""有没有打骂老百姓的？""有没有拿老百姓东西的？"查询之后，他就教育干部注意向从老红军中来的政治干部学习。为了使十三军成为红五军团的先进典型，并将十四、十五军带起来，中央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并嘱咐何长工，到十三军后，抓紧研究批复董振堂的入党问题。何长工到十三军后，董振堂非常尊重他。每逢何长工下去检查工作或开干部会，董振堂总是让政委先讲。何长工觉得，董振堂虽然出身于旧军人，但本质纯正，很有上进心。因此，两人关系融洽，相处很好。十三军改造得很快，各项工作都走在十四、十五军的前面。十四、十五军经常派人到十三军“取经”，董振堂毫无保留地

把改造十三军的经验告诉他们。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经常带着十三军各级干部到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亲自接见他们，并同他们亲切谈话。到红一军团参观之后，他亲自撰写了《模范的红五团》一文，介绍老红军的情况。回到十三军，他就学着老红军的样子做，经常言传身教，培养自己的下级。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如果董军长的棉衣穿上了，就说明部队的棉衣都穿齐了；如果董军长的棉衣还没有穿上，那就说明部队还有人未穿上棉衣。"要带兵，首先要爱兵。"这是董振堂的一贯思想。他当了红军将领后，对战士更是视如手足。凡是与他相处过的同志，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全都被他的爱兵精神所感动。

经过不长时间的教育、整顿和改造，红五军团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同兄弟部队一起投入革命战争，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一九三二年春，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中央军委交给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里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临危受命"，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红五军团开上去，顶住了前来救援的敌主力陈诚的十一师，掩护红三军团安全撤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内，董振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决心跟党走的。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对董振堂的过去是了解的，即使在旧军队中，董振堂也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军官。从宁都起义开始，董振堂的一系列表现，他看在眼里，完全同意尽快批准董振堂入党。

一九三二年四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董振堂入党。董振堂入党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使他想了好多。他认为，入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人民，为党工作一生，战斗一生，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时间不久，他就把自己在旧军队中积蓄起来的钱，全部交给了党。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说：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不久，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指挥东路军（一、五军团）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此役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的大部。这一胜利，使红军筹到大量物资和现款，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漳州战役后，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怕红军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地盘，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二十个团的兵力，从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据地扑来。一九三二年六月底，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粤敌。此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这一次，他带领五军团开到前线后，首先命令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

下属各级干部了解敌情，汇报敌情。他听完汇报之后，又找老百姓座谈，询问敌军是从哪里来的，带了什么武器等。董振堂指挥作战的特点是细致、果断、勇敢。经过周密调查之后，他才部署了这次作战。七月八日，他率领红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与敌接战，打成对峙，敌进入水口圩固守待援。九日，余汉谋以两个师又一个旅向水口圩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与敌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后，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同敌人拼杀。霎时间，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满山遍野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董振堂带着警卫员，到了离敌人只有六七十米的地方，红军战士顿时士气大振，一个个更加勇猛，敌人抵挡一阵后，溃退下去。红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敌人伤亡三千多人，陈尸遍地。这一战，充分表现了红五军团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八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乐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因指挥作战有功，十二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董振堂荣获红旗勋章。

一九三三年春，他又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胜利归来，声威大震。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建设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任后卫，掩护全军安全转移。但左倾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不仅携带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象大搬家似地向西突围。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设下了三道封锁线。红五军团在后面，被敌人紧紧咬住屁股，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也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部队急剧减员。通过湘江封锁线时，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合围的敌人封锁在江那边，损失惨重。董振堂非常沉痛。

部队进入贵州后，敌人仍尾追不放。一次在大山丛中，红五军团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截断了去路，后面又遭到优势敌人的追击，加上弹药缺乏，几次冲杀都未能奏效。董振堂遂令大刀队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又命令一部分持枪的战士在山顶故意暴露，装作停止战斗的模样。敌人发现后，一窝蜂地向山上冲。待敌人冲到山腰时，董振堂一声令下，顿时手榴弹一颗颗向敌群飞去，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董

振堂乘势率大刀队出击，猛冲猛杀十多里，变被动为主动，胜利地掩护了主力西进。从此，被打怕了的敌人再也不敢紧紧地尾追红五军团了，而总是与其后卫部队相隔一二日的行程。

十二月下旬，部队到达贵州黄平县。中央军委决定在这里休息三天，进行整编。董振堂十分兴奋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大家。经过整编，撤销了师一级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将八军团与五军团合编，把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有一百五六十人，加强了战斗力。

一九三五年元月，前面的部队攻下了遵义，红五军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部队还没有完全布防好，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就接到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通知。因为董振堂要布防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李卓然先走了一步。后来，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未能参加这次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胜利地纠正了左倾的军事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二月，红军二渡赤水，红一、三军团重占了娄山关和遵义，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红五军团在后面牵制敌人，一个团曾成功地牵制敌人九个团达七天七夜。

红军在绞平渡强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北渡。石板河背

靠一座上六十里下五十里的大山，山那边就是波浪翻滚的金沙江。董振堂看过地形，要求各级指挥员分置兵力，占领各个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如有可能，还要在夜间出击，骚扰敌人。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每个山头上都配置了一二十人。这样，既有效地减弱了敌人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争取到一定时间后，分散在各山头上的战斗部队再分别后撤一段距离。敌人在红五军团的节节抗击下，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

战斗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形势逼人。这时，中央军委又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面对这严重的形势，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董振堂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的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河！"会后，战士们听到传达，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不要说九天九夜，就是十天十夜我们也坚决守住！"

敌人又开始向前沿阵地打炮了。董振堂指挥战士们躲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指战员一起跑到山头，进入工事，阻击冲锋的敌人。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

宣告破产!

红五军团随大军北上后，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一带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掩护兄弟部队休整，红五军团的一支部队不顾艰难险阻，曾三次翻越高入云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会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认为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抗日。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竭力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向西向南退却，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并将两个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五军团编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毛儿盖会议后，红五军团军团部在一家藏民的房子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董振堂强调：要认真贯彻毛儿盖会议精神，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长处，都值得我们虚心学习。他还询问了部队训练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过草地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左路军过草地时，红五军团变为左路军的前卫。当他们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要他们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他们回到阿坝后，张国焘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攻击北上抗日是无止境的逃跑，是机会主义。会后，

他又煽动红四方面军中少数人，对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横加欺辱。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将下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实事求是地写成报告，要求总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军团联合调查纠正。朱德当场表示同意，但张国焘却拒不采纳，并把红五军团军团部还控制着的一部电台的密码没收。从此，红五军团便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这期间，董振堂经常告诫红五军团的同志们，要大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坚持原则，但在兄弟部队之间，要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决不能辜负党的希望！""只要同志们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是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红五军团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后，被留在丹巴县担任警戒，以对付康定方面的敌人。

张国焘为了加强对红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红五军团的所谓"改造"，想方设法将其亲信安插进红五军团。董振堂对张国焘的这些阴谋，是有觉察的，并进行了抵制。

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

同年六月，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来到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增强了。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持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加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迫使张

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红二、四方面军各部陆续北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又踏上了长征的艰难历程。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红五军团指战员历尽艰辛，三次通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出腊子口，到了悬窝，先头部队准备了大批的炒面、土豆，他们终于吃上了两个月来的第一次饱饭。

十月八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此时，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他不断鼓励全军将士用实际行动庆祝主力红军的会师！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作战勇敢，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出色地完成了全军的后卫任务。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六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十一月十一日，过河部队正式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适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军委主

席团的指示，突破黄河天险，深入敌军腹地，鏖战河西。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十二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他对干部们说：“培养一个骑兵战士不容易啊！战士从中央苏区出来，跑了这么多路，一定要好好爱护，不要摔坏，要慢慢来。”他又对参加训练的骑兵说：“骑上马后，开始不要跑，要先慢慢地走圈，马要拉屎、尿尿，人也要在马上适应一下。”他还对部队说：“今后遇上敌人骑兵要认真对付。敌人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同志们听着董军长的讲述，感到很惊奇，想不到军长还有这么好的骑兵素养！

从山丹出发时，董振堂和骑兵团一起行军。他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前面，骑兵团在后面。开始，他不上马，牵马步行。走了五六里路，他把马肚带紧了一下，然后上马。大家也学着他的样子，上马了。马踏着碎步，走了十来里路，出汗了，他又下马步行起来。他告诉大家说：“这样可以保护马的战斗力。”

十二月七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组成。董振堂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

一九三六年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皇而逃。部队休息几小时后，他又率领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三千多人，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一举攻占了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高台守敌，除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而逃外，民团一千余人全部被俘，各种武器弹药都被缴获，反动县长和县政府的所有官吏均被生擒。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在县城文庙广场上召开了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了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董振堂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会后，分了卢怀植的当铺，并打开卢等的粮仓给群众分粮。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马步芳！”“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标语。紧接着，红军又帮助人民群众组织抗日人民政府，成立贫协委员会。与此同时，红军还积极组织当地青壮年成立抗日义勇军，将愿意接受改编的民团编入红军。

河西一带是敌马步芳的地盘。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

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两万多人包围高台，切断了红五军与临泽县城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张掖县）的红军主力，企图消灭红五军。

当时，敌人占据着大片地区，有后方，有补充，西路军则没有根据地，群众基础差，无后方，无补充，人员伤亡一个就少一个，子弹消耗一发就少一发，种种条件对西路军非常不利。狡猾的敌人，立即抓住西路军这个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集中主力猛攻高台。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冰，使城墙加宽加高。城内所有的铁匠，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董振堂还把城内分成若干防区，分别派兵固守。

一九三七年元月五日，敌人开始向城内射击，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

从元月十二日起，敌人调集八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猛攻。先是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挥舞马刀，向城墙拥来。守城的红军战士们同敌人在缺口上拼刺刀，反复冲杀，直到将敌人打退。象这样的冲杀，一天要有许多次。一到夜间，红军战士就忙着修补缺口，以利明天再战。

高台城墙实为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两丈，顶上又窄，很难组织火力。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了很大

的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和机关人员都上了城头，没有子弹，就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杀，有的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咬，还有许多负了伤的同志，抱住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准备在必要时组织力量突围。但就在这时接到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高台。于是，董振堂立即在东城的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此时此刻，董振堂语气沉重，但态度严肃而又坚定。会后，大家立刻回去作了最后的动员，要求战士们死守高台。

元月十八日，敌人将西关的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

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多数已血洒疆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象锯齿似的残破不堪。

十九日上午，形势危急。在孤军无援，粮弹奇缺的不利条件下，英勇的红军战士与敌人反复血战。董振堂带领五十多个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他的声音威严而坚定，坚毅的脸上，滚动着泪珠，其

他同志也都热泪盈眶。此时此刻，他们都已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元月二十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被收编的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机打开城门，敌人象疯狗一样拥进城内。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敌人围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完，壮烈殉职。

红五军主力三千多人，除极少数同志逃出虎口外，全部英勇牺牲。

高台战斗是西路军浴血苦斗中一次有名的战斗。它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马家军”的兵力，对支援西路军主力部队作战起了积极而有力的策应作用。

董振堂牺牲后，红军广大将士无比悲痛！同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分别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朱德和徐向前元帅分别题了挽词。

董振堂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坚定的党员，是中国工农红军最勇敢、最沉着的领导者和优秀将领之一，也

是抗日救国最坚决、最彻底的民族英雄之一。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将流芳千古，永世长存。

（李　直　陈增发）



谭　震　林



谭 震 林

一

谭震林(1902——1983)，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诞生于湖南省攸县珍珠巷一个矿山小职员家庭。乳名喜仔，后名喜起，字震林。参加革命后曾用过林俊、梅城、卓林等笔名。

谭震林的祖籍原为江西省太和县，清乾隆年间迁至湖南省攸县城内。此后祖辈世代承袭县公署粮房职员，负责管理粮册，每年领取微薄俸薪，维持低等的平民生活水平。到谭震林的父亲谭端开时，中断了承袭的职务，到一家锌矿当会计师。母亲胡润秀，是个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谭震林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三。

谭震林九岁开始读私塾。念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十二岁时，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从此，家境日趋困难，后来不得已将谭家老当铺的屋出租，全家到城南河边水月楼老姑母家借居。为了找生活出路，父母忍痛把五弟和七弟送给了人家，让大哥谭福元

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谭寿林进了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妹妹谭银娥去卖水烟，谭震林进攸县“太成堂”古书铺当学徒。

学徒期间，工作很繁重。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是做杂工，也没有报酬。两年后，当谭震林开始学打算盘及学打敬鬼神的纸钱时，店老板死了，店也关了。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

不久，父母又托人把谭震林介绍到离家九十里的茶陵，在一家“徐文元”书店学手艺。他每天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必须保证在木板上印完三千张纸，否则老板是不让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是累人。可是，谭震林就是在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四年后，他“出师”了，被老板留在书店继续当工人。

当时，“徐文元”书店在茶陵是一家比较大的书店，藏书也较多。谭震林过去常常为自己读书太少而苦恼，现在面前有这么多的书，他兴奋极了，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些书全部“吃”进自己的肚里。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偷偷地从书架上把书拿回宿舍，在煤油灯下贪婪地读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悄悄地把书放回原处，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晚上再去取来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十分小心，不使书发生一点折皱损伤，以免老板看出来。他就是

这样不间断地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大量书籍。从这些书中，他不仅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而且晓得了中国农民阶级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统治阶级。书中豪侠义士劫富济贫、锄奸灭害的浩然正义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洪秀全等敢于推翻统治阶级的壮举，在他心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曾天真地想，如果现在也有个洪秀全的人物出来该多好啊！就可以领着穷人把不平等的社会翻个底朝天。他看书的时候，常常把书本和社会上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和自己苦难的家世联系起来。这样，他要改变这个黑暗社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一九二三年，湘军第五军陈嘉佑的部队路过茶陵时抓伕，谭震林被抓去替他们挑担子，一直挑了好几个月。在一次军阀混战中，谭震林所在部队被打散，于是，他回到了攸县老家。

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思想在攸县广泛传播。一九二五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遵照党的"四大"关于迅速适应发展的革命形势，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的决议，派遣潘鹏举到攸县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潘鹏举经过多方考察，首批发展余来、谭志道、刘谭豪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余来他们到长沙一个党训班学习后，回攸县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在工农运动的优秀青年中发展党员。谭震林回攸县后，开始没有事情做，后来帮一个刻字店的老板搞印刷，

装订记录本、帐本。刻字店的左对面是所小学，右对面是个衙门，所以有许多东西要印刷，有许多本子要装订。闲暇之时，谭震林常到小学校去走走，逐渐结识了余来。他同余来志趣相投，因此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在谈论中，余来向谭震林讲起了中国社会腐败的现状，讲起孙中山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后来失败了，胜利果实被敌人窃取等问题。还讲起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谈到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余来还拿出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向导》这样一些进步刊物给谭震林看。一次，谭震林问余来：干革命就我们两个行吗？余来回答说：当然不行！干革命的人多得很。不但小学有，中学也有；工人中有，农民中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多的人都干革命难道还怕不成功吗？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谭震林的思想，使早已埋藏在他脑子里的革命种子发芽了。他决心跟着共产党，为穷人翻身打天下。一九二五年冬，在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谭震林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书纸行业工人的串联、组织工作，把这部分工人逐步集合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它为尔后攸县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攻攸县。谭震林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积极参预带路、架浮桥等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使叶挺独立团顺利地攻占了攸县。

实际斗争的锻炼使谭震林的思想更加成熟起来，他决心为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经余来等介绍，谭震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各地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嘴脸也暴露出来。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驻军反动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发生时，谭震林正带领一个宣传队在北乡进行北伐宣传。听说发生了“马日事变”，谭震林立即率队返回攸县。此时县城已被反动军队占领，无法进城。谭震林便将宣传队分散行动。这时，攸县党组织，有的已被杀害，有的被捕，上级领导也联系不上了。于是，谭震林只身跑到长沙找党组织，没接上关系，又去武汉，也没有找到熟人，只得惆怅而返。当时一片白色恐怖，他化装从武汉回到攸县，到县郊一打听，敌人搜捕正紧，无法立足，于是又转到茶陵，试探性地进了“徐文元”书店。老板只知道他是做工会工作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徐老板还讲点情义，让他留下来继续做工，但规定两条：一是不能再做工会工作，二是只能在后面搞印刷装订，不要在前面柜台露面。为了防备县衙搜查，晚上要他睡在纸堆

里。谭震林一一答应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为了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并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十月上旬，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领二、三连，从宁冈古城出发，前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工农革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茶陵城后，杀了反动县长，砸开了监狱，救出了八十多名被押的农运、工运干部和无辜群众，并开仓赈济群众。当天，工农革命军撤出茶陵，临走时，张贴了革命标语、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布告是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亮的名义发的。其实，郭亮没任团长，也不在这支部队里，因为他在群众中影响比较大，故用他的名义发布。

几个月来，谭震林因找不到党，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这天，他再也忍不住了，出门看个究竟，可惜他得到的消息迟了，晚来了一步，工农革命军已经走了，没接上头。他只看见了标语、布告。当他看见"郭亮"这个名字时，惊讶得简直要叫出声来。他知道，郭亮是共产党员、湖南省工会委员长，坚强的革命者。郭亮这个名字这时出现，对他来说，犹如在漫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他竭力控制住内心的激动，详细地看完了布告。这天晚上他辗转不能入睡。他想起了北伐战争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想起了"马日事

变”中许多亲密的战友惨遭屠杀，想起了白天看过的布告，他自言自语地说：“郭亮还在，也就是党还在，党的军队还在，国民党反动派造谣‘共产党被斩尽杀绝了’，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坚信党、党的军队一定还会打到茶陵来的。

这一天终于来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率领第一营又一次打开了茶陵城。谭震林一看自己的队伍来了，心里非常激动，主动去找宛希先接头。谭震林问宛希先今后怎么办？宛希先对他说：你是工人嘛，先把工会搞起来！

谭震林按照宛希先的吩咐，在群众中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凭着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积极地进行串联，不几天就集拢了一批工运骨干，很快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大家公推谭震林担任主席。

县总工会成立后，谭震林又积极领导建立各个行业的分工会。不久，茶陵县城的店员工会、学徒工会、缝纫工会、铁业工会、磨（豆腐）工会等，都在县总工会的指导下相继成立。谭震林还跟正在山区的中共茶陵县委取得联系，敦请县委搬进城里，着手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工作。

在县总工会成立的同时，在革命军第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等人主持下，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从部队指派了一个叫谭梓生的人当县长。这个县政府成立后，只是在旧县长的衙门前挂起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新

牌子，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新县长上任后，每天依旧升堂审案。旧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人民群众还是没有说话的权利。

宛希先写了一封信，把上述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写了回信，信中说，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指示立即撤销县长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

宛希先接信后立即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和农会负责人开会，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组织大家讨论成立工农兵政府的问题。经过协商，各个组织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当讨论到政府主席人选时，三位代表你推我，我推你。宛希先见谦让不下，便对谭震林说："不要推了。我看你既然是工人代表，你就来当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吧！"宛希先一提议，大伙都表示赞同，这样就确定谭震林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洣江书院操坪召开。谭震林在大会上讲了话，公布了由三名工、农、兵代表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恢复农会、工会，举行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报仇雪恨。

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谭震林同政府的其它委员一起商议决定，立即派出政府人员、工会会员和士兵组成的工

作队下乡，广泛发动群众闹革命。在工作队指导下，乡村各地掀起了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不久，在全县范围内就建立了八个区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不几天，毛泽东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五支枪，建立和发展茶陵地方武装。谭震林等人接受这五支枪后，立即成立了一支纠察队，以维护城里秩序。在这支纠察队的带动下，乡村里的赤卫队、暴动队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此外，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当时的茶陵是遍地梭镖，漫天红旗，形成了比大革命时更为高涨的革命运动。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以后，敌人恨之入骨，妄图把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掉。茶陵的地主武装在大地主谭绍绪、罗兆鹏的策划下，纠合了三百余人枪，由腰陂向茶陵县城进发，然后将主力屯在茶陵对河定宁寺的山上。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消灭敌人。谭震林指挥纠察队、赤卫队一部埋伏在定宁寺敌人的右翼，一部涉过高陇河，迂回到敌人左翼。正面工农革命军与敌人打响后，埋伏在左、右两翼的纠察队、赤卫队突然杀出，毙敌二十余名，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地主武装失败后，他们联合了国民党湘东保安团团长罗定，兵分两路再次进攻茶陵。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配合工农革命军奋起抗敌，先是集中力量

击溃了谭绍绪、罗兆鹏的地主武装，然后把主力扎在营盘岭下，居高临下，锁住了洪沙庙的隘口，控制了从攸县进攻茶陵的白军。谭震林指挥由各乡赶来支援的农民自卫军，在四处山头布置疑兵，又用杉树做“炮”，吓唬敌人。当敌人兵临茶陵的时候，山头四处号起，红军、纠察队、赤卫队一齐出击，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战败了顽敌，杀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茶陵的革命火焰，派湘敌第八军吴尚一个加强团第三次包围了茶陵县城。工农革命军与敌展开激战，谭震林除调茶陵游击队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外，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大队送弹药、运伤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谭震林立即组织鞭炮工人制作了一种特殊的鞭炮。夜晚部队撤退时，他们在山上立红旗，点燃装在瓶子里的鞭炮，制造假象，掩护工农革命军顺利地撤出战斗，返回井冈山。谭震林也随同上了井冈山。

上到井冈山后，发现茶陵县委的人没有上山，毛泽东说，茶陵还是要管。于是，指定由谭震林负责茶陵县的工作。谭震林立即带领一些人到靠近宁冈、永新的九陇山活动，并派人下山去了解情况。由于敌人对茶陵县搜查、封锁得很严，派下山的第一个人被敌人杀了，又派出第二个人下山也不见回来，工作做不进去。谭震林把这个情况向毛

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没有武装不要下去活动。谭震林说，从这件事体会到，没有武装就没有活动的余地。毛泽东听后笑着对谭震林说，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随后，前委决定将茶陵县委改为特别区委。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特委委员。这次会议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等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五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了边界最高政府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负责土地部工作。

九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杨开明生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为了总结一年来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十月十四日，在宁冈县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如何巩固根据地及土地问题、《工会组织法》和整顿党的组织等问题，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和《井冈山土地法》。大会选举谭震林为第二届特委书记。会议确定边界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进一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会以后，谭震林在茅坪特委机关，为迎击敌人的重兵"会剿"，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夜操劳。

十一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井冈山根据地重

新组织了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谭震林兼任组织科长。不久，前委成立了工农工作委员会，谭震林任该委员会主任。

三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打破了敌人重重围困，离开井冈山，经过赣南，向闽西挺进。为了加强对沿途群众工作的领导，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的工作由邓乾元等负责，谭震林带领前委工农工作委员会随部队一起行动。下山后，部队每进驻一个新的地点，谭震林和工农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三月，红军打下了闽西的汀州城。

在汀州期间，前委决定把红四军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把红二十八团改为第一纵队；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改为第二纵队；红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谭震林曾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党代表。

一九二九年五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二次到闽西后，特别重视发展闽西地方武装和扩大主力红军的工作。六月上旬，红军由上杭白砂到达旧县时，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和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地方部队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六月中旬，在连城县新泉，由朱德军长传达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正式成立红四

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为了迅速提高这支新建部队的战斗力，在四纵队组建过程中，红四军前委决定从主力红军中选派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军事干部去加强四纵队。谭震林是被选派到四纵队去的干部之一。他对四纵队的政治训练进行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四纵队组成后，谭震林任中共四纵队委员会书记兼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次，毛泽东问谭震林：你们这个纵队能打仗吗？谭震林回答说：很难说，但是一定有勇敢的人，一定也有不敢打的人，到了那时候把勇敢的提拔起来当干部，把不勇敢的撤下来，这不就解决了么。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

为了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办法，在干部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大队建立了支部，支队成立了支队委，纵队成立了纵队委。在健全组织的基础上，谭震林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他组织政治部油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发给每个党员，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切实做到。谭震林很注意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他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谈心，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谭震林还特别注意维护党的政策和纪律。当时红四军规定要保护商业，发展经济。可是，四纵队中有个干部对此项规定观念淡薄，随便把商人的东西没收了，使商店关了门，在工商界造成不良影响。谭震林知道此事后，对这个干部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并给了纪律处分，使这个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还有一个负责肃反工作的干部偷偷地同地主的老婆搞腐化，败坏了我军声誉。为了严肃军纪，教育其他干部，谭震林请示上级批准，把这个败类给枪毙了。由于采取了上述这些有力措施，四纵队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成为巩固、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谭震林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九月，四纵队进攻上杭之前，谭震林组织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发动群众中他发现白砂地区的妇女在动员丈夫参军参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于是，他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要政治部及时进行总结，并指示部队在发动群众中要普遍建立妇女会，以便把广大妇女动员起来，发挥她们的作用。谭震林在四纵队工作前后不到一年，但却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对这一点，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省委派往四纵队进行考察的巡视员谢运康在向省委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谭震林是"四军配来的，过去在湖南做过工会工作，后随四军到各地参加地方工作，是一店员工人，工作能力不错。"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进一步总结闽西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经红四军前委建议，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召开了在闽西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前委指派毛泽东、

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出席大会。大会经过民主协商，选举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十五人为特委委员。大会以后，谭震林同闽西的其他领导人一道，深入基层，指导建党、建政和分配土地的工作，把闽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十二月初，红四军前委决定对全军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谭震林等奉命率四纵队抵达连城新泉参加整训。同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召开，谭震林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前委委员。会后，谭震林在四纵队传达贯彻了古田会议精神，并组织部队认真地学习大会的《决议》。

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一九二九年的工作，并提出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前委及赣西南、闽西、湘赣边等赤区斗争的指导机关。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随着工农武装和主力红军的迅速扩大，以及游击战争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并经过专门训练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此，一九三〇年五月在龙岩建立了闽西红军学校，谭震林任校长，邓子恢任政委。第一期招生二百人，第二期招生八百人。红军军政学校的建立，为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壮大革命武装，提高红军军政素质，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一九三〇年六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六月中旬，红四军在汀州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闽西地方红军主力第十二军正式编入红一军团建制，谭震林被任命为红十二军政治委员。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于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选举产生了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谭震林被选为委员。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前委命令全军由长沙撤围，“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并布置各军用十二天时间，帮助地方恢复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和赤卫队，筹集款子等工作。按照前委的部署，十四日，谭震林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由株洲起程，经醴陵，向攸县进攻，十七日占领攸县县城。部队进城前，国民党反动军队散布了红军杀人放火等大量谣言，把很多群众都吓跑了。部队进城后，为了安定民心，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谭震林上台讲了话。他说：乡亲们，大家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是共产党，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广大人民办事的。我们这次来攸县，要为革命烈士报仇，要革反动派和大土豪劣绅的命，要为大家办几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怕，不要逃跑，跑了的要回来，照常做工，照常做生意……。台下认识谭震林的群众，看看相貌，听听声音，指着台上讲话的人惊讶地说：“那不是咱们的喜仔吗？！”

“是的，真的是喜仔。”喜仔回来了，人们心里充满着喜悦。盼望喜仔早日回来，这是攸县人民很久的愿望。“马日事变”后，攸县党的主要领导人余来和二百多名工农干部，先后被国民党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杀害了。攸县沉沦在白色恐怖之中。大家听说谭震林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还当了红军领导人，于是盼望他能早日带兵回来，为人民报仇、出气。现在，喜仔果然回来了，乡亲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散会后，大家把谭震林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有的问：“喜仔这些年走了哪些地方？”有的问：“这次回来了还走不走？”还有的问：“红军里头还要不要人？”谭震林对这些问题都耐心地作了回答，最后乡亲们都满意而去。喜仔回来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外出躲避的乡亲们纷纷回到家中，攸县呈现了一派节日气氛。

谭震林回到家乡的第二天，就帮助攸县重新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并把县内的赤卫队员召集起来，组成一支有三十多人的赤色游击队。谭震林从部队拨了两支步枪、一批梭镖和大刀给赤卫队。在红十二军帮助下，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六十多人。

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谭震林要求部队打土豪筹款子。他把部队派到东、南、西、北四乡，与各地群众一起评议，谁个土豪多出，谁个土豪少出，经大家评议后，作出结论，这样，筹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也有极个别的土豪抗拒捐款，部队就点燃他家的房子，当熊熊大火燃烧时，房

顶上隐藏的银元纷纷滚落下来，土豪吓得面如土色，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高喊“烧得好”！谭震林在攸县还动员了数十名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十二军离开攸县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了攸县，地主反动武装乘机对无辜群众和红军亲属进行残害。谭震林的父亲和大哥、二哥、五弟就是在这次惨遭不幸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八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谭震林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战略部署，率领红十二军担任从左右侧迂回攻击张辉瓒部的任务，对全歼张辉瓒师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又奉命从正面，经南团、林池向东韶追击逃敌，同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谭道源师。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主体组成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在赣南成立，谭震林被指定为中央局委员。四月，蒋介石调集十六个师又三个旅，共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前，毛泽东在建宁溪口驻地先后三次致函谭震林和闽赣边界领导人。在六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毛泽东指示说：“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

的工作。”“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雩、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六月三十日的信中，毛泽东说：“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需兼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一次会，震林同志一人普遍地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在七月一日的信中，毛泽东对如何完成上述任务，进一步作了具体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筹集经费、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工作做得很细。指定一个连到一个县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检查土改搞了没有，没有搞好的帮助搞好，不懂的就讲给他们听。同时，还帮助建立了宁化县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打击敌王金钰、公秉藩部时，十二军担任右路军，负责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的指挥下，十二军同兄弟部队一起配合，不到半天时间，就取得了首战胜利。随后同红四军一起围攻广昌，又大获全胜。

七月，蒋介石拼凑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

指挥红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为了诱惑和调动敌人，命令红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罗炳辉、谭震林根据毛泽东、朱德的部署，率红十二军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直向北插。果然，敌人跟着来了。这时，为不把敌人甩得太远，红十二军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着敌人的鼻子。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他们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打开旗子。于是，部队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一看，简直象一支几万人的大军。为了迷惑敌人，他们让全军上下都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更多的“圈套”：在红军行进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见门就写：“某团某连驻此地”。在显眼的地方，还要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落款是：“某师某某”，名字是随手编的。番号呢？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就这样，尾追红军主力的敌军已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红军主力已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罗炳辉和谭震林高兴地说：“好啊！蒋介石上钩了，那就牵着他的鼻子多逛几圈吧！”为了给主力部

队创造更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红十二军又作了新的行动部署：哪座山高就翻哪座山，哪条道路险峻就走哪条。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是难耐的酷刑，一二十万敌军被拖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随后，红十二军又在东韶附近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支部队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消灭，当夜仓皇溃逃。红十二军从容地收复了黄陂、小布地区。这时，红军主力已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而敌人士气低落，蒋介石已下决心撤退了。毛泽东、朱德当即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命令全军出击，接连打了五个大胜仗，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罗炳辉和谭震林奉命率领红十二军向赣南边界挺进，以配合闽西的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十月，红十二军进入汀州同闽西主力红军新十二军胜利会师。新、老十二军汀州会师后，在长汀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帮助根据地恢复、发展。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编制进行了局部调整，决定将老红十二军的主力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调回江西编入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其空员由新十二军编入代替，仍称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继续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整编后，十二军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率领下，继续向连

城、宁化、清流一带发展游击战争，解放了连城县城和汀、连、宁的广大地区，从而打通了闽西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等红色区域的联系。在红十二军的胜利进军下，龙岩、永定、上杭各县被敌人侵占的地区，除县城以外，大部分也得到恢复，闽西军阀张贞部被迫退却到龙岩、永定一线，使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谭震林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军委副主席，谭震林等十五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令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

四

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使闽西苏区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有了一个比较巩固的中央根据地。为了统一闽西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

九三二年三月，在福建长汀十里铺正式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政治委员。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谭震林出席了大会，被选为福建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四月一日，谭震林出席了中央红军总部在汀州召开的部署东征漳州的军事会议。会后，谭震林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组织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搞好扩大红军和支前工作，配合中央红军东征作战；另--方面指挥杭、永、岩边界的红军独立师、团严密牵制敌人，用假象迷惑敌人，切断广东支援漳州之敌，同时，指挥红十二军由汀州迅速出发攻打上杭城，然后与红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会师，协同作战，经龙岩直下漳州。四月二十日配合东路军攻占了漳州。

随着红军的胜利，部队不断发展。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要求，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决定重新组建福建军区，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就职后，谭震林以主要精力来领导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六月，他指挥岩、永、杭军分区和上杭旧县地方武装五六百人，发起围攻广东军阀陈济棠、黄任寰部的水西渡战斗，取得歼敌一个营的胜利。九月，又指挥宁、清、归军分区所属部队在安远市击溃敌周志群部，俘获人枪各五十余。一九三二年秋，指挥在闽东南作战的红军主力部队和福建军区汀、清、连等分区以及地方武装，在长汀南阳(现上杭)马洋伏击敌十九路

军部队，经过五天激战，毙伤敌一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获胜利品无数。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谭震林还领导军区积极配合苏维埃政府做好扩建红军的工作。福建军区一成立他就做出决定，每年的五、八、十三个月为扩红突击月，专门组织工作队开展扩红工作。还决定在杭、汀、宁三县各设立一个新兵补充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一段集中训练，然后输送给正规部队。军区还制订了红军家属优待条例，颁发红军家属光荣牌、红军战士光荣匾，鼓励人民群众参加红军，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所以，当时青年参军非常踊跃。据当时报刊报载："仅一九三二年五月全省扩大红军就有四千余人，超过原定三千人的计划；六、七两个月扩大两千余人；八、九两个月又扩大红军九千余人。"谭震林不仅重视动员群众，而且非常关心群众。他经常对军区的干部战士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关心群众。军区机关驻南阳茶杵下时，谭震林亲自带着机关干部和直属队指战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帮助群众搞生产。当时军队搞生产是件新鲜事，影响很大。谭震林还要求政治部规定一个劳动日制度，在全军区执行。部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既打仗、又做群众工作的精神。张鼎丞在全省苏维埃代表会上，高度赞扬了谭震林这个做法。

一九三二年八月，毛泽东找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

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谈话后，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由罗明、谭震林、方方等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谭震林等贯彻了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

正当福建军区在谭震林等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这场斗争中，谭震林是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同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在对形势的看法上，谭震林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以主要力量来打击那些所谓妥协的反革命派的主张。谭震林认为“蒋粤战争有爆发的可能，十九路军与粤系军阀对闽西苏区的进攻，会暂时的停止。”不久，谭震林的判断果然被证实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内的一部

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且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在闽西反“围剿”斗争的方针上，谭震林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不顾实际情况地“猛烈扩大红军”，把闽西所有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开往反“围剿”第一线与敌人决战的主张。他支持罗明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主张“以桃地小兰为第一防线，官庄水口濯田为第二防线”。在土地问题上，谭震林支持对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把这项正确的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在战略问题上，谭震林坚决主张采取毛泽东、朱德“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向白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谭震林这些正确看法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多次斥责。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中共福建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决定，在汀州召开省委临时代表会议，对罗明进行批判斗争。谭震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同到会的多数同志一样，对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决定表示不理解，“感到突然，思想上想不开”。会上中央局派来出席会议的代表，不顾谭震林等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凭借上级领导的指示和决定进行压服，通过了《临时省委〈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决定在省委和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批判罗

明的斗争，撤销了拥护罗明意见的汀东、新泉、永定三个县委书记的职务。会上要求谭震林检查“罗明路线”的错误。由于谭震林不愿意检查，因此，大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指责谭震林“是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这是机会主义最可耻的企图”。要求“集中火力向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扩大会以后，谭震林为了说明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向福建省委写了《申明书》。《申明书》上交后，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加恼火，要用对待罗明一样的手段来对付谭震林。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了题为《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谭震林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指责谭震林“不尊重”中央局的指示，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同“罗明路线机会主义者一样，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共同观点，又翻出一些新花样来”。文章还说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死守《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的腐朽思想”。文章还号召开展对谭震林的斗争，为进攻路线战斗。同年十月，根据中央局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福建军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对谭震林进行了残酷斗争，并宣布撤销他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谭震林被错误地批判和撤职后，仍然坚信正确的路线终将胜利。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保卫局红军科当科长。到职后，他不计恩怨，不嫌职卑，不怕麻烦，仍积极努力地

工作。随后，谭震林被送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并留下一部分红军部队，由江西分局直接领导，坚持斗争。江西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陈潭秋、毛泽覃、梁泊台等组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被困守在仁风山区的江西分局接到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当即提出要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围出去，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江西分局接受了陈毅的正确建议，决定分局、中央办事处的干部和红军部队分成五路，分别向闽赣、闽西、湘南、赣粤方向突围。向闽西方向突围的是陈潭秋、谭震林带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加强营。当时陈潭秋是以中央苏区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挥游击战争的。因陈潭秋对军事不熟悉，要谭震林作他的参谋。他们从瑞金西南出发，一路走，一路打，到福建长汀、四都

一路平安无事。过了水口，情况很紧张，到处都是敌人。在畲心嶂山山脚下想烧点饭吃，敌人打来了，加强营的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当场牺牲。陈潭秋问谭震林怎样办？谭震林果断地说："有办法，只要给我一个班归我直接指挥，走在前头边侦察边开路，还愁走不出去？"陈潭秋看谭震林决心大，办法对，高兴地说："只要你有办法走出去，整个部队都可以归你指挥。"谭震林风趣地说："你授这么大的权力给我，我更好办。"就这样，谭震林指挥部队赶了一天的山路，拂晓到中寨找到才溪苏区十多个人，知道旧县、石训潭都驻有敌人，旧县河被敌人封锁。谭震林认为，不过旧县河，无其它路可走。他果断决定从洪北过河。渡河时水的声音很大，部队刚过了三分之一，敌人就向河里乱打枪。这时谭震林还在渡口，他沉着指挥，并鼓励大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过了河就是胜利。"还说："他打他的枪，我们过我们的河，不要理他。"过河后，在铁场整理了一下队伍，立即翻过山到了岩下山的松柏林。谭震林带着两个连在大森林中走，路很窄，加之黑夜又看不清路，就一个接一个地拉着绳子走。突然，陈潭秋脚踏空了，一滑摔了下去，天亮时才把他找回来。第二天谭震林决定陈潭秋坐担架，自己带两个连在后面掩护。下午找到了廖海涛、黄火星，尔后又找到刘永生。刘很快通知了张鼎丞，张立即派人把陈潭秋、谭震林等领到永定石木林。谭震林见到张鼎丞高兴地说："哎呀，真险啦！差一点不能与你相见

了。"陈潭秋说："一路来如果没有这位好参谋决心果断，灵活指挥，可能还下来不了呢？"张鼎丞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们胜利来到闽西。"

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永定县上溪南区的赤棋乡，召开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谭震林当选为军事部长。当时，敌人集中几个师的兵力正在闽西进行第一期"围剿"。谭震林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和斗争形势，在会议第一天就提出：会议不能开长，部队和领导同志要立即分散，集中一起目标大，对我们不利。这个正确的建议深得大家同意。于是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分散发展，独立自主作战，渡过这个极为艰苦的难关。会议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作了具体决定。谭震林被分配到上杭与廖海涛、黄火星一起，坚持双髻山的斗争。

会后谭震林来到双髻山。他对廖海涛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不依靠群众就寸步难行。"谭震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生活。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谭震林还带领红军游击队在双髻山、鸡公山一带打土豪，把打来的粮食、猪肉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一次，红军游击队打听到敌人有三条装满了粮食的船要从附近路过。于是，谭震林就指挥部队把这三条船截住，把粮食一袋一袋地背上山，然后分给群众。并且在路上有意撒上一些大米，表

示把粮食带上山了，免得敌人找群众报复。有时把打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群众不敢要，谭震林就叫战士们把粮食送到群众家里。同时警告地主：粮食是我们拿走的，你不能损害村子里的老百姓，如果损害了，下次我们来就杀你的头。这样群众才敢要粮食了。由于谭震林等关心群众，所以始终同群众保持着密切地联系。敌人有什么行动，群众就马上通知游击队。群众不仅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有时为了红军就是牺牲了也在所不惜。龙岩城里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经常帮游击队买粮食，后来游击队里的一个战士叛变了，把这个消息报告敌人，敌人把她抓去，问她："你买了多少粮食给土匪？"她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替土匪买粮食，你们这些人靠抢老百姓的粮食吃，土匪是你们！"敌人问："你买的粮食给谁了？"她说："你们不是知道了吗，还问什么！"敌人又问："你为什么买粮食给红军？"她回答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敌人恼羞成怒，最后把她杀了。类似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还很多。

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谭震林很关心战士们的疾苦，常常为战士们排忧解难。一天，他带领指战员在山地上训练，有的战士没有鞋穿，脚被荆棘划伤，他便发动战士们上山割茅草编织草鞋。有些新入伍的战士，没有经验，误将芦苇当茅草割回来了，编不成草鞋，很泄气，谭震林就耐心地开导说："芦苇太粗，太硬了，不适合打草鞋，要

割那种细叶的茅草，有弹性，打的草鞋才结实，不易烂。”讲罢，他就带领大家上山寻找适宜打草鞋的茅草。把茅草割回来后，他不顾疲劳和天气炎热，亲自动手打草鞋，还手把手地教那些不会编的同志。在谭震林的细心传授下新战士很快学会了打草鞋，解决了战士们穿鞋难的问题。谭震林还经常深入战士当中，同他们谈心，战士们也乐于把心里的话对他讲，所以战士们中间有什么事情他都能很快知道。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谭震林非常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方针政策。原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傅柏翠，后来因种种原因脱离红军部队回乡组织武装，听从敌人指挥。对于这样一支武装，谭震林认为，他生存在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我们失败，他也难以幸存。因此，可以同他沟通联系，建立一种微妙关系。于是，他写信给傅柏翠说道:“我要生存你也要生存，我们不能生存，你们也要完蛋……。”这封信使傅认识到与红军的利害关系，他回信给谭震林表示同意双方互不侵犯。后来廖海涛的部队同他背靠背也能安然相处，敌人来搜山他不积极配合，只是虚张声势，敷衍了事。红军游击队还可以到他的地方暂时隐蔽。游击队缺乏粮食和药品，他也可以帮忙买一些。左倾错误统治时，不管青红皂白，凡替白军做事的都要杀，结果把可以中立或争取的中间势力也都赶到了敌人一边。当时，保甲长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人就上山躲起来。谭震林感到这样下

去对坚持斗争不利，就亲自到兰田、大洋坝作调查。首先找到一个甲长，通过他找到大洋坝的保长，问他为什么要躲。这个保长回答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白军出布告，说通共产党要杀，红军看到我们应付白军，又说是叛徒要杀头，这叫我们怎么办呢？谭震林感到是个问题，对保甲长的政策应当改变，应把消灭保甲制度的政策，改变为利用保甲长的政策，这样做对坚持游击战争才有利。他很快写信给张鼎丞、邓子恢，建议军政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张鼎丞、邓子恢接信后很有同感，认为完全有必要召开会议。后来，他们在双髻山开会决定把利用保甲长的政策规定下来，并提出“白皮红心”的口号。这样，就把革命的原则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对游击队的斗争非常有利。对于土匪武装，谭震林认为，对他们不能苛求，只要他们不抢农民、不打红军，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

在敌人重兵对闽西根据地实行“围剿”的情况下，谭震林指挥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他强调仗打不打，要看对当地群众是否有利，对红军是否有利，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他带领游击队平常住在山中的树林里，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敌人清剿比较紧，就隐蔽起来，同敌人“捉迷藏”。其它时间就积极开展活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袭扰疲惫敌人。并积极组织群众，把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部队

在谭震林指挥下，创造出许多灵活的游击战术。谭震林还注意教育部队把宣传、瓦解、利用敌人巧妙地结合起来。有一次，谭震林派部队去拔掉一条公路上的敌军地堡，打进去后，不缴他们的武器，而是把敌军的头头抓起来，向士兵们宣传革命道理，要他们不要替统治阶级卖命，同游击队合作，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果然，效果不错，他们表示愿意同红军游击队合作。这样就把敌人的堡垒变成为游击队可利用的堡垒。

谭震林同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常常用野菜、野果子、竹笋充饥，用土制的草药治病。一天晚上，一个叛徒带领敌人突然袭击谭震林和廖海涛住的寮子。当时正是夏天，谭震林满身长了疥，又热又痒，睡不安稳，正辗转反侧，忽听到有响声。原来他们在通向寮子的必经小路上，安了土“警报器”——把几根竹子扳倒，上面放上洋油桶，一踩上竹子，洋油桶就会发出响声。一听到响声，谭震林警觉地问了一声：谁？没有回音，他还以为是野兽。不一会，又听到响声，他觉得不妙，赶快喊廖海涛：“老廖，有情况，快起来！”一边喊，一边向外突围。廖猛然惊醒，顺手就抓枪，可是枪皮带被竹床挂住了，扯不动，这时敌人已堵到了寮子跟前，他一个箭步猛地一窜，用力猛一推，把敌人的枪管推开，迅速突出包围。敌人举枪射击，但是夜暗帮了大忙，敌人看不清，打不准。枪一响，敌人以为是谭

震林、廖海涛他们开了火，就朝寮子里打枪，结果打误会了。谭震林和廖海涛突围出去了，敌人自己打自己，混战一场，死伤好几个。

在艰苦的日子里，谭震林始终坚持看书学习。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论政党》、《政治经济学》、《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战斗条例》等书籍。他还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阅读。他常对同志们说：环境越艰苦，越要抓紧学习，学习才能使人增加智慧，增添信心，才能看到未来。

在紧张的斗争中，谭震林是异常严肃的。但在斗争的间隙他又是非常活跃的。他说：我们的生活不能搞得太枯燥，应该活泼的还是要活泼。为了活跃生活，有时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讲故事，生动有趣，战士们都很喜欢听。有时他也给大家说上一段笑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快乐的笑声，驱散了战斗的疲劳，唤起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

一九三五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中共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谭震林出席了会议，被增补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下，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福建和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在闽西南地区开展抗日反蒋统一

战线的新方针和新策略，决定将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对于闽西南党组织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获悉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为适应新形势，决定派方方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五月，闽南红三团转来了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得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立即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愿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口号，确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部署。会后，以张、邓、谭名义发表了致国民党驻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七月，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会在上杭白砂召开。从延安回到闽西的方方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闽西南的党坚持游击战的表扬。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取消军政委员会，闽西南特委与潮梅特委合并，成立闽粤赣边省委，张鼎丞为省委书记，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八月间，蒋介石调集广东军阀两个师入闽配合中央军两个师，继续对闽西南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清剿”。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使敌人

为时三个月的"清剿"，十天的搜山，被彻底粉碎。之后，谭震林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闽西出版的《红旗》第十二期上，以卓林的笔名发表了《在粉碎粤敌"清剿"中战术运用的检讨》一文，全面地总结了这次反清剿斗争中的经验。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十五日，闽粤赣边省委接到新四军军部指示，令谭震林到南昌接受命令，办理部队整编有关事宜。于是，谭震林带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日夜兼程奔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在闽西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两千多名红军游击队员，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下辖三、四两个团，张鼎丞为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三月一日，张鼎丞、谭震林等率领二支队全体人员，告别了闽西的父老兄弟，浩浩荡荡开赴抗日前线。

六

二支队开到安徽岩寺集中后，谭震林奉命调往三支队任副司令员。三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副军长、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由于张云逸在军部担当重任不能离开，四月，由谭震林率领三支队到达皖南芜湖、宣城、青阳、大通镇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五月四日，毛泽东向新四军发出《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

发出《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利用有利时机，主动、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挥三支队经常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十月初，谭震林奉军部命令，率领三支队开往青弋江，接替友军阵地。月底，日军集中兵力一千多人，分数路向三支队驻守的红衣铺、清水潭阵地进攻。谭震林立即指挥部队以机动防御的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战斗的胜利，共毙伤敌伪三百余名，打击了日军的凶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民心，巩固了我军的阵地。

一九三八年春夏，由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铜陵、荻港、旧县、横山等地，并企图进一步占领繁昌，建立前进阵地，尔后夺取整个皖南地区，以维护长江航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破坏和威胁敌人的长江交通运输，十一月底，谭震林率领新四军三支队进入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春，三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在铜繁前线先后共进行了大小二百多次胜利的战斗，其中以七次保卫繁昌之战最为激烈。战后新四军军部在《战斗详报》中这样写道：我军保卫繁昌的英勇战斗，是南繁战线上空前伟大的胜利。第一，它粉碎了敌人企图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巩固了皖南一部分国土，第二，打击了反共顽固派和投降分子对我军的一切造谣破坏计划。第三，在群众中提高了本军

政治及战斗的威信，使群众再一次认识了本军不是“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的部队，而是抗战最坚决、最英勇的部队。第四，发扬了我军自我牺牲、刻苦耐劳、英勇战斗、勇猛攻击的优良传统。第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获得了运动战的新经验和开拓了向运动战发展的道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给谭震林发来贺电称赞：“指挥得力，将士同心，殊堪嘉尚。”日军派遣军长官哀叹：国民党为我手下败将，惟共产军乃皇军之大敌，要在共产军手中夺取繁昌异常困难。为了庆祝“繁昌之战”的胜利，谭震林在中分村主持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军民庆祝大会。新四军《抗敌报》为此发表了《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新四军政治部还编写了“繁昌之战”的歌曲。

歌词唱道：

皖南门户，
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城，
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无耻的日本强盗，
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七次大规模的侵犯，
遭受了七次重大的杀伤。
峨山头的搏斗，
汤口坝的血战，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

爆烈的手榴弹，

火力猛烈的机关枪，

前仆后继冲锋，

把敌人打下山岗。

发扬了我们勇猛的攻击，

无比的顽强。

我们英勇牺牲，牺牲，

不怕凄风冷雨。

我们顽强奋斗，奋斗，

不怕饥寒死伤。

我们顽强战斗，

粉碎敌人的“扫荡”。

谁说我们游而不击，

谁说我们不能打仗？

七次伟大胜利，

我们坚决地保卫了繁昌。

这支歌曲当时在新四军部队中广泛传唱，成为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和激励指战员抗日斗志的生动教材。至今，新四军的许多老战士和繁昌地区的老游击队员仍记忆犹新。

一九四〇年五月，为了加强党对苏南东路地区（即苏州、太仓、常州、江阴、无锡、常熟之间的地区）工作的领导，谭震林奉命化名林俊，进入东路地区，主持该地区

的党、政、军工作。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首先，以苏(苏州)、太(太仓)、常(常州)为基地，以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部队为基础，建立了江抗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统一领导东路地区的工作。接着，他对东路地区的地方武装进行整编，建立了精干的武装支队。之后，他率部打垮了顽敌武装。在巩固苏太常地区胜利的基础上，谭震林指挥武装支队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同时，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政权建设，组织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从而使东路地区的抗战工作进入鼎盛时期。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决定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为新四军第六师，任命谭震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并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六师成立后，担负了在苏南阻击顽军北渡长江，粉碎敌伪"扫荡"，开辟新根据地，发展有生力量的任务。同年，五六月间，六师在谭震林指挥下，对敌伪主动袭击八十余次，使苏常太地区获得新发展。七月一日，日军开始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由于当地党组织对形势估计不足，"清乡"使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较大的损失。谭震林及时帮助当地党组织总结经验教训。他指出，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的隐蔽力量、积蓄力量、配合主力反攻

的方针。二是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充分掌握敌、伪、顽的情况，未看到“清乡”是他们三位一体的集中行动。三是我们的锄奸活动在掌握政策上过左，削弱了社会基础。四是对敌人“清乡”计划，包括规模、步骤、兵力、方法等情况不明，因而反“清乡”斗争未能作出相应的对策。为对付敌人的“清乡”，谭震林对澄锡虞地区反“清乡”斗争作了妥善部署，使该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不仅减少了损失，还开辟了新区。在苏中领导斗争的粟裕，请谭震林到苏中给部队干部作了题为《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后来苏中军民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九月，谭震林任新四军军部巡视员，被军部派到所属各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十月，谭震林检查了苏中地区的工作，在苏中党政军扩大会议上作了《对苏中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年底，谭震林被任命为新四军二师政治委员并担任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到职后，立即参加了淮南区党委的整风。一九四三年五月，他主持召开了淮南新铺上干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纠正了党内存在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使淮南区党委和军队领导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九四三年，新四军军部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淮南区部队“自春季新铺会议以整风精神开展反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各自为政的现象斗争后，检查各地区部队与此相类似的倾向，均相当严重。经此教

育后再加干部的调整，现有进步，内部不团结的现象逐渐消除”。“整风清奸工作亦在开展，并获有成绩”。

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另在华中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将新四军留在华中地区的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谭震林被任命为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这时，蒋介石一面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一面伪装和平，妄图将破坏和平的罪责加在中共头上，为发动全面内战制造借口。谭震林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对将要发生的内战，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头脑。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他发表了《时局的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和平要巩固，民主要实现，还要经过困难曲折的道路。”二月二十五日，谭震林在华中分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说：“谈判的基本方针是寸土必争，方式是和平的，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军事手段。军事上要有充分准备，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谭震林还十分注意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使干部战士从思想上作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六月三日，谭震林在对部

队所作的《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部队思想上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随时准备自卫，防止国民党大举进攻。第二，对抗战中涌进的大批知识青年进行教育，解决对蒋介石本质认识不足的问题。“指示”强调部队的中心工作主要抓三件大事：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练兵，三是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华中野战军所属部队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形势，传达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华中我军完成新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年七月，国民党军以四倍于我的兵力进攻苏中解放区。谭震林和粟裕一起，指挥华中野战军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在苏中地区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等地，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的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合计五万多人。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淮南、淮北。当华中野战军主力撤离这两个地区时，一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波动。为了端正这部分同志的认识，十一月十五日，谭震林发表了《对目前自卫战争应有的认识》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两淮失守，不可否认对我华中整个作战是有极大影响的。但是，两淮失守是否等于我军已失

败不能再战呢？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想。事实上，两淮之失不是我们没有力量保卫两淮，而是敌人乘我主力未到钻了一个空子，并不是敌人之强，我们打不过他。文章又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有生力量之消长，不决定于某些土地之得失。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打败一个近代化的日本加上汪精卫，那末，我们就有充分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加上蒋介石。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澄清干部战士中的模糊认识，增强部队的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初，战争的发展对我军越来越有利。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一月，华东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了统一整编，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华野前委。谭震林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担任副政治委员期间，积极协助陈毅司令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谭震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是很得力的。全国解放后，陈毅在谈到当年华东部队的工作时，曾对谭震林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陈毅说："至于我自己，在政治工作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上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这一方面反映出陈毅的虚怀若谷的革命家胸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谭震林在政治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七年八月，华东局、华野前委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指示，确定由陈毅、粟裕率领七个纵队组成外线兵团，执行外线进攻作战的任务；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四个纵队组成内

线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内线兵团组成后，立即在山东诸城、昌邑地区进行休整。休整中，在谭震林政委的组织指导下，各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端正了干部战士对全国大反攻形势的认识，稳定了坚持内线作战的思想，提高了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休整结束后，谭震林和许世友按照作战计划指挥部队积极寻机歼敌。九月，击败了南犯诸城之敌，十月重创了敌六十四师主力，取得了胶河战役的胜利。接着又解放胶县，攻克莱阳，取得了胶东战役的胜利。从而，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计划，改变了山东战场的敌我形势，配合了外线兵团的战略进攻，为收复山东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八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将内线兵团改为山东兵团，以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从三月起，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先后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和兖州战役，歼敌十四万五千余人，解放了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九月，根据中央军委、华野前委的指示，许世友、谭震林统一指挥攻打济南的东、西两个集团的部队，经八昼夜激战，全歼守敌十万余人，活捉敌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济南解放后，临沂、烟台、菏泽等地守敌，先后弃城逃跑，从此山东全境除青岛及南部边缘少数据点外，均获解放。

在济南战役接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即向中央军

委提出了组织淮海战役的建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决定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负统筹之责。在淮海战役中，谭震林同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山东兵团从临城枣庄一线向敌攻击，对于迫使冯治安部起义作出了贡献。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转入整训。整训中，谭震林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参加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后，谭震林向华东部队的高级干部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施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九年初，中央军委命令第二、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南下，准备渡江作战，捣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总前委决定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南三个作战集团军。中集团军由第七、九兵团，共七个军，三十万人组成，谭震林负责指挥中集团军，并兼任七兵团政治委员。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集团军在谭震林指挥下，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地段展开渡江，于二十一日凌晨四五点钟，先头部队越过繁昌追击南逃之敌。七兵团一过长江，谭震林接到中央军委关于“七兵团进杭州，接管整个浙江”的命令。五月三日，七兵团指挥机关进驻杭州。

谭震林率七兵团进驻杭州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这时，整个浙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迅速从困难中打开局面，谭震林在进驻杭州的第三天，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会，分析形势，果断决定：各路干部迅速会师，集中力量接管城市，实行战略展开。在进行接管工作的同时，谭震林动员全省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他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攻势与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必须密切结合，而又以群众武装自卫为中心”的剿匪方针。由于方针对头，一九五〇年初，浙江大陆公开的股匪和散匪基本消灭，全省秩序日趋稳定。同时，谭震林组织大批干部、青年学生下乡，开展反霸减租、发展生产运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农村面貌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谭震林不仅敢于领导浙江人民破坏旧秩序，而且十分重视建设新浙江。在进驻浙江后不久，他就提出了“建设新浙江”的口号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农业、建设工业”的战略设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浙江先后建成了麻纺厂、黄坛口水电站和其它重要工矿企业。谭震林还提出把各地名花、名树移植到杭州来，把杭州建设得山清水秀，成为东方的日内瓦。他亲临现场，指挥改造西湖和建设杭州植物园。

一九五二年夏，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一面领导农村的土地改革，一面指导工厂的民主改革。十月，中央决定苏南区、苏北区、

南京市三地区合并设立江苏省，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谭震林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一九五六年九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书记处分工他主管农村工作。从此，他为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而积极奋斗。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谭震林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六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谭震林任财经小组副组长。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谭震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二年冬，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林办公室，以加强对农业、林业的领导。十一月，谭震林被任命为农林办公室主任。

一九六六年，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谭震林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曾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因此，他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受到打击和迫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又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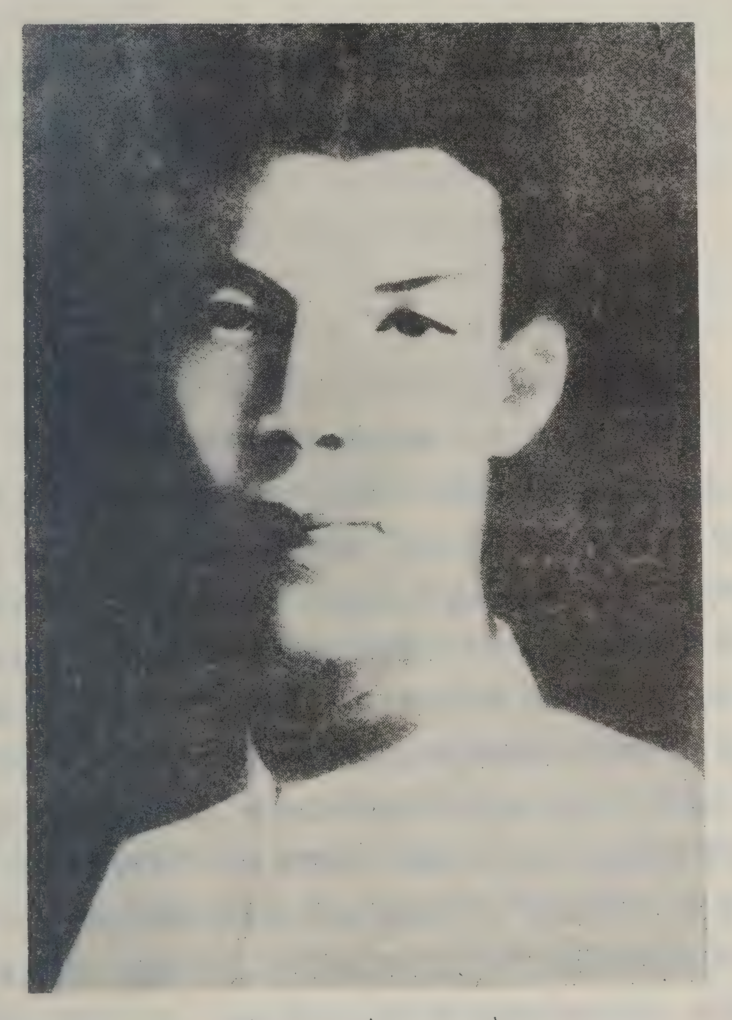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谭震林感到无比兴奋。一九七七年八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八年二月，又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年秋天，他应《红旗》杂志的约请，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谭震林通过回顾毛泽东的伟大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刻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真理，有力地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谬论，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年底，谭震林参加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后，谭震林通过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地宣传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宣传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条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谭震林在北京逝世。十月五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群众三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谭震林追悼大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胡耀邦在悼词中说：谭震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要学习他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要学习他对革命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学

习他刻苦学习，勤于思索，勇于进取的良好学风。这是对谭震林一生的最好总结。

（胡良忠）



蔡　会　文



蔡　会　文

一

蔡会文(1908—1936)，号赤潮，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湖南省攸县凉江山田一户富裕之家。祖父蔡清二，父亲蔡开先。蔡会文八岁时，入附近宰冲的蔡贻清老先生家读《三字经》，但不感兴趣，他喜欢听长工讲故事，尤其爱听讲农民怎样同豪强斗争的故事。十岁时，父亲从东乡请来一位清末秀才陈济贤，专门教他们兄弟读经。陈先生教的诗云子曰，渗进了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民主思想，这使蔡会文的长进很大，学会怎样看待社会的一些不平现象。有一年，当地有个叫张家恂的土豪做三十大寿，他看不顺眼，写了一副对联悄悄贴在张家恂的门口："家家为你，吃了烂肠肿肚；询询责问，听着哑口无言。"气得张家恂哭笑不得。又有一次，山田农民凑钱出粮在栖真观打醮，求神降福，要请陈先生做副对联。陈先生要蔡会文先做一副。蔡会文写道："山上有山，山山为寨，寨寨除民害；田中有

田，田田收租，租租含人泪。”还有一次，陈先生出了个题目“我的家乡”，叫蔡会文兄弟作文。蔡会文写道：“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似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在少年时期就有了初步的民主进步思想。

一九二一年，蔡会文进入盘田小学。一九二三年入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长郡中学。入校不久，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组织同学成立了“南星读书社”和“攸邑旅省同学会”，主办《攸县同学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这年暑假，他偕刘振国等同学回到攸县，在贾山、大桥一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后来，蔡会文回到家乡山田，在栖真观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土豪劣绅欺压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起来清算血泪帐，实行“二五”减租，并组织刘苍根等成立山田乡农民协会。为了带头均贫富，他召集百余贫苦农民到自己家里担谷，动员母亲拿出钱来，站在门口，向每个担谷农民的箩里扔一块银元。之后，蔡会文又带领农民群众到大土豪张家恂、陈扬芬家里吃大户，迫使他们开仓济贫。蔡会文回到学校后，被长郡中学中共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

二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湖南省委为培养军事骨干，建

立革命武装，适应高涨的斗争形势，成立了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总队。蔡会文应选到总队训练，跟刘亚球编在一个中队，任第二班班长兼党小组长。经过严格的训练，他的政治、军事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升任排长。“马日事变”时，干训总队首先遭到袭击，他率领全排抵抗到最后才撤走。他与胞兄蔡忠(中共党员)化装回到攸县。父亲久卧病榻，生命垂危，母亲要求他兄弟俩“收心”，别再“乱闯”了。蔡会文对母亲说:“救国救民的革命路，我们走定了，我俩不需要继承父母的家业，只要得到父母的支持。”

县团防局长、大土豪陈扬芬，闻知蔡家兄弟回来了，深夜带着团丁破门而入，对着蔡母大骂:“你家出了这样的‘乱臣贼子’，不除掉，我们将后患无穷。”遂指使团丁搜查。这时，蔡会文兄弟俩已破窗出走，当晚来到王背冲李贞元(中共党员)家，嘱李串联党员，坚持秘密活动，待他到外地找党组织。

七月下旬，蔡会文辗转来到武汉，党组织派他去卢德铭领导的警卫团，任第一营第一连党代表。八月上旬，他随部队来到湖南浏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警卫团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失败后，他随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在攻克莲花、占领古城、围攻宁冈时，蔡会文率领战士，勇猛冲杀，立下了战功。

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蔡会文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三月，他深入江西

永新秋溪乡作调查研究。他来到秋溪乡后，先找受苦最深的贫苦农民蔡球、李和林、张桂仁等，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并布置他们联络穷人。不久，蔡球等人串联了三十多个苦大仇深的农民，成立了贫农协会。接着，蔡会文又发展十三个贫协积极分子入了党，建立了秋溪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成立了暴动队和赤卫队。在党支部领导下，秋溪乡人民，在为红军侦察敌情，送子弟参加红军，用钱粮支援红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久，成立了中共秋溪特别区委。

一九二八年八月，蔡会文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教导队任党代表，肩负培训基层军事骨干的任务。他同正副大队长梁军、周子昆一起，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向学员们讲军事斗争形势，讲官兵平等，讲红军纪律，讲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还教唱《国际歌》，坚定大家的革命斗志。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作盐油和菜金，粮食要靠自己到酃县等地打土豪去筹办，脱下裤子扎了裤腿当袋子背上山。蔡会文也常到茅坪背谷子。冬天没有被子，他跟学员一样盖稻草。一次，朱德到教导队检查工作，看见大家夜里冻得睡不着觉，就说：起早一点，跑步爬山，身上不就热了吗？蔡会文便带领学员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翻山越岭。教导队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文盲。为了使学员们成为能写会说的武装宣传员，他耐心教他们学文化。没有黑板，就拿茨坪祠堂门

口的两块大石头当黑板，没有粉笔，用木炭棒代替。红四军教导队在培训红军骨干、提高部队军政和文化素养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蔡会文多次派交通员刘连生深入攸县活动，串联地下党员李贞元等筹建中共攸县县委和各区委，组织发展地下游击武装，制定了“从宁冈出发、夺取高陇、会师茶陵”的游击计划。后来，因为组织遭破坏而未成功。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达瑞金。此时蔡会文任红四军支队政委。一九三〇年三月，他随毛泽东来到会昌城开展工人运动。月初，他来到筠门岭镇，在牛栏背(山名)主持了筠门岭党支部成立大会。接着，又帮助成立筠门岭赤卫队和中共筠门岭镇区委会。

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蔡会文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四军由江西重新开回闽西，在汀州进行休整。前委决定将红四军一、三纵队扩编为新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并以江西地方武装红二、四团为基础，扩编组成红三军，由黄公略任军长，蔡会文任政委。当时，蔡会文年仅二十二岁。针对红三军的组成成份复杂，以

及战士中普遍存在着地方观念、农民意识、旧军队习气等情况，在汀州休整期间，他用古田会议精神教育部队。向指战员宣讲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比分析红军与白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分析斗争形势，指出奋斗目标和革命前途，并特别强调党支部、党小组和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使部队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大为改善，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得到克服。

在汀州期间，蔡会文会见了胞兄蔡忠（红十二军三十四团政委，后牺牲于陕北战场）。此时是他们兄弟俩参加革命武装三周年，久别重逢，他以“赤潮”署名题字留念：“三周年纪念的我俩，具备了牺牲奋斗的决心。”借以表达对革命忠贞不二的赤诚。

八月，黄公略、蔡会文率领红三军挺进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击毙敌旅长戴斗垣，并歼其部属五千余人。不久，回师江西，东渡赣江，进入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带，开辟新战场，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争取了主动。年底，红三军和红四军等在龙冈活捉敌“围剿”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张部九千余众。之后，红三军分驻藤田、潭头、东固一带休整，从事地方工作。当时正值青黄不接，加上敌人封锁，粮食供应困难，蔡会文带领干部战士上山挖竹笋，下水捡田螺、捉泥鳅，想方设法解决生活困难，减轻地方负担。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又消灭了敌二十八师公

秉藩部和王金钰之四十七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又在老营盘全歼蒋鼎文旅，在东固彻底消灭了韩德勤之五十二师。在毛泽东“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誉词里，当然也包含着蔡会文政委的功绩。

蔡会文在红三军一年多时间里，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加强了部队的革命化建设。但他也执行过“左”的政策，曾将军部参谋曹里怀错误的当“AB团”分子关押审讯，后来听了朱德的指示，承认了错误，没有伤害同志。

四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蔡会文从江西省军区（当时任政治部主任）调到湘赣省军区任总指挥兼政委，并兼红八军政委。

蔡会文和萧克（红八军军长）一同到达湘赣苏区之后，即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为目标，投入紧张纷繁的战备工作。十一月七日，在湘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蔡会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关于紧急动员，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政治动员，并对扩大红军、统一各级指挥关系、加强内部肃反、实行赤色戒严等具体工作作了部署。在这次大会上，他和王首道、王震、甘泗淇等当选为省委委员。

十一月中旬，敌人完成了对湘赣苏区“围剿”的兵力部署，在浙赣沿线，罗霄山脉中段西侧，北起清江、峡江，南到赣州之赣江沿岸，以及遂川、上犹、崇义等县苏区南翼，部署了八个整师，包括反动地主武装，总兵力逾十万人。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打法，先后占领北线之吉安，西线之茶(陵)、攸(县)苏区和南端的上(犹)、崇(义)苏区。敌六十三师更由茶陵逼进莲花，配合五十二师和粤敌一个师分别从安福、酃县、遂川分路合击，压向苏区中心之永新。当时湘赣主力红军第八军仅有战斗人员二千一百人，加上各级地方武装总共也不过一万三千人。为了打破敌人的疯狂进攻，蔡会文决定首先向进攻苏区之敌五十二师还击，并命令各独立师、团及其他地方武装进入苏区西、南边沿地带牵制敌人，配合作战。十一月十六日，红八军开始在安福金田向敌一五六旅发起攻击，随后又在官田攻打一五四旅及与之协防的靖卫团。经过近半个月的频繁战斗，给了从东北方向逼进永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并恢复了一部分苏区，但自己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例如，二十九日的官田之役，战斗打响后，红八军的正面和左翼展开都很顺利，击破了敌人的部分防线。但是，由于右翼不能稳住阵脚，加上正面部队动作不灵敏，致使敌人得以乘机反攻，造成红军伤亡一百五十余人而不得不撤离阵地的被动局面。基于这一教训，蔡会文修正了湘赣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内线作战，积聚主力，在有充分胜利把

握的前提下，乘敌人向苏区进犯时，选择其一点予以击破的原则，不打无充分胜利把握的冒险战争与盲动战争。

但是，上级却规定红八军主要行动方向是袁水流域，打通与湘鄂赣苏区的联系，跟湘鄂赣之红十六军的行动相呼应，配合中央红军迅速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当时，敌人部署在袁水流域的兵力多达十二个团，并于萍乡、宜春、分宜、彬江以及阜田、丁田、油田等重要城镇构筑工事，凭坚扼守，互相策应。而红八军战斗人员仅两千余人，战斗力有限，又缺乏攻坚武器，没有击破敌人据点的充分把握，又不便在湘赣苏区北部这一狭窄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再则，九月间，红八军执行过北上袁水攻打分宜的任务，当时守敌仅六连兵力凭坚固守，红八军猛攻竟日未克，损失三百八十余人，加上新近官田之役失利的教训。因此，蔡会文没有轻率接受北上袁水的决定，而把“培养八军，使八军具备能消灭两团敌人的力量”作为当时湘赣省的主要任务之一和自己努力经营的目标。

十二月十五日，蔡会文、萧克率领红八军撤出北线战场，由永新高桥头出发，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群众基础较好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发展。二十一日，蔡会文在《红三军团八军关于部队及湘赣苏区情况的报告》中，向中革军委据实申述了红八军这一行动的理由和意旨：“八军如要达到配合主力红军向北行动的任务，必须：A、攻破敌人之一据点， 并消灭或击溃敌人之援兵。B、迅速渡过

袁水流域，与十六军取得密切联系。但第一项我们觉得八军目前数量不足，战斗力不强，要突破已搞好工事的敌人据点……很少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推论说：过去人多枪多尚不能战胜分宜的六连敌人，现在人枪比以前较少，当然更不能。但目前对八军的战斗力的确不能有过高的计量。第二项，我们取得渡过袁水流域是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困难。但渡过以后，敌人一定会固守袁水各据点，一面集中几团兵力分路向我们追击。这时，白匪通讯容易，我们联络困难，敌情难明，不好放手打仗。敌情明了，遇着一团敌人，也可鼓一把劲。然而敌人是否一团一团向我们追击呢？没有这样笨的敌人，分散前来遭我们各个击破。如遭敌人追击，(我军)进既不能，退亦不可，与十六军也不能断定取得联系。这样一来，(孤军)深入袁水流域，是含有几分冒险性的。”“我们认为向遂万泰行动，正是与主力红军的行动相呼应，截断赣江交通，威胁吉、遂、万、泰之敌，使吉、赣之敌不敢大胆向中区前进。”为了使军委尽可能地理解和认可自己这一行动部署，蔡会文还在这个报告中郑重申明：“八军的行动当然是向北发展，向遂万泰行动是暂时的、是短期的，也正是实际地执行向北发展的任务，争取沿赣江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革命首先胜利。这一总的政治任务，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地动摇。”

红八军进入遂万泰边区之后，一面进行休整训练，一面开展地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不仅帮助建立了

遂万泰中心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而且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打击、牵制了吉安至赣州一线的敌人，支援了中央红军在抚河地区的战斗。并且恢复了遂川以北、永新以南的大片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天红八军在于田一举击溃敌二十八师四个营。四月七日，又对该处守敌八十三旅及一六六团发起佯攻，以调动龟缩遂川城之敌出援。结果仅用三十多分钟就将出援之敌一六五团一个营并一机枪连及该师迫击炮营全部歼灭，毙俘敌人四百余人，其中敌营长一名、连长三名，缴获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两挺、长短枪一百三十多支，扭转了湘赣红军在战斗中的被动局面。

一九三三年夏天，敌人进一步强化了攻势，在湘赣苏区周围和腹地进驻了九个师近四十个团的部队。其中陈光中部四个团已于四月五日攻陷莲花，并以莲花为据点向苏区腹地四周蚕食；王东原部六个团以宁冈为依托，盯住苏区中心之永新不放。当时，我江西军区特务团、公略独立团都急需返回中央苏区作战。身居湘赣省委要职的陈洪时、刘士杰也迫不及待地要东渡赣江。给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增加了困难。在此紧要关头，蔡会文立即从赣南挥师北上，返回永新，部署破敌战斗，并将吉安及永新独立团编成警卫师，分别到宁冈、酃县和遂川、崇义活动，钳制湘敌王东原部和粤敌余汉谋部。同时命令萍乡独立团

和醴陵游击队编成新独立一师出击东朝、黄土街、老关之线，牵制湘东之敌，并将北路独立团及各县独立营编成新独立三师，在泗气墟、三湖、河埠一带游击，相机打击敌二十七师、二十三师等部向北路进犯。又抽调各县地方武装组成挺进游击队，积极向敌后活动，迷敌扰敌，牵制敌人主力。部署之后，蔡会文、萧克亲率红八军打击深入苏区腹地之敌，在运动中逐次剪灭其爪牙。

湘敌王东原和陈光中部虽然在宁冈、莲花构筑了大量工事，互为犄角之势，给红军出击造成了困难。但是敌人这些据点，又相对地处于苏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加上各地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对敌人进行严密封锁，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了行动和供应的极大困难。因此，湘敌不得不以茶陵至莲花的唯一通道，作为他们保证给养供应的生命线，并经常派两三个营的骑、步兵在九渡冲一线警戒。为了截断敌人的交通，威胁、动摇敌人前方，迫使敌人守城部队出援，从而在运动战中予以消灭，五月初，蔡会文、萧克即将部队布置于棠市、九渡冲一线，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捕捉战机。自六日到月底，红八军集中全力并有独立十二师协同，在九渡冲、棠市一带连战皆捷，击溃敌六十三师三个团，全歼其两个整营，打垮敌十五师一个旅，消灭十九师一个团，俘敌近千，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三十余挺、二瓦特电台一架，并截获八千多套军装及大量辎重，取得了以少数兵力、劣等武器战胜拥有优势兵力之敌的空前胜利，

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孤注一掷，亲自出马，设行营于南昌，委刘峙、何键、刘建绪、陈济棠等军阀分任各路“剿总”，发起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西路“剿总”、国民党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将总部移驻莲花，统率彭位仁、陶广、李觉、陈光中、王东原五师之众，向湘赣苏区进攻。

为了打破敌人这次更大规模的进攻，蔡会文在五月间就开始了下一战役的准备工作。为了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他要求苏区人民动员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入伍；要求干部关心爱护士兵，尽量改善士兵的生活和待遇；要求各级地方党政部门积极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有计划地深入白区活动，破坏敌人的进攻部署；同时指令各部队派员打入白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加强对白军士兵的革命宣传；并设法同一切真正愿意抗日的友军订立停战协定。在军事行动方面，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分析敌情，对敌人要有正确的估量，同时要有迅速的决心，不应犹豫不决以致贻误战机，应以积极的行动，选择敌人的弱点，在各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消灭敌人一路；又指示各级地方武装用大部分力量组成挺进游击队，深入到白区与敌人的前后左右，实行扰敌、截敌，破坏敌人的交通，断绝敌人的后路，以运动战略来保卫和发展苏区。为了让地方武装在战斗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对挺进队的任务、行动方法和战略战术原则，一

一进行具体指导。由于这些正确部署得到较好的实施，苏区军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广泛开展，终于迫使占领苏区腹地局部的强敌，除了派出小部队进退无常地进入苏区中心骚扰外，其余只好龟缩在碉堡工事里与红军相抗衡。

一九三三年秋后，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坚决执行进攻路线，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湖南敌人，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犹崇义苏区，打通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联系，以利向北发展，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从七月底开始，红六军团（由红八军改编的十七师及湘鄂赣红十六军改编的红十六师组成）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挺进到莲花、宁冈、茶陵，十月进兵醴陵。这一系列战争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造成梅花、七溪岭和永新城的失守。此时，蔡会文积极设法挽回局面，争取永新和万(安)、泰(和)地区的重新赤化。

在湘赣时期，由于蔡会文坚持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作斗争，导致了左倾领导者对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蔡会文辞去红十七师政委职务，调回省军区机关工作。在省委会议上，把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后来，刘士杰等去参加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向中央报告了蔡会文的情况。于是中央又撤销了蔡会文湘赣军区总指挥的职务。萧克在回忆中说：蔡会文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挫伤了一些干部的积极性。但是，他在

湘赣工作一年多，成绩是主要的，指挥打仗，建设军队都有很大功劳。他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工作也是积极的、负责的，把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当作一条错误路线来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后来撤销他军区总指挥的职务，更是做得过分了。

五

一九三四年春，蔡会文参加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四月，�门岭战斗失利，中革军委任命蔡会文担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重任。主力红军准备长征的前夕，中央又于九月委派蔡会文任赣南省军区司令员，与项英、陈毅、方维夏、贺昌、阮啸仙等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实行长征。以项英、陈毅为首组成江西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率领红二十四师和三、七、十一等独立团，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由于项英继续坚持大兵团作战的错误方针，使红军兵力锐减，最后被压到于都与赣县之间的仁凤山区。后来中共中央多次来电敦促江西中央分局及所属部队“应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项英才决定分五路突围。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蔡会文、陈丕显、阮啸仙、刘伯坚等率领赣南省军区部队一千八百多人，开始从仁凤山区的黎板桥

突围。蔡会文、陈丕显亲率先头部队为省委机关干部和后续部队开路。他在突围途中写了一首《七绝》，真切地流露出他对中央苏区的依恋心情，表达了他冲破艰难险阻，为革命开辟新的战场的坚定信心。这首《七绝》如下：

连天烽火炮声隆，
惜别赤都情意浓；
突破重围千万叠，
挥戈直指油山中。

部队进到马岭，两山之间突然响起猛烈的枪声，密集的火网把部队拦腰截断。赣南省委和省军区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全被打散，红军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省委书记阮啸仙不幸牺牲，军区参谋长刘伯坚也因重伤被俘（后被杀害于大余）。为了打破敌人的堵截，陈丕显不断鼓励战士奋勇拼杀，蔡会文身先士卒，端起一挺轻机枪冲在最前头为部队开路，战士们紧紧地跟在他后面，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闯过马岭，进入牛岭。

牛岭系战略要道，敌人在这里筑有坚固的堡垒，凭坚死守，红军无法通过。蔡会文果断决策，立即挑选一批精壮战士，组成突击组和爆破组，并亲自带领突击组冲入敌阵，迅速抢占了一个制高点，用猛烈的扫射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接近敌堡，完成了爆破任务。突破敌人设在牛岭的碉堡防线之后，蔡会文带领部队继续向南挺进。

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部队伤亡惨重。突围时

红军有一千八百人枪，冲过牛岭之后仅剩八十余人。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司令员成了个连长了。但是蔡会文仍然坚毅地带领大家奋勇向前，凭一个指南针，借助风雨辨别方向，看一山，走一山，来到桃江。沿途被打散和负伤的战士也陆续赶上了队伍，总计又有三百多人。蔡会文一面让大家稍事休息，一面派人去找当地党组织。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又饥又乏，一听休息，身子一躺下便呼呼入睡了。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一觉醒来，发现蔡会文在为大家警戒，激动地说："司令员，你也该休息了。"蔡会文兴奋地说："阿丕同志，现在好了，我们找到大龙区委了。"说罢，顺手把刚填好的一首《好事近》词递给陈丕显。词曰：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大龙区委为部队补充了给养，战士们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征途。行至离信丰河十多里的地方，前面有敌军挡道，被甩掉的追兵也从后面尾随赶上。蔡会文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以猛虎扑羊之势，击溃敌军，进至信丰河边。信丰河

水深难渡，敌追兵和被击溃的敌残部会合后又压了上来。蔡会文立即命令部队抢占一个山头。这座山前面是一道缓坡，后面却是悬崖。红军部队刚到山顶，敌人就在坡面展开了。指战员们异口同声喊道："不走了，和敌人拼了！"大家同仇敌忾英勇奋战，没有子弹了，就用石头砸；石头打完了，就拼刺刀。有的同志刺得太猛，刺刀拔不出，干脆就用枪托和敌人拼打。这时不少重伤员要求蔡司令员把自己留下掩护突围。许多共产党员都来找蔡会文，"请求党给我们最后一次任务"，表示坚决战斗到底。蔡会文始终跟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战斗在前沿阵地，终于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叫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当绳子，准备把指战员们吊下悬崖脱险。绳子扎牢之后，同志们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先下，急得几个团、营干部无法，就一拥而上，把蔡会文捆住，说："为了党的工作，为了部队的生存，你司令员一定得先下去。"不容分说，大家硬把他吊下悬崖，然后其他同志才一个个吊下去。待敌人追至悬崖，红军已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从王母渡过了信丰河。这时我军好一点的武器只剩下一挺轻机关枪了。

从仁凤山突围到渡过信丰河，历时近一个月，蔡会文带领部队战马岭，闯牛岭，过桃江，渡信丰河，打破敌人的重重堵截，以拖不垮、打不散的英雄气概开辟了通向油山的道路。蔡会文在戎马倥偬中哼就的《浪淘沙·突围行军记事》，生动地再现了英雄红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迈气

概：

料峭春寒溶，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如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四月初，蔡会文、陈丕显率领部队来到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同志会师。

每当回忆这段战火纷飞的戎马生涯，陈丕显就对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蔡会文充满敬意和怀念之情。他说：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油山这一段时间，我几乎与蔡会文寸步不离。我常说，没有蔡会文的正确指挥，就没有我们这支红军部队。因为当时领导突围的阮啸仙、刘伯坚先后牺牲，剩下蔡会文和我，我当时年轻，又没有作战经验，部队往哪儿冲，怎么打，都是蔡司令员亲自指挥。他年轻英俊，能文能武，很会打仗，作风过硬。他那时年纪不过三十左右，然而他对革命之坚定，操算之稳重，指挥之得当，却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那老练持重的态度，以身作则的作风，实在叫人佩服。

六

根据南方游击总指挥部长岭干部会议的决定，蔡会文带领一支三百人的红军武装，到上犹、崇义、桂东、汝城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蔡会文率领部队来到湖南桂东县的东边山，与方维夏、周礼、陈山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央湘粤赣边特委和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蔡会文任特委委员、游击支队长兼政委，罗荣任参谋长，特委决定以赤水仙为游击支队总部，以桂东的东边山、西边山为活动中心，深入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

西边山，山大林密，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地处湖南境内，主要敌人只有湘军，比较容易对付。东边山是湖南、广东和江西的界山，一拉旗帜，震动三省，因此招来的敌人也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牵制更多的敌人，保卫设在北山的南方游击总部机关，支援北山、油山的游击战争，蔡会文亲自率领两个大队进入东边山，为革命勇敢地承担起更大的风险。

蔡会文来到东边山之后，立即带领战士深入到各个山村，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和

欺骗伎俩，组织群众参加与支援游击战争。

东边山群峰绵亘，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一听说“兵”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躲进深山，蔡会文带领指战员经常深入山庄空院，为老乡打扫屋场，挑水，割草垫圈，到老百姓家里买吃的，总是按斤两加价付款，老百姓不在家便写个字条，留下现金。当地群众终于明白了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来了，高兴地互相传递红军到过自己家里的消息，都主动地跟游击队亲近起来。

东边山的老乡，长期受豪绅地主和反动势力的盘剥勒索，生活穷困不堪。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蔡会文经常带领游击队下山打土豪。当时，虽然部队生活很艰苦，突围出来，战士们除了枪支外真是一无所有，但都把打土豪得到的衣物首先分给了群众，老百姓非常感动。在打土豪的斗争中，蔡会文特别注意执行党的阶级政策，每逢抓了人，都要请当地老百姓辨认是不是土豪。有的老乡怕土豪认出了自己以后遭报复，不敢去认，蔡会文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他穿上，叫他站在暗处去认。群众发动起来了，青壮年争着参加红军游击队，老年人和妇女自动为游击队购运物资，担任秘密交通员，有的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红军游击队的安全。方冈有个老人叫方传启，敌人抓住他带路去搜山，老人家领头走到一座桥上，他突然返身拖住一个敌人跳进河里，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蔡会文经常教育干部战士，群众越是拥护，越要关心

爱护群众，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注意群众纪律。上庄有个李春源，经常为游击队送情报，跟游击队亲如一家。因为他很瘦，有些人叫他“鸦片烟鬼”，蔡会文总是亲热地叫他“老李”。李春源一来，蔡会文把饭菜送到他手上，问长问短，还留他跟自己睡一张床。有一次，一个战士弄坏了老李一盒如意油(即清凉油)，被蔡会文知道了，就要那个战士赔偿两个铜毫子，老李不肯要，不声不响地走了。事后蔡会文打发警卫员从晓水坳追到谷耙垅，赶了十二三里路，硬把两个铜毫子交给了李春源。

由于蔡会文卓有成效的工作，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包括湖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赣南的遂川、上犹、崇义、大余和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边沿地区。游击支队也很快壮大到一千人。尽管敌人纠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对游击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仍然非常活跃地战斗在三省边界上。

七

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红军游击支队的不断壮大和活跃，引起了湖南、广东和江西三省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迅速集结三个主力师，又纠合游击根据地周

围十数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以数十倍于游击队的优势兵力，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进行“会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并强迫移民并村，控制集市贸易，进行经济封锁。敌人还利用叛徒李宗保（原红四团团长）等恶棍做向导，到处搜山纵火，洗村劫寨，把崇义的冬瓜棚、赤水，上犹的十八垒，桂东的上下庄、晓水、芳村等数十个山村化为焦土。上庄贫农妇女李凤媚来不及逃难，一家大小全被杀绝。由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造成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荒凉凄惨景象。

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会剿”，蔡会文想了许多办法。敌人大规模进攻，游击队就化整为零，编成十几人至三四十人一个小分队，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分散到各个山头隐蔽起来，不和敌人硬拼，实行“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方针。兵力分散，目标小，但也要警惕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了保证兄弟部队的安全，蔡会文常常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次，他和周礼、罗荣带领四十多个战士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朱冠山赤水仙庵子下面的山腰里。庵子里驻敌人一个营。粤敌彭霖生的师部驻扎在庵子下面的上堡墟，庵子左面的上犹营前墟还有敌人一个团驻守。蔡会文领导的小部队离前后左右的敌人大部队都不过三十里，他们今天在这个小山头，明天到那个小山头，使敌人摸不着，碰不上，又离不开。在战役上，他们“赚钱就干，赔本不来”，一遇战机，迅速集合，歼灭敌人。有一次，

何键部三个连来搜山，蔡会文带领一支小部队正在一个陡坡上，很远就看见敌人一个连在搜索前进，蔡会文果断地对周礼说："送上砧的肉，先吃掉它一个连再说。"待敌人进入射击区，蔡会文指挥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一个猛虎下山，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听到枪声，隐蔽在其它山头的兄弟部队也迅速合围过来，将敌全歼。

敌人分散进击的阴谋被粉碎之后，又组织起所谓"跟着队"、"望火队"、"砍山队"，绞尽脑汁企图找到游击队这支"飞兵"。蔡会文又教育指战员涉水过溪莫踩露出水面的石头；用干柴生火，趁浓雾做饭，不让敌人发现一点痕迹。他还让战士们化装成民工，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把带队砍山的地主恶霸、保长干掉。敌人的阴谋又破产了。发疯的敌人到处放火，把山上的民房烧个精光，连厕所也不留。群众却对战士们说："让他们烧吧，烧了旧的，以后我们盖新的。"战士们非常感动地说："老俵，这话说得对呀！我们队伍里木匠、石匠、泥水匠有得是，帮你们盖新房，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还要盖高楼大厦呢！"

敌人切断了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给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克服眼前的困难，蔡会文跟部下一样，没有东西煮饭，就用稍大一点的水缸残片或搪瓷缸煮，没有粮食就吃野草。

一九三五年秋后，东边山的斗争日趋困难，油山、北山等根据地的处境也更加艰难，蔡会文立即派出一个大队

到项英、陈毅处，支援总部。之后不久，又派出一个小分队深入湘赣根据地，支援谭余保领导的游击斗争。

由于战争越来越残酷，生活越来越艰苦，游击队里叛逃事件常有发生，特别是原湘粤赣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之后，给部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为安定部队情绪，坚定大家的信心，蔡会文深入到各个游击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召开会议，帮助大家认清革命形势和前途。他对战士们说：敌人把我们逼进了深山，条件自然艰苦些，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绝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要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要有坚定的信念。他还说：我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呆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而甘愿吃这个革命的苦？根本原因，就是我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革命红旗扛起来，扛到底。他向大家讲述革命一定会胜利时说：我们的部队虽然小，我们可以占山为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不断扩大根据地。过去贺胡子(即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毛委员上井冈山时人也不多，却搞红了小半个江西。我们有大家在，为什么不能搞红整个湘粤赣边？我们不要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住，其实敌人并不可怕，敌人象一头很凶又很笨的野牛，在深山密林里瞎闯，我们有时敲它一下脑壳，有时钻它一下屁股，有时给它拦腰一棍

子，有时牵着它的鼻子满山转，它发怒了，朝我们猛冲，我们又闪到它的身子后面……这样，牛魔王碰上了孙悟空，即使它再肥大，再凶猛，也要被拖瘦、拖垮、拖死。蔡会文生动形象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一九三五年冬天，敌人为了对付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广东军阀陈济棠不仅搬出他的精锐第一军，而且增派了铁甲兵教导团；湖南方面也补充了胡凤璋旅和何宗汉保安团，并指令衡阳卫戍司令欧鉴京前往桂东“督剿”。叛徒龚楚也顶着“剿共游击司令”的头衔，进山充当帮凶。时值隆冬腊月，寒风彻骨。被困在丛林里的游击战士缺衣少食，忍受着极度的痛苦，与饥寒作着顽强的斗争。形势虽然十分险恶，蔡会文仍镇定自若，指挥小分队在显垅、上堡、晓水坳、刘家排、鹰打圈等处给了敌人以无数次的打击。胡凤璋赔了老本，就在桂东一带强迫每个农户出一二个壮丁，拼凑“民团”替他当炮灰。这些民团没有经过训练，又不穿军装，而且大多数是冬天守着火塘熬日子的贫苦农民，故红军战士称他们为“灶头勇”。蔡会文提出“不打灶头勇，专打胡凤璋”、“穷人不打穷人”等口号，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所以，“灶头勇”一遇到红军游击队就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还向游击队透露了敌人的消息。

一九三六年初春，在一次与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被打散。蔡会文身边仅有十多名战士，只得向朱冠山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他只带

领九名战士来到一幢破房子里稍事休息。由于连续转战，他们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见过一粒米，个个又饥又累。蔡会文叫管理员下山买粮，不料管理员一下山就被俘叛变。这个叛徒竟带着化了装的广东铁甲兵教导团来搜山。当时，蔡会文正跟战士们在破房子里煮野菜。敌人悄悄地包围过来，我哨兵刚鸣枪报警，就被敌人击倒。蔡会文闻声跃起，举枪还击，掩护战士突围，自己带两名警卫员断后。他们才突围到麻婆垅的一座山脚下，一名警卫员中弹牺牲，蔡会文也多处负伤。战士们要背着蔡会文撤离，他说："你们赶快走，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冲出去！"他伏在地下仍坚持举枪还击。让剩下的战士安全脱险。这时，他背部又中一弹，昏倒在血泊中，被敌人俘获。敌人得知他就是蔡会文司令，立即备了竹椅要把他抬回去请功。蔡会文苏醒之后，破口大骂叛徒和白匪，不准敌人把他抬走。敌人恼羞成怒，竟残忍地用刀割断了他的脖子，顿时，鲜血从咽喉里喷出，蔡会文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蔡会文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和全部才华，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是装着满肚子草根、树叶为革命而英勇战死的。蔡会文将军永垂不朽！

（刘普庆　谭运湘）

解放军将领传

（四）

*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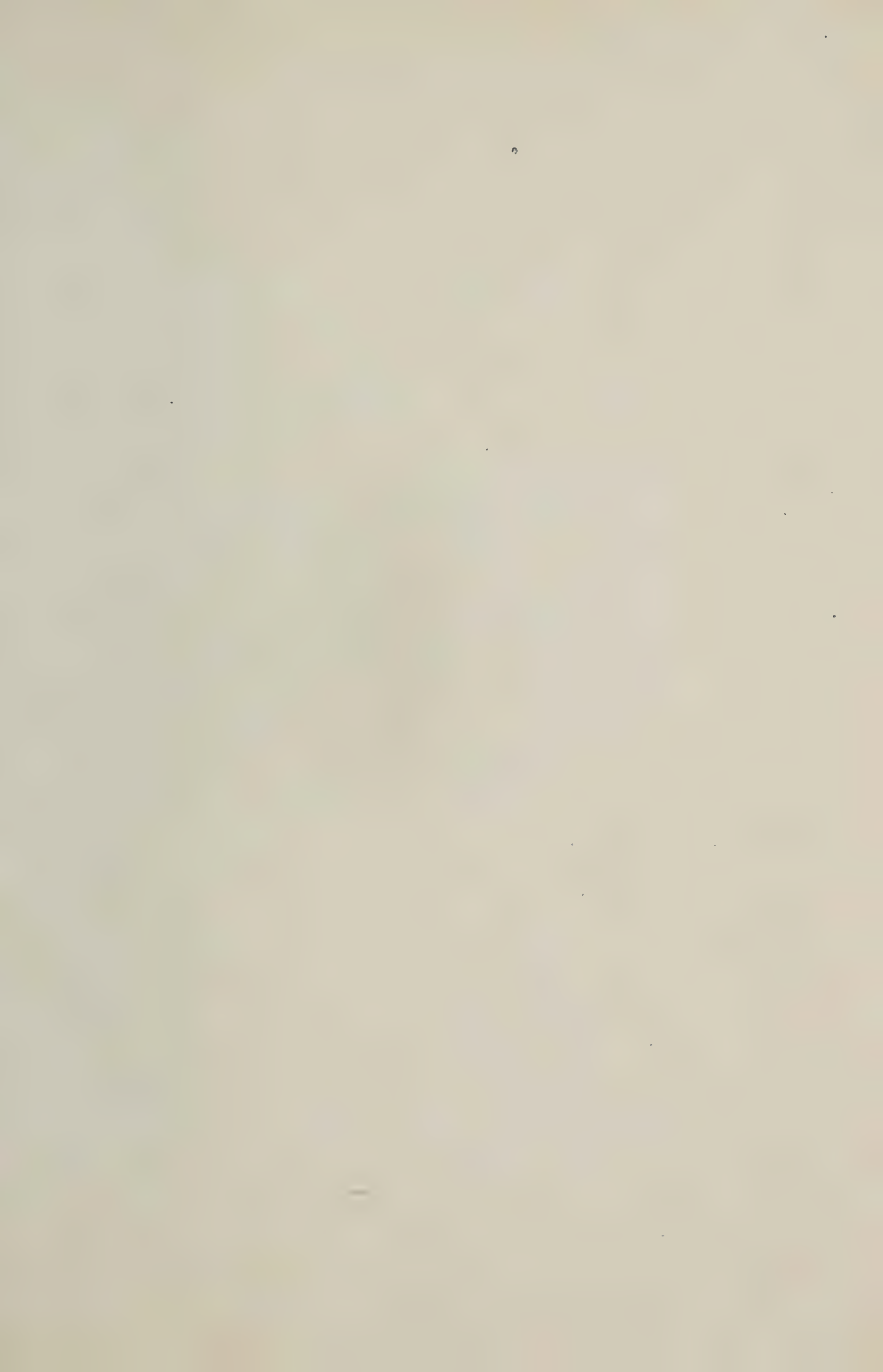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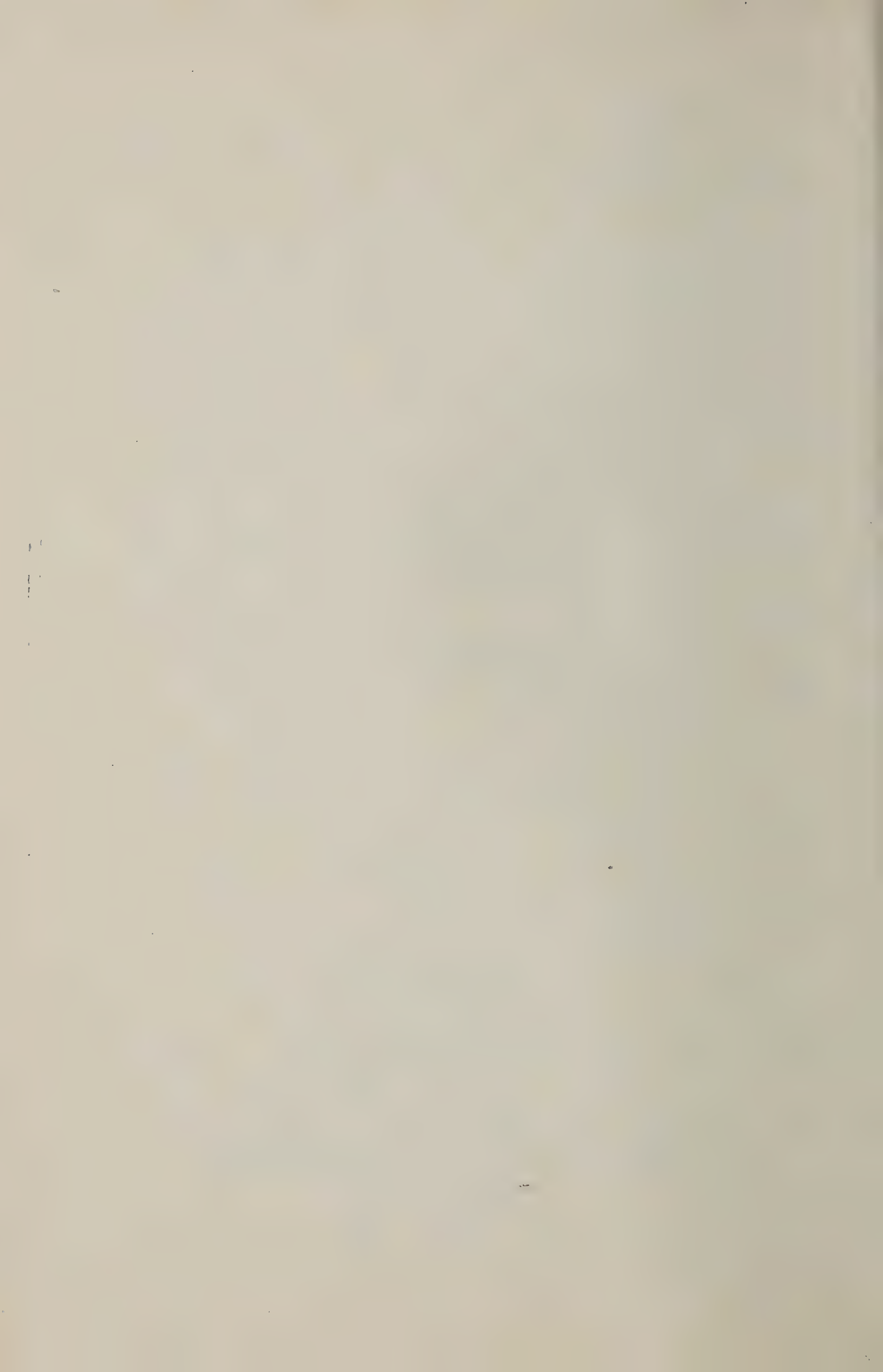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5・字数3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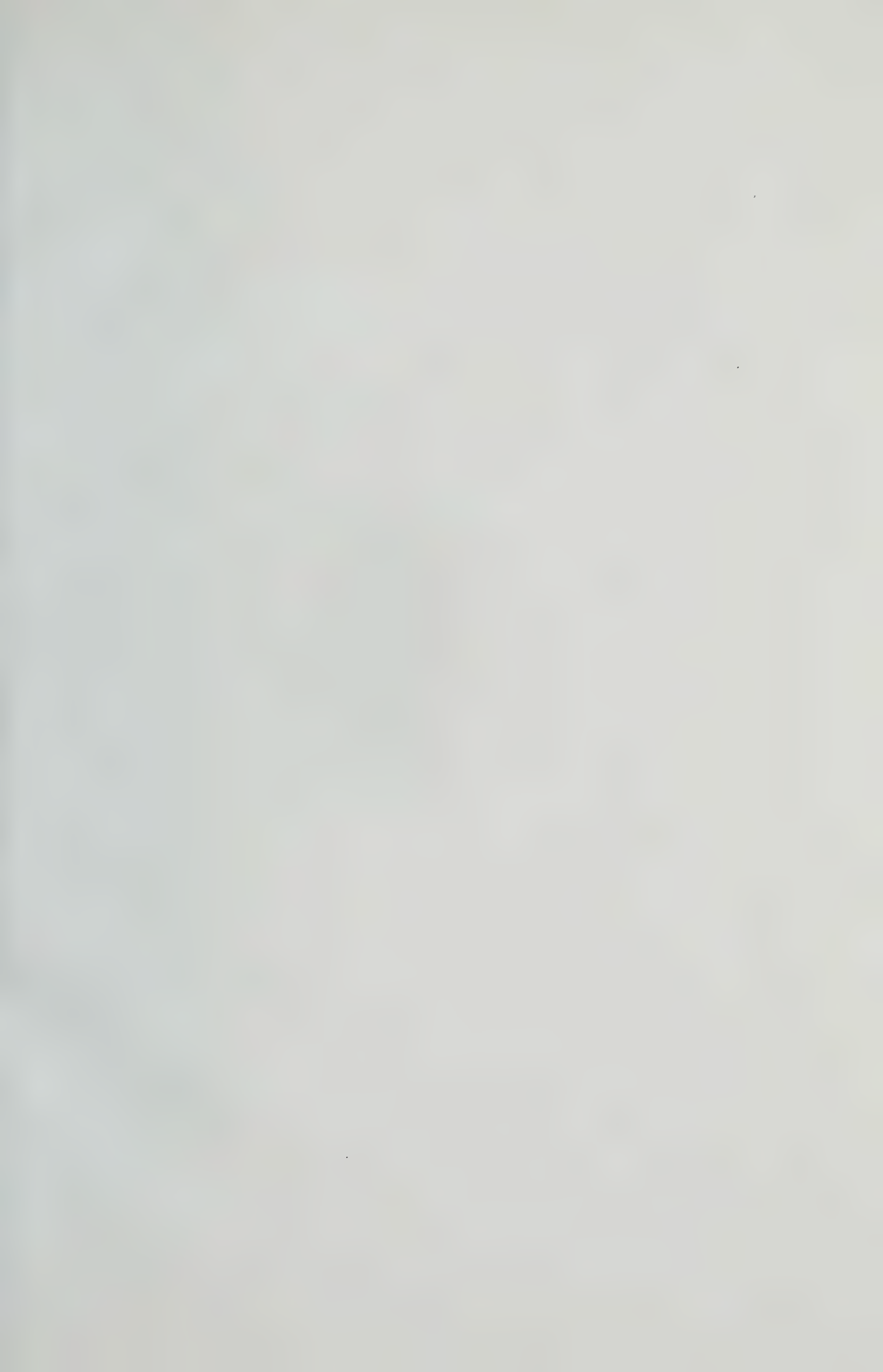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 000

统一书号：11185·81 定价：4.00元















责任编辑：王　伟
封面设计：姜学亮

书号：11185·81
定价：　4.00元







